

論民族問題

斯大林著
張仲實譯

斯大林著
張仲實譯

論民族問題

一九三九年五月出版

論 民 族 問 題

每冊實價

著 者 斯 大 林

譯 者 張 仲 實

代售者 生活書店

版權所有 ★ 不准翻印

中 華 民 國 二 十 八 年 五 月 再 版

KA645
1-4000

譯者的幾句話

本書是一個彙集，凡斯大林關於民族問題所有的言論，都搜羅在它的裏面。著者的偉大的名字，就顯示出了本書的重要性，用不着譯者再來多囉嗦。

我們知道，在革命前的帝俄境內，居民的民族構成，極其複雜，大小不下百餘種。因此，民族問題和民族政策，不論在「十月革命」以前或在「十月革命」以後，在革命政黨——布爾塞維克黨的工作中，都佔着很重要的地位，路線稍一錯誤，就要引起民族間莫大的糾紛，削弱革命的力量而在「十月革命」以前或「十月革命」以後，布爾塞維克黨關於民族問題的大政方針及實踐方法，便都是由列寧和斯大林主持及決定的。我們打開布爾塞維克黨史，就可以看出，該黨所有關於民族問題的文件——提綱，報告，決議案，大半是出於斯大林的手的。在「十月革命」以後，蘇維埃政權爲了處理複雜的民族問題，政府機關內曾設立了一個民族事務人民委員會，主持該部的

原
角
567.31

就是斯大林。所以，斯大林的關於民族問題的言論，像列寧的一樣，不論在革命前或革命後，在布爾塞維克黨中始終佔着權威的地位。今日蘇聯大小百餘種民族的親睦合作與各民族經濟文化的欣欣向榮，就證明了列寧和斯大林關於民族問題理論與實踐的絕對正確。

我們中國，地廣人衆，居民的民族構成，也相當複雜，這是人所共知的。所以，民族問題和民族政策，在我們的建國工作中，也佔着重要的地位。雖然，中山先生的民族主義，已經給了我們一個原則『一則中國民族自求解放；二則中國境內各民族一律平等』；但是怎樣去實現這個原則，還待我們努力研究。尤其在今日，在我們對日本帝國主義實行抗戰的今日，怎樣澈底實現中山先生的民族主義——對外求得整個中華民族的獨立與自由，對內實行各少數民族的平等，更引起各方的注意。以此說來，斯大林的這本書，對於中國讀者，實在有着莫大的參考價值。因此，譯者在漢口的時候，便於工作之暇抽空把它譯了出來。

譯後鑒於本書的重要，譯者不大放心，曾將全稿請黃文杰先生校閱了一遍。黃先生的俄語造詣，極其高深，而且他老先生作事，認真負責，一毫不夠。就他看過的底稿看來，他曾把全稿逐字逐句對照原文校閱了一遍。但這並不是說，本書在譯文方面，已經盡善盡美，完全沒有錯誤了，而只是說，全稿經過黃先生看後，譯者稍微覺着安心一點吧了。

仲實

一九三八年終日，即赴新前三日於重慶。

目 錄

譯者序言.....	一
馬克思主義與民族問題（一九一三年）.....	一
一 民族.....	四
二 民族運動.....	一九
三 問題的提法.....	三〇
四 民族自治.....	四一
五 猶太工人同盟及其民族主義和分離主義.....	五七
六 高加索人，取消派的代表會議.....	七八
七 俄國的民族問題.....	九五
關於民族問題的報告（一九一七年四月二十九日在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七	

次全俄會議上的報告	一〇七
結論	一一五
十月革命與民族問題（一九一八年）	一一七
一 二月革命與民族問題	一一七
二 十月革命與民族問題	一二一
三 十月革命的世界意義	一二六
蘇維埃政權對於俄羅斯民族問題的政策（一九二〇年）	一三二
論黨在民族問題方面的迫切任務（一九二一年向俄國共產黨第十屆代表大會報告提綱，經黨的中央委員會所批准）	一四七
一 資本主義制度與民族壓迫	一四七
二 蘇維埃制度與民族自由	一五一
三 俄羅斯共產黨的迫切任務	一五六

黨在民族問題方面的迫切任務（一九二二年三月十日在俄國共產黨（布

）第十屆大會上的報告）

一六四

結語

一七七

論民族問題的提法（一九二一年）

一八三

十月革命與俄羅斯共產主義者的民族政策（一九二一年）

一九二

論各蘇維埃共和國的聯合（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在第四屆全俄蘇

維埃代表大會上的報告）

一九七

論各蘇維埃共和國的聯合（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三十日在蘇聯第一次蘇維

埃代表大會上的報告）

二一〇

黨的建設與國家建設中的民族因素（對俄國共產黨（布）第十二次大會

報告提綱經黨的中央認可）

二二九

一

二二九

二	黨的建設和國家建設中的民族因素（一九二三年四月二十三日對俄國共產黨（布）第十二次大會的報告）	二四一
	結語	二四六
	在俄國共產黨（布）中央與各民族共和國和民族區負責工作人員第四次會議上的演說（一九二三年）	二八四
一	論各民族共和國和各民族區內的「右派」與「左派」（一九二三年六月十日關於會議日程第一項「蘇丹·加里也夫案件」的演說）	二八四
二	論各民族共和國和特別區馬克思主義幹部的培植與鞏固（節錄一九二三年六月十日關於議事日程第二項「黨的第十二次大會關於民族問題議決案實施方案」的報告）	二九八
	十月革命和中等階層問題（一九二三年）	三〇五

民族問題（節錄一九二四年四月初在斯威特洛夫大學所講授的講義）論

列寧主義的基礎』）……………三二三

論南斯拉夫的民族問題（一九二五年三月三十日在共產國際執委南斯拉

夫委員會上的講演）……………三二九

東方大學的政治任務（一九二五年五月十八日在東方大學學生會議上的

演說）……………三三八

一 東方大學對於東方各蘇維埃共和國的任務……………三四〇

二 東方大學對於東方殖民地及附庸國家的任務……………三五一

再論民族問題（關於舍米契同志的文章）……………三六一

給卡加諾維赤同志及烏克蘭共產黨（布）其他中央委員的信（一九二六年）……………三七五

論中國（摘自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聯共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聯席

會議上的演說：「國際現狀與蘇聯的國防」）……………三七九

論無產階級解決民族問題方法的問題（摘自『十月革命的國際性質』一

文）（一九二七年）……………四一三

論民族問題方面的各種傾向（摘自一九三四年六月二十七日在聯共（布

）第十六次大會上的報告）……………四一七

摘自結論……………四二九

論民族主義的各種傾向（摘自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六日在聯共（布）第

十七次大會上關於中央工作的報告）……………四三五

附 錄

（一）聯共（布）關於民族問題決議摘要……………四四〇

一 民族問題決議案（一九一七年四月）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七次

全國臨時代表大會通過……………四四〇

二	關於黨在民族問題方面的迫切任務（一九二一年三月間俄國共產黨（布）第十屆代表大會所通過的議決案）……………	四四三
三	黨的建設和國家建設中的民族因素（一九二三年四月俄國共產黨（布）第十二屆大會所通過的議決案）……………	四六二
四	摘自關於中央報告的議決案（一九三〇年七月聯共（布）第十六次大會所通過）……………	四八〇
五	摘自黨綱（一九一九年三月間俄國共產黨（布）第八次大會通過）……………	四八一
	（二）註解……………	四八五

馬克思主義與民族問題 (二)

——一九二三年——

俄國反革命的時期，不僅帶來了「雷鳴電閃」，而且帶來了對運動的失望，帶來了對於一般力量的不相信。當人們相信「光明的前途」的時候，大家不分民族，都在一塊兒奮鬥；總的問題放在第一！當靈魂中潛入懷疑的時候，大家便開始依民族的營壘而分裂：每個人都只是爲自己而打算！「民族問題」便放在第一了！

正在這個時候，俄國又發生了嚴重的經濟生活的毀壞。一九〇五年不是空過了：鄉村中農奴制度的殘餘，又受了一次打擊。飢荒後的連年豐收以及後來來到的工業的興盛，把資本主義向前推進了一下。鄉村中的分化和城市的增長，貿易與交通的發展，更向前走了一大步。這在邊疆，尤其如此。不過這不能不加速俄羅斯各民族的



經濟團結的過程。俄國各民族也應當動作起來了……

在這個時候所確立的「立憲制度」，對於各民族這種醒覺的方向也有影響。報紙和一般出版物的增長，出版與文化機關的若干自由，民族戲院的增加等等，無疑的，在在都促進了「民族感覺」的加強。國會及其競選運動和各種政治集團，也給了與舊各民族的新可能，給了動員各民族的新的大舞台。

從上掀起的戰鬥的民族主義的浪潮，「執政者」方面爲了報復各邊疆的「愛自由」而採取的種種壓迫，却反而從下引起了民族主義的逆潮，這種民族主義有時竟轉爲感奮的沙文愛國主義。猶太人當中西翁主義(二)的加強，波蘭排外愛國主義的日益增長，韃靼人中間的大回教主義(三)，亞美尼亞人、喬治亞人、烏克蘭人中間的民族主義的加強，庸人俗子的一般傾向於反猶太主義方面——所有這些事實都是人人知道的。

民族主義的浪潮一天比一天兇猛，而有波及於工人羣衆之虞。解放運動愈加消

沉，則民族主義的花越開得鮮麗。

在這個困難的關頭，有一個最高的使命落在社會民主黨的肩上，那就是給民族主義以抵抗，預防羣衆染上一般的『流行病』。因爲，社會民主黨，而且只有它，才能做到這一點，它以試驗過的國際主義的武器，以階級鬥爭的統一和不可分性跟民族主義對立起來。民族主義的浪潮來得越兇猛，則社會民主黨爭取俄國一切民族無產者之親睦與統一的呼聲，應當喊得越響亮。在這種情形之下，直接與民族主義運動接觸的邊疆社會民主派，更須有特別的堅定性。

不過，並不是一切社會民主派，都能勝任，尤其是邊疆的社會民主派。猶太工人同盟（四），從前很重視一般的任務，現在已把自己的特殊的純粹民族主義的目的放在第一位：事情竟弄到這樣的地步，就是它把『紀念禮拜六』和『承認猶太俗語』，宣佈爲自己的競選運動的戰鬥條文了（見猶太工人同盟第九次會議報告）（五）。跟在猶太工人同盟屁股後面的，則有高加索人；一部分高加索社會民主派，從前跟其餘的高

加索社會民主派共同否認『民族文化自治』，而現在他們竟把『民族文化自治』作爲當前的要求了（見八月會議的情報）。至於用外交手腕去默認民族主義動搖的取消派代表會議，（六）那就不用再提了。

從這裏可以得個結論說，俄國社會民主黨，對於民族問題的見解，還沒有爲一切社會民主派所明白。

因此，對於民族問題加以認真的和各方面的討論，那是很必要的。澈底的社會民主派，要親密而不倦的工作，以反對不管他從那裏來的，民族主義的雲霧，這是很需要的。

一 民族

什麼叫做民族？

所謂民族者，這首先是個人們的集團，一定的人們的集團。

這一集團不是種族的，也不是部落的。今日意大利的民族，是由羅馬人、日耳曼人、愛特魯利亞人、希臘人、阿拉伯人等等所組成的。法蘭西的民族，是由高盧人、羅馬人、布利特人、日耳曼人等等所構成的。至於那些由不同的種族與部落的人們而構成一個民族的英人、德人等等，亦是如此。

所以民族不是種族的集團，也不是部落的集團，而是歷史上形成起來的一個人們的集團。

別一方面，無疑的，偉大的基爾國或亞力山大國，都不能稱爲民族，雖然它們也是歷史上形成起來的，是由各個部落和種族所組成的。它們不是民族，而是偶然的和彼此很少聯繫的各個集團的凝結物，這種凝結物的分散與聯合是以某個征服者的成敗爲轉移的。

所以民族不是偶然的人們的凝結物，也不是一時的人們的凝結物，而是一個固定的人們的集團。

但是，並不是一切固定的集團都可以造成民族。奧地利和俄羅斯也都是固定的集團，可是，沒有一個人把它們稱爲民族。民族的集團與國家的集團有什麼分別呢？其分別就在於：民族的集團，若沒有共同語言，那就不可思議，而國家不必有共同語言。在奧地利的捷克民族和在俄國的波蘭民族，若沒有牠們之中每個所共同的語言，那是不可能的，但是俄羅斯和奧地利內部許多語言的存在，並不妨得牠們的完整性。當然，所謂語言，是指一般人所講的普通話，而不是正式的官語。

所以，共同語言乃是民族主要特點之一。

當然，還並不是說，各種不同的民族，隨時隨地都是說不同的語言，或者凡說着同一的語言的人們，一定要構成一個民族。每個民族都有共同的語言，但是，不同的民族不一定就有不同的語言！一下子就會說不同語言的民族是沒有的，然而，這還不是說，說一種語言的兩個民族是不能夠有的。英吉利人和北美利堅人，就說着一個語言，但是，他們並未構成一個民族。挪威人和丹麥人，英吉利人和愛爾蘭人，也是

如此。

但是，例如英吉利人和北美利堅人，雖有共同語言，但是爲什麼沒有構成一個民族呢？

首先是因爲他們不是共同住在一起，而是住在不同的領土上面。民族的結合，只是長期而經常的接觸的結果，只是人們代代共同生活的結果。而長期的共同生活，就非有共同的領土不可。英吉利人和美利堅人，從前他們是居住在一個地方——英吉利，所以他們曾經構成了一個民族。後來，一部分英吉利人，從英吉利遷居於新的地方——美利堅，於是在這個新的地方，他們經過相當時期，便形成了一個新的民族，北美利堅民族。不同的領土曾經形成了不同的民族。

所以，共同領土乃是民族的主要特點之一。

但是，這還不够。共同領土，其本身還不能造成民族。要造成民族，除了共同領土之外，還要有內部的經濟聯繫，把民族的各部分結合而成爲一個整體。英吉利和北

美利堅之間，沒有這樣的聯繫，所以，他們便構成了兩個不同的民族。但是，如果北美利堅的各部份，不由於他們彼此間的分工、交通的發展等等，而彼此間聯繫起來成爲一個經濟的整體，那末，北美利堅人也就不配稱爲民族了。

試舉喬治亞人爲例吧。在俄國農奴解放以前的時期，喬治亞人曾居在共同的領土上面，而且說的是相同的語言，可是，嚴格地說，他們却沒有構成一個民族；因爲他們分成了好多彼此不相往來的公國，不能過共同的經濟生活，數百年來他們彼此互相戰爭，互相破壞，使波斯人和土耳其人互相殘殺。某個倖運的皇帝，有時雖能使許多公國暫時的偶然的統一起來，但是，這一統一至多祇限於表面上行政的範圍，因各王公的意氣用事和農民的漠不關心，很快就瓦解了。這在喬治亞經濟散漫的情形之下，也非如此不可。喬治亞的成爲一個民族，只是十九世紀下半期的事情，那時農奴制的崩潰和國內經濟生活的進步，交通的發展和資本主義的發生，曾確立了喬治亞各區域間的分工，完全動搖了各公國的經濟閉關主義，而把牠們聯合起來成爲一個整體。

其他經過封建制度階段而發展到資本主義的各民族，也是如此。
所以，共同經濟生活，經濟的聯繫，乃是民族的主要特點之一。

但是，這還不够。除了上邊所說的一切之外，對於聯合而為一個民族的人們的精神容貌的特點，也須加以注意。民族與民族的分別，不但由於他們的生活條件的不同，而且由於表現在民族文化特質上的精神容貌的差異。如果操同一語言的英吉利、北美利堅和愛爾蘭，構成三個不同的民族，那末，在這一點上，他們代代由於不同的生存條件的結果所造成的那種特殊的心理狀態，實在演有不少的作用。

當然，心理狀態，或——像別種說法——「民族性格」，其本身對於考察家是一種不可捉摸的東西，但是，它既然表現於民族所共同的文化之特質，那麼，它就是可以捉摸的，而且不能忽視的。

不消說，「民族性格」，並不是永久不變的一種東西，它是隨着生活條件的變化而變化的；但是，它既然存在於每個特定的時期，那麼，牠在民族的形狀上便印下了

自己的痕跡。

所以，表現於共同文化的共同心理狀態，乃是民族的特點之一。

這樣，民族的一切特徵，已經說盡了。

總而言之，民族是歷史上結合而成的一個有共同語言、有共同領土、有共同經濟聯繫、以及有表現於共同文化的共同心理狀態的固定集團。

並且不言而喻的，民族亦如一切歷史現象一樣，是受變化的法則所支配的，它有自己的歷史，有其始亦有其終。

必須着重指出的，就是無論上述的任何一個特徵，都不夠用作民族的定義。反之：只要缺少上述的特徵之一，民族便不成其為民族了。

可以有有共同的「民族性格」的人們，但是，如果他們在經濟上分離散漫、住在不同的領土之上，操着不同的語言等等，那麼，仍不能說他們構成了一個民族。比方，俄羅斯的、加里西亞的、美洲的、喬治亞的以及達格斯坦山中的猶太人，便是如

此，在我們看來，這些猶太人便不能構成一個統一的民族。

可以有共同領土和共同經濟生活的人們，但是，如果沒有共同的語言和共同的「民族性格」，他們仍不能構成一個民族。比方，波羅的海邊區的日耳曼人和拉脫維亞人，便是如此。

最後，挪威人和丹麥人都是操着一種語言，但是，因為缺少其他的特徵，他們也不能構成一個民族。

只有一切的特徵完全具備的時候，纔算是一個民族。

有人說，「民族的性格」不是民族的特徵之一，而是民族的唯一重要的特徵，而且一切其餘的特徵，只是民族發展的條件，而不是民族的特徵。比方，奧國社會民主黨內有名的民族問題的理論家——希普林格，尤其是巴威爾，就是站在這種觀點上的。

現在我們就來研究一下他們的民族理論吧。

據希普林格說：「民族是一個思想相同和語言相同的人們的聯合」。又說：民族是「現代人們文化相同的集團，牠與「地方」沒有關係。」（希普林格著的「民族問題」四三頁，着重點是我加的——斯大林）

以此說來，民族是思想相同和語言相同的人們之一個「聯合」，不管他們彼此如何沒有聯繫，不管他們住在什麼地方。

巴威爾還更進了一步。他說：

「什麼叫做民族呢？——他問道——這是不是那把人們聯合起來而成爲一個民族的共同語言呢？英吉利人和愛爾蘭人……雖然操一種語言，但是，他們不是統一的民族；猶太人並沒有共同語言，然而他們却構成一個民族。」（巴威爾著的「民族問題和社會民主主義」，一至二頁。）

究竟什麼叫做民族呢？他說：

「民族是相對共同的性格。」（同上，六頁）

但是，什麼叫做性格呢，什麼叫做民族的性格呢？

所謂民族性格者，『乃是一國人與他國人所由以區別的一些徵候之總和，是一民族與他民族所由以區別的肉體特質與精神特質之集成物。』(同上，二頁)

巴威爾當然知道，民族的性格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因而他補充說：

『人們的性格無非是由他們的命運所決定的……所謂民族者，不是別的，無非是共同命運，而共同命運，又是由人們生產自己的生存資料和分配自己的勞動生產品的諸條件所決定的。』(同上，二四——二五頁)

這樣，我們便算得到最『充分的』(巴威爾的說法)民族定義了。

『所謂民族者乃是基於共同命運而結合成共同性格的人們之全部總和。』(同上，一三九頁)

以此說來，所謂共同的民族性格，則以共同的命運為基礎，而與共同領土、共同語言、和共同經濟生活，沒有應有的聯繫了。

但是，在這種情形之下，民族還剩下了什麼東西呢？試問經濟上彼此分散，居住於不同的領土之上，和代代操着不同語言的人們，還有什麼民族的共同性可言呢？

巴威爾說，猶太人是一個民族，雖然「他們並沒有共同的語言」（同上，二頁）；但是，比方，在喬治亞、達格斯坦、俄羅斯，以及美洲等地的猶太人，他們彼此完全隔離，居於不同的領土之上，而且操不同的語言，試問他們有什麼「共同的命運」和民族的聯繫呢？

上述的猶太人，無疑的，則與喬治亞人、達格斯坦人、俄羅斯人、和美國人過着共同的經濟生活與政治生活，與他們處於共同的文化氛圍中；這不能不在他們的民族性格上印下自己的痕跡；如果他們還保留有共同的東西的話，那末，這就是宗教、共同的淵源、以及民族性格的若干殘餘吧了。所有這些都是毫無疑義的。但是，如何能够鄭重地說，僵硬的宗教儀式與枯萎的心理殘餘，其對於上述猶太人的「命運」的影響，比之環繞他們的活的、社會經濟的、以及文化的環境，要來得更厲害呢？殊不知

只有在這種假定之下，纔能說一般猶太人是一個統一的民族。

巴威爾所說的民族與唯神論者所說的神祕的和獨立存在的「民族精神」有什麼分別呢？

巴威爾在民族的「特點」（民族性格）和民族的生活「條件」之間，立下了一道不可超越的界限，把牠們彼此隔離起來。但是，什麼叫做民族的性格呢？這不是生活條件的反映嗎？這不是從周圍環境中所帶來的印象的凝結物嗎？怎樣可以僅僅指出民族的性格，而把它和產生它的基礎孤立起來和隔離起來呢？

其次，在十八世紀末和十九世紀初，北美利堅還稱爲「新英吉利」，試問那時英吉利民族和北美利堅民族究竟有什麼分別呢？

其分別當然不在於民族的性格，因爲北美利堅人會出身於英吉利，他們除了英語以外，還隨身帶了英吉利的民族的性格到美洲去，他們當然不能夠這樣迅速地消失掉這種民族性格，雖然因受新的條件的影響，他們會形成了自己的特有的性格。不過他

們雖有多少共同的性格，然而，他們當時已經構成了一個與英吉利不同的特殊民族！很明顯的，當時「新英吉利」民族與英吉利民族的區別，不在於特殊的民族性格，或者與其說在於民族性格，而不如說在於與英吉利不同的特殊環境——生活條件。

這樣說來，很明白的，在事實上，任何唯一的特有的民族徵候，是沒有的。所有者，只是一些徵候的總和，在比較各民族時，其中有的是某一徵候（民族性格）特別顯著；有的是另一徵候（語言）特別顯著；有的則是第三個徵候（領土、經濟條件）特別顯著。所謂民族者乃是所有一切徵候的配合。

巴威爾的觀點，是把民族和民族性格看作相等的東西，他把民族和它的基礎隔離起來，使民族變成一個視而不見的獨立存在的力量。於是乎，他所說的民族，不是一種活的和行動的東西，而是一種神祕的、不可捉摸的、和死氣沉沉的東西了。因為，我再重說一遍，比方所謂猶太民族，是由俄國的、美洲的、達格斯坦的、喬治亞的、以及其他等地的猶太人所構成的，他們的構成份子，彼此語言不通，又居住在地球上

的各個部份，從來彼此沒有看見過，無論在平時或在戰時，從來都沒有一致行動過，試問這叫做什麼民族呢？！不，社會民主黨制定自己的民族綱領，並不是爲了這種紙上的「民族」！社會民主黨只能注意現實的民族，這種民族是行動的和前進的，因而使人不能不注意他們的。

民族是個歷史的範疇，部落是個人種學上的範疇，顯然的，巴威爾把兩者混爲一談了。

不過，在表面上看來，巴威爾本人也感覺着自己的立場的薄弱。在他的書中的起頭堅決地說，猶太人是一個民族（第二頁），而在該書的末尾又改正這種說法，而斷言說，「一般資本主義社會不許他們（猶太人）保持其爲一個民族」（三八九頁），把他們與其他各民族同化起來。他認爲原因就在於「猶太人沒有閉關自守的殖民區域」（三八八頁），而捷克人却有這樣的區域，所以巴威爾認爲，他們應當保持其爲一個民族。簡言之：原因就在於沒有領土。

巴威爾的這種議論，是要證明民族自治不能成爲猶太工人的要求（同上，三九六頁），但是，這樣一來，他無意中却推翻了他自己的理論，即否認共同領土是民族徵候之一的理論。

但是，巴威爾還更進一步。他在該書的起頭堅決地說：「猶太人並沒有共同的語言，可是，他們却是一個民族。」（同上，二頁）但是，他寫到一百三十頁，就已經轉移了自己的戰線，他同樣堅決地說：「不庸置疑的，無論任何民族，如沒有共同的語言，那是不可能的。」（同上，一三〇頁，着重點是我加的——斯大林）

巴威爾在這裏想證明，「語言是人類交際的最重要的一個工具」（同上，一三〇頁），但是，他同時却無意中又證明了他不願證明的東西，即：他的否認共同語言意義的民族理論，是不能成立的。

所以，由唯心主義線索所織成的理論，是自己推翻了自已。

二 民族運動

民族並不簡單地是個歷史的範疇，而是一個一定時代的、即向上發展的資本主義時代的歷史範疇。封建制度消滅與資本主義發展的過程，同時也是人們結合而為一個民族的過程。比方，西歐的情形，就是這樣。英人、法人、德人、意人等之結合而為一個民族，正是在戰勝封建割據性的資本主義凱旋的時候。

但是，在西歐各國，民族的形成，同時也就是表示他們變成為獨立的民族國家。英吉利民族、法蘭西民族等等，同時也就是英吉利國家，……餘此類推。愛爾蘭不在這種過程之列，但它並未改變全幅畫圖。

東歐的情形，有些不同。當西歐各民族發展而成為國家的時候，而在東歐，則結成了民族間的國家，即由幾個民族所組成的國家。奧匈帝國、俄羅斯，就是如此。在奧地利，在政治上最發展的，是日耳曼人，他們擔負了聯合奧地利諸民族而成為一個

國家的事業。在匈牙利，最能適應於國家組織的，則是馬加爾人——匈牙利諸民族的核心，他們是匈牙利的統一者。在俄羅斯，大俄羅斯人則扮演了統一諸民族的角色，他們曾在歷史上形成的有力的和有組織的貴族軍事官僚制度為首領。

東歐的情形，便是如此。

這種特殊的形成國家的方法，只有在封建制度尚未消滅的條件之下，只有在資本主義發展薄弱的條件之下，纔有可能，在這些條件之下，被排擠在後面的諸民族還來不及在經濟上結合而成為一個完整的民族。

不過，資本主義在東歐各國也開始發展起來。貿易和交通日益發展。大城市也出現了。各民族在經濟上逐漸結合起來。資本主義侵入於被壓抑的民族的甯靜生活中，使他們煩惱並使他們動作起來。報紙和戲院的發展，國會（奧國）和帝國會議（俄國）的活動，都促進了「民族感覺」的加強。新興的知識階層為「民族觀念」所浸透，並且向着這個方向活動起來……。

不過，醒覺起來而謀獨立生存的被壓抑的民族，已經不能團聚起來而成爲獨立的民族國家；在這條道路上，他們遇着了那些早已做了國家領導者的統治民族中的領導階層方面的猛烈抵抗。總之他們已經遲了！……。

奧地利的捷克人、波蘭人等；匈牙利的霍爾瓦特人等；俄羅斯的拉特維亞人、立陶宛人、烏克蘭人、喬治亞人、亞美尼亞人等，就是這樣團聚起來而成爲民族的。那在西歐（愛爾蘭）是例外的，而在東歐却成爲一種慣例。

在東歐，愛爾蘭是以民族運動來回答這種特殊的形勢。在東歐，醒覺的各民族也應當以同樣手段去回答。

推動東歐各青年民族起來鬥爭的情形，就是這樣形成起來的。

這一鬥爭已經開始了，並且燎原起來了，但是這不是整個民族之間的鬥爭，而是支配民族的統治階級與被壓迫民族的統治階級間的鬥爭。通常不是被壓迫民族的城市小資產階級進行鬥爭以反對支配民族的大資產階級（捷克人、和德意志人），便是被

壓迫民族的鄉村資產階級進行鬥爭以反對支配民族的地主（波蘭的烏克蘭人），或是被壓迫民族的全部『民族』資產階級進行鬥爭，以反對支配民族的統治貴族（俄屬波蘭、立陶宛、烏克蘭）。

資產階級乃是主要的角色。

對於青年資產階級的基本問題，乃是市場。推銷自己的商品，以及在對他民族的資產階級的競爭中求得勝利，——這就是這種資產階級的目的。因此，他們的希望，就是保障『自己的』，『本地的』市場。市場就是資產階級所由學得民族主義的第一個學校。

不過，問題往往不限於市場。支配民族的半封建半資產階級的官僚，用他們的『患得患失』的方法，來干涉鬥爭。支配民族的資產階級（無論是小資產階級或者是大資產階級，都是一樣）獲得了『更迅速』『更堅決』地來對付自己的競爭者的可能。『力量』逐漸併合起來，並且開始用種種限制辦法（正在轉為壓迫方法），來反對『

異族」的資產階級。鬥爭遂由經濟領域轉移到政治領域裏面來了。遷徙自由的限制，語言的壓抑，選舉權的限制，學校的減少，宗教的壓抑等等，便降臨在「競爭者」的頭上來了。當然，這些辦法不但爲着支配民族的資產階級的利益，而且可以說特別爲着統治官僚的闊闊目的。不過，從結果上看來，二者毫無分別：資產階級和官僚在這裏是携手並進的，——無論奧、匈帝國，或俄羅斯，都是這樣的。

於是，各方面感受壓迫的被壓迫民族的資產階級，自然而然的動作起來了。他們求訴於「下層同胞」，開始大喊「祖國」，把自己本身的事情作爲全民的事情。他們從「同胞」中招募自己的軍隊，以保護「祖國」……的利益。「下層人」有時也響應這些號召，集合在資產階級的旗幟的周圍，因爲從上而來的壓迫也連累到他們，而引起他們的憤激。

民族運動就是這樣開始的。

民族運動的力量，是由民族中廣大階層——無產階級和農民——參加這個運動的

程度來決定的。

無產階級是否站在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的旗幟之下，——這要看階級矛盾發展的程度，要看無產階級的覺悟性和組織性而定的。覺悟的無產階級，有着他自己的鍛鍊好了的旗幟，用不着站在資產階級的旗幟之下。

至於農民，他們之參加民族運動，首先是依壓迫的性質為轉移的。如果壓迫損害到「土地」的利益，如在愛爾蘭所有的情形一樣，那麼，廣大的農民羣衆馬上會站在民族運動的旗幟之下的。

別一方面，例如在喬治亞，如果沒有稍為嚴重的反俄羅斯人的民族主義，那麼，這首先是因為在這裏沒有俄羅斯人的地主或俄羅斯人的大資產階級，可以在羣衆當中滋生這種民族主義。在喬治亞，有一種反亞美尼亞人的民族主義，這是因為那裏還有亞美尼亞人的大資產階級，這種大資產階級擊敗了小的尙未強固的喬治亞的資產階級，推動後者走向了反亞美尼亞人的民族主義。

民族運動是否帶有羣衆性質而日益生長起來（愛爾蘭、加里西亞），或者牠變成一連串的小鬥而化爲吵鬧和爭奪招牌的「鬥爭」（波希米幾個小城市），還是依上述諸因素爲轉移的。

民族運動的內容，當然不會到處相同的；牠完全是由運動所提出的各種各樣的要求來決定的。在愛爾蘭，民族運動帶着土地的性質；在波希米，民族運動則帶着「語言」的性質，一個地方是要求公民的平權和信教自由；另一個地方則要求「自己的」行政官和自己的國會。在不同的要求中，往往反映出了那表徵一般民族的各種各樣的特點（語言、領土等等）。無論何地，你都看不見巴威爾式的包羅萬象的「民族性格」的要求，這是很值得注意的。這是很明白的，所謂「民族性格」者，就其本身言之，是不可捉摸的，像斯特拉塞所正確指出的一樣，「政治家是無法對付它的」（參看他的著作「工人與民族」，一九一二年版，三三頁）。

大體說來，民族運動的形式和性質，就是如此。

從上述的一切中，可以看出，民族鬥爭，在向上發展的資本主義條件之下，乃是各資產階級相互之間的鬥爭。有時資產階級也能吸引無產階級參加民族運動，在這種情形之下，民族鬥爭在表面上便採取了『全民』的性質，但是，這只是就表面而言的。按其實質言之，民族鬥爭總是資產階級的鬭爭，主要是對資產階級有利的和便利的。

但是，從這裏并不能得出結論說：無產階級不應當反對民族壓迫的政策。

自由遷居的限制、選舉權的剝奪、語言的排擠、學校的減少、以及其他的壓迫，其對於工人的害處，並不比對資產階級的害處為少，如果不是更多的話。這種情形，可以阻礙被壓迫民族的無產階級的精神力量自由發展的事業。要是喬治亞工人或猶太工人不能利用自己本族的語言去開會和演講，不許他們進學校，那末他們的精神裏賦的充分的發達，便根本談不到了。

不過，從別一方面說，民族主義的壓迫政策，對於無產階級事業却是危險的。它使廣大民眾不去注意社會問題，階級鬥爭問題，而只去注意民族問題，對於無產階級

和資產階級所「共同的」問題。這便造成了一種利於進行虛偽的「利益協調」說教、抹殺無產階級的階級利益、以及在精神上奴役工人的基礎。這對於團結一切民族工人的事業，是一個莫大障礙。如果一大部份波蘭工人迄今還受着資產階級民族主義者的精神奴役，他們迄今還沒有參加國際工人運動，那末，這主要的是因為「掌握政權者」的已往的反波蘭的政策，造成了這一奴役的基礎，使工人難以從這種奴役之下解放出來。

但是，壓迫政策還不限於這一點。它往往從壓迫的「制度」，進到殘殺民族的制度，進到屠殺撲滅的「制度」。當然，後者不是隨時隨地都有可能的，但是，凡在可能的地方——在缺乏初步的自由條件之下，它便往往大用而特用，到達驚人的程度，使團結工人的事業有沉淪於血海淚潮中的危險。在高加索和俄羅斯南部，就有不少的例子。「宰割駕馭」——這就是殘殺政策的目的。因為這一政策能够成功，所以牠對於無產階級有莫大的害處，對於團結國內一切民族的工人的事業，是個莫大的障礙。

不過，工人最關心的，是把自己的一切同志，完全團結起來，而成爲一個統一的

國際軍，把他們從資產階級的精神束縛之下迅速而澈底的解放出來，使自己的同胞兄弟（不論他們屬於何種民族）的精神力量充分而自由的發達起來。

所以，工人反對而且將來也是反對各色各樣的民族壓迫政策，——從最精巧的起至最蠢笨的止，並反對各色各樣的屠殺政策。

所以，各國社會民主黨都主張民族自決權。

所謂民族自決權者，就是只有民族自身纔有權決定他自己的命運，誰也沒有權用暴力去干與民族的生活，去破壞他的學校和其他的機關，去打破他的道德和習慣，去排擠他的語言，去剝奪他的權利。

當然，這並不是說，社會民主黨將贊助某一民族的一切任何習慣和制度。他固然反對對民族用暴力去壓迫，但他只主張民族自身有決定自己的命運之權，同時他進行鼓動工作，反對該民族的有害的習慣和制度，為的使該民族的勞動階層有解脫這些習慣和制度的可能。

所謂民族自決權，就是一個民族可以從心所欲的組織起來。牠有權依自治的原則去組織自己的生活。牠有權與其他民族結有聯邦的關係。牠有權完全分立起來。民族是至尊的，而且一切民族是平權的。

當然，這並不是說，社會民主黨將擁護每個民族任何的要求。一個民族甚至有權恢復舊的制度，但這還不是說，社會民主黨要贊成某一民族某一機關的這種決定。保護無產階級利益的社會民主黨之義務與由各階級所構成的民族權利，是兩回事。

社會民主黨為民族自決權而鬥爭的時候，牠的目的是要終結民族壓迫政策，使這種政策無法實現，以便摧毀民族的鬥爭，削弱這一鬥爭，把它減少到最低限度。

這也就是覺悟的無產階級的政策與資產階級的政策之主要區別，資產階級政策是努力加深和鼓吹民族的鬥爭，繼續和加劇民族運動。

正因爲這樣，自覺的無產階級不能站在資產階級的「民族」旗幟之下。

正因爲這樣，巴威爾所提出的所謂「進化民族」的政策，不能成爲無產階級的政策。

策。巴威爾企圖把他的「進化民族」的政策看作和「現代工人階級」的政策是一個東西，這一企圖力謀使工人的階級鬥爭去適應於民族的鬥爭。

民族運動的命運——實際上是資產階級的——自然而然地是跟資產階級的命運聯繫在一起的。民族運動的完全沒落，只有在資產階級沒落的時候纔有可能。只有在社會主義統治之下，纔能建立充分的和平。但是，把民族鬥爭減少到最低限度，根本剷除這個鬥爭，使這個鬥爭對於無產階級毫無害處——在資本主義範圍以內也是可能的。瑞士和美國的例子，便證明了這一點。要做到這一點，必需使國家民主化，並且給各民族以自由發展的可能。

三 問題的提法

一個民族有權自由地去決定自己的命運。牠有權隨心所欲把自己組織起來，當然不能蹂躪其他民族的權利。這是無可爭辯的。

但是，如果注意到民族中多數人的利益，尤其無產階級的利益，那末牠究竟應當怎樣組織起來呢？牠的未來的憲法應當採取怎樣的方式呢？

一個民族有權自治地組織起來。牠甚至有權分立起來。但是，這還不是說，在任何條件之下，牠都應該這樣做去；這也不是說，自治或分立隨時隨地都是有利於民族的，換一句話說，都是有利於民族中的多數人，即有利於勞動階層的。外高加索的韃靼人，是一個民族，牠可以在自己的國會裏面集議，服從自己的大佐和大師的影響，恢復自己的舊制度，決定跟國家分離開來。按照民族自決這個條文的意思，他們對於這一點有充分的權利。但是，這是否有利於韃靼民族的勞動階層呢？社會民主黨對於大佐大師如何引導羣衆去解決民族問題能否漠不關心呢？社會民主黨應該不應該對此事加以干涉，並用一定的方式去影響民族的意志呢？牠應該不應該提出解決問題的對於韃靼羣衆最有利益的具體計劃呢？

但是，怎樣的解決才算跟勞動羣衆的利益最能符合的呢？是自治呢，還是聯邦

呢，抑或分立呢？

所有這些問題的解決，都要依某一民族所處的具體的歷史條件以轉移的。

不僅如此。條件也和一切事物一樣，是在變化着，對於某一時期是正確的解決，而對於別一個時候，便要完全不適合的了。

在十九世紀中葉，馬克思贊成俄屬波蘭的分立，他的主張是對的，因為當時的問題是把高級文化從破壞性的低級文化中解放出來。而且當時的問題，不僅是在理論中，不是學院式的，而是在實踐中，在生活本身中。……

在十九世紀末葉，波蘭的馬克思主義者已經表示反對波蘭的分立，他們的主張也是對的，因為在最近五十年來，發生了種種深刻的變化，使俄羅斯和波蘭在經濟上和文化上接近起來。此外，在這個時期，分立問題已從實踐行動的對象，變成了僅僅激動國外智識分子的學院式的爭論的對象。當然，這并不排斥那使波蘭分立問題可以重新提出的某些內外局面的可能性。

從這裏可以得出一個結論：民族問題的解決，祇有與歷史條件（從牠們的發展中來把握）聯繫起來，才有可能。

某個民族所處的經濟的、政治的、和文化的條件，那便是解決某個民族應當如何組織起來，牠的將來的憲法應當採取何種形式。這個問題的唯一的鎖鑰。在這種情形之下，每個民族需要特殊的解決問題的方法，也是有可能的。如果某處需要辯證的提出問題的話，那末，這個地方恰就是民族問題。

因此之故，我們應當堅決地表示反對一個極普遍而極空洞的「解決」民族問題的方法，這個方法是從猶太工人同盟開頭的。我們所說的，即是援引奧地利和南斯拉夫社會民主黨（南斯拉夫社會民主黨曾在過去的奧地利南部做過工作）的輕巧方法；該社會民主黨似乎已經解決了民族問題，俄國社會民主派應當簡簡單單地做效牠的解決方法就好了。而且他們認為，凡對於奧地利是確切的，對於俄羅斯也是確切的。他們忽略了這個事件中最重大最主要的一點，即俄羅斯一般——尤其俄羅斯境內每個民族

生活中的具體的歷史條件，

舉例來說。請聽聽有名的猶太工人同盟派科梭夫斯基的話：

「當猶太工人同盟第四次代表大會（七）上討論問的原則方面（指民族問題言）——

斯大林）的時候，大會上一位代表根據南斯拉夫社會民主黨的決議精神所提議的一個解決問題的方法，曾引起了全場的贊成。」（科梭夫斯基，『民族問題』一六一—一七頁，一九

〇七年出版）

結果，『大會一致通過了』……民族的自治。

再沒有別的了！既不分析俄國的現實，又不究明俄國猶太人的生活條件；始則做效南斯拉夫社會民主黨的解決方法，繼則『贊成』，最後又『一致通過了』！猶太工人同盟派便是這樣提出和『解決』俄國的民族問題的……。

不過，奧地利和俄羅斯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條件。原因是奧地利社會民主黨在布隆（一八九九年）（八）所通過的民族綱領，是根據於南斯拉夫社會民主黨的決議精神

(不錯，曾加上了一些修改)，該黨可以說完全未照俄國的方法去提出問題，當然，也沒有照俄國的方法去解決問題。

首先就問題的提法來說。奧地利的民族自治的理論家，布隆民族綱領和南斯拉夫社會民主黨決議的解釋者——希普林格和巴威爾是怎樣提出問題呢？

『此地——希普林格說——我們不回答如下的問題：一般說來，多民族的國家是否可能——尤其奧地利諸民族是否非組成一個政治的整體不可？我們認為這些問題已經解決了。凡不同意上述的可能性與必然性的人，當然要把我們的研究看作是無根據的。我們的立論是：某些民族是迫不得已而謀共同的生存；怎樣的法權形式才可使他們過最好的生活呢？（見「民族問題」一四頁，着重點是希普林格自己加的。）』

由此可知，他把奧國的完整，看做出發點。巴威爾也說過同樣的話：

『我們是從下列一個假定做出發點，即奧地利諸民族仍將留在他們現在所處的那個國家聯盟之內，試問在這個聯盟的範圍以內，各民族相互間的關係以及一切這些民族對於國

家的關係究竟怎樣呢？」見「民族問題和社會民主主義」，三三九頁。）

又是把奧地利的完整性作爲第一個義務。

俄國社會民主黨能否這樣提出問題呢？不，不能。牠所以不能這樣提出問題的緣故，就因爲牠自始就站在民族自決的觀點上，根據這個觀點，一個民族是有分立權的。甚至猶太工人同盟派哥爾布拉在俄國社會民主黨第二次代表大會上也承認，俄國社會民主黨不能放棄民族自決的觀點。當時哥爾布拉說道：

「我們絕對不能反對民族自決權。如果某個民族爲牠的獨立而鬥爭時，那末我們是不能反對這一鬥爭的。如果波蘭不願意和俄羅斯結成「正式的婚姻」，那末我們也用不着去阻礙牠。」

這些話都是不錯的。但是，從這裏可得出一個結論說：奧地利社會民主派和俄國社會民主派的出發點，不但不相同，而且恰恰相反。自此以後，能否說俄國人可以抄襲奧地利人的民族綱領呢？

再則，奧地利人想用微小的改良，用緩慢的步驟來實現『民族的自由』。當他們提出民族自治作為實踐的辦法時，他們並沒考慮到根本的改變，民主解放運動，這一運動在他們的前途上是沒有的。但是，俄國馬克思主義者却把『民族自由』的問題跟或然的根本改變，跟民主解放運動聯繫起來，他們沒有理由去作改良的打算。這從俄國各民族的或然的命運說來，在本質上根本改變了問題。

『不用說——巴威爾說——很難認為民族的自治乃是偉大解決的結果，乃是勇敢而堅決的行動的結果。奧地利將一步一步的走到民族的自治，這將是一個緩慢而痛苦的過程，這將是一個艱苦的鬥爭，由於這一鬥爭，立法行政將陷於慢性的麻痺的狀態。不，新的國家法權制度，不是用偉大的立法案件，而是由許多個別區域為個別地方所頒佈的各個法律造成的。』（見巴威爾的「民族問題」，四二二頁。）

希普林格也說過同樣的話：

「我知道的很清楚——他說——這類的機關（民族自治的機關——斯大林），不是在一

年內創造成的，也不是在十年內創造成的。單單普魯士行政機關的改組，就化費了很長的時間……普魯士化費了二十年的工夫，才最後建立了牠的基本的行政機關。因此，請人們不要想，以爲我不知道奧地利要化費了多少時間，要經過多少困難。（見希普林格的「民族問題」，二八一至二八二頁。）

這些話都說得十分肯定。但是，俄國馬克思主義者能否不把民族問題跟「勇敢而堅決的行動」聯繫起來呢？他們能否只打算到局部的改良，只打算到「許多個別的法律」，把牠們看作獲得「民族自由」的工具呢？如果他們不能夠而且不應該這樣做，那末，奧地利人和俄國人的鬥爭方法和前途，是完全不同的，這難道從此不是很明白的嗎？在這種情形之下，怎樣可以只限於奧地利人的片面而不澈底的民族自治呢？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贊成抄襲的人們沒有考慮到「堅決而勇敢的行動」；或者是他們考慮到這一點，但是他們却「不知道自己做的是什麼」。

最後，俄羅斯和奧地利各有完全不同的當前任務，唯其如此，解決民族問題的

方法也因之而有所差異。奧地利處於國會制度的條件之下，在今日的條件之下，這裏沒有國會便沒有發展的可能。不過，奧地利的國會生活與立法機關，由於各民族政黨之劇烈的衝突，往往完全停頓起來。奧地利老早就害着慢性的政治危機的毛病，即可以此來說明的。唯其如此，民族問題便構成了奧地利政治生活的樞紐，成了牠的生存的問題。因此，奧國社會民主派政治家，首先是努力設法去解決民族衝突的問題，這是毫不奇怪的。當然，這一解決是根據於已有的國會制度，是根據於國會的方法。

俄羅斯的情形，不是這樣。在俄羅斯，第一『多謝上天，沒有議會』（九）。第二——這是主要的一點——俄羅斯政治生活的樞紐不是民族問題，而是土地問題。因此，俄國問題的命運，也就是說，民族『解放』的命運，是跟土地問題的解決，即跟農奴制度殘餘的消滅，亦即跟全國民主化，有着聯繫。在俄羅斯，民族問題不是獨立而決定一切的問題，而是全國解放的總的和更重要的問題的一部份，原故就在這裏。

『奧地利國會的毫無結果——希普林格說——無非因為每一改良在各民族政黨內部都產生了矛盾，這些矛盾破壞了牠們的團結，因此，各黨的領袖都竭力避免由改良而發生的一切不快。一般地說，奧地利的進步，只有在各民族得到堅固的法權地位的情形之下，纔有可能。這可以使牠們無須在國會內籌養常備作戰的隊伍，可使他們轉而去注意經濟任務和社會任務的解決。』〔見希普林格的「民族問題」，三六頁。〕

巴威爾也說過同樣的話：

『民族和平首先是國家所需要的。國家絕不容忍立法機關爲了最愚蠢的語言問題，爲了在民族邊界某處受刺激的人們的小小吵鬧，爲了每個新辦的學校，而停頓起來。』〔見巴威爾的「民族問題」，四〇一頁。〕

所有這些話都是很明白的。但是，在俄羅斯，民族問題與此不同，這也是同樣明白的。不是民族問題，而是土地問題在決定着俄羅斯進步的命運；而民族問題，則是附屬的問題。

總之，問題的提法是不同的，鬥爭的前途和方法，也是不同的，因而當前的任務也是不同的。在這種實際情形之下，只有在空閒與時間以外去「解決」民族問題的紙人，纔能採用奧地利的例子，而從事於做效它的綱領，這難道還不明白嗎？

重說一遍：具體歷史條件乃是出發點，辯證法的提出問題乃是唯一正確的提法，——這便是解決民族問題的鎖鑰。

四 民族自治

關於奧國民族綱領的形式方面，關於俄國馬克思主義者不能簡單地做效奧國社會民主黨的榜樣，把它的綱領作爲自己的綱領的方法論上的根據，我們在上面已經說過了。

現在我們從本質上來談它的綱領的本身。

然則，奧國社會民主派的民族綱領究竟是怎樣的呢？

還可用民族自治四個字表現出來。

第一，這就是說，並不是把自治給予以捷克人或波蘭人爲其主要居民的捷克或波蘭，而是給予一般捷克人和波蘭人，不分領土，不管他們是居住在奧地利任何地方，都是一樣。

因此，這種自治，叫做民族自治，而不是領土自治。

第二，這就是說，把散處在奧地利各角落的捷克人、波蘭人、德意志人等等（就其個人而言），組織成爲幾個整個的民族，包括在奧地利國家以內。在這種情形之下，奧地利便不是一個各自治區域的聯盟，而是一個不分領土而組成的各自治民族的聯盟。

第三，這就是說，爲了這些目的而應當爲波蘭人、捷克人等等所設立的全民機關，並不是處理「政治」的問題，而祇是處理「文化」的問題。特別的政治問題則集中於全奧的國會。

因此，這種自治又叫做文化的自治，民族文化的自治。

諸君一八九九年奧國社會民主黨在布隆代表大會上所通過的綱領的原文（南斯拉夫社會民主黨的代表也是表決贊成這個綱領的）吧。

該綱領說：「奧國的民族糾紛，阻礙着政治的進步」，「民族問題的澈底解決，首先是文化上的必要」，「只有在根據普遍、直接、及平等的選舉權而建立起來的真正民主的社會之下，問題才有解決的可能。」說了這些話以後，該綱領繼續說道：

「奧地利各種民族的特性的保存與發達，祇有在完全平權與沒有任何壓迫之下，才有可能。因此，官僚主義的國家集權制之系統，以及個別地方之封建特權，首先應當加以推翻。

在此種條件之下，也祇有在此種條件之下，在奧地利，才能夠在下列基礎之上建立起民族的秩序，消除民族的紛爭：

一、奧地利應當加以改造而成爲一個各民族的民主聯盟的國家。

二、應當成立民族分離的自治的團體，以代替歷史上王朝的領地，在這種每個自治團體中，立法行政都要操在根據普遍、直接、以及平等所選舉所選出的民族國會的手中。

三、同一民族的各自治區域，共同組成一個民族統一的聯盟，該聯盟可以完全自治地去解決本民族的問題。

四、少數民族的權利，得由帝國會議所頒佈的特殊法律保證之。」

該綱領末尾，號召奧地利的一切民族團結起來。不難指出，在這個綱領裏面，還留下了一些「地方主義」的痕跡，但是大體說來，這個綱領是民族自治的一個公式。難怪民族自治的頭一個鼓動家——希普林格，狂喜地歡迎這個綱領（見他的「民族問題」，二八六頁）。巴威爾也贊成這個綱領，把它叫做民族自治的「理論的勝利」（見他的「民族問題」，五四九頁）；祇是爲着更加清楚起見，巴威爾才提議把第四條改爲一個更確定的公式，該公式謂必須把「每個自治區域內的少數民族組織成爲公共法人團體」，去處理學校事務及其他文化事務（見巴威

爾的「民族問題」，五五五頁）。

奧國社會民主黨的民族綱領，便是如此。

現在我們來考察該綱領的科學基礎。

現在我們來研究奧國社會民主黨是怎樣在樹立牠所說教的民族自治的根據。

就拿民族自治的理論家——希普林格和巴威爾來說吧。

把民族了解爲與一定領土無關的人們之聯盟，這便是民族自治的出發點。

「民族——希普林格說——與領土沒有任何重要的聯繫；民族是一些自治的個人的聯

盟。」（見希普林格的「民族問題」一九頁。）

巴威爾也說：「民族是個人的集體」，牠「不能在某個一定的區域內得到特有的

支配」（見「民族問題」，二八六頁）。

不過，構成一個民族的人們，並不是一個團聚稠密的集羣，——他們往往分散而

爲各個集團，而且以這個方式點綴在億民族的機體中。這因爲資本主義把他們驅逐到

各地方和城市中去謀生。不過，這些集團一經加入其他民族的區域，而在那些地方構成少數民族的時候，他們便忍受着當地多數民族在語言、學校等方面的壓抑。由此，便產生了民族的衝突。由此，便產生了領土自治的『不適宜』。據希普林格和巴威爾的意見，打破這種情形的唯一出路，就是把散居在一國內各地方的某一少數民族，組織成爲一個共同的各階級間的民族聯盟。據他倆的意見，只有這樣的聯盟，纔能保護少數民族的文化利益，只有這樣的聯盟，纔能消弭民族的糾紛。

『必須——希普林格說——使各民族有適當的組織，使其能享受各種權利與義務。』（見『民族問題』七四頁。）當然，『建立一件法律是很容易的，但是，法律能否發生如人們對它所期望的效力呢？』……『如果人們想替一個民族創立一件法律，那末，首先就應當去創造民族本身。』（同上，八八——八九頁。）……『不創造民族，便不能造成民族權利，也不能排除民族糾紛。』（同上，八九頁。）

巴威爾的言論也是這樣，他主張『基於個人的原則把少數民族組成爲公共法人團

體」，他認為這是「工人階級的要求」（同上、五五二頁）。

但是，怎樣去組織民族？怎樣去決定某人屬於那一民族呢？

「某人屬於某一民族——希普林格說——是由民族的入籍法來決定的；凡居住在一地之人，都應當聲明自己是屬於那一民族。」（見普氏的「民族問題」、二二六頁。）

「個人的原則——巴威爾說——是以居民……根據成年公民的自由聲明，按民族加以劃分爲前提。」爲了這，「應當製造民族的名冊。」（巴氏的「民族問題」、三六八頁。）

其次，巴威爾又說：

「在清一色的民族區域中的一切德意志人，以及填具了二重區的民族名冊的一切德意志人，便構成了德意志民族，來選舉民族會議。」（同上、三七五頁。）

關於捷克人、波蘭人等等，可說也是如此。

希普林格說：

「民族會議就是民族的文化國會，凡爲維護民族學校事業、民族文學、藝術、科學；

凡爲設立研究院、博物館、陳列室、戲院等等所必需的基礎之規定與經費之批准，都屬於這個國會。」（「民族問題」，二三四頁。）

民族的組織及其中央機關，就是這樣。

據巴威爾的意見，當奧國社會民主黨創造這種各階級間的組織時，它力謀「使民族文化變成爲……全民的福利，並用這種唯一可能的方法，把民族的一切組成分子，團結起來而成爲一個民族文化的集體。」（「民族問題」，五五三頁）。

有人可以這樣想，以爲凡此一切只是指奧地利而言的。但是，巴威爾不同意這一點。他堅決的斷言，凡像奧地利一樣，由幾個民族所組成的其他國家，也一定要實行民族自治。

據巴威爾的意見：

「一切民族的無產階級，應當把自己的民族自治的要求，去跟有產階級的民族政策，

跟奪取多數民族國家中的政權的政策，對立起來。」（同上，三三七頁。）

然後，他悄悄地用民族的自治代替了民族的自決，並繼續說：

「因此，民族的自治，民族的自決，不可避免地要成爲處於多數民族國家中一切民族的無階級之立憲綱領。」（同上，三三三頁。）

但是，他還向前更進了一步。他深信他和希普林格所「創造的」階級間的「民族聯盟」，可作爲未來的社會主義社會之一種模型。因爲他認爲：「社會主義的社會制度……將人類分爲民族分離的社會」（同上，五五五頁）；在社會主義之下，「人類定要分成爲自治的民族社會」（同上，五五六頁）；「於是乎，社會主義社會，無疑的，將是一幅個人的民族聯盟和地方集團之複雜的畫圖」（同上，五四三頁）；「因四社會主義的民族原則，乃是民族原則和民族自治之最高總合」（同上，五四二頁）。

似乎够了吧……

巴威爾、希普林格二人著作中所說的民族自治的理由，大致如此。

首先我們可以看到，他們是拿民族的自治來代替民族的自決，這是完全令人不

解，而且絲毫沒有理由的。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巴威爾不懂民族自決，或者就是他懂了，但是因爲某種原故，他有意地把民族自決的範圍縮小了。因爲，無疑的：（一）民族的自治須以民族國家之完整爲前提，而民族的自決却超出於這種完整的範圍之外；（二）民族自決把全部的權利交給民族，而民族自治只給它以「文化」的權利。這是第一點。

第二，在將來，這樣一種內外環境的配合是完全有可能的，就是在這種配合的情形之下，某一民族決定要脫離多民族的國家，如奧地利就是，——露西社會民主派就在布隆的黨的大會上聲明，他們一定要把自己人民的「兩部分」聯合而爲一個整體（見「布隆黨的大會上關於民族問題的辯論」，四八頁）。試問那時候「對於一切民族的無產階級所不可避免的」民族自治又將如何？

機械地把民族束縛在國家完整的範圍以內，這算是問題的「解決」嗎？

其次，民族自治是與民族發展的整個行程相矛盾的。民族自治是個組織各民族的

口號，但是，如果實際生活，如果經濟的發展，使整羣整羣的人脫離這些民族，而散處於各地方，試問能否把他們勉強團結起來呢？毫無疑義的，在資本主義的最初各階段上，各民族都團結起來了。但是同樣也毫無疑義的，在資本主義的最高各階段上，正在開始着各民族分離的行程，許多人羣都跟民族分離的行程，這些人羣，始則出去謀生，繼則完全遷居於一國的其他區域；在這種情形之下，遷居者甚至失掉了舊有的聯繫，而在新的地方獲得了新的聯繫，一代一代採取了新的習尚與嗜好，甚至要操一種新的言語。……

現在試問：這些彼此互相隔離的人羣，能否聯合起來而成爲一個統一的民族聯盟呢？何處可以找到一些神奇的圈套，使不可統一的东西都能統一起來呢？例如能否把波羅的海沿岸和外高加索一帶的德意志人「團結而爲一個民族」呢？如果凡此一切都是不可思議的，而且是不可能的，那末，在這種情形之下，民族自治與那些致力於使歷史車輪向後開的老民族主義者之空想又有什麼區別呢？

而且，民族之聯繫與統一，不僅由於分居而崩潰。民族的統一，還從內部，還由階級鬭爭的尖銳化而崩潰。在資本主義的最初階段中，還可以說到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之「文化的共同性」。但是，隨着大工業的發展和階級鬭爭的尖銳，這個「共同性」也開始消失了。當同一民族的資本家和工人一個不了解一個的時候，那民族的「文化的共同性」就不能鄭重其事地說了。當資產階級渴望戰爭，而無產階級則以戰爭對付戰爭的時候，試問還有什麼「命運的共同性」可言呢？能否把這些相反的分組組織成一個統一的階級間的民族聯盟呢？自此以後，能否再說「把民族的一切人員團結起來而為一個民族文化的集體」呢（見巴威爾的「民族問題」、五五三頁）？從這裏可以看出，民族自治與階級鬥爭的整個行程是相矛盾的，這難道還不明白嗎？

就暫時假定，「組織民族」的口號，是一個可以實現的口號。資產階級民族主義者的國會議員，爲了獲得多餘的票數努力去「組織」民族，這還可以了解的，但是，從什末時候起，社會民主派開始去幹「組織」民族，「構成」民族，「創造」民族等等

的勾當呢？

在階級鬥爭最尖銳的時代竟去組織階級間的民族的聯盟，這種社會民主派算什麼東西呢？直到現在，奧國社會民主黨，和其他各國的社會民主黨一樣，只有一個任務：組織無產階級。但是，顯然的，這個任務已經「陳舊了」。現在希普林格和巴威爾則提出了一個「新的」更忙的任務：「創造」民族，「組織」民族。

然而，邏輯不能不如此：凡採納民族自治的人，也應當採納這個「新的」任務，不過，採納後邊這個任務，便是說離開了階級的立場，走到民族主義的路上去了。……希普林格和巴威爾的民族自治，乃是一種精鍊的民族主義。

奧國社會民主派的民族綱領，一定要關心於「各國人民的民族特性之保存與發展」，那絕不是一種偶然。只要請你想想：把外高加索韃靼人每逢「夏西·瓦西」紀念節自相毆打的這種「民族特性」保存起來的情形吧！把喬治亞人人人有「復仇權利」的這種「民族特性」發展起來的情形吧！

上述的這種條文，只能列在沒落的資產階級民族主義者的綱領中，要是奧國社會民主派的綱領中還列入這一條的話，那是因為民族的自治容忍這些條文，而與它不相抵觸的原故。

但是，對於現在即不適用的民族自治，而對於未來的社會主義社會更要不適用了。

巴威爾謂「人類將分爲民族隔離的社會」（參閱本章開頭）之預言，被現代人類發展的整個行程所推翻了。民族的隔離不是在鞏固着，而是在破壞着，崩潰着。

馬克思還在十九世紀四十年代，即已經說過：「民族的孤立與各人民利益的背馳，現在已經一天天在消滅着」；並說「無產階級的統治更要加速它們的消滅」。

(十) 人類的往前發展及其資本主義生產的巨大增長，與夫各民族的推演和人們在日益擴大的領土上的聯合起來，都完全證實了馬克思的思想。

巴威爾想把社會主義社會看作是一幅「個人的民族聯盟和領土集團之複雜畫圖

」，他的這個用意就是想用稍爲改良的巴枯寧的觀念來代替馬克思的社會主義觀念之庸怯的企圖。社會主義的歷史告訴我們，所有這樣的企圖都帶着無可倖免的破產的因素。

關於巴威爾所讚揚的什麼「社會主義的民族原則」，我們更不用說了，在我們看來，這個原則不過是用資產階級的「民族」原則，來代替社會主義的階級鬥爭的原則罷了。如果民族的自治是從這個可疑的原則爲出發點，那末，必須承認：它給予工人運動的只是害處而已。

是的，這個民族主義不是這樣透明的。因爲它會用社會主義的詞句巧妙地掩蓋起來，不過，正因爲這樣，它對於無產階級便更加有害。公開的民族主義總是容易應付的；人們是不難考究它的。但是跟掩蓋着，以及戴上假面具使人不能認識的民族主義作鬥爭，那就很困難了。它在社會主義的鐵鎧掩護之下，不易受傷，而更多活動力。它生活在工人當中，製造有毒的空氣，散佈各民族工人互相不信任和孤立的有害觀

念。

而且，民族自治的害處，並不限於上述各點。它不但造成了民族孤立的基礎，而且造成了分散統一的工人運動的基礎。民族自治的觀念造成了心理上的前提，可使統一的工人政黨分裂而成爲各個按民族組織起來的政黨。在政黨分裂之後，工會就隨之而分裂了，於是便成了完全各自爲政的局面。因之，統一的階級運動，也就分裂而爲各個民族的支流了。

『民族自治』的策源地——奧地利，便是這種現象的最可悲痛的例子。過去曾經統一奧國社會民主黨，從一八九七年起（文伯克的黨的大會）便開始分裂而爲各個的政黨了（一一）。自從不魯尼的黨的大會（一八九九年）通過民族自治以後，分裂更其加強了。最後，竟弄到這樣的地步：即一個統一的國際政黨，現在竟然弄成了六個民族的政黨，其中捷克社會民主黨甚至不願跟德意志社會民主黨發生關係。

不過，工會與政黨有着關係，在奧地利，跟在其他的地方一樣，擔負主要工作

的，同是社會民主派的工人。因此，令人擔憂的，就是黨內的分裂主義定要走向工會的分裂主義，而工會也要分裂起來。實際上也發生了這樣的事情：各工會都依民族而分裂了。現在往往甚至弄到這樣的地步，就是捷克的工人破壞德意志工人的罷工，或在市政選舉時與捷克資本家取一致行動，來反對德意志的工人。

由此可知，民族自治不能解決民族問題。不僅此也：它並且使這個問題尖銳而紛亂，造成有利於破壞工人運動的統一，使工人按各民族而分離起來，並加強他們相互間糾紛的基礎。

民族自治的收穫，便是如此。

五 猶太工人同盟及其民族主義和分離主義

上面我們已經說過，巴威爾承認捷克人、波蘭人等等有實行民族自治的必要，但是，他却表示反對猶太人實行民族自治。「工人階級應否為猶太人民要求自治？」巴

威爾對這個問題答道：『民族自治不能成爲猶太工人的要求。』（見他的『民族問題』，三八一頁，三九六頁）據巴威爾的意見，原因就在於『資本主義社會不許他們（猶太人——斯大林註）保存其爲一個民族』（同上，三八九頁。）

簡言之：猶太民族已經停止其存在，因此，用不着再要求民族自治了。猶太人正在同化着。

這種對猶太民族命運的見解不是新的。還在十九世紀四十年代（一二）馬克思就表示了這種見解，他主要是指德意志猶太人而言的（見馬克思著『猶太人問題』）。考茨基於一九〇三年也重複了這種見解，他是指俄羅斯的猶太人而言的（考茨基著的『申涅未的慘案和猶太人問題』）。現在巴威爾關於奧地利的猶太人，也把這見解重複了一下，所不同的，就是他不是否定猶太民族的現在，而是否定猶太民族的將來。

巴威爾認爲猶太人所以不能保存其爲一個民族的緣故，就是因爲『猶太人沒有閉關自守的移殖區域』（見巴氏的『民族問題』，三八八頁。）這個解釋在基本上是正確

的，不過沒有說出全部的真理。問題首先就在於猶太人是沒有與土地發生關係的廣大而固定的階層，這個階層不但自然而然地可以組成民族的骨幹，而且可以組成『民族的』市場。在五——六百萬的俄國猶太人之中，只有百分之三——四的人，才與農村經濟有相當的關係。其餘的百分之九十六的人，都從事於工商業，在城市各機關中做事，一般的說來，大都居住在城市中，而且散處於全俄羅斯，無論在那一個省份中都沒有佔多數。

這樣，猶太人就點綴在他民族區域中作了少數民族。他們主要是替『異』民族做事，或為實業家，或為商人，或為自由職業者，他們自然而然地去適應『異民族』，而學他們的語言等等。凡此一切，由於民族的日益變化（這是發達的資本主義的形式所特有的），自然使猶太人起了同化的作用。『土著特色』的消滅，只有加速他們的同化。

因此之故，民族自治問題，對於俄羅斯猶太人，有些奇怪：人們都主張該民族實

行自治，但是這個民族的將來，却被人否認，這民族的存在還待證明！

雖然如此，猶太工人同盟却站在這個奇怪的和動搖的立場上，而在其第六次代表大會上（一九〇五年）通過了以民族自治為精神的『民族綱領』（一三）。

有兩種情形，推動猶太工人同盟採取了這樣的步驟。

第一種情形，就是猶太工人同盟的存在，該同盟為猶太社會民主派工人的組織，而且只是猶太工人的組織。還在一八九七年以前，在猶太工人中工作的社會民主派，便以建立『特殊的猶太工人組織』為目的（『民族運動的諸形式』，七七二頁）。一八九八年，他們就加入猶太工人同盟而成立了這樣的組織。這還在俄國社會民主黨整個政黨事實上尚未存在的時候。從此以後，猶太工人同盟就不斷地生長和擴大起來，而在俄國社會民主黨黑暗之日陪襯之下，便日益顯現出來……，現在進到一九〇〇年代了。羣衆的工人運動正在開始，波蘭社會民主黨日益在生長着，猶太工人日益捲入羣衆的鬥爭。俄國社會民主黨也日益在發展着，而吸收『猶太工人同盟』的工人到自己的

方面來。猶太工人同盟的民族範圍，因沒有領土的根據地，日益狹小。在猶太工人同盟的面前提出了一個問題：或是溶化在總的國際的浪潮中，不然就是保持着自己獨立的存在，而為一個超領土的組織。猶太工人同盟則選擇了後者。

所謂猶太工人同盟為「猶太無產階級唯一代表」的「理論」，就是這樣造成的。但是，要「簡簡單單地」來擁護這個奇怪的「理論」，是不可能的。必須有一種「原則上的」襯裏，「原則上的」辯護。民族自治便作了這種襯裏。猶太工人同盟從奧國社會民主黨那裏把它抄襲了來，便抓緊不放手了。即使奧國社會民主黨沒有這樣的綱領，而猶太工人同盟也會想出它來，以便在「原則上」辯護自己的獨立存在。

所以，在一九〇一年（第四次代表大會）膽怯的企圖以後，猶太工人同盟便於一九〇五年（第六次代表大會）最後通過了「民族綱領」。

第二種情形，就是猶太人的特殊地位，他們是一個完整區域內稠密的多數異族當中的零星少數民族。

我們已經說過，這樣的地位摧毀了猶太人的存在而爲一個民族，使他們走向了同化之路。不過，這是一個客觀的過程。在主觀上，在猶太人的頭腦中，它仍引起了一種反感，而提出了保障少數民族權利的問題，提出了保障不致同化的問題。

猶太工人同盟既然鼓吹猶太「民族」的生存能力，那它便不能不站在「保障」的觀點上。既然站在這種立場上，那它便不能不採取民族的自治。因爲，即使猶太工人同盟能夠抓着什麼自治，那末，它所能抓着的也只是民族自治，就是說，民族文化自治：因爲猶太人缺乏一定的完整的領土的原故，關於猶太人領土的政治的自治，是談不到的。

很值得注意的，從最初起，猶太工人同盟就重視民族自治的性質，認爲這是少數民族權利的保障，是各民族「自由發展」的保障。猶太工人同盟出席俄國社會民主黨第二次代表大會的代表——哥爾伯拉，給民族自治下了一個定義，說牠是「保障牠們（民族。——斯大林）文化發展的充分自由的機關」，這也不是偶然的（見第二次代

表大會紀錄）。猶太工人同盟思想的信徒，在俄國社會民主黨第四屆國會黨團中也有了這樣的提議案。

猶太工人同盟採取猶太民族自治的奇怪立場的經過，便是如此。

上面我們已經揭穿了一般的民族自治。這一分析告訴我們，民族自治便要走向民族主義。以後我們可以看到，猶太工人同盟已經走到了這樣的終點。不過猶太工人同盟還從特殊的方面，還從保障少數民族權利的方面，來考察民族的自治。現在我們就從這個特殊的方面來研究問題吧。這是很必要的，因為關於少數民族（不但是猶太人）的問題，對於社會民主黨，有着重大的意義。

先來看民族自治是「保障」各民族「文化發展的充分自由的機關」一語吧！（着重點是我加的——斯大林）

但是，「保障」……的機關，究竟是什麼東西呢？

這首先就是希普林格和巴威爾所說的「民族會議」，如文化事業會議之類。

但是，此等機關能否保障民族「文化發展的充分自由」呢？某種文化事業的會議能否保障民族而不受民族主義的壓迫呢？

猶太工人同盟認為這是能夠的。

不過，歷史則證明了相反的東西。

在俄屬波蘭，有一個時期，曾有國會，政治的國會，當然，它曾經力謀保障波蘭人「文化發展」的自由，但是，它不但來不及做到這一點，而且相反，它本身在反對俄國一般政治條件不平等的鬥爭中，也崩潰了。

在芬蘭，老早就有國會，它也力謀保護芬蘭民族，防止他人「侵犯」，但是：它能否在這一方面做出許多事情來——這是有目共見的。

當然，國會與國會之間也發生衝突，對付按民主原則組織起來的芬蘭國會，不像對付貴族式的波蘭國會那樣容易。但是，能左右一切的，並不是國會本身，而是俄國的一般秩序：即使現在俄國這樣的愚蠢的亞洲式的社會政治秩序，如過去一樣，如在

解散波蘭國會時代一樣，那芬蘭國會仍要遇到更惡劣的情形。此外，「侵害芬蘭的政策正在增長着，而且不能說這一政策要遭受失敗的……」。

舊有的，歷史上形成的機關，政治的國會，既是這樣的情形，那末，新成立的國會，新成立的機關，而且又是這樣薄弱的「文化」國會，更加不能保障民族的自由發展了。很明顯的，問題不在於「機關」，而在於一國的一般秩序。該國沒有民主，那民族的「文化發展的充分自由」，便沒有保障。可以很自信地說，某國愈民主化，則對於「民族自由」的「侵害」也愈少，不受「侵犯」的保障也愈多。

俄國是個半亞洲式的國家，因而在這裏「侵害」政策往往採取了最粗暴的形式，殺戮的形式；至於這種「保障」在俄國，會減到最低限度，那更不用說了。

德國在歐洲已經是個有多少政治自由的國家，所以，在這裏「侵害」政策從來沒有採取殺戮的形式，這是不足為奇的。

在法國，當然「保障」更多了，因為法國要比德意志更民主些。

至於瑞士，那更不用說了，在這裏，由於牠的高度民主精神——即使是資產階級的原故，一切民族都過着自由的生活，——不管他們是少數還是多數，都是一樣。

所以，猶太工人同盟斷言說，「機關」本身可以保障各族的充分的文化的發展，那是很虛偽的。

有人可以說，猶太工人同盟自己也認爲俄國的民主化，乃是「創造機關」和保障自由的先決條件。這是不對的。從「關於猶太工人同盟第八次代表會議的報告」(二四)中可以看出，猶太工人同盟企圖在俄國現存秩序的基礎上面，用「改良」猶太公社的方法，以獲得這種「機關」。猶太工人同盟的領袖之一，在這次代表會議上會說：

「公社可作爲未來的民族文化自治的核心。民族文化自治，乃是民族自給的形式，滿足民族要求的形式。在公社形式的後面，隱藏着同一的內容。這是全部鏈鎖的一環，一種進化的各階段。」(見關於猶太工人同盟第八次會議報告書、六二頁。)

代表大會從這裏出發，曾經決定要爭取「猶太公社的改良，把它用立法的手段變爲民間的機關」，按民主原則組織起來（同上，八三——八四頁。着重點是我加的

——斯大林）

很明顯的，猶太工人同盟不是把俄羅斯的民主化認作條件和保障，而是把用「改良猶太公社」的方法，可以說用「立法」手段，經過國會所得的未來的猶太人的「民間機關」，看作條件與保障。

但是，我們已經看到，在整個國家內，若沒有民主秩序，則「機關」本身是不能作爲「保障」的。

試問在未來的民主制度之下又將如何？在民主制度之下是否需要特殊的「文化」機關，以「保障」……呢？比方，關於這個問題，在民主制度的瑞士，其情形如何呢？在瑞士是否有特殊的文化機關如希普林格所說的「民族會議」之類？瑞士沒有這種機關。但是，比方在瑞士佔少數的意大利人的文化利益，是否因此而有所損害

呢？似乎還沒有聽到過。這是很明白的：瑞士的民主制，使一切似乎能够「保障」……的特殊文化「機關」，都成爲多餘的了。

所以，現在無力和將來無用的民族文化自治機關，就是如此，而民族自治，亦是如此。

但是，倘若把魯濟自治強加於那存在及其前途尙屬疑問的「民族」，那末牠的爲害要更大了。在這種情形之下，擁護民族自治的人們，不能不保存和保守「民族」的一切特性，不論是有益的，或是有害的，——所以然者，無非爲使「某一民族避免」同化作用，無非爲着「保存」它吧了。

猶太工人同盟不可免的要走上這條危險的路上來。

而且，實際上它已經走上這條路了。請看猶太工人同盟最後幾次代表會議關於「禮拜六」，關於「俗語」等等的有名決議，就可以明白。

社會民主黨主張一切民族有應用本族語言的權利，但是，猶太工人同盟不以此爲

滿足，牠要求「以特別堅決的態度」，保持「猶太語言的權利」（着重點是我加的——斯大林），而且猶太工人同盟在俄國第四屆國會選舉時，自認為「甯可選舉那自願負責堅持猶太語言權利的人」（見猶太工人同盟第九次會議報告書，一九一二年出版，四二頁）。

他們所擁護的，不是本族語言的一般權利，而只是猶太語言——俗語——的個別權利！各民族的工人首先應為本族的語言而奮鬥；猶太人應為猶太語言而奮鬥，喬治亞人應為喬治亞語言而奮鬥云云。至於爭取各民族的一般權利，那是次要的事情。你可以不承認一切被壓迫民族應用本族語言的權利，但是，如果你承認俗語的權利，那末，猶太工人同盟就要投票贊成你，猶太工人同盟「甯可」擁護你了。

試問那時候猶太工人同盟與資產階級民族主義者有什麼分別呢？

社會民主黨主張規定每個禮拜，必須休息一天，但是，猶太工人同盟不以此為滿足，牠要求在「立法的手段」上，須「保證猶太無產階級有權紀念禮拜六，而取消對

於另一天的強迫紀念』（見『猶太工人同盟第八次會議報告書』，八三頁）

應當想一下，猶太工人同盟曾『前進了一步』，牠並且要求紀念一切舊時猶太紀念節的權利。但是，如果（這是猶太工人同盟的厄運）猶太工人拋棄了一切偏見，而不願紀念，那末，猶太工人同盟將以牠的關於爭取『禮拜六權利』的鼓動，使工人們去回憶禮拜六，在工人中去培養什麼『禮拜六的精神』……。

因此，猶太工人同盟第八次代表會議上各發言者的『熱烈演說』和提出設立『猶太醫院』的要求，那是一目了然的，並且他們提出這個要求的理由是：『病人覺得住在自己中間要比較好些』，『猶太工人在波蘭工人當中便有惡劣的感覺，他們在猶太商人中就有很好的感覺。』（見『猶太工人同盟第八次會議報告書』，第八三頁。）

保存猶太人的一切東西，保守猶太人的一切民族特性，直至對無產階級顯然有害的東西，把猶太人與一切非猶太人隔離開來，甚至要開辦特別的醫院，——猶太工人

同盟竟然墜落到這個地步！

普列漢諾夫同志曾經說過：猶太工人同盟「使社會主義適應於民族主義」（一五），這句話是千真萬確的。當然，科梭夫斯基以及類似的猶太工人同盟派，可以痛罵普列漢諾夫為「造謠惑衆者」（見「我們的曙光」，一九二二年出版，第九、第十期，一一〇頁）（一六），——紙上甚麼話都可以寫的，但是，熟悉猶太工人同盟活動的人，都不難明白，這些大胆的人們簡直害怕說出關於自己的真話，而用「造謠惑衆」的嚴厲詞句把自己掩蔽起來……。

猶太工人同盟在民族問題上，既然站在這樣的立場上，那末，在組織問題上，牠自然也要站在猶太工人孤立的道路上，站在社會民主黨內民族分組的道路上。民族自治的邏輯，便是這樣！

事實上也是如此，猶太工人同盟會放棄「唯一代議制」的理論，而改取了工人的「民族分界」的理論。猶太工人同盟要求俄國社會民主黨要「在自己的組織結構中，

應按照民族加以分界」(見猶太工人同盟第七次大會報告書，七頁(一七))，他從「分界」出發，「前進」一步達到「孤立」的理論。難怪在猶太工人同盟第八次代表會議上，發生了這些言論，說在「孤立中，便是民族的生存」(見猶太工人同盟第八次會議報告書，七二頁)。

組織上的聯邦主義，隱藏着瓦解和分離主義的因素。猶太工人同盟正在走向分離主義了。

老實地說，牠實在也無路可走了。牠是個超領土的組織，牠的存在本身，就驅使牠走上了分離主義的道路。猶太工人同盟沒有一定的完整的領土，牠寄居在「異民族」的領土上；但是與牠日常接觸的波蘭社會民主黨、拉多維亞社會民主黨、和俄國社會民主黨，都是國際的有領土的集團。然而，這種情形便產生了下列的結果：這些集團的每次擴大，不啻猶太工人同盟的「損失」，不啻牠的活動範圍的縮小。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整個俄國社會民主黨在民族聯邦主義的基礎上面加以改組，這時猶太

工人同盟便有了「保證」牠有猶太無階級的可能性了；或者是這些集團的領土國際原則，依然有效，這時猶太工人同盟則在國際主義的原則上面加以改組，如波蘭社會民主黨和拉多維亞社會民主黨的辦法一樣。

猶太工人同盟自始便要求「俄國社會民主黨在聯邦主義的基礎上面，加以改組」，即可以此來說明的（見猶太人所出「論民族自治和俄國社會民主黨根據聯邦原則革新問題」）。

一九〇六年，猶太工人同盟遷就下層的統一潮流，曾選擇了中間的道路，而加入俄國社會民主黨。但是，它是如何加入的呢？我們知道，波蘭社會民主黨和拉多維亞社會民主黨加入的目的，是爲了進行和平的共同的工作，而猶太工人同盟加入的目的，則是爲着爭取聯邦主義。當時他們的領袖——美登說道：

「我們不是爲了歌詠太平，而是爲了鬥爭而加入的。太平是沒有的，只有曼尼洛夫在最近將來才能等着牠。猶太工人同盟應當備着全副武裝去加入惹。」（見「我們的話」（一八）

如果認為這是美登的惡意，那是錯誤的。問題不在於惡意，而在於猶太工人同盟的特殊立場，由於這個特殊立場的原故，牠不能不反對根據國際主義的原則所建立起來的俄國社會民主黨。猶太工人同盟既然反對它，那末牠自然而然地就要破壞統一的利益了。最後，竟弄得這樣的地步：猶太工人同盟會與俄國社會民主黨正式分裂，違背黨章，在俄國第四屆國會選舉中和波蘭民族主義者聯合起來，以反對波蘭社會民主派（一九）。

顯然的，猶太工人同盟認為分裂是牠的自我活動的最好的保證。

於是，組織「分界」的「原則」，便走向了分離主義，走向了完全的分裂。

猶太工人同盟和舊火星報（二〇）辯論聯邦主義的時候，牠曾說道：

「火星報想使我們相信，猶太工人同盟對於俄國社會民主黨的聯邦主義態度，定要削弱牠們相互間的聯繫。我們不能援引俄國的實際，來推翻這個意見，原因很簡單，就是俄

國社會民主黨不是一個聯邦主義的聯合。但是，我們可以援引奧國社會民主黨極寶貴的經驗，該黨根據一八九七年黨的大會的決定，曾採取了聯邦主義的性質。」

這段話是在一九〇二年寫的。

現在已經是一九一三年了。現在我們也有俄國的「實際」，又有「奧國社會民主黨的經驗」。

它們證明什麼呢？

先從「奧國社會民主黨的極寶貴的經驗」說起吧。還在一八九六年以前，奧國即有統一的社會民主黨。同年捷克人在倫敦國際大會上首次要求單獨的代表權，他們也得到了這種代表權。一八九七年，在維也納的該黨大會（在文伯克舉行）上，統一的黨正式取消，而確立了六個民族社會民主集團的聯邦主義的聯盟，以代替牠。隨後，這些「集團」變為獨立的政黨。這些政黨，逐漸打破了彼此之間的聯繫。在政黨之後，國會黨團也跟着分裂，而成立了各民族的「俱樂部」。再後，工會也按民族而分裂了。甚至

鬧到合作社，捷克的分離主義者（見『Documente des Separatismus』所引溫尼克（二））一小冊子中的幾句話，二十九頁）號召工人去分裂合作社。分離主義者的鼓動削弱了工人一致行動的感覺，往往推動他們走到工賊行爲的道路上去，這更不用說了。

所以，『奧國社會民主黨極寶貴的經驗』，是反對猶太工人同盟，而贊成老火星報的。奧國黨內的聯邦主義，走向了最醜惡的分離主義，走向了破壞工人運動的統一。

我們在上面已經看見過，『俄國的實踐』，也證明了同樣的事情。猶太工人同盟的分離主義者，也如捷克的分離主義者一樣，他們和整個俄國社會民主黨分裂了。至於工會，猶太工人同盟的工會，他們自始就是根據民族的原則組織起來的，就是說，他們自始就是跟其他民族的工人脫離的。

完全的孤立，完全的分裂，——這就是聯邦主義的『俄國的實踐』所表示出的東西。

這種情形對於工人的反響，便是一致行動感覺的減弱和志氣渙散，而且在猶太工

人同盟中也有志氣渙散的現象，這是毫不奇怪的。試看猶太工人與波蘭工人因失業而常常發生吵鬧，就可以明白。關於這個問題，猶太工人同盟第九次代表會議上有這樣的言論：

「……我們認爲排斥我們的波蘭工人，乃是暴徒，是黃色分子，我們不支持他們的罷工，而要破壞他們的罷工。第二，我們要以排擠選排擠：我們不許波蘭工人到手機中去，以回答他們不許猶太工人的進廠。如果我們不把這個事情拿到自己的手裏來辦，那末，工人就要跟着他人跑了。」（見『猶太工人同盟第九次代表會議報告書』、十九頁，着重點是我加的——斯大林。）

在猶太工人同盟的代表會議上，他們關於一致行動的言論，便是如此。

在『分界』中和『孤立』中實在也走頭無路了。猶太工人同盟的目的是達到了：它引着各種民族的工人去打架，做工賊。實在也非如此不可：『如果我們把這個事情拿到自己手裏來辦，那末，工人就要跟着他人跑了……』」

破壞工人運動，擾亂社會民主黨的隊伍——這就是猶太工人同盟的聯邦主義所產生的結果。

所以，民族自治的觀念，牠所造成的空氣，其在俄國的害處，比在奧國更大。

六 高加索人，取消派的代表會議

前邊說過，高加索的一部分社會民主派，曾經動搖，不願反對民族主義的「瘴氣」。這些動搖，就表現在這些社會民主派跟在（不管這是怎樣奇怪的）猶太工人同盟派的屁股後面，而主張民族文化的自治。

這些社會民主派，附和俄國的取消派，提出這樣的要求：全高加索實行區域自治，凡加入高加索的各民族，都實行民族文化的自治。

請聽聽他們所公認而有相當名望的領袖——X氏(二二)的意見吧。

「大家知道，不論就居民的種族成份論，或就領土和農業的耕作論，高加索與俄國中

部各省，都有很大的分別。該地的開發及物質的發展，在在需要當地工作人員，需要熟悉當地特性，即習慣於當地氣候和文化的人。以開發當地領土爲目的的一切法律，都必須在當地頒佈，並由當地的力量來施行。因此，高加索中央自我管理機關，應有權頒佈關於當地問題的法律……這樣，高加索中央的職權，就在於頒佈那些以經營開發當地領土爲目的、以促進該地物質繁榮爲目的的法律。〔見佐治亞報——我們的生活（二二二）第二期，一九二二年〕

因此，他們便主張高加索實行區域自治。

X氏的理由，有點曖昧而不明瞭，要是把他的理由丟開不講，那末，必須承認他的結論是正確的。高加索的區域自治，要是在整個國家憲法（X氏也沒有否認這一點）的範圍以內來實行，那末這在事實上是必要的，因爲高加索的組成部分及其生活條件有着種種特點。俄國社會民主黨也是承認這一點的，牠在第二次代表大會上曾經主張：「凡生活條件及其居民成分與俄國本部各地方不同的邊疆，應實行區域自治

管理。」

馬爾托夫在提出上述條文於第二次大會討論時，說明理由如下：

「俄國的廣大職員和我們的集中管理的經驗，給了我們以理由，認為芬蘭、波蘭、立陶宛、高加索這些大單位，實行區域自治，是必需的而且是適宜的。」

但是，這裏應聲明的，就是所謂區域自我管理者，即區域自治之意。

不過，X氏却更進一步。據他的意見，高加索的區域自治「只是涉及問題的一方面」。

「至今我們所說的，只是關於地方生活的物質發展。但是，促進邊疆經濟發展的，不但是經濟活動，而且有精神活動，文化活動。……文化上強盛的民族，在經濟方面也是強盛的。」……「但是，民族的文化發展，祇有應用民族語言，才有可能。」……「因此，凡與本族語言有聯帶關係的一切問題，都是民族文化問題。例如教育問題、司法問題、教會問題、文學問題、藝術問題、科學問題、戲院問題等都是。如果邊疆物質發展的事業，可以把各民族聯合起來，那末，民族文化事業，便可使各民族分離開來，把每

個民族放置在單獨的場所。第一種活動，與一定的領土有着連帶關係。……而民族文化事業，却不是這樣。它與一定的領土沒有關係，而與一定的民族之生存有着連帶關係。凡是喬治亞人，不管他們住在什麼地方，都同樣關心喬治亞語言的命運。如果說喬治亞文化祇關係於住在喬治亞的喬治亞人，那是很愚蠢的話。比方亞美尼亞的教會來說吧。各地方和各國的亞美尼亞人，都參加這種教會事務的進行。在這裏，領土不起任何的作用。或者再舉一個例子來說，比方創辦喬治亞的博物館一事，無論第佛里斯的喬治亞人，或巴庫的喬治亞人，或古達、彼得堡以及其他地方的喬治亞人，都同樣關心。這就是說，一切民族文化事業的主持與領導，統應交給有利害關係的民族本身。因此，我們主張高加索諸民族的民族文化自治。」（見上述的「我們生活」十二期。）

簡言之：文化既不是領土，而領土又不是文化，因之，民族文化的自治是必要的。X氏為擁護民族文化自治所能說的議論，不過如此而已。

關於一般的民族文化自治，這裏恕不再說了，因為關於它的否定的性質，我們已

經在前邊說過了。我們祇想指出的，就是一般不適用的民族文化自治，從高加索條件來看，那更加無意思，更加荒謬了。

請看爲甚麼是這樣。

民族文化自治是以多少發展的民族，以有發展的文化和文學的民族爲前提。沒有此等條件，則這種自治便失掉了一切意義，而變成爲荒謬之談了。在高加索，有着許多民族，他們有着原始的文化和特殊的語言，他們沒有本族的語言，而且又是過渡的民族，一部分正在同化着，一部分則正在向前發展着。如何把民族文化自治應用於這些民族呢？對於這些民族怎樣辦呢？怎樣把他們「組織」成爲各個民族文化聯盟（顯然的這是民族文化自治所必有的前提）呢？

對於那些語言不同而又沒有自己的文學的明格列爾人、阿不哈斯人、愛特夏爾人、司凡人、列司金人等，怎樣辦呢？把他們歸於那一民族呢？能否把他們「組織」到民族聯盟裏邊去呢？在那些「文化事業」的周圍把他們「組織」起來呢？

又拿奧雪廷人來說。外高加索的奧雪廷人則爲喬治亞人（但尙未完全同化）所同化；而北高加索的奧雪廷人一部分則爲俄羅斯人所同化，一部分仍在往前發展，創造自己的文學，——試問對於這些人又怎樣辦呢？怎樣把他們「組織」而爲一個民族聯盟呢？

又如阿特夏爾人，他們操喬治亞語言，但是崇尙土耳其文化和信仰回教，——試問把他們歸於那一種民族聯盟呢？是不是在宗教事業的基礎上跟喬治亞人分開而在其他文化事業的基礎上跟喬治亞人在一起把他們「組織」起來呢？科希列人怎樣呢？裏面什人怎樣呢？茵吉萊人又怎樣呢？

把許多民族除外，這算什末自治呢？

不，這不是民族問題的解決，這是無謂的幻想的結果。

不過，我們現在來允許一種不可允許的事情，並且假定，X氏的民族文化自治是實現了的。試問牠的結果如何呢？例如拿外高加索的韃靼人來說吧，他們有最低限度

的識字的百分數，有以萬能的大師爲首的學校，有其充滿宗教精神的文化……。不難明白，把他們組織起來而成爲一個民族文化聯盟，這等於推尊他們的大師做首領，這等於把他們送給反動的大師們去宰割，給韃靼羣衆的最兇惡的敵人造成了一種在精神上奴役韃靼羣衆的新枷鎖……。

但是，從什末時候起，社會民主派會替反動派賣氣力呢？

把外高加索的韃靼人限制在一個民族文化的聯盟以內，使最兇惡的反動派得以奴役羣衆——難道外高加索的取消派……再沒有更好的「主張」嗎？

不，這不是民族問題的解決。

高加索的民族問題，只有基於把各個落後的民族和人民吸引到最高文化的總潮流中來的精神，纔能加以解決。祇有這樣的解決，才算是進步的，對於社會民主黨所能接受的。高加索的區域自治，所以能接受的緣故，因爲牠可以把落後的民族吸引到一般文化的發展裏面來，可以幫助這些民族打破小民族的閉關主義的介殼，可以推動他

們前進，促進他們得以接近最高文化的幸福。反之，民族文化自治却起了正相反的作用，因為牠把各個民族鎖閉在舊的介殼以內，使牠們禁錮於文化發展的低下階段上，障礙牠們上昇到最高的文化階段上來。

同時，民族自治麻痺了區域自治的積極方面，使區域自治變為零了。

正因為這樣，所以X氏所提出的那混合式的自治，即民族文化自治與區域自治的混合物，是不適用的。這種反自然的混合物，不能改善事情，而是把事情弄糟了，因為牠除了阻礙落後的民族的發展以外，還把區域自治變為組織在民族聯盟以內的各民族互相衝突的舞會了。

這樣，一般不適用的民族文化自治，一經用於高加索，就會變成為無意識的反動的企圖了。

X氏及其高加索的信徒們的民族文化自治，便是如此。

高加索的取消派是否要「再進一步」，他們是否在組織問題上要追隨於猶太工人

同盟之後，——這須待將來的事實來證明。直到現在，在社會民主黨的歷史上，組織上的聯邦主義，總是先於綱領上的民族自治。奧國社會民主派，從一八九七年起，即實行組織上的聯邦主義，僅僅過了二年（一八九九年），他們便採取了民族自治。猶太工人同盟派於一九〇一年才首次談到民族自治，可是，從一八九七年起他們就實行組織上的聯邦主義了。

高加索的取消派，則是從尾做起的，是從民族自治做起的。如果他們步着猶太工人同盟的腳跡再走下去，那末，他們不能不預先破壞全部現有的組織建築物，這種建築物是在十九世紀九十年代末葉根據國際主義的原則建造起來的。

不過，採取此時工人還不明瞭的民族自治很容易，破壞經年歷歲所建造起來而為高加索一切民族的工人所寵愛所培養的建築物，那就困難了。爲了使工人睜開眼睛，並且明白民族文化自治的民族主義的實質，值得把這種立異爲高的企圖提出來說一下。

如果，高加索人是用通常的方法，用口頭討論和文字辯論的方法，來解決民族問題的，那末，全俄取消派的代表會議却想出了極不平凡的方法。這方法是輕易而簡單的。請聽吧：

「聽了高加索代表團……關於必須提出民族文化自治要求的通知以後，代表會議在本質上對於本要求並未表示意見，而肯定指出，這種對於綱領上承認每個民族都有自決權一條的解釋，是與自決的原意不衝突的。」

這樣，始則對本問題「在本質上並未表示意見」，繼則又「肯定指出」，這方法妙極了……。

這個奇妙的代表會議「指出」了什麼呢？

它指出民族文化自治的「要求」，與綱領上承認民族自決權一條的「原意，是不衝突的。」

現在我們來分析一下這個議論吧。

民族自決一條所說的，是關於民族的各種權利（二四）。根據這一條，民族不但有自治權，而且有分立權。這是指政治上的自決而言的。取消派企圖把這個在整個國際社會民主派中早已確定的民族政治自決權重新加以解釋，試問他們想欺騙誰呢？

或者，也許取消派要指東說西，以詭辯來替自己辯護，說：民族文化自治與民族權利是『不衝突』的吧？就是說，如果某一國的一切民族，都同意根據民族文化自治的原則組織起來，那末，他們——所有的民族，便對這一點有了充分的權利，誰也不能以別種方式的政治生活強加於他們。這又新穎而又聰明。還可以補充一句。一般地說，各民族有權廢止自己的憲法，代以任意欲為的體系，恢復舊的制度；因為民族，而且只有民族自身，才有權決定自己本身的命運。再重說一遍：在這個意義上，不論民族文化自治，也不論任何民族的反動性，都是與民族權利『不衝突』的。

可敬可愛的代表會議不是想這樣說呢？

不，不是這樣說的。它直然說，民族文化自治，不是與民族權利，而是與綱領的「原意」不衝突的。這裏指綱領而言，而不是指民族權利而言。

這也是很明白的。假使有某個民族去向代表會議請願，那末，代表會議可以直接了當地說，每個民族都有民族文化自治之權。不過，向代表會議請願的不是民族，而是高加索社會民主派（不錯，他們是壞的社會民主派，但是他們究竟是社會民主派的「代表團」。他們所質問的，不是關於民族權利，而是關於民族文化自治是否與社會民主黨的原則相抵觸？他是否與社會民主黨綱領的「原意」相「衝突」？

總之，民族權利和社會民主黨綱領的「原意」，不是一個東西。

顯然的，有這樣一種要求，它與民族權利不衝突但與綱領的「原意」却相抵觸的。舉例來說。社會民主黨的綱領中，有信教自由的一條。根據這個條文，任何一羣人，都有信仰任何宗教的權利：天主教、正教……。社會民主黨反對一切宗教的壓迫，反對對正教徒、天主教徒、和基督新教徒的殘害。這是不是說，天主教和基督新

教等等，是與綱領的「原意沒有抵觸」呢？不，不是這樣說。社會民主黨總是反對天主教和基督新教等的殘害，它總是擁護各民族信仰任何宗教的權利，但是，同時牠從無產階級的真正利益出發，從事鼓動反對天主教、反對基督新教、反對正教等，爲的要爭取社會主義宇宙觀的勝利。

它所以這樣做的緣故，就是因爲天主教、基督新教、正教等等，無疑的，是與綱領的「原意相衝突」的，就是說，是與無產階級的真正利益相衝突的。

民族自決的問題，也應該如此。各民族都有權依自己的願望而組織起來，他們有權保存本民族的任何制度——不管有害的制度還是有益的制度——誰也不能（也沒有權利！）用強制手段去干涉民族的生活。但是，這邊不是說，社會民主黨不從事鬥爭，不從事鼓動，來反對某一民族的有害的制度，反對某一民族的不適宜的要求了。恰恰相反，社會民主黨應該進行這樣的鼓動，去影響民族的意志，使該民族能用最適宜於無產階級利益的形式組織起來。

正因為這樣，所以社會民主黨為民族自決權而鬥爭的時候，同時仍從事鼓動，以反對韃靼人的分立，以反對高加索各民族的文化自治，因為前者和後者雖跟這些民族的權利不衝突，可是，與綱領的「原意」，與高加索無產階級的利益相衝突的。

很明顯的，「民族的權利」和綱領的「原意」，是兩個完全不同的平面。綱領的「原意」，表現着無產階級的利益，這一利益科學地規定在無產階級的綱領中；而民族的權利可以表現任何階級——資產階級、貴族、僧侶等的利益，而依這些階級的力量和影響而定。前者是馬克思主義者的義務，後者是由各階級所構成的民族的權利。民族的權利和社會民主主義的原則，彼此能否發生「衝突」，猶之乎埃及金字塔和有名的取消派代表會議一樣。二者簡直不能比較。

但是，從這裏可以得出一個結論說：可敬可愛的代表會議，最不可寬恕的却把兩個完全不同的東西混為一談了。結果，不是民族問題的解決，而是一種無稽之談，唯其如此，民族的權利和社會民主主義的原則，也就彼此「不衝突」了，——因之，民

族的每個要求都是跟無產階級的利益符合的，因之，力謀自決的民族，其任何要求，都不會與綱領的「原意」發生「衝突」的！……

好一個邏輯……

在這種無稽之談的基礎上面，便出現了至今有名的取消派代表會議的決議，根據這個決議，民族文化自治的要求，是跟綱領的「原意不衝突」的。

但是，取消派會議不僅違背了邏輯的法則。

該會議還違背了自己對俄國社會民主黨的責任，默認了民族文化自治。牠確定地違背了綱領的「原意」，因為大家知道，通過綱領的黨的第二次大會，會堅決地否決了民族文化自治。

試看大會上關於這個問題的發言吧：

「哥爾伯拉（猶太工人同盟派）：我認爲必須成立各種特殊的機關，以保障各民族文化的發展的自由，因此我提議在第八節上要補充一句：「創立各種機關，以保障他們有文化發

民的充分自由。」大家知道，這是猶太工人同盟的民族文化自治的公式——斯大林。

馬丁諾夫指出謂，一般機關的組織應當使牠們又可以保障私人的利益。創造任何特殊的機關，來保障民族文化發展的自由，是不可能的。

耶果落夫：關於民族問題，我們祇能採取消極的提議，就是說，我們反對一切對於民族的壓抑。但是，每個民族是否如此發展下去，我們社會民主派，用不着去過問。這是自發過程的事情。

科爾錯夫：當人們談到猶太工人同盟各位代表的民族主義時，他們總是感覺難過。不過猶太工人同盟代表所提出的修正，則帶有純粹民族主義的性質。人們要求我們採取純粹進攻的辦法，以支持那些正在衰亡着的民族。

……結果，哥爾伯拉的修正由大多數對三票而否決了。」

總之，很明白的，取消派的代表會議，是跟綱領的「原意發生衝突」了。牠違背了綱領。

現在取消派的代表會議援引斯托哥爾姆代表大會為證，企圖為自己辯護，似乎斯

托哥爾姆大會批准了民族文化自治。比方，科梭夫斯基說：

「大家知道，根據斯托哥爾姆代表大會所通過的條約，猶太工人同盟有權保存自己的民族綱領（至全黨的代表大會解決民族問題爲止）。這次代表大會承認民族文化自治，無論如何，是跟全黨的綱領不抵觸的。（見「我們的曙光」，第九、第十合刊，二二〇頁。）

不過取消派的企圖是徒然的。斯托哥爾姆代表大會並未想到批准猶太工人同盟的綱領，牠只是同意把問題暫時擱置起來。大胆的科梭夫斯基沒有勇氣說出全部真理。但是，事實總是事實。請看事實吧：

「加林提出如下的更正：『關於民族綱領的問題，尙待討論，因爲代表大會沒有考察這個問題。』（贊成者五十票，反對者三十二票。）

有人質問：什麼叫做「尙待討論」？

主席答道：如果我們說，民族問題尙待討論，其意就是說，在下次代表大會以前，猶太工人同盟可以保存自己對於本問題的決定。」（著重點是我加的——斯大林）

看吧，代表大會甚至「沒有考察」過關於猶太工人同盟的民族綱領的問題，——

它僅僅認爲這個問題「尙待討論」，而讓猶太工人同盟在下次全黨代表大會以前自己去決定自己綱領的命運。換句話說：斯托哥爾姆代表大會把問題擱置起來，對於民族文化自治未加任何方面的估計。

可是，取消派的代表會議却確定地來估計問題，承認民族文化自治是可以接受的，並且用黨的綱領名義批准了牠。

二者的區別，是很明顯的。

這樣，取消派的代表會議，雖然用盡了一切方法，但是把民族問題，並未向前推進一步。

代表會議所能做到的一切事情，只是在猶太工人同盟和高加索民族取消派的面前支吾其辭吧了。

七 俄國的民族問題

現在我們把民族問題的積極的解決來說一下。

我們的出發點是：問題的解決只有與俄國現在所處的時代密切聯繫起來才行。

俄國正處在一個過渡時代，此時『正常的』、『立憲的』生活還未曾確立起來；政治的危機，還沒有解決。狂風暴雨和『紛亂』的時代還在前面。運動，現在的和將來的運動，以完全民主化爲目的的運動，就是這樣發生的。

民族問題，也就應當與這個運動聯繫起來，加以研究。

因之，全國的完全的民主化乃是解決民族問題的基礎和條件。

在解決民族問題時，不但要注意到國內的形勢，而且要注意到國外的形勢。俄國是處在歐洲和亞洲之間，處在奧國和中國之間，亞洲民主主義的生長是不可避免的。

歐洲帝國主義的生長，不是偶然的。在歐洲，資本的活動範圍已經狹窄了，所以牠力謀侵入他國，去找尋新的市場，找尋廉價的工人，找尋新的投資地。但是，這要走向外部的紛亂和戰爭。誰都不能說，巴爾幹戰爭（二五）不是紛亂的開始，而是紛亂

的終結。在某種內外形勢配合之下，俄國的某一民族，乘機提出和解決自己獨立的問題，那是完全可能的。當然，在這種情形之下，馬克思主義者用不着去阻礙牠。

但是，從這裏可得出一個結論說：俄國的馬克思主義者非擁護民族自決權不行。所以，民族自決權，乃是解決民族問題中的必要的一項。

其次，對於那由於某些原因而審願留在整個範圍以內的民族，又怎樣辦呢？

我們已經說過，民族文化自治是不適宜的。

第一，它是矯揉造作的，沒有生氣的，因為它的前提，須要把那些被生活和實際生活所分開而且散處於全國各地的人們，用矯揉造作的手段，拉攏成爲一個民族。

第二，它推動人們走向了民族主義，因為它走向了把人們按民族原則而加以「分界」的觀點，走向了「組織」民族的觀點，走向了「保存」和培養「民族特性」的觀點，——這完全不是社會民主黨的事情。

我們知道，上議院中的摩拉維亞分離主義者，曾與德國社會民主黨議員分手，而

與摩拉維亞的資產階級議員聯合而爲一個所謂摩拉維亞的『帝政會議』，這不是偶然的。同樣的，猶太工人同盟中的俄國分離主義者拘泥於民族主義，而稱贊『禮拜六』和『俗語』，這也不是偶然的。在俄國國會裏面，還沒有猶太工人同盟的議員，可是在猶太工人同盟的區域中，却有牧師制式的，反動的猶太公社，在這種公社的『領導機關』中，猶太工人同盟設置了猶太工人和資本家的『統一者』。民族文化自治的邏輯，便是如此。

所以，民族自治沒有解決問題。

出路在那裏呢？

唯一正確的解決，就是區域自治。波蘭、立陶宛、烏克蘭、高加索等這些一定的單位，都實行自治。

區域自治的優點，首先就在於：在這種自治之下，我們所要注意的，不是沒有領土的虛無東西，而是住在一定的領土之上的一定的居民。

其次，區域自治不是按民族去劃分人們，不是鞏固民族的區別，恰恰相反，它只是打破了這種區分，把居民統一起來，可以開闢道路，以便進行另一種性質的分界，即按階級而分界。

最後，區域自治不待總的中央的決定，即可以盡量利用本區的天然財富，發展生產力，——這些功用是民族文化自治所沒有的。

所以，區域自治，乃是解決民族問題所必要的一項。

毫無疑義的，無論任何一個區域，都不是通盤清一色的民族，因為其中每個區域，都攙雜着各種少數民族。例如：猶太人的在波蘭，拉多維亞人的在立陶宛，俄羅斯人的在高加索，波蘭人的在烏克蘭等等就是。因此，很可憂慮的，就是少數民族將要被多數民族所壓迫。不過這個憂慮，只有該國仍然處於舊制度之下的時候，才有根據。如果國內有充分的民主主義，那末，這些憂慮便失掉一切基礎了。

有人主張，把分散的少數民族聯合而成爲一個民族聯盟。不過，少數民族所需要

的，不是矯揉造作的聯盟，而是自己在當地所享的實在的權利。非有充分的民主化，這個聯盟能給他們什麼東西呢？或者：在充分的民主化之下，民族聯盟還有什麼必要呢？

少數民族所特別不滿意的的是什麼？

少數民族所不滿意的，並不是由於民族聯盟的缺乏，而是由於應用本族語言的權利的缺乏。允許他們利用本族語言，那末他們的不滿便自然消弭了。

少數民族所不滿意的，不是由於矯揉造作的聯盟的缺乏，而是由於自己本族學校的缺乏。允許他們開辦這樣的學校，那末他們的不滿便失掉一切基礎了。

少數民族所不滿意的，不是由於民族聯盟的缺乏，而是由於信仰自由、遷移自由等的缺乏。允許他們有這些自由，那末他們的不滿便不成其為不滿了。

所以，在一切形式上（語言、學校等等）民族的平權，乃是解決民族問題所必要的一項，根據全國的充分的民主化，制定全國的法律，禁止各種民族特權，禁止對

於少數民族權利的任何壓抑或限制。

在這裏，而且只有在這裏，少數民族的權利才有真正的而不是紙上的保障。

組織上的聯邦主義和民族文化自治之間，有一種邏輯。聯繫的關於這一點，可以爭論，也不可以爭論。但是民族文化自治，替無限的聯邦主義，即轉變為完全分裂、轉變為分離主義的聯邦主義，可以造成適宜的空氣，這却是無可爭辯的。如果奧地利和捷克人和俄羅斯的猶太工人同盟派，先從民族自治開始，然後轉向到聯邦主義，最後走到了分離主義，那末，在這裏，民族自治所自然散佈出來的民族主義空氣，顯然起了很大的作用。民族自治和組織上的聯邦主義是彼此攜手並進的，這不是偶然的，這也是很明白的。無論前者或後者，都要求劃分民族的界限，無論前者或後者，都以成立民族的組織為前提。二者的相似，是毫無疑義的。所不同的，只在於：一個分裂了一般居民，另一個分裂了工人。

我們知道，按民族劃分工人，會產生何種結果。統一的工人政黨的瓦解，工會的

分裂爲各民族工會，民族摩擦的尖銳化，民族的工賊行爲，社會民主黨隊伍的完全墮落，——這就是組織上的聯邦主義的結果。奧國社會民主黨的歷史和猶太工人同盟在俄國的活動，都明顯地證明了這一點。

反對這個的唯一手段，就是基於國際精神的組織。

把俄國各地一切民族的工人團結起來，而成爲統一而完整的集團，再把這些集團團結起來而成爲一個統一的政黨，——這就是我們的任務。

不消說，這樣的黨的組織，不但不排除，而且以統一的黨的整體內部各區域的廣泛的自治爲前提。

高加索的經驗，表明了這種組織的適宜性。如果高加索人居然克服了亞美尼亞工人與韃靼工人之間的民族摩擦，如果他們居然保證了居民的安全，防止互相屠殺和互相械鬥的可能，如果在各種民族雜處的巴庫，現在已經沒有再發生民族衝突的可能，如果此地居然吸引工人加入統一的強大運動的潮流中來，——那末，在這裏，高加索

社會民主黨的國際主義的組織會起了不小的作用。

組織的方式，不但可以影響及於實際的工作。牠對於工人的整個精神生活，也印下不可磨滅的痕跡。工人過着自己組織的生活，他在精神上便可以發展，獲得教育。

因為他加入自己的組織，每次在那裏可以遇到自己的異民族的同志們，在一個總的集團領導之下，與他們在一塊兒進行共同的鬥爭——這樣一來，他會深深地領悟到這樣一種思想：工人們首先是一個階級家庭的一員，是統一的社會主義軍隊中的一員。這對於工人階級的廣大階層，不能不有莫大的教育意義。

因此，國際主義的組織形式，乃是造成同志情感的學校，乃是擁護國際主義的最大的鼓動。

按民族成立的組織，就不然了。工人在民族的基礎上面組織起來，鎖閉在民族的介殼以內，由組織上的界限彼此隔離開來。引起他們特別注意的，不是工人相互間的共同的東西，而是他們彼此所不同的東西。在這裏，工人首先是本民族中的一員；猶

太人、波蘭人等等。組織上的民族聯邦主義，在工人中會培養成民族孤立的精神，這是毫不足為奇的。

因此，民族的組織形式，乃是造成民族狹隘和頑固的學校。

這樣，在我們面前，便有兩個原則上不同的組織形式：一個是國際團結的形式，一個是按民族而在組織上劃分工人「界限」的形式。

調和這兩個形式的各種企圖，至今都沒有成功。

奧國社會民主黨於一八九七年在文堡會議上所通過的調和主義的章程，已經成了空中樓閣了。奧社會民主黨分裂而為各個部分了，工會也隨之而分裂了。「調和」不但成了空想，而且已經有害了。史特拉蘇說得好：「分離主義在文堡會議上獲得了第一次的凱旋。」（見他的“Der Arbeiter und die Nation”[一九二二年出版]）。

在俄國也是一樣。斯托哥爾姆代表大會上對於猶太工人同盟的聯邦主義所採取的「調和」態度，終於完全破產了。猶太工人同盟破壞了斯托哥爾姆的妥協。從大會以

後的第二天起，猶太工人同盟，便成了各地工人匯合在包括一切民族工人的統一組織內的障礙物。雖然俄國社會民主黨於一九〇七和一九〇八年，曾幾次要求一切民族的工人之間能從下實行統一（二六），但是猶太工人同盟仍頑強地繼續進行牠的分離主義的策略。猶太工人同盟，先從組織上的民族自治着手，實際上已經轉向聯邦主義，爲的要完成完全的分裂，完成分離主義。牠與俄國社會民主黨分裂後，就設法拆散和搞亂該黨。試看耶格羅的事件（二七），就可以明白。

所以，「調和」的道路，應當放棄，這是條空想的和有害的道路。

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猶太工人同盟的聯邦主義，那時候，俄國社會民主黨應根據按民族劃分工人的「界限」的原則加以改組；或者是國際主義的組織形式，那時候，猶太工人同盟則根據區域自治的原則，做效高加索的、拉多維亞的、和波蘭的社會民主黨的榜樣，加以改組，而開闢一條大道，以便把猶太工人與俄國其他各民族的工人直接聯合起來。

中間的道路是沒有的：原則是勝利的，而不是「調和」的。
所以，工人國際團結的原則，乃是解決民族問題所必要的一項。

一九一三年一月於維也納

（本文曾連續登載於一九一三年三月至五月的『啓蒙雜誌』第三至第五期）

關於民族問題的報告

——一九一七年四月二十九日（即公歷五月十二日）在俄國社會民主黨第七次全

俄會議（即四月會議）上的報告（二八）——

關於民族問題本應作個詳盡的報告，只因時間太少，我不得不把自己的報告縮小起來。

在未講議決案的草案以前，必須把幾個先決條件講一下。何謂民族的壓迫呢？所謂民族壓迫者，係指那帝國主義者所進行的榨取和掠奪被壓迫民族的體系，用暴力限制被壓迫民族國家權利的方法而言。所有這些總括起來，便成了那叫做民族壓迫政策的一幅圖景。

第一個問題——某一政權憑藉以推行自己的民族壓迫政策的諸階級是怎樣的階級

呢？爲了解決這個問題，必須明白，爲什麼在各國內有着各種形式的民族壓迫，爲什麼在一國內，民族的壓迫，比在別國內更加苦重而粗暴呢？比如在英國和在奧匈，民族的壓迫從未採取殲滅的形式，它存在的方式則爲對於被壓迫民族的民族權利的限制；反之，在俄國，它往往採取着殲滅與屠殺的形式。在有些國家內，反對少數民族的特殊方法是完全沒有的。例如在瑞士就沒有民族的壓迫，在這裏法蘭西人、意大利人、日耳曼人都是自由地在生活着。

各國對民族各不相同的關係，可用什麼來說明呢？

可用這些國家的民主精神程度的差別來說明。當過去的年代老的土地貴族掌握俄國國家政權的時候，民族的壓迫可以採取而且事實上已經採取了可怕的屠殺與殲滅的形式。在英國，因爲有着某種程度的民主精神和政治自由，所以民族壓迫很少有粗暴的性質。至於瑞士，因爲它接近於民主社會，所以它內面的各弱小民族都有多少充分的自由。一句話，某國愈民主，則民族的壓迫愈薄弱；反之，某國愈不民主，則民族

的壓迫也越粗暴。我們所謂民主化者既是有着當政的一定的階級之謂，那末從這一觀點上可以說，舊的土地貴族愈接近於政權，如舊時沙皇制度下的俄國所有者，則民族壓迫也愈利害，其形式也愈可惡。

不過，民族壓迫，不僅爲土地貴族所支持。除它以外，還有別的力量——帝國主義集團，牠們把奴役殖民地人民的方法，也搬到本國內部來，因而牠們乃是土地貴族的天然同盟者。跟在牠們後面的有小資產階級，有一部分知識份子，有一部分工人的上層份子，他們也享有掠奪的果實。這樣，結果便是一個完整的支持民族壓迫的社會力量的合唱隊，其首領則爲土地貴族和金融貴族。爲了創立真正民主的秩序，首先須要清洗根基，掃除政治舞台上的這種合唱隊。

(宣讀議決案草案)

頭一個問題：怎樣建立被壓迫民族的政治生活呢？對於這一問題，應當這樣來答覆，就是俄國境內各被壓迫民族願留在俄羅斯國家以內還是分出而成爲一個獨立國

家，須讓他們有自行解決這個問題之權。現在擺在我們眼前的，就有芬蘭人民與臨時政府間的一個具體的衝突。芬蘭人民的代表，社會民主黨的代表，要求臨時政府交還芬蘭人民在併入俄國以前所享的那些權利。臨時政府則拒絕這一要求，不承認芬蘭人民自主。我們應當站在那一方面呢？顯然的，我們應當站在芬蘭人民的方面，因為承認強制某一民族於統一的國家範圍以內，那是不可能的。我們提出民族自決權的原則，是爲了把反對民族壓迫的鬥爭提高到反對我們的共同敵人——帝國主義的鬥爭的頂點上。要不是這樣作的話，我們不會做了帝國主義者的應聲虫了。我們社會民主主義者要是拒絕芬蘭人民有表現自己分離意志和實行這一意志之權，那末我們不會做了沙皇主義政策的持續人了。

把關於一個民族自由分離權利的問題，跟關於一個民族隨時分離義務的問題，混爲一談，那是不可以的。無產階級的政黨，於每一個別場合之下，應獨立地依着環境來解決這個問題。我們承認被壓迫民族有分離之權，有決定自己政治命運之權，但是

我們並未因此解決某一民族應否於一定時期跟俄羅斯國家分離的問題。我承認某一民族有分離之權，但是這不是說，我務須做到這一點。某一民族有分離之權，但是依着條件的轉移，它可以不享有這一權利。這樣一來，隨着無產階級的利益以轉移，隨着無產階級革命的利益爲轉移，我們方面，仍保留有從事贊成，或反對分離的鼓動的自由。這樣，分離的問題，於每一個別場合之下，便獨立地，依着環境而解決了，正因爲如此，承認分離權的問題，不應當跟在某些條件下分離的適合性混爲一談。比方，我個人爲了注意外高加索與俄羅斯的共同發展，及無產階級鬥爭的若干條件等等，是反對外高加索的分離。不過假使外高加索的各人民仍然要求分離的話，那末就讓他們分離好了，不會遇到我們方面的反對。

(繼續宣讀議決案草案)

其次，對於那些情願留在俄羅斯國家範圍以內的人民怎樣辦呢？要是各人民中間對俄羅斯有不信任之事的話，那首先是由沙皇主義的政策所培養成的。假使沒有沙皇

主義，沒有它的壓迫政策的話，那末這種不信任定會削弱的，對俄國的內向力定會增長的。我想，十分之九的民族，在推翻沙皇主義以後，都是不願分離的。所以，黨提議，凡不願分離而有生活、語言特徵的區域，如外高加索、土耳其斯坦、烏克蘭，應當成立區域自治。這些自治區域的地理界綫，應由當地居民自己依照經濟生活等條件來決定的。

不過與區域自治分庭抗禮的，還有一個計劃，這一計劃早為猶太工人同盟，尤其提出民族文化自治原則的希普林格和巴威爾二氏所推薦。我認為，這個計劃，對於社會民主黨是不適宜的。它的本質如下：俄羅斯應改爲一個各民族的聯盟，而各民族應改爲包括在一個社會內的人們的聯盟，不論他們是住在那國的那一區域內。一切俄羅斯人，阿美尼亞人等，與領土無關，都組織成爲自己特有的民族聯盟，然後再加入全俄羅斯的各民族聯盟。這一計劃，是極端不便利，而且是極端不適宜的。問題在於資本主義的發展，使整羣之人，與民族脫離，而散居在俄國的各角落。民族的分散是由

於經濟的條件所造成的，而在民族分散的情形之下，要把該民族的各個人們撮合起來，那是說用人工的方法來組織民族，製造民族。用人工的方法把人們撮合而成爲一個民族，那是說站在民族主義的觀點上面了。猶太工人同盟所提出的這一計劃，社會民主黨是不能贊成的。它在一九二二年本黨會議（二九）上即被否決了，而且除猶太工人同盟外，在社會民主黨範圍以內，一般對於它不大注意。這一計劃又叫做文化自治，因爲它從某一民族所感興趣的各色各樣的問題當中，分出了純文化的一些問題，把它們交給民族聯盟去解決。這一劃分的出發點，乃是文化可把民族聯合而爲一個整體一事。有人以爲，在民族的腹內一面有分裂民族的利益，比如經濟的利益；別一方面又有把民族撮合而成爲一個整體的利益，這種問題便是文化問題。

最後，還有一個關於少數民族的問題。少數民族的權利，應當特別加以保障。所以，黨要求關於學校、宗教諸問題，少數民族要完全平等，嚴止對少數民族的任何限制。

第九條便規定各民族完全平等。只有在全社會完全民主化之下，才有實行這一條所必要的條件。

各民族的無產階級，怎樣可組織成一個共同的政黨，關於這個問題，我們也應當加以解決。有一個計劃，主張工人按民族組織起來，有幾個民族，便有幾個政黨。這一計劃為社會民主黨所否決。實踐表明，某國的無產階級，按民族組織起來，結果，只有使階級利害相關的觀念為之消滅，某國境內一切民族的一切無產者，應當組織成爲一個不可分割的無產階級的集團。

總之，我們關於民族問題的觀點，可歸納如下：（一）承認各民族有分離權；（二）對於留在某國境內的各民族，應實行區域自治；（三）對於少數民族應製定獨特的法律以保障他們的自由的發展；（四）對於某國境內一切民族的無產者，應成立一個不可分割的無產階級集團——一個統一的政黨。

結 論

兩個議決案，大體說來，都是相同的。除了「承認分離權」一條外，比打柯夫同志抄襲了我們決議案中的一切條文。二者之中必擇其一；或是我們否認各民族有分離權，這應當爽直地說出來；或是我們不否認這一權利。現在芬蘭有一種趨向於保證民族自由的運動；同時也有着臨時政府反對牠的鬥爭。這裏有一個問題：就是應當贊助誰呢？或者是我們贊成臨時政府的政策，贊成用暴力抑制芬蘭，把它的權利減至最低限度，這時我們便是吞併主義者了，因為我們附和臨時政府了；或者是我們贊成芬蘭的獨立。這裏應當肯定地說贊成這個或那個，只限於空喊權利，那是不可以的。爭取愛爾蘭的獨立的運動是有的。同志們，我們應當支持誰呢？或是贊成愛爾蘭，或是贊成大英帝國。請問——生活本身也在問——我們是贊助那反對壓迫的人民呢？還是贊助那壓迫他們的階級呢？我們可以說，社會民主黨，因為它的目標是社會主義革

命，所以它應贊助那反對帝國主義的民族的革命運動。或者是我們認為，我們必須爲社會主義革命的先鋒隊創造一個後方如高舉反對民族壓迫旗幟的人民者，——這時我們在西方與東方之間便打了一架橋樑，這時我們便真正採取了世界社會主義革命的方針；或者是我們不這樣作，——這時我們便孤立起來，這時我們便放棄了利用被壓迫民族內部一切革命運動以消滅帝國主義的策略。我們應當贊助一切趨向於反對帝國主義的運動。在相反的情形之下，芬蘭的工人告訴我們的是什麼呢？比打柯夫和狄茨任斯基二位同志告訴我們，任何民族運動，都是反動的運動。這是不對的，同志們。難道愛爾蘭反對英帝國主義的運動不是給帝國主義以打擊的民主運動嗎？難道我們不應當支持這一運動嗎？……

· (摘自一九一七年四月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彼得堡會議與全國會議)，一九二五年出版。)

十月革命與民族問題 (三〇)

——一九二八年——

民族問題並不是一種什麼獨立的問題，也不是永久存而不廢的問題。民族問題祇是改造現實社會制度的總問題的一部分，它完全是由社會環境的條件、國家政權的性質、以及一般社會發展的全部行程來決定的。這在俄國革命時期表現得特別顯明，當時民族問題和俄國邊疆的民族運動，隨着革命的進行和出發，很快地改變了自己的內容，這是衆目共覩的。

一 二月革命與民族問題

在俄國資產階級革命的時代（即一九一七年二月起），邊疆的民族運動，曾帶有

資產階級解放運動的性質。數百年以來被「舊制度」所壓迫和剝削的俄國各民族，初次才感覺着自己的力量，而突向壓迫者決一死戰。「消滅民族的壓迫」，這便是運動的口號。俄國邊疆，剎那間設滿了各「全民」的機關。運動的領導者則是民族的資產階級德謨克拉西的智識階級。拉多維亞、愛斯特邊區、立陶宛、喬治亞、阿美尼亞、阿才培靈、高加索、吉爾吉斯坦、伏爾加河中部等地的「國民議會」；烏克蘭（三二）和白俄羅斯（三三）的「拉打」；比薩拉比亞的「斯法士柴立」（三三）；克里姆（三四）和巴什吉爾（三五）的「苦爾台」；土耳其斯坦的「自治政府」（三六）等等，所有這些都是民族資產階級團結自己力量的「全民」機關。他們都以爲「沙皇制度」是民族壓迫的「根本原因」，因此高唱由「沙皇制度」之下解放出來，而成立民族資產階級的國家。他們把民族自決權解釋爲邊疆民族資產階級奪取政權和利用二月革命來成立「自己」的民族國家的權利。革命的進一步的發展，並未顧慮到而且也不能顧慮到上邊所說的這些資產階級的機關。而且又忽略了代替沙皇制度而出現的則是赤裸

裸的未帶面具的帝國主義，這個赤裸裸的帝國主義是各民族更有力更可怕的敵人，是民族新的壓迫的基礎。

但是沙皇制度的消滅和資產階級的登台，並未使民族的壓迫爲之消滅。舊的「粗暴」的民族壓迫的方式，代以新式「精緻」的更可怕的壓迫方式。李伏夫——米流可夫——克倫斯基三人的政府，不但沒有放棄民族壓迫的政策，而且又重新出兵征討芬蘭（一九一七年夏季解散國會）及烏克蘭（破壞烏克蘭各種文化機關）。不僅此也，這個本性是帝國主義的政府，仍舊號召人民繼續戰爭，藉以征服新的土地、新的殖民地 and 民族。此種行動，不僅是由於它的帝國主義的內在本性所使然，並且由於西歐現有的老帝國主義國家所推動，這些老帝國主義國家不可抑制地力謀征服新的領土和民族，而以縮減它的勢力範圍來威脅它。帝國主義國家力謀征服弱小民族的鬥爭——這是這些國家存在的條件——在帝國主義戰爭的過程中，暴露無遺。沙皇制度的消滅和米流可夫——克倫斯基的登上政府舞台，對於這個醜惡的圖景，絲毫沒有加以什麼改善。

自然，因爲過度的『全民』團體，表現了國家獨立的趨向，所以牠們遭遇了俄國帝國主義政府方面的不可克服的阻礙。因爲牠們只圖建立民族資產階級的政權，而絲毫不顧『自己』的工人和農民的根本利益，所以牠們在工農中間引起了不平等及不滿意。所謂『國民軍』祇是火上添油；牠們從上反對危險是無力的，牠們只有從下加強和加深危險。『全民』的團體既無法防禦外來的打擊，又無法防止內部的分裂。方始萌芽的民族資產階級的國家，尙未興盛，便告衰落了。

這樣，對自決原則的舊的資產階級德謨克拉西的解釋，便變成了一句廢話，失掉了革命的意義。顯然的，在此種情形之下，便談不到『民族壓迫』的消滅和『弱小民族國家的獨立』了。很明白的，被壓迫民族勞動羣衆的解放和民族壓迫的消滅，非與帝國主義斷絕關係，推翻『自己』的民族資產階級及勞動大眾自己取得政權不可。

這個理論，在十月革命以後，表現得特別顯明。

二 十月革命與民族問題

二月革命會含着內在的不可調和的矛盾。革命的告成，雖是工農的力量，但其革命的結果，政權不是落在工農（兵）手中，而是落在資產階級手中了。

工人農人的舉行革命，爲的是停止『戰爭』，達到『和平』；但是奪取政權的資產階級，却力謀利用羣衆的革命熱忱來繼續『戰爭』，反對『和平』。國內經濟的瓦解和糧食的危機要求沒收私人的資本和工業企業，交給工人，沒收地主的土地，交給農民，但是米流可夫和克倫斯基的資產階級政府，却是保護地主與資本家的利益，堅決保護後者，以防止工人和農人的侵害。二月革命乃是資產階級的革命，這一革命爲工農的手所造成，但其利益却歸權取者所享有了。

當時俄國全國在帝國主義戰爭、經濟瓦解、糧食恐慌等重担之下，日益凋敝。前線上的軍隊瓦解分崩了。工廠和作坊停閉了。國內飢荒日益增加了。二月革命及其內

在的矛盾，很顯明地表現出了它不足以『救國』。米流可夫和克倫斯基的政府，很顯明地表現無力可以解決革命的根本問題，爲了使全國打破帝國主義戰爭與經濟瓦解的困境，再來一個新的社會主義的革命，是很必要的。

由十月政變的結果，便來了這一革命。

十月革命推翻了地主和資產階級的政權，而代以工農政府，這一打擊解決了二月革命的矛盾。地主富農萬能權力的廢止和土地的交給農村勞動羣衆去使用；工廠作坊的沒收和將牠們交給工人去管理；與帝國主義的決裂和掠奪戰爭的停止；祕密條約的公佈與奪取他人領土政策的揭露，以至被壓迫民族勞動羣衆得有民族自決權的宣佈和芬蘭獨立的承認，——這一切都是蘇維埃政權在革命過程中所進行的基本設施。

這是一個真正的社會主義革命。

革命自在中心開始之後，自然不能長久停留在這個狹窄的範圍以內。它在中心勝利以後勢必要擴張到邊疆去。事實上，革命的波浪，自政變的第一天起，即從北方波

及於全俄羅斯，包括了一個一個邊疆地方。不過在這些地方，革命的浪濤，却遭遇了巨堤，那就是尚在十月革命以前即已成立的『國民議會』和特別區『政府』（頓河、庫班、西北利亞）。問題就在於這些『民族政府』，不願聽到社會主義的革命。這些『民族政府』，就性質說，是資產階級的，因之，牠們並不想毀壞舊的資產階級世界，反之，牠們認為牠們的責任是要竭力保護和鞏固資產階級的世界。在本質上，這些政府是帝國主義的，因之牠們並不願與帝國主義決裂；反之，只要有機會，牠們就想奪取並征服其他民族的一塊地。所以，邊疆的民族政府，會向中央的社會主義政府宣戰，是毫無足怪的。牠們宣戰以後，自然而然的，便成了反動的中心，把全俄羅斯的反革命者，都吸引在自己的周圍。誰都看得清楚，那些從俄國驅逐出來的反革命者，都趨向這個中心，牠們在這個中心的周圍編成了白黨的『民族』軍。

可是除『民族』政府外，在各邊疆尚有民族的工人和農人。他們在十月革命前，就做照俄國中央蘇維埃的榜樣，組織了自己的革命的蘇維埃，他們從未與自己的北方

弟兄斷絕關係。他們力謀戰勝資產階級，他們也同樣為社會主義的勝利而鬥爭。因此，他們與自己的「民族」政府的衝突日益加甚，這是一點都不足為怪的。十月革命，只是鞏固了邊疆工農和俄國工農的聯合，增加了他們對社會主義勝利的信心。「民族」政府與蘇維埃政權間的戰爭，使工農與這些民族政府的衝突，達到完全與他們決裂，直至公開暴動以反對牠們的地步。

全俄工農反對俄國邊境各「民族」資產階級政府的反革命聯盟的社會主義聯盟就是這樣形成的。

有些人認為各邊疆「政府」的鬥爭，乃是反對蘇維埃政權的「無情中央集權制」以求民族解放的鬥爭，這是不對的。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會允許這樣寬泛的地方分權制；世界上沒有一個政府會給人民如此完滿的民族自由，如俄國的蘇維埃政權者。邊疆各地政府的鬥爭，始終是資產階級反對社會主義的反革命的鬥爭。民族旗幟，只是拿來欺騙羣衆、藉以遮掩民族資產階級的反革命陰謀的幌子吧了。

可是所謂「民族」政府和區域政府的鬥爭，是不平等的鬥爭。牠們受兩方面的攻擊：外面是蘇維埃政權；內部是「自己」的工人和農民。因此，「民族」政府初次大戰後即行退却了。

芬蘭工農的暴動和資產階級「國務院」的逃亡；烏克蘭工農的暴動和資產階級「拉達」（即國會）的逃亡；頓河、庫班、西伯利亞等地工人和農民的暴動和白軍卡金、科爾尼羅夫及西伯利亞「政府」的崩潰；土耳其斯坦貧民的暴動和使「自治政府」的逃亡；高加索的土地革命和喬治亞、阿美尼亞、阿才培疆等處「民族議會」的孤立無援，所有這些業皆週知的事實，都表明了各邊疆「政府」與「自己」羣衆的完全脫離關係。激頭激尾瓦解的各「民族政府」，乃「不得不」向西歐帝國主義，全世界弱小民族歷史的壓迫者和剝削者乞援，來反對「自己」的工人和農民。

外國干涉和邊疆各地被佔的一時期，就是這樣開始的。這一時期又一度揭穿了各「民族」政府與區域政府的反革命性。

現在，大家才明白，民族資產階級所求的，並不是把『自己的民族』從民族的壓迫下解放出來，而是奪取民族血汗的自由，保存自己特權和資本的自由。

現在大家才明瞭，非與帝國主義決裂，非推翻被壓迫民族的資產階級，非把政權交給這些民族的勞動羣衆的手中，則被壓迫民族的解放是不可能的。

舊的資產階級的民族自決原則觀和『一切政權歸諸民族資產階級』一口號，在革命的過程中已經被揭破而拋棄了。社會主義的民族自決原則觀和『一切政權歸諸被壓迫民族的勞動羣衆』一口號，則獲得了應用的權利和可能性。

這樣，十月革命，便結束了舊的資產階級的民族解放運動，而開闢了一個被壓迫民族工人和農民的社會主義運動的新紀元，這一運動的目的，是在於反對一切的壓迫（民族壓迫在內），反對『自己』的與異族的資產階級的政權，反對一般帝國主義。

三 十月革命的世界意義

十月革命自在俄國中心勝利並佔有好些邊疆地方以後，便不能限於俄國的領土範圍以內了。在帝國主義世界大戰和一般下層民衆不滿意的空氣中，十月革命不能不蔓延及於鄰國。與帝國主義的分裂和俄國的脫離強盜戰爭；祕密條約的公佈和侵略異國領土政策的宣佈廢止；民族自由的宣佈和芬蘭獨立的承認；俄羅斯的宣佈爲「各蘇維埃民族共和國聯邦」和蘇維埃政權投入世界的與帝國主義作堅決鬥爭的呼喊——所有這一切對於被奴役的東方和正在流血的西方，不能不有極嚴重的影響。

實在說起來，十月革命乃是世界上的第一次革命，牠打破了東方被壓迫民族勞動羣衆的噩夢，把他們吸引在反對帝國主義的鬥爭中。在波斯，在中國，在印度，都按照俄羅斯蘇維埃的榜樣，都成立了工農蘇維埃，便是證明。

十月革命是世界上的第一次革命，這革命作了援救西歐工人和兵士的模範，推動他們走上了從戰爭與帝國主義壓迫之下真正解放出來的道路。奧匈和德國工人兵士的暴動；工人兵士代表蘇維埃的成立；奧匈不平權的各民族反對民族壓迫的革命鬥爭

——都證明了這一點。

問題並不在於東方，甚至西方的鬥爭，尙未完全脫離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的外膜，而是在於反帝國主義的鬥爭已經開始了，而且它仍在繼續着，勢必達到自己的邏輯的盡頭。

外國的干涉和「外部」帝國主義者的侵略政策，只是加劇了革命的危機，吸引了新的民族參加鬥爭，擴大了革命的反帝國主義鬥爭的區域。

這樣，十月革命便在落後的東方民族和先進的西方民族之間建立了一種聯繫，把他們吸收到一個反帝國主義鬥爭的共同營壘裏面來了。

於是民族問題，遂從反對民族壓迫的局部問題，一變而爲各民族、各殖民地、各半殖民地從帝國主義下謀解放的一個整個問題了。

第二國際及其首領考茨基的該死的罪過，就在於他們附和資產階級的對民族自決權的解釋，不明白民族自決權的革命意義，他們不會也不願把民族問題放在公開與帝

國主義作鬥爭的革命的基礎上面；他們不會也不願把民族問題跟殖民地解放的問題聯繫起來。

奧國社會民主主義者，如巴威爾，綸納爾之流的愚笨處，就在於他們不了解民族問題與政權問題不可分離的關係，力謀將民族問題跟政治分開，把它鎖閉在「文化啓蒙」問題的範圍以內，而忘記了帝國主義和被帝國主義所壓迫的殖民地這些「小事」的存在。

有人說：民族自決權和「保護祖國」的原則，在社會主義革命潮流高漲的環境中已經被事件的行程本身所取消了。在事實上，民族自決權和「保護祖國」的原則並沒有取消；所取消的只是資產階級對於這些原則的解釋吧了。

我們祇要把呻吟在帝國主義壓迫下而力謀解放的被佔地方看一下；只要把爲保護社會主義祖國抵禦帝國主義強盜而進行革命戰爭的俄國看一下；只要把現在奧匈所發生的事變想一下；只要把那些已成立了蘇維埃的被奴役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印度、

波斯、中國)看一下，——把所有這一切看一下，就可以知道社會主義所謂的民族自決權原則的革命意義了。

十月革命的偉大的世界意義，最重要的有下列三點：

第一：它擴大了民族問題的範圍，把它從反對民族壓迫的局部問題，變為各被壓迫民族、各殖民地及半殖民地從帝國主義下謀解放的一個整個問題。

第二：它給這一解放開闢了廣大的可能性和真正的道路，而大大促進了西方和東方被壓迫民族的解放事業，把他們吸收到勝利的反帝國主義鬥爭的共同軌道裏面來。

第三：因此，它在社會主義的西方和被奴役的東方之間架了一道橋樑，從西方的無產者起，經過俄國的革命，到東方的被壓迫民族止，建築了一條新的反對世界帝國主義的革命戰綫。

現在東方和西方的勞動者和被剝削羣衆對俄國無產階級，表示不可言喻的熱情，即可以此來說明的。

前。

現在全世界兇惡的帝國主義者反對蘇維埃俄羅斯的暴行，主要的也可以此來說明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六日和十九日真理報第二四一期和二五〇期)

蘇維埃政權對於俄國民族問題的政策 (三七)

——一九二〇年——

俄國三年的革命與內戰證明，如無俄國中央區域與其邊疆的相互支持，則革命的勝利，便無可能；俄國從帝國主義鐵蹄之下解放出來，亦不可能。俄國中央區域，乃是世界革命的火爐，如無富於原料、燃料及食物的邊疆的幫助，則它便不能長久支持。如無比較發展的俄國中央區域方面政治、軍事及組織上之幫助，則俄國的各邊疆定要淪受勢所必至的帝國主義的奴役。有人說，比較發展的無產階級的西方，如無不大發展但却富於原料和燃料的農民的東方的贊助，便不能夠結束全世界的資產階級；同樣，比較發展的中央的俄國，若無不大發展，但富於必要資源的俄國邊疆的贊助，也不能徹底完成革命事業，要是前一理論正確的話，那末後邊一個理論也是正確的。

自從蘇維埃政府出現的第一天起，無疑的協約國就考慮到了這一情形，所以當時牠們（協約國）就用把俄國中央和其重要邊疆隔離的方法，實行在經濟上包圍俄國中央的計劃。後來從一九一八年起到一九二〇年止，經濟上包圍俄國的計劃，仍舊是協約國征討俄國的牢固基礎，而現在牠們在烏克蘭，在阿才培羅，及土耳其斯坦等地的陰謀，也是爲了實現這一計劃的。

因之，保證俄國中央與邊疆間的牢固聯合，便獲得了極大的注意。

因之，在俄國中央與邊疆之間，確立一定的關係，確立一定的聯繫，以保證牠們之間的密切而不可破壞的聯合，那是很必要的。

這種關係應當是怎樣一種關係呢？牠們應當採取那種方式呢？

換一句話說：蘇維埃政權對於俄國民族問題的政策是在什麼地方呢？

把邊疆與俄國分離，作爲中央與邊疆之間的關係方式，這一要求，應加以排斥，

這不僅因爲它跟關於確立中央與邊疆相互聯合一問題的提法本身相抵觸，而且主要因

爲它在根本上是跟中央與邊疆民衆的利益相衝突的。至於邊疆的分離，可以破壞促進西方與東方解放運動的俄國中央的革命威力，而分離的邊疆自身又不可避免地要淪在國際帝國主義奴役之下，關於這一點就不用說了。只要把脫離俄國的喬治亞、亞美尼亞，波蘭，芬蘭等國看一下就夠了，牠們名爲獨立，其實則變爲協約國的絕對的屬國了（註）；只要把不久以前的烏克蘭和阿才培疆的歷史回想一下，那時前者爲德國的資本所掠奪；後者則爲協約國所掠奪，就可以明白在目前的國際條件之下邊疆分離一要求的全部反革命性了。在無產階級的俄國與帝國主義的協約國正在作生與死的鬥爭的環境下，對於邊疆只有兩個出路：

（註）在十月革命後內戰期間，帝國主義者曾出兵干涉，佔領烏克蘭、喬治亞這些地方，

• 故斯大林當時曾有此言。——譯者

或是跟俄羅斯在一起，這時邊疆勞動羣衆便可解除帝國主義的壓迫；

或是跟協約國在一起，這時便是勢不可免的帝國主義的羈絆。

第三條出路是沒有的。所謂獨立的喬治亞、亞美尼亞、波蘭、芬蘭等的所謂獨立，只是欺人的外表。這一外表掩護了這些國家對某一帝國主義集團的完全的依賴。

當然，俄國的邊疆，住居在這些邊疆的民族與部落，跟其他的任何民族一樣，都有跟俄羅斯分離的無限權利，要是其中某一民族大多數決定要跟俄羅斯分離，如芬蘭於一九一七年所作者，那末俄羅斯大概也許可以根據事實，默認分離。不過這裏不是就民族的權利而言，那是不可爭辯的，而是就中央與邊疆的民衆的利益而言，是就數動的性質而言，這一性質是由這種利益來決定的，這種鼓動，只要本黨不願消滅自己，只要本黨想要以一定的方向來影響各民族勞動羣衆的意志，那務必要進行的。正是民衆的利益告訴說，邊疆分離的要求在革命的現階段上是極端反革命的。

同樣，把所謂民族文化自治，作為俄羅斯中央與邊疆的聯合方式，也應當加以排斥。近十年來奧匈帝國（民族文化自治的祖國）的實踐，表明了把民族文化自治作為多民族國家各民族勞動羣衆聯合方式的暫時性與無生氣。希普林格與巴威爾這兩個民

族文化自治的創作者，現在正坐在他們的狡猾的民族綱領的破槽中，他們也作了此事的活證據。末了，俄羅斯民族文化自治的傳聲筒——有一個時期很有名的猶太工人同盟，不久以前自己也不得不正式承認民族文化自治的無用，它公開地說道：

「民族文化自治的要求，是在資本主義制度的範圍內所提出的，現在在社會主義革命的條件之下，便失掉了自己的意義了。」（見「猶太工人同盟第十二次代表會議」，二十一頁，一九二〇年出版。）

最後就張有獨特生活和民族成份的邊疆，實行區域自治，這可說是中央與邊疆間聯合的唯一適宜的方式，這種自治最適宜於用聯邦聯繫的絲結來聯絡俄國邊疆與中央。這就是那蘇維埃政權自出世之日起所宣佈而且今日以行政公社和自治蘇維埃共和國方式在邊疆所實行的蘇維埃自治。

蘇維埃自治並不是一種凝固不變永遠如此的東西，它允許自己的發展可以採取各式各樣的方式與程度。它從狹隘的行政上的自治（如伏爾加河流域的日耳曼人、秋瓦

什、卡勒拉)起，進而到更廣泛的政治上的自治(如巴什吉爾、伏爾加河流域的韃靼人、吉爾吉斯)，從廣泛的政治上的自治起，再進而到更加廣泛的方式(烏克蘭、土耳其斯坦)；最後，從烏克蘭式的自治起，更進而到最高方式的自治，到條約的關係(阿才培疆)。蘇維埃自治的這一伸縮性，乃是它的主要優點之一，因為這一伸縮性可以包括處在文化經濟發展各種階段上的各色各樣的俄羅斯各邊疆。三年來蘇維埃政權對俄國民族問題的政策表明，蘇維埃政權實現各式各樣的蘇維埃自治所走的道路是很正確的，因為只有由於這種政策，它才成功開闢了到俄羅斯邊疆窮鄉僻壤去的大道，發動最落後和在民族關係上各色各樣的羣衆來參加政治生活，把這些羣衆用各式各樣的線索跟中央聯繫起來——這一任務，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的政府，不但沒有解決過，而且沒有提出過(都害怕提出來)！俄羅斯基於蘇維埃自治原則的行政的劃分，尚未完畢，北高加索人、卡米克人、切列米斯人、伏恰克人、布雅特人等，都還在等待着問題的解決，但是不論未來俄國的行政地圖採取怎樣的方式，也不論在這一方面有怎樣

的毛病，——事實上確曾有若干毛病——但必須承認的，就是俄羅斯根柢區域自治的原則實行行政的劃分，就團結邊疆於無產階級中央周圍，就使政權與邊區廣大民衆接近而言，乃是一大進步。

不過某一方式的蘇維埃自治的宣佈，相適應的法令的頒佈，甚至邊疆政府的成立如自治共和國的區域人民委員會者，還不足以鞏固邊疆與中央的聯合。爲了鞏固這一聯合，首先需要消滅邊疆的冷淡態度與閉塞主義、家長制與不文化、對中央的不信任，——所有這些都是沙皇主義的野蠻政策留給邊疆的遺產。沙皇主義故意在邊疆培植家長式封建的壓迫，爲的使羣衆永遠處在奴隸與愚頑的狀態中。沙皇主義故意把殖民份子移植在邊疆的優良角落，爲的把土人排擠到惡劣區域中去，以加強民族的隔閡。沙皇主義抑制、有時簡單地取消當地的學校、戲院、教育機關，爲的使羣衆處於黑暗之中。沙皇主義斬斷當地居民中優秀人們的一切進取志向。最後，沙皇主義弄死了邊疆民衆的任何積極性。由於這一切，沙皇主義在土人中間培養下了極深刻的對一

切俄羅斯人的不相信，這種不相信有時變成了仇視的關係。爲了鞏固俄羅斯中央與邊疆間的聯合，需要消滅這種不信任，需要創造相互理解和親睦信任的空氣。但是爲了消滅這種不信任，首先需要幫助邊疆民衆解脫封建家長羈絆的殘餘，需要廢除（要事實上的廢除，並不是口頭上的廢除）殖民份子的所有一切特權，需要使民衆嘗到革命的物質幸福。簡言之，需要向羣衆證明：中央的無產階級的俄羅斯，是在保護牠們，只是在保護牠們的利益，要證明這一點，其法不僅單單要採取壓制方法以對付殖民者和資產階級民族主義者，這種方法往往爲羣衆所不了解，而且首先要採用澈底的深思熟慮的經濟政策。

大家都知道，自由主義者是要求普遍義務教育的。邊疆的共產主義者，不能比自由主義者右些，要是他們願消滅人民的無知，要是他們願在精神上使俄羅斯中央與邊疆接近的話，那末他們應當在邊疆實施普通教育。不過爲了做到這一點，需要發展當地的民族學校、民族戲院、民族教育機關，提高邊疆民衆的文化水準，因爲愚頑與無

知乃是蘇維埃政權的最危險的敵人，這無須加以證明了。我不知道，在這一方面，我們的工作究竟有多末順利，但是各方告訴我們，在一個最重要的邊疆內，當地的教育人民委員部用於當地學校的款項，僅僅是牠的放款的百分之十而已。要是這是真確的話，那應當承認，在這一方面，很可惜的，我們與「舊的制度」實在相距不遠。

蘇維埃政權，並不是脫離民衆的一個政權；反之，它是唯一的從俄國民衆當中產生出來的政權，是與俄國民衆最親近的政權。老實地說，蘇維埃政權通常在千鈞一髮的當兒，總是表現一種空前未有的力量和彈性，其原故就在這裏。使蘇維埃政權成爲俄國邊疆民衆那樣親近的政權，是很必要的。但是爲了使蘇維埃政權成爲民衆親近的政權，蘇維埃政權首先應當成爲民衆所了解的政權。因此，必須要使邊疆的蘇維埃機關——法庭、行政機關、經濟機關、直接的權力機關（以及黨的機關），應當盡可能地應用熟悉當地居民生活、習慣、道德、語言的當地人，必須要吸引土著民衆當中一切優秀的份子參加這些機關，必須要把當地勞苦大衆捲入在全國各種行政機關裏面來，

即軍事訓練也不能例外，必須要使羣衆看見蘇維埃政權及其機關確是他們自己努力的事業，確是他們期望的化身。只有用這種方法，才可以在羣衆與政權之間建立一種牢不可破的精神聯繫，只有這種方法才可使蘇維埃政權成爲邊疆勞苦大衆所了解所親近的政權。

有些同志，把俄羅斯的自治共和國及一般把蘇維埃自治看作一種暫時的——即使是必要的——醜事，由於若干情形，這種醜事是不能不犯的，但必須加以糾正，隨時消除。這一觀點在根本上是不正確的，不論如何，它跟蘇維埃政權對民族問題的政策沒有絲毫共同之點。蘇維埃自治，並不是一種抽象的和玄想的東西，因之更不能認爲它是一種空洞的宣言式的諾言。蘇維埃自治乃是聯絡邊疆與中央俄羅斯最現實最具體的一個方式。誰都不能否認，烏克蘭、阿才培疆、土爾基斯坦、吉爾吉斯、巴什吉爾、韃靼等邊疆，牠們既都力謀增進民衆文化物質的生活，那末牠們就非有本族的學校，非有主要由當地人組成的法庭、行政機關、政權機關不可。而且，這些區域的

真正的蘇維埃化，牠們的轉變爲蘇維埃國家，這些國家與中央俄羅斯密切聯繫而成爲一個國家整體，是非廣事開辦當地學校，非成立應用熟悉居民的生活與語言的人的法庭、行政機關、權力機關不可的。但是要使學校、法庭、行政機關、權力機關應用本族語言，那就是在事實上實施蘇維埃自治，因爲蘇維埃自治無非是這些披着烏克蘭、土耳其斯坦、吉爾吉斯等形式的制度的總和罷了。

因此，怎能說蘇維埃自治是暫時的，而必須與它作鬥爭呢？

二者必居其一：

或是烏克蘭、阿才培疆、吉爾吉斯、烏茲別克、巴什吉爾等語言，都是一種真正的現實，因而在這些區域內絕對需要發展本族的學校、法庭、行政機關、及由當地人組成的權力機關，這時蘇維埃自治就應當在這些區域內徹底施行，毫無保留。

或是烏克蘭、阿才培疆等語言都是一種空洞的虛構東西，因而學校及其他用本族語言的機關便不需要了，這時蘇維埃自治就像無用的垃圾一樣，應當把它丟掉。

只有不懂事理或可憐的糊塗虫，才會尋求第三條路。

邊疆當地出身的知識份子的極端缺乏，一切毫無例外的蘇維埃和黨的各部門工作指導人員的缺乏，乃是實現蘇維埃自治的嚴重的障礙之一。這一缺乏不能不阻止住邊疆教育與革命建設的工作。正因為如此，丟開這些為數很少的當地知識份子羣，那是很蠢的，對事有害的，這些知識份子也許願為民衆服務，但是不敢這樣作，因為他們不是共產主義者，認為自己為不信任的空氣所包圍，害怕可能的壓迫。對於這些份子，可以順利地應用吸引他們參加蘇維埃工作的政策，吸引他們担任經濟、農業、食物等職務以期使他們逐漸蘇維埃化的政策。因為很難說，這些知識份子羣，要比反革命的軍事專家更不可靠，這些反革命的軍事專家，他們雖有反革命性，但他們仍被吸收來參加工作，後來並使他們在重要的職務上蘇維埃化。

不過單是利用民族的知識份子羣，還不足以滿足對於指導人員的需要。同時，還需要發展邊疆一切行政部門的豐富的訓練班和學校網，以便建立當地人出身的指導幹

部。因爲很明白的，沒有這種幹部，那開辦本族學校、法庭、行政機關及本族語言的機關，是非常困難的。

有些同志在邊疆蘇維埃化上所表現的那種躁急情形——這種躁急往往轉爲粗暴的笨拙——也是實現蘇維埃自治的一個嚴重的障礙，當這些同志在比中央俄羅斯落後一個整個歷史時代的區域內，在尙未完全消滅中世紀機構的區域內，竟然決心爲實行「純粹的共產主義」而作「英勇的努力」的時候，可以自信地說，這種騎兵式的襲擊，這種「共產主義」是不會有好處的。請這些同志把我們綱領的有名的一條回憶一下吧，該條是：

「俄國共產黨站在歷史階級的觀點上，而估計到某一民族是處在它的歷史發展的某一階段上：是處在從中世紀到資產階級民主的途上，還是處在從資產階級民主到蘇維埃或無產階級民主的途上等。」

又說：

「不論如何，壓迫民族的無產階級方面，對於被壓迫民族或不平等民族的勞苦大眾的民族情感的殘餘，需要加以特別的慎重和特別的注意。」（見「俄國共產黨綱領」）

換一句話說，例如阿才培疆的羣衆，認爲住所——家庭爐灶是不可侵犯的，是神聖的，要是直接減縮阿才培疆住所的道路可使阿才培疆的羣衆脫離我們，那末很明白的直接減縮住所的道路，需要代以間接的、迂迴的道路以達到這一目的。再舉一個例子：要是宗教偏見很深的達格斯坦羣衆，「根據夏里亞特經典」跟在共產主義者後面走，那末顯然的，直接反對該國宗教偏見的道路，應當代以間接的、更慎重的道路。餘此類推。

簡言之：使落後人民的羣衆「馬上共產主義化」的騎兵式的襲擊，必須放棄，而改取周密而深思的逐漸吸引這些羣衆加入蘇維埃發展的總軌道的政策。

大體說來，實現蘇維埃自治的實踐條件，大致如此，這一自治的實施，可保證俄羅斯中央與地方的精神的接近與牢固的革命的聯合。

蘇維埃俄羅斯，對於在統一的無產階級國家範圍內，基於相互信任的原則，基於自願的、親睦同意的原則，實行好多民族共居一事，正在進行世界上還從未有過的試驗。三年來的革命證明，這一試驗有着一切成功的機會。不過，要這一試驗，完全成功，只有我們在地方上的關於民族問題的實踐政策與業已宣佈的各式各樣及各種程度的蘇維埃自治之要求不相背馳，只有我們在地方上的每一實踐步驟，可以促進邊疆人民羣衆，在與他們生活與民族面容相適應的形式上，跟最高的無產階級的精神的與物質的文化配合起來才行。

鞏固俄羅斯中央與邊疆間革命聯合的保證，就在這裏，在這一聯合的面前，協約國的一切陰謀都烟消雲散了。

(一九二〇年十月十日真理報第二二六期)

論黨在民族問題方面的迫切任務

——一九二一年向俄國共產黨第十屆代表大會報告提綱，經黨的中央委員會所

批准——

一 資本主義制度與民族壓迫

(一) 現代的民族，本身是一定的時代——上升的資本主義時代的產物。封建主義消滅與資本主義發展的過程，同時就是人們結合而為民族的過程。英吉利人、法蘭西人、日耳曼人、意大利人的結合而為民族，正是戰勝封建割據性的資本主義勝利地發展的時代。

(二) 凡民族的形成，大體說來，在時間上，跟中央集權的國家的形成符合一致

的地方，民族自然披着國家的外衣，發展而為獨立的資產階級的民族的國家。在英國（無愛爾蘭），在法國，在意大利，都是如此。在東歐，適為相反，中央集權國家的形成，由於自衛（防禦突厥人、蒙古人等的侵犯）的需要所加速，比封建主義的消滅為早，所以比民族的形成為早。因此之故，民族在這兒未曾發展，也不能發展而為民族的國家，而成立了幾個混合的、多民族的、資產階級的國家，這種國家通常是由一個有力的支配民族和幾個弱小的被隸屬的民族組成的。奧國、匈牙利、俄羅斯，便是如此。

（三）民族國家，如法國和意大利之類，起初主要地是憑藉於本民族的力量，一般說來，不知有民族的壓迫。與此相反，多民族的國家，是基於一個民族，更確切些說，是基於該民族的支配階級對其他民族的支配而建立起來的，它本身就是民族壓迫和民族運動的基本產生地和基本舞台。支配民族利益與被支配民族利益的矛盾，是必須加以解決的矛盾，這些矛盾不解決，則多民族的國家，要想牢固存在，那是不可能的。

多民族的資產階級國家的悲劇，就在於它無力解決這些矛盾，其在保存私有財產和階級秩序等下「弄平」各民族和「保障」少數民族的每個企圖，通常結果都重新歸於失敗，都重新使民族的衝突尖銳化。

(四) 歐洲資本主義的進一步的發展，新的銷貨市場的需要，原料和燃料的尋求，以及帝國主義的發展，資本的出口和保證水陸交通幹線的必要，一面使舊的民族國家去佔新的領土，把它們變為多民族（殖民的）的國家，因而帶來了民族的壓迫和民族的衝突（如英、法、德、意）；別方面在舊的多民族國家的支配民族中間，不僅加強了保持舊有國界的意向，而且加強了擴充國界、犧牲鄰國而為自己征服新的（弱小的）民族的意向。因此之故，民族問題，更加擴大，歸根結底，與關於殖民地的總的問題匯合而為一，而民族的壓迫遂由國內的問題變為國與國間的問題，變為「強大」的帝國主義列強為征服弱小的不平等的民族而鬥爭（而進行戰爭）的問題了。

(五) 帝國主義大戰，連根帶底地暴露了不可調和的民族的矛盾和資產階級各民

族國家的內部的破產情形，它使戰勝的殖民國家（英、法、意）內部民族衝突極端尖銳化，使戰敗的舊的多民族國家（奧、匈、一九一七年的俄國）完全崩潰，最後——這是資產階級對民族問題的最「急進」的解決——並成立了許多新的民族國家（波蘭、捷克斯拉夫、南斯拉夫、芬蘭、喬治亞、亞美尼亞等）。不過新的獨立的民族國家的成立並未確立也不能確立各民族的和平共居，並未消除也不能消除民族的不平等，更不能消除民族的壓迫，因為新的民族國家，係基於私有財產和階級的不平等，牠們（一）非壓迫自己的少數民族（波蘭壓迫牠境內的白俄羅斯人、猶太人、立陶宛人、烏克蘭人；喬治亞壓迫牠境內的奧雪廷人、亞布哈斯人、亞美尼亞人；南斯拉夫壓迫牠境內的霍華特人、波斯尼克人，餘此類推）；（二）非侵犯鄰國擴張自己領土以致引起衝突與戰爭（如波蘭的侵犯立陶宛、烏克蘭、俄羅斯；南斯拉夫的侵犯保加利亞；喬治亞的侵犯亞美尼亞、土耳其等）；（三）非在財政上、經濟上，軍事上服從帝國主義「大國」，就不能存在。

(六) 這樣戰後便揭開了一幅無可慰藉的民族仇視、不平等、壓迫、衝突、戰爭、文明國民族方面彼此之間以及對不平等的人民的帝國主義獸行的圖畫：一方面是，幾個「大國」，壓迫和剝削附庸的和「獨立」(事實上完全是附庸的)的民族國家的全體羣衆，以及牠們相互之間爲爭取剝削民族國家的獨占權而鬥爭；別一方面是，附庸的與「獨立」的民族國家反對「大國」的苦重壓迫；民族國家相互之間又爲擴充自己的民族領土而鬥爭；每個民族國家都力謀抑制自己的被壓迫的少數民族；最後，殖民地反對「大國」的解放運動，日益加強；這些大國內部以及民族國家(照例這些民族國家都包含着好多少數民族)內部的民族衝突，日益尖銳。帝國主義大戰所遺留下的一幅「和平圖畫」，就是這樣的。

資產階級社會，在解決民族問題一事上，完全破產了。

二 蘇維埃制度與民族自由

(一)要是私有財產和資本是不可避免地分散人們，燃起民族的歧視，加強民族的壓迫；那末集體的財產和勞動則是不可免地使人們接近、消滅民族的歧視，摧毀民族的壓迫。資本主義的存在，非有民族的壓迫是不可能的；同樣，社會主義的存在，非解放被壓迫民族，非實行民族的自由是不可能的。當充滿着民族偏見的農民（以及一般小資產階級）跟着資產階級走的時候，排外愛國主義和民族鬥爭是不可避免的，是無可如何的；反之，當農民跟着無產階級走的時候，換一句話說，要是無產階級專政有保證的話，則民族的和平和民族的自由可算有了保證了。所以蘇維埃的勝利與無產階級專政的確立，乃是消滅民族壓迫、確立民族平等、保證少數民族權利的基本條件。

(二)蘇維埃革命的經驗，完全證實了這一論點。俄羅斯蘇維埃制度的確立和民族的國家分離權的宣佈，掉換了俄羅斯各民族勞動羣衆間的關係，摧毀了舊有的民族仇視，剝奪了民族壓迫的基礎，不僅取得了俄羅斯，而且取得了歐亞二洲異族兄弟對俄羅斯工人的信任，使這一信任達到熱心甘願爲共同事業而奮鬥的地步。阿才培歷、

亞美尼亞蘇維埃共和國的成立，也得到同樣結果，消滅了民族的衝突，解決了土耳其勞動羣衆與亞美尼亞勞動羣衆，亞美尼亞勞動羣衆與阿才培疆勞動羣衆間的『永世』仇恨。關於蘇維埃在匈牙利、巴威利亞、芬蘭、拉脫維亞的臨時勝利，也可以說是如此。另一方面，可以確信地說，要是俄羅斯工人不消滅自己家中的民族仇視和民族壓迫，要是沒有西方和東方各民族勞動大衆對他們的信任與熱忱，那他們也許不能夠戰勝柯爾恰克和鄧尼金，而阿才培疆和亞美尼亞兩共和國，也許不能立足了。蘇維埃共和國的和鞏固和民族壓迫的消滅，乃是勞動者解除帝國主義奴役的同一過程的兩方面。

(三)不過蘇維埃共和國的存在，即使是規模最不大的吧，仍是對帝國主義的一個致命威脅。這一威脅不僅在於蘇維埃共和國，自與帝國主義決裂以後，曾從殖民地 and 半殖民地變爲真正獨立的國家，因而剝奪了帝國主義者的多餘的一塊領土和多餘的一筆收入，尤其在於蘇維埃共和國存在的本身，這些共和國壓服資產階級和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的每一步驟，都是反對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的巨大鼓動，都是爭取附庸國

家解除帝國主義奴役的巨大鼓動，都是瓦解和破壞各種資本主義的不可克服的因素。所以，帝國主義「大國」反對蘇維埃共和國的鬥爭，「大國」消滅這種共和國的志向是不可避免的。「大」列強反對蘇維埃俄羅斯的歷史——喉使一個一個邊疆資產階級政府，強使一羣一羣反革命的軍人起來反對牠，勞心焦慮地設法封鎖牠，及一般力謀在經濟上孤立牠，——所有這一切都很明白地證明在現在國際關係之下，在資本主義包圍的環境下，不論那一個蘇維埃共和國，如個別而論，牠都不能認為自己已有保證，可以對付世界帝國主義方面的經濟消耗和軍事毀滅了。

(四)所以，各蘇維埃共和國，孤立生存，是不牢固的，因為資本主義國家方面威脅着牠們的生存。一則各蘇維埃共和國國防的共同利益；二則被戰事所破壞的生產力的恢復；三則產糧食的蘇維埃共和國方面對非產糧食的蘇維埃共和國的必要的食物的幫助，都在在有力地指使各個蘇維埃共和國實行國家的聯盟，這是從帝國主義奴役下和民族壓迫下拯救出來的唯一道路。從「自己」的和「異族」的資產階級之下解放出

來的各民族蘇維埃共和國，要能保持自己的生存和戰勝帝國主義的聯合力量，只有聯合而爲一個密切的國家聯盟才行，否則它們是不會獲勝的。

(五)基於軍事和經濟事業的共同性而成立的蘇維埃共和國聯邦，乃是國家聯盟的一個總的方式，這一總的方式：(一)可以保證各個共和國以及整個聯邦的完整與經濟的發展；(二)可以包括發展階段各不相同的民族和人民的各色各樣的生活、文化及經濟狀態，並可以根據此點應用某一聯邦方式；(三)可以調整各民族和各人民的和平共居和親密合作，使牠們把自己的命運跟聯邦的命運設法聯繫起來。俄羅斯應用各種聯邦，從以蘇維埃自治(吉爾吉斯、巴什吉爾、韃靼、山人、達格斯坦)爲基礎的聯邦，進而到以與各獨立蘇維埃共和國(烏克蘭、阿才培疆)訂立條約關係爲基礎的聯邦，並允許在牠們之間設立一中間階段，這一經驗，完全證實了聯邦的適宜與靈活，證實了聯邦是各蘇維埃共和國的國家聯盟的總方式。

(六)不過聯邦要能牢固，而聯邦的結果要能切實，只有它依靠於加入它的各國相

互信任和自願同意時才行。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是世界上唯一的國家，這裏好多民族和人民和平共居和親密合作的試驗已經完全成功，其原因就在於在這裏不論支配者、被支配者、宗主國、殖民地、帝國主義、民族壓迫等都沒有了，——在這裏聯邦是以各民族勞苦大眾相互信任和自願聯盟為基礎的。聯邦的這種自願性質，務須設法保存起來，因為只有這一聯邦才能成為走向那各國勞動者在統一的世界經濟內達到最高統一的過渡方式，這種最高的統一天天感覺而必要了。

三 俄羅斯共產黨的迫切任務

(一) 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及與它聯盟的各蘇維埃共和國，約有一萬萬四千萬居民。其中非大俄羅斯人，約有六千五百萬（主要者為烏克蘭人、白俄羅斯人、言爾吉斯人、烏茲別克人、土克門人、達輯克人、阿才培疆人、伏爾加韃靼人、克里姆薩爾人、布哈里亞人、赫文人、巴什吉爾人、亞美尼亞人、赤城人、卡

巴丁諾人、奧雪廷人、切爾基斯人、茵古什人、卡拉查也夫人、巴爾卡人（註一）、卡勒米克人、卡列勒人、阿瓦里亞人、達爾根人、卡西庫穆人、庫林人、庫姆克人（註二）、瑪里人、秋瓦什人、伏恰克人、伏爾加日耳曼人、布雅特人、雅庫特人等。沙皇主義的政策，地主和資產階級對這些人民的政策，就在於殺死牠們中間一切國家的萌芽，蹂躪牠們的文化，抑制牠們的語言，使牠們永處於愚頑無知之中，並盡可能地使牠們俄羅斯化。這一政策的結果，便是這些民族的不發展與政治的落後。

（註一）後邊七個民族統稱為『山人』。

（註二）後邊五個民族統稱為『達格斯坦人』。

在地主和資產階級被推翻和這些區域內勞苦大眾宣佈成立蘇維埃政權的現在，黨的任務就在於幫助非俄羅斯民族的勞苦大眾趕上走在前邊的中央俄羅斯，幫助牠們：

- （一）發展並鞏固自己的蘇維埃國家，其方式須與這些人民的民族面容相適應；
- （二）設立用本族語言的法庭，用熟悉當地居民生活和心理的當地人組成的行政機關、經濟

機關、權力機關；（三）發展自己的用本族語言的報紙、學校、戲院、俱樂部及一般文化教育機關。

（二）六千五百萬的非俄羅斯居民中間，除過已經多少經過工業資本主義時期的烏克蘭、白俄羅斯及一小部分的阿才培疆、亞美尼亞以外，剩下的三千萬左右的人，主要爲土耳其人（土耳其斯坦、阿才培疆的大部分、達格斯坦、山人、韃靼人、巴什吉爾、克爾吉斯等），牠們還未來得及踏入資本主義的發展，還沒有或者差不多還沒有自己的工業無產階級，大抵還保存着牧畜經濟和家長式民族生活（如吉爾吉斯、巴什吉爾、北高加索）或者還未脫離半家長半封建生活的原始方式（如阿才培疆、克里姆等），可是牠們都已經捲入在蘇維埃發展的總的軌道以內了。

黨對於這些民族的勞苦大眾的任務（除過第一節內所指出的任務以外），就在於幫助他們消滅家長封建關係的殘餘，以勞動農民的蘇維埃爲基礎並用在這些民族中間創立堅強的共產主義組織的方法，與蘇維埃經濟的建設配合起來，這種共產主義組織能

夠會利用俄羅斯工農從事蘇維埃經濟建設的經驗，同時在自己的建設工作中會考慮到每一民族的具體的經濟環境、階級構成、文化與生活的一切特質，不要把只是適用於別的、更高度的經濟發展階段的中央俄羅斯的經濟措施很機械的搬移過去。

(三)要是從三千萬主要爲土耳其人的口中，除去阿才培疆、土耳其斯坦大部分、韃靼(伏爾加的、克里姆的)、布哈拉、赫瓦、達格斯坦、一部分山人(卡巴丁諾，切爾基斯巴爾卡拉)，及其他若干業已定居下來而佔有一定領土的人民外，那末剩下的約有一千萬樣子的人口，則爲吉爾吉斯人、巴什吉爾人、赤城人、奧雪廷人、酋古什人，他們的土地直到最近曾作了俄羅斯僑民方面的殖民地化的對象，這種俄羅斯僑民攫去了他們的良好耕地，有系統地把他們排擠到貧瘠的荒原裏面去。沙皇主義的政策，地主和資產階級的政策，就在於在這些區域內盡量移植俄國農民和哥薩克當中的富農份子，把這種富農份子變爲大國意向的可靠支柱。這一政策的結果，便是被排擠到荒野去的土人逐漸滅亡(如吉爾吉斯人，巴什吉爾人)。

黨對於這些民族的勞苦大眾的任務（除過第一第二兩節所說的任務以外），就在於把牠的力量跟當地俄國居民當中勞苦大眾的力量聯合起來，力謀從一般富農——尤其強盜般的大俄羅斯富農之下解放出來，用一切力量和手段幫助他們丟掉肩上所負的富農殖民者，以此給他們保證以良好的、爲人類生存所必要的土地。

（四）除過上邊所說的有着一定的階級構成並佔據着一定的領土的民族和人民外，在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境內還有着各個流動的民族集團之少數民族，這種少數民族點綴在稠密的佔據多數的異民族中間，大抵沒有一定的階級構成，也沒有一定的領土（如拉脫維亞人、愛沙尼亞人、波蘭人、猶太人等）。沙皇主義的政策，就在於用一切手段，直到屠殺（如屠殺猶太人），來使這種少數民族歸於滅亡。

在今日民族特權業已消滅，各民族實行一律平等，而少數民族自由發展的權利有蘇維埃制度的性質本身爲之保證，這時黨對於這些民族集團勞苦大眾的任務，就在於幫助他們完全享用這種有保證的自由發展的權利。

(五)共產主義組織在邊疆的發展，是在幾個特殊的條件下面進行的，這些條件阻止了黨在這些區域內的正常的生長。一方面，在邊疆工作的大俄羅斯共產主義者，他們是在『強國』民族的生存條件之下長大的，不知有民族的壓迫，因之他們往往縮小了民族特點在黨的工作中的意義，或是完全沒有顧計到這些特點，在自己的工作中未考慮到某一民族階級構成、文化、生活、過去歷史的特點，使黨對於民族問題的政策庸俗化，因而加以曲解。這種情形，其結果便弄成放棄共產主義，傾向於大國精神、英民主義，大俄羅斯排外愛國主義的方面。別方面，當地共產主義者，他們曾經過民族壓迫的困苦時期，還沒有完全解脫民族壓迫的夢幻，往往誇大了民族特點在黨的工作中的意義，放棄了勞苦者的階級利益，或是簡簡單單地把該民族勞動者的利益跟該民族的『全民』利益，混為一談，不會把前者從後者之中分別出來，而根據勞動的利益去建立黨的工作。這種情形又弄成放棄共產主義而傾向於資產階級民主的民族主義的方面，這種民族主義有時採取了大回教主義，大土耳其主義（在東方）的方式。

大會堅決地指斥這兩種傾向，認為它們對共產主義事業是有害的和危險的，並認為須要特別指出第一種傾向，即趨向於大國精神、殖民主義的傾向，有着特別的危險和特別的危害。大會認為，如不克服黨的隊伍中的殖民主義和民族主義的殘餘，便不可能在邊疆成立牢固的及與羣衆聯繫的真正共產主義的組織，此種組織基於國際主義去把土著居民和俄羅斯居民的普羅份子團結在自己的隊伍中。因此大會認為消滅共產主義中的民族主義的——尤其殖民者的動搖，乃是黨在邊疆的重大任務之一。

(六)由於軍事前線上的勝利，尤其自消滅烏蘭吉爾叛變以後，沒有或者差不多沒有工業無產階級的一些落後邊疆內，市儈的民族主義的份子，爲了升官發財而加入於黨的傾向，大爲加強。這些份子考慮到了黨的地位是一種真正統治的力量，通常重新染一點共產主義的色彩，往往整羣整羣的加入黨，給黨帶來了掩蔽不好的排黨愛國主義及腐化的精神，而且邊疆一般很薄弱的黨的組織並不是常常能够抵抗吸收新黨員以「擴充」黨的誘惑。

大會號召要與一切偽共產主義的混入無產階級政黨的份子作堅決的鬥爭，並使黨要特別提防用吸收知識的市儈民族主義的份子來『擴充』的辦法。大會認為黨在邊疆的補充，主要應當用吸收這些地方的無產者、貧人及勞苦農民的方法來進行，同時，須用改善邊疆的黨的組織的質量構成的方法，來鞏固牠們。

(一九二二年二月十日「真理報」第二十九期)

黨在民族問題方面的迫切任務

——一九二一年三月十日在俄國共產黨(多數派)第十屆代表大會上的報告——

在直接討論黨對於民族問題的具體的迫切任務以前，首先須要確定幾個前提。沒有這些前提，那民族問題是不可能解決的。這些前提，與民族的出現、民族壓迫的產生、民族壓迫在歷史發展行程中的方式、以及民族問題在各種發展時期的解決方式諸問題，都有關係。

這種時期有三個。

第一時期乃是西方封建主義消滅和資本主義勝利的時期。人們的結合而為民族，即屬於這一時期。我的意思，係指英國（愛爾蘭不在內）、法國、意大利而言。在西方——在英國、在法國、在意大利及在德國的一部分，封建主義消滅與人們結合而為

民族的時幕，在時間上大體是與中央集權的國家出現的時期符合一致的，因此之故，在這些地方，民族在其發展的時候會披着國家的形式。因為這些國家內部沒有別的稍微大一點的民族集團，所以這些地方也沒有民族的壓迫。在歐洲的東部，適為相反，民族形成與封建割據性消滅的過程，在時間上是跟中央集權的國家的形成過程不相符合的。例如匈牙利、奧地利、俄羅斯就是。在這些國家裏面，資本主義發展還沒有或剛在萌芽的時候，防禦塞厥、蒙古人及其他東方民族侵犯的利益，便要求刻不容緩地要成立足以抵禦外侮的中央集權的國家。在歐洲東部，中央集權國家出現的過程，既比人們的結合而為民族的過程為快，所以在這裏便成立了由幾個尚未形成民族但已經聯合在一個共同國家內的人民構成的混合國家。

這樣，第一時期的特點，便是民族在資本主義曙期的出現，並且在歐洲西部產生了未有民族壓迫的純民族的國家，而在東部產生了多民族的國家，在這種多民族的國家內，一個民族比較發展，而居於支配地位，其餘民族則不大發展，在政治上以及在

經濟上都受支配民族的支配。東歐的這些多民族的國家便作了民族壓迫的祖國，這種民族壓迫產生了民族糾紛、民族運動、民族問題、及解決這一問題的各種方法。

民族壓迫和對付它的方法發展中的第二個時期，跟帝國主義出現時期適相符合，這時，資本主義爲了尋求銷售的市場、原料、燃料及低廉勞動力，這時資本主義爲了爭取資本的出口與主要鐵道和航線的保證，乃越出了民族國家的範圍，力謀侵略遼遠的及附近的鄰國，以擴充自己的領土。在第二個時期，西方舊有的民族國家——英、意、法，已終止其爲民族國家，換一句話說，牠們由於取得了新的領土的原故，都變成了多民族的、殖民的國家，因之牠們也成了那從前尚在歐洲東部所有的民族與殖民地壓迫的舞台。在東歐，這一時期的特點，則爲被壓迫民族（捷克人、波蘭人、烏克蘭人）的醒覺與興起，這些被壓迫民族於帝國主義大戰的結果，曾瓦解了舊的資產階級的多民族國家，而成立了許多新的民族國家，而受所謂大國的奴役。

第三個時期，便是蘇維埃時期，資本主義消滅和民族壓迫肅清的時期，這時支配

民族與被支配民族的問題，殖民地與宗主國的問題，都放在歷史檔案裏面去，這時我們看到，在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境內，各民族勃興，他們有着同等的權利，有着同等的發展的機會，不過由於自己的經濟、政治、文化落後的原故，牠們還保存着若干歷史上遺留下來的不平等。這一民族不平等的本質，就在於我們由於歷史發展的原故，得了過去的一種遺產，根據這一遺產，有一個民族即大俄羅斯，在政治上和在工業關係上，比其他民族要發展些。因此，產生了一種事實上的不平等，這不平等在一年之內是不能消滅的，不過它是應該用經濟上、政治上、文化上幫助落後民族的方法加以消滅的。

這就是我們在歷史上所經過的民族問題發展的三個時期。

第一第二兩個時期有個共同的特點。這一特點就在於在這兩個時期內，民族都遭受着壓迫和奴役，因此之故，民族鬥爭仍舊存在，而民族問題仍舊未解決。不過牠們之間也有差別。這一差別就在於在第一個時期內，民族問題並未越出各個多民族國家

的範圍，僅包括了幾個主要是歐洲的民族；而在第二時期內，民族問題會由國內問題變為好多國家的問題，變為帝國主義國家相互之間爲了使不平等民族服從自己，使歐洲境外的新的人民和部落來服從自己勢力而進行戰爭的問題。這樣，從前只在文明國內有意義的民族問題，在這一時期內便失掉它的孤立的性質，而與總的關於殖民地的問題匯合起來了。

民族問題的發展而爲一般殖民的問題，並不是歷史的偶然。這一發展，第一，可用這種情形來說明，即在帝國主義大戰期間，參戰各國的帝國主義集團本身，不得不有所求於殖民地，他們從殖民地汲取人力，組織軍隊。不庸置疑的，這一過程，帝國主義者必然向殖民地落後人民有所乞求的過程，不能不喚醒這些部落和人民去求解放，去從事鬥爭。其次，第二個因素，乃是各帝國主義集團瓜分土耳其，滅亡其國家的企圖，這一因素會使民族問題擴大發展而爲一般殖民地的問題，蔓延全地球。初則僅爲星星之火，帶則竟成爲解放運動的火燄。土耳其就國家一點說，在同教人民中間，

乃是發展的關鍵，這個土耳其自然不能忍受這種前途，於是牠高舉了鬥爭的旗幟，在自己的周圍團結了東方的各民族來反對帝國主義。第三個因素，則為蘇維埃俄羅斯的出現，蘇維埃俄羅斯反對帝國主義的鬥爭已有多成就，自然牠激勵了東方的各被壓迫民族，喚醒了牠們，使牠們起而鬥爭，因而造成了一種機會，得以成立被壓迫民族從愛爾蘭起到印度止的共同戰線。

所有這些因素，遂在民族壓迫發展的第二階段上，使資產階級的社會不僅沒有解決民族問題，不僅沒有民族與民族間的和平，反之，則燃起了民族鬥爭的火星，而成為被壓迫人民，殖民地與半殖民地反對世界帝國主義的鬥爭的火線。

很明顯的，能够解決民族問題的唯一制度，換一句話說，能够建立保證各人民和部落和平共居及親睦合作的唯一制度，只有蘇維埃政權的制度，普羅專政的制權。

在資本統治、生產手段私有制及階級存在之下，民族的平等是不能够有保證的，資本的權力存在一天，佔有生產手段的鬥爭存在一天，則民族的任何平等是不能够有

的，同樣，各民族勞動羣衆間的合作也是不能够有的。歷史告訴說，消滅民族不平等的唯一方法，建立被壓迫與非被壓迫人民勞苦羣衆親密合作制度的唯一方法，便是消滅資本主義，建立蘇維埃制度。

其次，歷史告訴說，各個人民即使能够把自己從本國民族資產階級以及從「異族」資產階級之下解放出來，換一句話說，牠們即使建立了自己的蘇維埃制度，但是在帝國主義存在之下，如沒有相鄰的蘇維埃共和國方面的經濟與軍事上的支持，則牠們是不能够單獨存在，而且不能够順利地保持自己的生存的。匈牙利的例子，很明白地表明，各蘇維埃共和國如沒有國家的聯盟，牠們如不團結起來而成爲一個統一的軍事經濟的力量，那不論在軍事的戰線上或在經濟的戰線上都不可能抵禦世界帝國主義的聯合力量。

蘇維埃共和國的聯邦，乃是國家聯盟的一個最好的方式，其活的實現則爲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

同志們，我想說的前提，便是如此。在這裏我一開頭就說這種前提，爲的以後便於闡述本黨在解決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境內民族問題一事上應採取的若干步驟的必要。

雖然，在蘇維埃剝奪之下，在俄羅斯以及在與俄羅斯相聯系的各共和國內，已經沒有支配民族、無權民族、宗主國、殖民地、被剝削者、剝削者等的分別，但是民族問題仍在俄羅斯存在着。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民族問題的本質，就在於消滅那我們承繼自過去的各民族的落後性（經濟的、政治的、文化的），以便使各落後人民在國家關係上，在文化關係上，在經濟關係上，得以趕上中央俄羅斯。在舊的剝奪之下，沙皇的政權不努力也不能努力去發展烏克蘭、阿才培疆、土耳其斯坦及其他邊疆的國家精神，它是反對邊疆國家精神的發展，並反對牠們的文化的发展，而力謀用暴力使土著居民同化。其次，舊的國家，地主與資本家，遺留下了吉爾吉斯人、赤城人、奧雪廷人，這些被鞭笞的人民，這些人民的土地曾作了俄羅斯哥薩克和富農份

子方面殖民化的對象。這些人民都注定遭受極大的痛苦而歸於滅亡。再則，處於支配地位的大俄羅斯民族的地位，甚至也留下了自己的對於俄羅斯共產主義者的影響的痕跡，這些俄羅斯共產主義者，他們不會或者不願去接近土著的勞苦大眾，了解他們的需要，幫助他們上升而脫離落後性和不文明的狀態。我所講的，係指爲數很少的一羣俄羅斯共產主義者而言，這些共產主義者在自己的工作中，輕視邊疆生活與文化的特質，有時且有趨於俄羅斯人的大國的排外愛國主義方面的傾向。其次，受着民族壓迫的非俄羅斯民族的地位，也不能不留下對於當地共產主義者的影響，這些共產主義者有時不會把本民族勞動大眾的階級的利益跟所謂「全民」的利益分別開來。我所講的，係就趨於當地居民的民族主義方面的傾向而言，這種民族主義有時發見於土著共產主義者的隊伍中，而在東方表現爲大同教主義，大土耳其主義。最後，必須拯救吉爾吉斯、巴什吉爾及其他若干山中的部落，免於滅亡，犧牲富有殖民者，給他們保證以必要的土地。

關於黨的這些迫切的任務，業已說過了，現在再進而來說一說一般的任務，使我們在邊疆的共產主義政策適應於那主要在東方所有的經濟狀態的特殊條件的任務。

問題就在於，好多土耳其人——他們為數約有三千萬左右——還未經過，還未來得及經過工業資本主義的時期，所以，他們沒有或者差不多沒有工業無產階級，因此，他們不得不越過工業資本主義，而由原始的經濟方式轉到蘇維埃經濟的階段。爲了進行這一艱苦的但並非不可能的工作，需要估計到這些人民的一切經濟狀況的、甚至歷史過去的、及生活與文化的特點。把在俄羅斯中央有效力和意義的辦法，搬移到這些人民的區域裏面來，那是不可能的，而且是危險的。顯然的，在實施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的經濟政策的時候，務須對於邊疆經濟狀態，階級構成，歷史過去的一切特點，加以注意。那荒謬之事，應當消滅，更不用說了，比方在吉斯，回教居民，從不養豬，而食物人民委員會在徵集食物的辦法上，竟要求該地交豬，此種情形，是應當消滅的。從這例子可以看出，對於生活特性（這種特點，凡初

到該地的人，一眼就可以看出的）的如何不注意，就可想而知了。

剛剛有人交來一張條子，請求解答那切林（三八）同志的文章。同志們，那切林的文章，我曾經細心地讀過，我認爲他的文章中除玩弄筆墨而外，別無所有了。該文中，有四個錯誤或誤會。第一，那切林同志存心否認帝國主義國家間的矛盾，把帝國主義者的國際聯合估計的太高，而把各帝國主義集團間和各國家間的內部矛盾忘記，估計的太低，這些矛盾仍存在着，並在產生着戰爭（法、美、英、日等）。他過於重視帝國主義上層聯合的因素，而過於輕視這種托辣斯內部的矛盾。而這些矛盾則是有的，且是外交人民委員會活動的基礎。其次，那切林又犯了第二個錯誤。他輕視了那支配的大列強與不久以前成立的民族國家（捷克斯拉夫、波蘭、芬蘭等）之間所有的矛盾，這些民族國家都受着大列強的財政與軍事的支配。那切林同志完全忘記了，這些民族國家雖隸屬於大列強，或正確些說，由於這一隸屬的原故，大列強與這些民族國家之間，有着一種矛盾，這種矛盾，例如在對波蘭、愛沙尼亞等的談判中便表現出來了。

外交人民委員部存在的意義，就在考慮所有這些矛盾，以這些矛盾為根據，在這些矛盾的範圍以內操縱運用。最可注意的，就是那切林同志過於輕視了這一因素。那切林同志的第三個錯誤，便是他關於民族自決說的太多，這種民族自決事實上已經變為一個空洞的為帝國主義者所樂於使用的口號了。那切林同志完全忘記我們放棄這一口號已經兩年了。我們再不會把這一口號放在綱領中了。我們在綱領中所說的不是關於民族的自決——這個口號太糢糊了，而是關於一個更精練更明確的口號——關於各人民國家分離的權利。這是兩件不同的事件。令人驚異的，就是那切林同志在其論文中並未考慮到這一因素，因之，他反對那已經糢糊不清的口號的意見，乃是無的放矢，因為不論我在自己的提綱中或是黨綱都沒有隻字提及「自決」。這裏所說的，只是關於各人民國家分離的權利。在我們看來，只有這一口號，在殖民地解放運動日益高漲的現今，才是個革命的口號。各蘇維埃國家既都依據自願的原則聯合而為一聯邦，則分離的權利，根據加入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的各人民的意志，便未被使用。

我們所說的既是指那些受英、法、美、日羈絆的殖民地而言，我們所談的，既是指阿拉伯、米索不達米亞、土耳其、印度斯坦這些隸屬國家，換一句話說，既是指那些協約國殖民地的國家而言，那末各人民有分離權的口號便是革命的口號，放棄它那正是爲協約國所高興的。第四個誤會，便是那切林同志論文中實踐指示的缺乏。寫一篇文章，當然是很便當的，但是標題既爲『反對斯大林同志的提綱』，那就應當提出一種鄭重的實踐的對案方對。可是我在他的論文中，並沒有找到值得重視的一件實踐的提議。

同志們，我的話已經完了。我們可作出下列的結論。資產階級的社會，不僅不能解決民族的問題，反之，而且它在自己謀『解決』的企圖中，把民族問題吹大而成爲殖民地問題，並違犯自己的意志而創立了新的陣綫，這一陣綫從愛爾蘭延至印度斯坦。能够提出並且能够加以解決民族問題的唯一國家，那便是基於生產手段和生產工具共有的國家——蘇維埃國家。在蘇維埃聯邦國家之下，再不會有被壓迫民族和支配

民族之分了。民族的壓迫業已消滅，但是由於比較文明與不大文明的各民族之間還有從舊的資產階級制度遺留下來的事實上的不平等（文化的、經濟的、政治的）的原故，民族問題所採取的方式，要求製定一種辦法，這種辦法，可以促進落後民族勞苦大眾的經濟、政治及文化的繁榮，使他們得以趕上已經走在前面的中央的無產階級的俄羅斯。因此，我提出了一種實踐的提議，這種實踐的提議便是我所提出的民族問題提綱中第三部分的內容。（鼓掌）

結語

同志們，在民族問題的討論上，本屆大會所最特別的，就是已由關於民族問題的宣言，經俄羅斯行政的重新劃分，而進至問題的實踐提法。在十月革命之初，我們只限於宣言各民族有分離之權。一九一八年和一九二〇年，我們爲使落後民族勞苦大眾與俄國無產階級接近起見，曾依據民族的徵候，將俄羅斯在行政上重新劃分。今日在

這次大會上，我們基於純粹實踐的理由提出這個問題：黨對於自治區域和與俄羅斯有聯繫的各獨立共和國內勞苦大眾和小資產階級份子應當採取怎樣的政策。因此，查頓斯基同志的聲明，謂提給大家的提綱帶着抽象的性質，實在使我驚異；我手中有着他自己的提綱，這個提綱，不知爲什麼原故，他沒有提交大會予以注意，在這個提綱內，我沒有找到一條實踐性的提議，——除提議以「東歐」二字代替「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一名稱，以「俄羅斯人」或「大俄羅斯人」一詞代替「俄羅斯」一詞外，的確一無所有。在這些提綱中我沒有找到其他實踐的提議。

現在我來講下邊一個問題吧。首先要聲明的，就是我期望於發言的各位代表的很多。在俄羅斯，共有二十二個邊疆，這些邊疆中有的工業的發展，極其厲害，而在工業關係上，與俄羅斯很少區別；有的還沒有經過資本主義的階段，根本與中央俄羅斯不同；第三種則是完全被壓抑着的。把所有這些各色各樣的邊疆，很具體地包括在提綱裏邊，那是不可能的。絕不可要求，對於整個黨有意義的提綱，僅有着土耳其斯坦

的要求，僅有着阿才培疆或僅有着烏克蘭的性質。必須選取各邊疆所共同的特點，包括在提綱內，而丟開局部的；宇宙間其他起草提綱的方法是沒有的。必須把非大俄羅斯的民族分爲幾類，如像提綱所作者。非俄羅斯民族，共約有六千五百萬。這些非俄羅斯民族所特有的一個共同特徵，就在於從自己國家的發展一意義說來，牠們都落後於中央俄羅斯。我們的任務，就在於用一切力量，幫助這些民族，幫助他們的無產份子，勞動份子，用本族語言來發展自己的蘇維埃的國家生活。這在提綱中，在提綱的實踐部分中會有一般的敘述。其次，要是想使邊疆各特徵更加具體化，那就須要從大約六千五百萬非俄羅斯民族的總額中，再分出三千萬尙未經過資本主義的土耳其人。米柯揚同志，謂阿才培疆在若干關係上高出於俄羅斯各省以上，那是不對的。顯然的，他把巴庫和阿才培疆混爲一談了。巴庫不是從阿才培疆的腹內長大的，而是用諾貝爾、羅特希德、威瑞等的精力，從上建造起來的。至於阿才培疆本身，它是個最落後的家長封建關係之國。所以，我把整個的阿才培疆歸在那尙未經過資本主義的一類

邊區以內，這些邊疆，須用特殊的方法，才能把牠們吸引在蘇維埃經濟的軌道以內。關於這一點，在提綱裏面也說過了。其次，還有第三類，此類人口不過八百或一千萬，主要為牧畜部落，其氏族生活還存在着，他們尙未進到農業經濟。這主要的是吉爾吉斯人、土耳其斯坦的北部、巴什吉爾、赤城人、奧雪廷人、及茵古什人。對於這一類的民族，首先須要給牠們保證以必要的土地。這裏未讓吉爾吉斯人發言，就停止討論了。也許他們關於山中的巴什吉爾、吉爾吉斯及因沒有土地而衰亡的山人所受的痛苦，還要說的多些。不過薩法羅夫同志關於這一點所說的，只是關於八百或一千萬的一類人口而已。所以，把薩法羅夫同志的實踐提議，擴展於一切邊疆，那是不可能的，因為對於其餘一部分非俄羅斯民族——為數約有五千五百萬——這一修正沒有絲毫的意義。因此，我並不反對薩法羅夫所提議的關於若干類民族的各條的具體化、補充、及改善，但是我認為萬不可把這些修正普遍化。其次，關於薩法羅夫同志的一條修正，我應當聲明一下。他的修正中有一條曾失口說了「民族文化自決」這一句話。

「……………在十月革命以前——該處說——俄羅斯東部邊疆的各殖民地與半殖民地人民，由於帝國主義政策的原故，曾被剝奪了任何可能，去用自己的民族文化自決、本族語言的教育的方法，與資本主義文明的文化勝利配合起來。」

我要聲明的，就是我不能接受這一修正，因為它是猶太工人同盟派所提出的。民族文化自決，這是猶太工人同盟的一個公式。我們早已同民族自決這些朦朧的口號決別了，——恢復牠們是沒有必要了。而且這句話只是幾個字的最不自然的湊合而已。

說到這裏，有人寫來一個條子問：我們共產主義者似乎是用人工方法來栽培白俄羅斯民族。這是不對的，因為白俄羅斯民族是有的，它有自己的與俄羅斯人不同的語言，因此之故，要抬高白俄羅斯人民的文化，只有用它們的本族的語言才可。五年前，關於烏克蘭，關於烏克蘭民族，就發表過這樣的演說。但是不久以前，有人還說，烏克蘭共和國和烏克蘭民族乃是德國人的虛構。可是很明白的，烏克蘭民族是在存在着，發展它的文化，乃是共產主義者的義務。反對歷史是不可以的。很明白的，

假使烏克蘭各城市直到現在還是俄羅斯人的成份佔着優勢的話，那末隨着時代的進展這些城市勢必要烏克蘭化的。四十年前，里加（拉脫維亞）^地本身是個日耳曼人的城市，但是城市的發展既是靠犧牲農村而來的，而農村又是民族的儲藏所，所以現在里加便成了一個純粹拉脫維亞人的城市了。五十年以前，匈牙利人的一切城市，都有着日耳曼人的性質，但是現在牠們都馬加爾人化了，白俄羅斯將有同樣的過程，雖然它的各城市現在還是非白俄羅斯人佔着優勢。

我的話語完了，我向大會提議選舉一個包括各區代表的委員會，來討論大綱中一切邊疆所感興趣的實踐提議，使其更加具體化（鼓掌）。

（「俄國共產黨第十屆大會記錄」，一九二一年出版）

論民族問題的提法

——一九二一年——

共產主義者對於民族問題的提法，跟第二國際及第二半國際（三九）的要人，一切「社會黨」、「社會民主黨」、孟塞維克派、社會革命黨等所說的民族問題的提法，有着質的不同。

這兒要特別指出四個基本的因素，這四個因素便是民族問題的新的提法中所特有的徵候，也就是民族問題新舊觀點的界線。

第一個因素，便是局部的民族問題與整個殖民地解放的總問題之匯合。在第二國際時代，民族問題的範圍，極爲狹隘，通常只限於「文明民族」的一些問題。愛爾蘭人、捷克人、波蘭人、芬蘭人、塞爾維亞人、亞美尼亞人、猶太人以及歐洲的其他若干民

族——這便是不完全平等的民族的範圍，這些民族的命運則為第二國際所關心的。千千萬萬亞非二洲的民族，遭受着最粗暴最殘酷的民族壓迫，通常他們都不在「社會主義者」的眼裏。白人與黑人，「不開化」的黑人與「文明」的愛爾蘭人，「落後」的印度人與「有教育」的波蘭人，是不能相提並論的。一般默認，要是需要爭取歐洲不平等民族的解放的話，那末關於為「保持」「文明」所必需的殖民地的解放，「公正的社會主義者」是不屑談的。這些所謂社會主義者，從未設想到亞非二洲殖民地人民不解放帝國主義的壓迫，則歐洲民族壓迫的消滅是不可能的，後者與前者是有機地聯繫在一起的。共產主義者頭一個揭開了民族問題與殖民地問題的聯繫，在理論上樹立了它的基礎，把它作為自己的革命實踐的基礎。這樣一來，白人與黑人之間，帝國主義的開化奴隸與「不開化」奴隸之間的隔離，便消滅了。這種情形大大地促進了落後的殖民地的鬥爭與先進的無產階級的鬥爭，協同反對共同敵人，反對帝國主義的事業。

第二個因素，便是丟掉了模糊不清的民族自決權的口號，而代以明白的革命的民族與殖民地有國家分離權、有成立獨立國家權的口號。第二國際的要人們，在說到民族自決權的時候，通常總不提及國家分離之權，——頂多他們把民族自決權解釋為一般自治權。民族問題『專家』希普林格和巴威爾，甚至弄到這種地步，就是他們把自決權變為歐洲被壓迫民族文化自治之權，即將全部政治（和經濟的）權力留在支配民族手中而僅有自己文化機關之權。換一句話說，他們把不平等民族的自決權變為支配民族擁有政治權力的特權，而將國家分離的問題，撇開不談。第二國際的思想首領！考茨基，在大體上，也是附和希普林格和巴威爾對於民族自決的這個在本質上是帝國主義的解釋的。帝國主義者抓住自決一口號的這個對他們便利的特點，便宣佈它為自己的口號，這是不足為奇的。大家都知道，以奴役各民族為目的的帝國主義大戰，便是在自決旗幟之下進行的。這樣，模糊不清的自決的口號，遂由民族解放，民族平等的武器，變為馴服民族的武器，變為使民族服從帝國主義的武器。近數年來，全世界的事

物行程，歐洲革命的邏輯，以及殖民地解放運動的生長，都要求把這個已成為反動的口號丟掉，而以別的革命的口號，這個口號可以消失不平等民族勞動大眾對支配民族無產者不相信的空氣，可以走向民族平等和這些民族勞動者統一的道路。這種口號便是共產主義者所提出的不平等民族和殖民地有國家分離權的口號。這個口號的優點如下：

(一) 它可以消滅懷疑某一民族勞動者有侵略別一民族勞動者意向的一切理由，而造成相互信任及自願聯合的基礎。

(二) 可以揭破帝國主義者的假面具，帝國主義者很虛偽地說什麼自決，而事實上則力謀使不平等的民族和殖民地永處於隸屬的地位，永處於自己的帝國主義國家的範圍以內，這遂加深了不平等民族和殖民地反對帝國主義的解放鬥爭。

俄羅斯的工人，假使他們取得政權以後，不宣佈各民族有國家分離之權，假使他們不在事實上證明自己實施各民族在這個廣大權利的決心，假使他們不放棄對芬蘭（

一九一七年)的「權利」，假使他們不撤退波斯北部的軍隊(一九一七年)，假使他們不放棄對蒙古、中國某一部分的覬覦等，那末他們也許不會取得自己的西方與東方的異族同志的同情，這用不着證明了。

不庸置疑的，巧妙地在自決旗幟下掩藏着的帝國主義者的政策，近來在東方接連遭受失敗，這因爲這一政策在那裏遇着了日益加强的解放運動，這一運動是基於以各民族都有國家分離權一口號的精神的鼓動而生長起來的。第二國際與第二半國際的英雄們，並不了解這一點，他們熱狂地辱罵巴庫行動與宣傳委員會(因○)所犯的若干不大重要的錯誤，不過凡費心查過該委員會成立以來的活動及近兩三年來亞非殖民地解放運動的人，都懂得這一點。

第三個要素，便是民族殖民地問題與資本政權問題、推翻資本主義問題、無產階級專政問題間的聯繫，有機聯繫的發見。在第二國際時代，民族問題的容量，縮小到最低限度，通常只是獨個兒地考察它，而與未來的無產階級革命沒有聯繫。一般默

認，民族問題，在無產階級革命以前，用資本主義範圍內許多改良的方法，可以「自然而然地」解決，以爲無產階級革命，不從基本上解決民族問題，也可以完成；反之，民族問題，不推翻資本的政權，在無產階級革命勝利以前，也可以解決。這個本質上是帝國主義的觀察事物的觀點，充滿着希普林格與巴威爾二氏關於民族問題的有名著作。不過近十年來，這種民族問題觀的全部錯誤，全部腐敗性，都顯露出來了。帝國主義大戰表明了而近來的革命實踐更證實了下列各點：

(一) 民族問題與殖民地問題是跟解除資本權力的問題分不開的；

(二) 帝國主義（資本主義的最高形式），如對不平等民族和殖民地沒有經濟上和政治上的奴役，那它是不能存在的；

(三) 不平等的民族和殖民地，如不推翻資本的權力，那是不能夠解放的；

(四) 無產階級的勝利，如無不平等民族和殖民地的脫離帝國主義的壓迫，那是不牢固的。

假使歐美可以叫做前線，叫做社會主義與帝國主義間主力決鬥的舞台，那末富於原料、燃料、食物、廣大人力的不平等民族和殖民地，應當承認爲帝國主義的後方，預備軍。爲要使戰爭獲得勝利，不僅需要在前線上勝利，而且需要使敵人的後方，其預備軍革命化。所以，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勝利，只有在無產階級把自己的革命鬥爭和不平等民族與殖民地勞動大眾的解放運動配合起來，以反對帝國主義者的權力，爭取無產階級專政的時候，才算有保證。第二國際與第二半國際的要人們，把民族殖民地問題與西方日益生長的普羅革命時代的政權問題分開，而忘記了這種「小事」。

第四個因素，便是民族問題的加入新成份，各民族真正（不僅法權的）平等的成份（如幫助，協助落後民族高升到超過他們的各民族的文化經濟的水準），這是建立各民族勞動大眾之間親睦合作的條件之一。在第二國際時代，通常只限於宣佈「民族的平權」，頂多也不會超過實施這種平權的要求。不過民族平權本身是個極重要的政治上的獲得，所怕者，要是沒有使用這個重大權利的充足資源與可能性，那它只有其虛名

而已。無疑的，落後人民的勞苦羣衆，無力像先進民族的勞苦羣衆所享用的那樣，來享用「民族平權」給予他們的權利，因為承繼自過去的各民族的事實上的不平等（文化的、經濟的）仍感覺得着，這種不平等萬不能在一兩年之內就可以消滅的。這種情形，在俄羅斯尤其感覺得特別強烈，因為在這裏，好多民族未來得及踏入資本主義，有些民族還完全沒有踏入資本主義，牠們沒有或者完全沒有自己的無產階級，在這裏雖然已經實行完全的民族平等，但是這些民族的勞苦大眾，由於自己文化與經濟落後的原故，無力充分的去享用他們所獲得的權利。在西方無產階級勝利後的「次日」，處在各種不同的發展階段上的好多落後的殖民地與半殖民地都不可避免地要登上舞台，這時這種不平等將感覺得更要厲害。正因為如此，所以很需要勝利的先進民族的無產階級去幫助，而且有效的和長期的去幫助落後民族文化與經濟的發展，幫助牠們高升到最高的發展水平，趕上走在前邊的民族。沒有這種幫助，就不可能使各民族和人民的勞動者在統一的世界經濟之內實行和平共居和親密合作，而這種和平共居和親

密合作，却為社會主義的澈底勝利所必要的。

由此可知，僅僅限於「民族平等」，那是不可能的，而需要從「民族平等」進而採取使各民族真正平等的方法，進而製定並實施關於下列各問題的辦法：

- (一) 研究落後民族與殖民地的經濟狀況、生活文化；
 - (二) 發展牠們的文化；
 - (三) 牠們政治的啓蒙；
 - (四) 逐漸而慎重的使牠們與最高的經濟形態銜接起來；
 - (五) 調整落後民族與先進民族勞動者之間的經濟合作。
- 共產主義者關於民族問題的新提法的四大因素，便是如此。

(一九二一年五月八日「真理報」第九十八號)

十月革命與俄羅斯共產主義者的民族政策

——一九二一年——

十月革命的力量，就在於它與西方的歷次革命不同，而在俄羅斯無產階級的周圍團結了千千萬萬的小資產階級，尤其是小資產階級中力量最大為數最多的一層——農民。這樣一來，遂使俄羅斯資產階級孤立起來，成了光桿兒；而俄羅斯的無產階級則變為全國命運的主宰者。沒有這一點，俄羅斯的工人也許是保持不住政權的。

和平、土地革命、及民族的自由，這便是把幅員廣袤的俄羅斯的二十多種民族的農民結合在俄羅斯無產階級紅旗周圍的三個基本因素。

關於前邊兩個因素，這裏再沒有述說的必要，關於它們在讀物上已經說的很多，同時它們本身就說明了自己。至於第三個因素——俄羅斯共產主義者的民族政策，很

顯然的，對於它的重大性，人們還沒有完全認識清楚。因此，關於它再說幾句，並不算多餘的吧。

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的居民，共有一萬萬四千萬（芬蘭、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立陶宛、波蘭除外），其中大俄羅斯人不過七千五百萬，其餘六千五百萬則為非大俄羅斯的民族。就先從這一點說起吧。

二則，這些民族，主要是居住在邊疆，軍事上最易攻擊的要點，而且這些邊疆都富於原料、燃料、食物。

三則，這些邊疆，在工業和軍事上，比中央俄羅斯都不大發展，因此之故，沒有中央俄羅斯軍事經濟的幫助，牠們都是無力保持自己獨立的，同樣，中央俄羅斯，沒有邊疆燃料、原料、及食物的幫助，也不能夠保存自己的軍事經濟的力量。

這些情形加上共產主義的民族綱領的若干原則，便決定了俄羅斯共產主義者的民族政策的性質。

這一政策的本質，可用幾句話表達出來：放棄對於非俄羅斯民族所居住的各區域的一切任何「要求」與「權利」；承認（不是在口頭上而是在事實上）這些民族有獨立的國家生存之權；這些民族同中央俄羅斯實行自願的軍事經濟的聯盟；幫助落後民族文化與經濟的發展（沒有這一點，則所謂「民族的平等」便變成了空洞的東西）；所有這些，都須以邊疆各民族的農民獲得完全的解放和全部政權的集中在勞動份子的手中為基礎——俄羅斯共產主義者的民族政策，便是如此。

不用說，當政的俄羅斯工人，假使他們不在事實上證明自己的實施這種民族政策的決心，假使他們不放棄對芬蘭的「權利」，假使他們不撤回波斯北部的軍隊，假使他們不取消俄國帝國主義者對於蒙古和中國若干區域的覬覦，假使他們不幫助前俄羅斯帝國的落後民族去發展本族語言的文化與國家生活，那末他們便不能取得自己的異族同志的同情與信任的。

只有基於這一信任，才可以產生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各人民的牢不

可破的聯盟，一切反對這一聯盟的「外交」的詭計和嚴密執行的「封鎖」，都是沒有生效的。

不僅此也，沒有前俄羅斯邊疆被壓迫羣衆方面對自己的這種同情與信任，那俄羅斯的工人也許不能戰勝柯恰克、鄧尼金、及烏蘭吉爾。不要忘記，這些叛軍軍人活動的區域，只限於主要爲非俄羅斯民族所居住的邊疆區域，這些非俄羅斯的民族，因柯恰克、鄧尼金、烏蘭吉爾實施帝國主義和俄羅斯侵略主義政策的原故，不能不憎惡他們。實行干涉並支持這些叛軍首領的協約國，所能憑藉的只是邊疆的俄羅斯侵略主義者份子而已。因之，它只能燃起邊疆居民對叛軍首領的痛惡，而加深他們對蘇維埃政權的同情。

這種情形，便決定了柯恰克、鄧尼金、烏蘭吉爾後方的內在弱點，亦即決定他們的前綫的弱點，歸根結蒂，也就是決定了他們的失敗。

不過，俄羅斯共產主義者民族政策的良好結果，並不限於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

主義共和國及與它有聯繫的各蘇維埃共和國的範疇之內。這種良好的結果，間接地在隣國對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的關係上，也表現了出來。土耳其、波斯、阿富汗、印度及其他東方邊疆對俄羅斯（從前認為俄羅斯是這些國家所畏懼之東西）關係的根本改善，乃是一種事實。現在甚至克爾遜爵士這種勇敢的政治家都不敢爭辯這個事實。自蘇維埃政權存在以來的四年間，假使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內不系統地實施上述的民族政策，那末相隣各國對俄羅斯關係的這種根本的改變，便是不可能的，那就不用說了。

大體說來，俄羅斯共產主義者的民族政策的總結便是如此。在現在，在蘇維埃政權第四週年紀念日，這種總結，更其明顯，這個時候，艱苦的戰爭已經結束了，廣大的建設工作已經開始了，你不自覺地要把走過的路回瞥一下。

（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六——七日，「真理報」第二五一號）

論各蘇維埃共和國的聯合

——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在第十屆全俄蘇維埃代表大會上的報告——

同志們！幾天以前，即這次大會開幕前幾天，全俄中央執委會主席團，接到了外高加索各共和國、烏克蘭、及白俄羅斯蘇維埃代表大會的好多決議，陳述該共和國等主張聯合而成爲一個聯盟國家的願望與必要。全俄中執委會主席團，曾對此問題加以討論，認爲聯合的良機，不可失却。由於這些決議的關係，所以這次大會的日程上，便列了一個各共和國聯合的問題。

各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的聯合運動，在三四個月前，便已經開始。發動者爲阿才培羅、阿美尼亞、喬治亞各共和國，後來烏克蘭和白俄羅斯兩共和國，也加入了。這一運動的意義，就在於舊有的條約關係——蘇維埃俄羅斯與其他蘇維埃共和國之間的條約關係——已經盡了自己的使命，而不够了。這一運動的意義，就在於勢不可免地

要從舊有的條約關係進到更密切聯合的關係，以成立統一的聯盟國家和相適應的執行與立法性質的聯盟機關——聯盟中央執行委員會和人民委員會爲前提的關係，——簡言之，那從前枝枝節節的，在條約關係範圍內曾經解決的，今日在運動行程中提議要鑄造成一種經常的東西。

推動各共和國走上聯合道路的原因是什末呢？確定聯合必須的情形是什末呢？

有三類情形，使各蘇維埃共和國不得不聯合而爲一個聯盟國家。

第一類的情形，便是關於我們內部經濟狀況的一些事實。第一，是由於七年戰爭的結果，遂使各共和國所有的經濟資源，極爲貧乏，這種貧乏情形，迫使我們不得不把這一點貧乏的手段聯合起來，去更合理的利用它們，以發展那構成各共和國蘇維埃政權脊骨的基本經濟部門。第二，是各區域與我們聯邦的各共和國之間，在歷史上形成了天然的分工，經濟分工。比如北方給南方和東方供給紡織品；而南方和東方給北方供給棉花、燃料等。各區域間的這一分工，是不能一筆鈎銷了的，因爲它是在歷

史上由聯邦經濟發展的行程所造成的。這一分工，在各共和國各自存在之下，使各區的充分的發展，成爲不可能。因之，它必然要使各共和國團結起來，而成爲一個統一的經濟的整體。第三是全聯邦的基本交通手段的統一，交通手段爲一切可能的聯合的神經和基礎。很明顯的，絕不許在各個共和國指揮之下和利益範圍以內，交通手段分別存在，因爲這會使經濟生活的主要神經——運輸——變爲一團未按照計劃使用的各個份子。這種情形也使各共和國聯合而爲一個國家。最後是我們財力的拮据。同志們，應當爽直地說，在蘇維埃政權成立第六年的現在，我們的財政狀況大規模發展的可能性，例如要比在舊制度之下少得多。舊制有酒稅，它一年可給五萬萬盧布的收入，而我們是沒有的；舊制則有數十萬萬盧布的國外信用放款可借，而我們也是沒有的。所有這些都告訴說，在我們財政發展的可能性如此貧乏的情形之下，各個共和國的力量不團結起來，各個共和國的財政力量不結合起來而成爲一個整體，那我們便不能解決我們共和國的財政經濟的基本而迫切的任務。

推動我們的各共和國走上聯合道路的第一類情形，便是如此。

使各共和國聯合的第二類情形，便是與我們外部形勢相聯繫的一些事實。我的意思，第一係指軍事形勢而言；第二，係指我們經對外貿易人民委員會而對國外資本的關係而言；第三，係指我們對資產階級國家的外交關係而言。同志們，應當記牢，我們的各共和國雖然都僥倖的跳出了內戰的狀態，但是，外部侵犯的危險，還沒有完全消除。這一危險要求我們的軍事前綫要絕對統一，要求我們的軍隊要無條件統一，尤其在我們不是踏入精神上解除武裝，而是真正物質上裁減軍備的現在，更要如此。自我們的軍隊數額會減為六十萬以後，我們特別須要有統一的不可分裂的軍事戰綫，才能保證各共和國的外部安全。其次，除軍事性質的危險以外，還有使我們聯邦經濟孤立的危險。大家都知道，自熱那亞和海牙兩次會議（四一）及自烏卡特案（四二）以後，對我們共和國的經濟封鎖，雖未成功，但是外資大量流入以應我們經濟的需要却未有過。我們各共和國經濟孤立的危險還是有的。這個新的干涉方式，其危險並不下

於軍事干涉，要剷除這一危險，只有建立各蘇維埃共和國的統一的經濟戰綫以對付資本主義的包圍。最後則是我們的外交形勢。大家都親自看到，不久以前，在洛桑會議（四三）開幕的前夜，協約國各國竭力要使我們的聯邦孤立起來。這在外交上並未成功。有組織的對我們聯邦的封鎖，曾經瓦解了。於是協約國不得不顧計到我們的聯邦，而略微退却一點。

以爲在外交上孤立我們聯邦的這類事實，不會再有了，那是沒有理由的。因此在外交方面，也有實行統一戰綫的必要。

這便是推動各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走上聯合道路的第二類情形。

第一類情形與第二類情形，自蘇維埃政權成立以來，直到眼前，都是有效力的。我剛剛說過的我們經濟的需要和我們在對外政策方面的軍事外交的需要，無疑的，在以前也是有效的。不過這種情形，只有到了內戰結束後的現在，才獲得了特殊的力量，這時各共和國第一次才都有了從事經濟建設的可能，第一次都看見了自己財力

的貧乏與在對內經濟方面和對外方面聯合起來的必要。所以，在現在，在蘇維埃政權成立的第六年，各獨立的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合問題，便列在議事日程上了。

最後，第三類要求聯合的事實，是跟蘇維埃政權構成的性質，是跟蘇維埃政權的階級本性有聯繫的。蘇維埃政權的構成是這樣的，它就它自己的內部本質說是國際的，它在羣衆當中竭力培植聯合的觀念，它本身推動他們走上了聯合的道路。

資本、私有產及剝削，是分散人們的，它們把人們分爲相互敵視的營壘，英、法、以及有着不可調和的內在的民族矛盾（這種矛盾侵蝕着這些國家的基礎本身）的波蘭、南斯拉夫這些微小的多民族國家就是榜樣，要是在那裏，在資本主義民主統治着而且國家以私有產爲基礎的西方；國家的基礎本身總是傾向於相互的民族磨擦、衝突及鬥爭，那末在這裏，在政權不是建築在資本、而是建築在勞動之上；在政權不是建築在私有財產、而是建築在集體財產之上、在政權不是建築在人剝削人，而是建築在反對這種剝削之上的蘇維埃世界內，適爲相反，政權的本性就傾向於使勞動大衆自然

而然地力謀聯合起來而成爲一個社會主義的家庭。在那裏，在西方，在資產階級民主的世界內，我們看到，多民族國家，逐漸解體和沒落，而成爲各個構成份子（如大不列顛，我不知道，它怎樣在處理印度、埃及、愛爾蘭的問題，又如波蘭，我仍不知道，它怎樣在處理自己的白俄羅斯人、烏克蘭人、日耳曼人、猶太人的問題），而在這裏，在團結了三十餘種民族的我們的聯邦內，適爲相反，我們看到的是各獨立共和國間國家聯繫日益鞏固的過程，是走向各獨立共和國日益親密接近而成爲一個獨立國家的過程，難道這還不明顯嗎！請大家看吧，這是兩個國家聯合的式樣，其中第一個式樣——資本主義的式樣，使國家的各構成部份爲之瓦解，反之，第二個式樣，——蘇維埃式樣，則使早已獨立的各民族，逐漸而牢固的接近，而成爲一個獨立的國家。

這便是推動各個共和國走上聯合道路的第三類事實。

各共和國的聯合應當採取怎樣的方式呢？全俄中執委會主席團所接烏克蘭、白俄羅斯、及外高加索諸蘇維埃共和國的決議案中，對於聯合的基礎，都有大概的描述。

聯合起來的計有四個共和國：一爲蘇俄，它是個完整的聯邦組織；二爲外高加索共和國，它也是個完整的聯邦組織；三爲烏克蘭；四爲白俄羅斯。霍列斯姆和布哈拉這兩個獨立的蘇維埃共和國，不是社會主義的，而是人民的蘇維埃共和國，暫時尙未加入這一聯合，只因這兩個共和國還都不是社會主義的。同志們，我不懷疑，並且希望你們也不要懷疑，這兩個共和國，隨着牠們內部向社會主義方面的進展，也一定要加入今日成立的這個聯盟國家的。

有人以爲蘇俄是個完整的聯邦組織，牠加入共和國聯盟，也許不大適宜，而由加入它的各個共和國加入，比較來得適宜，顯然的，這事先把蘇俄就分解成了幾個構成部分。我以爲這個方法是不合理的，是不適宜的，是爲運動的行程本身所不容的。第一，它也許要得到這樣的結果，即除過各共和國聯合的過程而外，我們也許還有個使現有的聯邦組織分離的過程，——使已經開始的眞正革命的各共和國聯合的過程繼續發展的過程。

第二，採用這個不正確的方法，我們定要弄成這樣一種情形，就是由於這種情形的原故，除過八個自治共和國外，我們也許還要從俄羅斯社會主義聯邦蘇維埃共和國分出一個特殊的俄羅斯人的中執委會和俄羅斯人的人民委員會，使組織根本脫軌，這在目前是不需要的，而且是有害的，不論內部的環境或外部的環境，都不需要如此。所以，我以為聯合而為一個聯盟的主體應是俄羅斯社會主義聯邦蘇維埃共和國、外高加索聯邦、烏克蘭、及白俄羅斯四個共和國。

在起草聯盟條約時，應當以下列各點作為基礎：對外貿易、陸海軍、外務、交通、郵電等人民委員會，僅由聯盟人民委員會設置之；財政、經濟、食物、勞動、監察等人民委員會，訂約各共和國亦得設置，但須依照聯盟相同人民委員會的指令而活動。爲了使各共和國勞動羣衆在食物、國民經濟、財政、或勞動方面的力量，於聯盟中央指導之下聯合起來，這是很必要的。最後，其餘各人民委員會，如內務、司法、教育、農業等——牠們總共六個——因與各加盟共和國人民的生活道德、土地法

的特殊方式、司法系統的特殊方式、以及語言文化有着直接的關係，應成爲獨立的人民委員會，受締約各共和國執委會與人民委員會的指揮。這是保證加入各蘇維埃共和國的人民民族發展自由的現實條件。

依我的觀點看來，這些原則，應作爲我們的各共和國間在日內所訂立的條約的基礎。依照這一點，我特提出一個決議草案，這個草案是經全俄中執委會主席團所認可的：

(一)承認俄羅斯社會主義聯邦蘇維埃共和國、烏克蘭社會主義蘇維埃共和國、外高加索社會主義聯邦蘇維埃共和國、白俄羅斯社會主義蘇維埃共和國聯合起來，而成爲一社會主義蘇維埃共和國聯盟，頗合時機。

(二)以各共和國自願及平等爲聯合原則，每一共和國都保有自由退出共和國聯盟之權。

(三)委加里奇、托洛茨基、斯大林、里柯夫、卡明涅夫、秋魯巴、莫洛托夫、索柯尼

柯夫、沙普羅諾夫、畢塔柯夫、魯蘇達克、塞特加里葉夫、姆赫達羅夫、哈里柯夫、楊遜、曼蘇羅夫、拉赫姆巴葉夫諸同志爲代表團，協同烏克蘭、外高加索共和國，及白俄羅斯等代表團，起草各共和國聯盟成立宣言草案，並說明推動各共和國聯合而爲一聯盟國家的種種情形。

(四) 委該代表團起草俄羅斯社會主義聯邦蘇維埃共和國加入各共和國聯盟的條件，在審查聯盟條約時，該代表團務須堅持下列諸點：

- 1 成立相適應的聯盟立法與執行機關；
- 2 陸海軍、交通、外交、對外貿易、郵電諸人民委員部務須合併；
- 3 締約各共和國財政、食物、國民經濟、勞動、工農監察諸人民委員部須服從聯盟共和國相同人民委員部的指令；
- 4 締約各共和國人民民族發展的利益，須有充分的保證。

(五) 條約草案，在提交各共和國聯盟第一次代表大會前，先提交全俄中執委會主席團

■可。

(六)委該代表團，根據全俄中執委會所認可的聯合條件，全權締結俄羅斯社會主義聯邦蘇維埃共和國與烏克蘭、外高加索、白俄羅斯諸社會主義蘇維埃共和國成立社會主義蘇維埃共和國聯盟的條約。

(七)條約須提交各共和國聯盟第一次代表大會批准。

我請大家注意的議決案，便是如此。

同志們！自成立蘇維埃共和國以來，世界各國分成了兩個營壘：社會主義的營壘與資本主義的營壘。在資本主義營壘裏邊，是帝國主義大戰，民族屠殺、壓迫、殖民地的奴隸制及排外愛國主義。在蘇維埃營壘裏邊，在社會主義營壘裏邊，適為相反，則是各人民的相互信任、民族平等、和平共居、及親睦合作。數十年來資本主義的民主，想用混合各民族自由發展的利益和剝削體系的方法，力謀解決民族的矛盾，但是這一企圖過去乃至現在並未成功。反之，民族矛盾的絲結，愈弄愈亂，而有使資本主義死

亡之虞。只有在蘇維埃世界內，在社會主義營壘內，才成功連根剷除了民族的壓迫，調整了各民族的相互信任與親睦合作。只有在蘇維埃把這一點作成功以後，我們才有可能來建設我們的聯邦，防禦內外敵人的侵犯。五年以前，蘇維埃政權就成功奠定了各人民和平共居和親睦合作的基礎。在現在，即在我們正在解決願望聯合，必須聯合這個問題的時候，我們在這個基礎上面，要建立一個新的大廈，建立一個新的強盛的聯盟勞動國家，使其永垂不朽。我們各共和國的人民，不久以前，舉行代表大會，一致決定成立各共和國聯盟，這種意志毫無疑義的告訴說，聯合事業是置在一個正確的道路上，它是建築在各人民自願及平等的偉大的基礎上面。同志們，我們希望，我們的聯盟共和國成立以後，可造成一個可靠的反對國際資本主義的支柱，新的聯盟國家可作為全世界勞動者聯合而成爲一個統一的世界社會主義蘇維埃共和國的一個新的堅決步驟（長久鼓掌不息，全場唱國際歌）。

〔全俄第十次蘇維埃代表大會會議紀錄〕，一九三三年出版。

論各蘇維埃共和國的聯合

——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三十日在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第一次蘇維埃

代表大會上的報告——

同志們！在蘇維埃政權史上，今日是個轉變的日子。它在舊時期與新時期之間設立了一個標誌，在舊的、已經經過的時期內，各蘇維埃共和國雖然是在一起活動的，但是它們都是各行其是，首先忙於自己生存的問題；而在新的已經開關的時期內，各蘇維埃共和國各自為政的情形已經告終了，這時各共和國正在聯合起來而成爲一個統一的聯盟國家，以便順利的與經濟破壞作鬥爭，蘇維埃政權所想的，已經不僅僅是關於生存的問題，而是如何發展而成爲一個強大的國際力量，可以影響於國際的局勢，可以爲了勞動者的利益而改變國際局勢。

☆

五年以前，蘇維埃政權是怎樣一種情形呢？這是個小小的幾乎看不見的東西，它

的一切敵人對它譏笑，它的好多友人對它惋惜。這正是在破壞的時期，那時蘇維埃政權所賴以存在的，與其說是自身的力量，不如說是它的敵人的無力，當時蘇維埃政權的敵人，分成了兩個集團，一個是德奧集團，一個是英法集團，牠們兩者相互之間從事戰爭，而沒有可能去掉轉武器來反對蘇維埃政權。這是蘇維埃政權史上軍事破壞的一個時期。但是在柯恰克和鄒尼金的打擊之下，蘇維埃政權却創造了紅軍，越出了破壞的時期，而獲得勝利。

此後遂開闢了蘇維埃政權史上的第二個時期，與經濟破壞作鬥爭的時期。這一時期還沒有完結，但是已有了成績，因為在這一時期，蘇維埃政權對於飢荒（去年發生）的救濟，極爲順利；在這一時期農村經濟，大爲繁榮；輕工業，大見起色；工業的領導幹部，已經提拔出來，這種幹部乃是我們願望，我們希望的所在。不過這一切，對於克服經濟的破壞，是極其不夠的。爲了剷除和消滅經濟破壞的情形，需要把一切蘇維埃共和國的力量結合起來，需要把各共和國一切財政與經濟的可能用於恢復我們

工業的主要部門。因此，各蘇維埃共和國實有聯合而成爲一個聯盟國家的必要。今日便是我們的各共和國聯合而成爲一個國家，以便結合力量恢復我們經濟的日子。

與軍事破壞作鬥爭的軍事時期：曾使我們創造了紅軍——蘇維埃政權生存的基礎之一。下一個時期——與經濟破壞情形作鬥爭的時期，使我們創造着一個新的國家生存的框架——蘇維埃共和國聯盟（蘇聯），這個聯盟，無疑的，要把恢復蘇維埃經濟的事業向前推進。

現在蘇維埃政權如何呢？它成了一個偉大的勞動強國，它在敵人中間所引起的已不是譏笑，而是咬牙切齒了。

蘇維埃政權自其生存的五年以來的發展的總結，便是如此。

不過，同志們，今日不僅是個算總帳的日子，而同時又是個新俄羅斯戰勝舊俄羅斯，戰勝爲歐洲憲兵的俄羅斯，戰勝爲亞洲劊子手的俄羅斯的凱旋日子。今日是打破民族壓迫鎖鏈，戰勝資本，創造無產階級專政，喚醒東方各民族，鼓勵西方工人，把

紅旗從黨旗變爲國旗，把各蘇維埃共和國人民結合在這一旗幟周圍，使牠們聯合起來而成爲一個國家——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蘇聯），作爲未來世界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榜樣的新俄羅斯的凱旋日子。

人們常常辱罵我們共產主義者，說我們不會建設。五年來蘇維埃政權的歷史，便可作爲共產主義者也會建設的證據。這次蘇維埃代表大會的召集，是爲了批准各共和國聯盟（蘇聯）的宣言和條約（這個宣言和條約，昨日已經全權代表會議所通過），這次聯盟的代表大會告訴那一切尙未喪失理解能力的人們說：共產主義者會破壞舊的，同樣也會建設新的。

同志們，昨天全權代表會議所通過的宣言，我把它宣讀一遍：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蘇聯）成立宣言

自各蘇維埃共和國成立以來，世界上的國家便分成了兩個營壘：資本主義的

營壘與社會主義的營壘。

在資本主義營壘那裏，是民族的仇視和不平等，是殖民地的奴隸制和排外愛國主義，是民族的壓迫和滅亡，是帝國主義的獸行和戰爭。

在社會主義的營壘這裏，則是相互信任和和平，是民族的自由和平等，是各民族的和平共居和親睦合作。

數十年來，資本主義世界想用各民族自由發展和人剝削人的體系結合起來的方法，以解決民族問題的企圖，毫無結果可言。反之，民族矛盾的絲結一天比一天錯綜紛亂了，以致資本主義的生存本身都受到威脅。資產階級實已無力去調整各民族的合作。

惟有在蘇維埃營壘裏邊，惟有在把大多數人口團結在自己周圍的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之下，才可以根本消滅民族壓迫，才可以創立相互信任的環境，而奠定各民族親睦合作的基礎。

只是由於是些情形，各蘇維埃共和國才成功擊退了全世界內部的與外部的帝國主義者的侵犯；只是由於這些情形，各蘇維埃共和國才成功順利地消滅了內戰，保證了自己的生存，而着手和平的經濟建設。

不過諸年戰爭不是白白過去的。荒蕪的田野，停工的工廠，破壞不堪的生產力和竭蹶的經濟資源，都是戰爭的遺跡。所有這一切使各個共和國以個別的努力，去從事經濟建設，便感覺不夠。在各共和國分別存在之下，要復興國民經濟是不可能的。

別一方面，國際形勢的不安定和重新侵犯的危險，使各蘇維埃共和國成立統一戰線以對付帝國主義的包圍，也勢所必然。

此外，蘇維埃政權的構造，就自己的階級性質說，就是國際的，它本身也推動各蘇維埃共和國的勞動羣衆走上了聯合而爲一個社會主義家庭的道路。

所有這些情形，都命令式地要求各蘇維埃共和國聯合而爲一個聯盟國家，足

以謀外部的安全、內部經濟的繁榮、及各人民民族發展的自由。

各蘇維埃共和國的人民，不久以前，都舉行過自己的蘇維埃代表大會，曾一致通過成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簡稱蘇聯）的決定，這一意志可用作可靠的担保，證明這個聯盟乃是各平等民族的自願聯合，每個共和國都有自由退出聯盟之權，不論現有的或將來發生的一切社會主義蘇維埃共和國都可以加入聯盟，新的聯盟國家乃是尙在一九一七年十一月間就奠下的各民族和平共居和親睦合作的基礎之有價值的成就，它可用作反對世界資本主義的可靠壁壘和聯合各國勞動者而爲一個世界社會主義蘇維埃共和國的道路上的——一個新的斷然步驟。

· 蘇維埃政權的基礎，已經表現在委派我們的各社會主義蘇維埃共和國的法裏面，我們這些共和國的代表，向全世界聲明這一切，並鄭重宣佈蘇維埃政權基礎的牢不可破，同時，我們基於賦與我們的全權，議決簽訂『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成立條約。該會議所通過的條約原文如下：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蘇聯）成立條約

俄羅斯社會主義聯邦蘇維埃共和國，（簡稱 R. S. F. S. R.），烏克蘭社會主義蘇維埃共和國（U. S. S. R.），白俄羅斯社會主義蘇維埃共和國（W. R. S. S. R.），及外高加索社會主義聯邦蘇維埃共和國（T. S. F. S. R.）——係阿才倍疆、喬治亞及亞美尼亞三共和國組成——根據下列基礎，締結本聯盟條約，結成一個聯盟國家——『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蘇聯）。

第一條 下列各項，歸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蘇聯）掌理，由牠的最高機

關代爲行使：

- （一）在國際關係上，代表聯盟；
- （二）變更聯盟的外部邊界；

- (三) 締結容納新共和國加入聯盟的條約；
- (四) 宣戰和媾和；
- (五) 締結外國公債；
- (六) 批准國際條約；
- (七) 制定內外貿易體系；
- (八) 制定聯盟全部國民經濟的基礎和總計畫；並締結租讓契約；
- (九) 調理運輸及郵電；
- (一〇) 制定聯盟武裝力量的組織基礎；
- (一一) 批准聯盟的統一的國家預算；確定鑄幣、貨幣、和信託體系；
並制定全聯盟的各共和國的及地方的稅制；
- (一二) 制定聯盟全境土地法和土地利用，以及礦產、森林，水道利用
的一般原則；

- (一三)制定全聯盟的移民辦法；
- (一四)制定司法制度和訴訟程序的原則；以及聯盟的民法與刑法；
- (一五)制定勞働的根本法；
- (一六)制定國民教育的通則；
- (一七)制定國民衛生方面的一般方法；
- (一八)制定度量衡各制度；
- (一九)辦理全聯盟的統計事項；
- (二〇)制定在聯盟公民籍方面對於外僑權利的法律；
- (二一)一般的赦免權；
- (二二)取消各加盟共和國蘇維埃代表大會、中央執行委員會、和人民委員會違犯聯盟條約的各項法令。

第二條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的最高權力機關，爲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

聯盟的蘇維埃代表大會；在代表大會閉會期間，則爲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的中央執行委員會。

第三條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的蘇維埃代表大會，由各城市蘇維埃的代表及省蘇維埃代表大會的代表組織之。城市蘇維埃每二萬五千選舉人選舉代表一人；省蘇維埃代表大會每十二萬五千居民選舉代表一人。

第四條

出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蘇維埃代表大會的代表，在省蘇維埃代表大會當中選舉之。

第五條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蘇維埃代表大會常會，由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中央執行委員會召集，每年一次。非常大會，得由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中央執行委員會，依自身的決定或兩個加盟共和國以上的請求召集之。

第六條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蘇維埃代表大會，以每個加盟共和國的人口

比例，由各加盟共和國的代表中選舉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共爲三百七十一人。

第七條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中央執行委員會常會，每年召集三次；但依聯盟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團的決定或依聯盟人民委員會及某一加盟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的請求，得召集非常會議。

第八條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蘇維埃代表大會和中央執行委員會常會，依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團所規定的程序，得在各加盟共和國首都舉行。

第九條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中央執行委員會選舉一主席團，主席團爲中央執行委員會常會閉會期間聯盟的最高權力機關。

第十條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團人數爲十九名，聯盟中央執行委員會從其中按照加盟共和國的數目選舉四個聯盟中央執行委

員會的主席。

第十一條

聯盟中央執行委員會的執行機關爲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人民委員會，該委員會由聯盟中央執行委員會選出，以後者的委託爲期，由

左列人員組成：

- (一) 聯盟人民委員會主席；
- (二) 副主席；
- (三) 外交人民委員長；
- (四) 海陸軍人民委員長；
- (五) 對外貿易人民委員長；
- (六) 交通人民委員長；
- (七) 郵電人民委員長；
- (八) 工農監察人民委員長；

(九) 國民經濟最高委員會主席；

(十) 勞働人民委員長；

(十一) 食物人民委員長；

(十二) 財政人民委員長。

第十二條

爲確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境內的革命法律，並爲聯合各加盟共和國的力量與反革命作鬥爭起見，在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中央執行委員會之下，設立最高法院，執行最高裁判監督的職能；並在聯盟人民委員會之下，設立國家政治管理聯合機關，其主席可加入聯盟人民委員會，得有發言權。

第十三條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人民委員會的命令和議決，各加盟共和國均有執行的義務，並在聯盟全境內直接施行。

第十四條

聯盟中央執行委員會和人民委員會的命令和決議，用各加盟共和國通

用的語言（俄羅斯語、烏克蘭語、白俄羅斯語、喬治亞語、亞美尼亞語，及土耳其語）頒佈。

第十五條 各加盟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可向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中央執委會主席團抗議聯盟人民委員會的命令和決議，但不能停止它們的執行。

第十六條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人民委員會的法令，惟有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中央執行委員會及其主席團，才可加以取消，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各人民委員長的命令，惟有聯盟中央執行委員會，其主席團，及聯盟人民委員會，方可取消。

第十七條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各人民委員長的法令，只有在特殊的情形之下，只有在該法令與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人民委員會或中央執行委員會的議決顯然不相適合時，方可由各加盟共和國中央執行委

員會或該中央執行委員主席團，停止執行。各加盟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或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團應立即將所停止執行的法令，呈報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人民委員會及與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有關係的人民委員長。

第十八條 各加盟共和國人民委員會，由左列人員組成：

- (一) 人民委員會主席；
- (二) 副主席；
- (三) 最高國民經濟委員會主席；
- (四) 農業人民委員長；
- (五) 食物人民委員長；
- (六) 財政人民委員長；
- (七) 勞動人民委員長；

(八) 內政人民委員長；

(九) 司法人民委員長；

(十) 工農監察人民委員長；

(十一) 教育人民委員長；

(十二) 衛生人民委員長；

(十三) 社會保險人民委員長；

(十四) 民族事務人民委員長；

聯盟外交、海陸軍、對外貿易、交通、及郵電各人民委員部之特派員，亦得列席。

第十九條

各加盟共和國最高國民經濟委員會和食物、財政、勞働、以及工農監察各人民委員部雖直接隸屬於各加盟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和人民委員會；但在自己的活動中，仍以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相當的各

人民委員長的命令爲指導。

第二二條 加入聯盟的各共和國，各得有自己的收支預算，此項收支預算爲聯盟中央執行委員會所批准的全聯盟預算的一個構成部分。各共和國預算的收支部分，須得聯盟中央執行委員會規定。用於編造各加盟共和國的預算的收入細目與收入扣留額，須經聯盟中央執行委員會決定。

第二一條 各聯盟共和國公民均用統一的聯盟公民籍。

第二二條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有自己的旗幟、國徽及國印。

第二三條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的首都爲莫斯科城。

第二四條 各加盟共和國得按照本條約將自己的憲法，加以修改。

第二五條 聯盟條約的批准、修改、及補充，均屬於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蘇維埃代表大會的特殊權限。

第二六條 每個加盟共和國都保存有自由退出聯盟之權。

同志們，我受各蘇維埃共和國全權代表會議的委託，向諸位建議批准剛剛所宣讀的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成立宣言及條約的原文，同志們，我建議以共產黨員所特有的一種精神通過它們，在人類的歷史上添加一個新的章目吧。（鼓掌）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第一次蘇維埃代表大會會議紀錄，一九二二年）

黨的建設和國家建設中的民族因素

——一九二三年俄國共產黨(布)第十二屆大會報告大綱，經黨的中央認可——

一

(一)資本主義的發展，尚在前世紀，就暴露了生產方法和交換的國際主義化、民族閉關主義的消滅、各民族經濟的接近及廣大領土之聯合而為一個聯繫的整體的趨勢。資本主義的進一步的發展，世界市場的發展，主要海上航路 and 鐵道的設置，資本互輸出等，更加强了這一趨勢，把各色各樣的人民，用國際分工和各方相互依賴的繩索聯繫起來。因為這一過程反映了生產力的巨大發展，因為它促進了民族孤立性與各民族利益對立性的消滅，所以，它仍是一個進步的過程，因為它準備了未來的世界社會主義經濟的物質前提。

(二)不過這一趨勢是在一種特殊的方式之下發展起來的，這種方式是跟它的內在的歷史意義不相適應的。各民族的相互依賴和地域的經濟聯合，在資本主義發展行程中，並不是經過各民族平等合作，而是由於一個民族支配別個民族，比較發展的民族壓迫和剝削不大發展的民族而建立起來的。對殖民地的掠奪和侵略，民族的壓迫和不平等，帝國主義的橫行與殘暴，殖民地的奴隸制和民族的毫無權利，與夫「文明」民族相互之間奪取對「非文明」民族統治權的鬥爭，——這就是各人民經濟接近過程所經過的方式。因此，與聯合趨勢並行的，還生長了一個用暴力方式消滅這個聯合的趨勢，被壓迫殖民地和附庸民族謀解除帝國主義壓迫的鬥爭。因為這第二個趨勢是表示被壓迫羣衆反對帝國主義聯合方式的憤激行動，因為它要求各人民根據合作和自願的聯合的原則而聯合起來，所以，它仍是一個進步的趨勢，因為它造就了未來的世界社會主義經濟的精神前提。

(三)這兩個爲資本主義所特有的形式上所表現出來的基本趨勢的鬥爭，充滿着

近五十年來多民族的資產階級國家的歷史。在資本主義發展的範圍以內，這兩個趨勢間的不可調和的矛盾，曾作了資產階級的殖民國家內部破產和有變的不安定的基礎。

這些國家內部的不可避免的衝突和這些國家相互間的不可避免的戰爭；老舊的殖民國家的崩潰和新興的殖民國家的成立；奪取殖民地的重新角逐和多民族國家的重新崩潰（這一崩潰，使世界政治地圖重新劃過），——這便是這一基本矛盾的結果。一方面舊俄羅斯、奧匈帝國、及土耳其的瓦解；別一方面，大不列顛及舊德意志這些殖民國家的歷史；與夫偉大的「帝國主義戰爭和殖民地及不平等民族革命運動的生長，——所有這些及類似的事實，都很明顯地說明了多民族的資產階級國家的不安定與不牢固。

這樣，各人民經濟聯合過程與這種聯合的帝國主義方法間的不可調和的矛盾，便決定了資產階級尋求解決民族問題的正確方法的毫無能力，一籌莫展，及脆弱無力。

（四）本黨考慮到了這些情形，以民族有自決權、各人民有獨立國家生存權爲自己關於民族問題政策的基礎。尙在自己生存的最初幾天內，在自己的第一次代表大會

上（一八九八年），那時資本主義在民族問題方面的矛盾，還沒有十分明白地顯示出來，本黨就承認各民族有這個不能剝奪的權利。後來直到十月革命為止，牠在自己已代表大會和代表會議上，以特殊的決議和決定毫不改變地確定自己的民族綱領。帝國主義大戰和與這一大戰有關係的殖民地的強大的革命運動，不過對於本黨對民族問題的決定給一個新的確認罷了。這些決定的意義就在於：（一）堅決否認對各民族的一切任何強制方式；（二）承認各人民平等並對自己命運的處理有主權；（三）承認各民族的牢固聯合，只有基於合作和自願的原則才能做到；（四）宣佈了這種聯合的實現只有在推翻資本權力的結果而才能夠做到的真理。

本黨在自己的工作中，不倦地拿這種民族解放的綱領，限沙皇主義的公開壓迫的政策以及少數派和社會革命黨的不澈底的半帝國主義的政策對立起來。要是沙皇主義的俄羅斯化的政策造成了沙皇主義與舊俄各民族間的鴻溝，而少數派與社會革命黨的半帝國主義政策曾使這些民族的優秀份子放棄克倫斯基主義，那末本黨的解放政策，

曾獲得了這些民族的廣大羣衆在他們反對沙皇主義和帝國主義俄羅斯資產階級鬥爭中的同情與支持。毫不容疑的，這種同情與這種支持，乃是確定我黨在十月革命諸日內勝利的主要因素之一。

(五)十月革命把本黨關於民族問題的決定，作了個實踐的總結。十月革命推翻了地主與資本案——民族壓迫的基本執行者——的政權，而使無產階級得了政權以後，一下子便擊破了民族壓迫的鎖鏈，把舊的各民族間的關係顛倒過來，而摧毀了舊有的民族仇視，掃清了各民族合作的地盤，不僅取得了俄羅斯異族，而且取得了歐亞二洲異族兄弟對俄羅斯無產階級的信任。不用說，沒有這種信任，俄羅斯無產階級也許不能夠戰勝柯恰克和鄧尼金，右金尼亦與烏爾格爾。別一方面，無疑的，在俄羅斯的中央不建立無產階級專政，被壓迫民族也許不能獲得自己的解放。當資本掌握政權的時候，當充滿着民族主義偏見的以前「強國」民族的小資產階級，尤其農民，跟在資本案屁股後面走的時候，民族的仇視和民族的衝突總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反之，

要是農民與其他小資產階級跟着無產階級走的話，要是無產階級專政有保證的話，那末民族的和平和民族的自由也就有了保證。所以，蘇維埃的勝利和無產階級專政的確立，乃是在一個統一的國家聯盟之內各民族親睦合作所由建立的基礎。

(六)不過十月革命的成績，並不限於民族壓迫的消滅和各人民聯合基礎的創立。在自己發展的行程中，十月革命還制定了這一聯合的方式，而指出了各民族藉以聯合而爲一個聯盟國家的基本路線。在革命的初期，那時各民族的勞動羣衆初次感覺自己成了一種獨立的民族，同時外國干涉的威脅還沒有呈現爲一種實在的危險，因之各民族的合作還沒有完全肯定的、嚴格確定的方式。在內戰和國外干涉時期，那時各民族共和國軍事自衛的利益佔着首要的地位，同時經濟合作的問題還不甚迫切，因之合作採取了軍事聯盟的方式。最後在戰後時期，那時恢復被戰爭所破壞不堪的生產力的問題，佔了首位，於是軍事聯盟乃補充以經濟聯盟。各民族共和國的聯合而爲蘇維埃共和國聯盟（蘇聯），乃是合作方式發展的末了一個階段，這一階段在這次採取

了各民族在軍事、經濟、政治上聯合而爲一個統一的多民族的蘇維埃國家的性質。

這樣，無產階級便在蘇維埃制度中找到了正確地解決民族問題的鑰匙，它在蘇維埃制度中發見了依據民族平等和自願的原則而組織堅固的多民族國家的道路。

(七)不過找到正確地解決民族問題的鑰匙，還不是說已經完全而澈底地解決了它，還不是說這一解決的具體而實踐的實現，已經完善無遺。爲了把十月革命所提出的民族綱領正確實施到生活中去，還需要克服那過去民族壓迫時期所遺留給我們的障礙，這些障礙是不能一下子在最短期間就能克服的。

第一，這種遺產便是大國的排外愛國主義的殘餘，這種排外愛國主義乃是從前大俄羅斯人的特權地位的反映。這種殘餘，還在我們中央與地方蘇維埃工作人員的頭腦中活着，它們聚居在我們中央與地方的國家機關裏面；它們以「新的」目標更換派（四）的大俄羅斯愛國主義的觀念（這種觀念，因實行新經濟政策的關係，而日益加強）的方式而取得援助。在實踐上，它們表現爲俄羅斯蘇維埃官吏對各民族共和國困苦與要

求的輕視與官僚的冷淡態度。多民族的蘇維埃國家，要能真正牢固，其中各民族的合作，要能真正親睦，只有在這些殘餘於我們國家機關的實踐中堅決而澈底地剷除時才行。所以，反對大俄羅斯排外愛國主義殘餘的鬥爭，乃是本黨的頭一個迫切的任務。

第二，這種遺產便是共和國聯盟（蘇聯）各民族事實上的即經濟與文化上的不平等。十月革命所獲得的法律上的民族平等，乃是各民族的偉大獲得，但是它本身並未解決整個民族問題。好多共和國和人民，還沒有經過或者差不多還沒有經過資本主義，還沒有或者差不多還沒有自己的無產階級，因此之故，在經濟上和文化上都落在後邊。所以這些共和國和人民，都不能完完全全地享用民族平權所給予的權利和可能，要是沒有外來的有效而長期的幫助，牠們都不能高升至最高的發展階段，因而，都不能趕上走在前面的各民族。這種事實上的不平等的原因，不僅藏在這些民族的歷史裏面，而且藏在沙皇制度和俄羅斯資產階級的政策裏面，因為沙皇制度和俄羅斯資產階級力謀把邊疆變為純產原料的區域，而受工業發展的中央區域所剝削。要在最短期間克

服這一不平等，要在一兩年內消滅這一遺產，那是不可能的。我黨第十次大會，就指出謂「事實上的民族不平等的消滅，乃是一個長期的過程，這一過程需要與民族壓迫和殖民地奴隸制的一切殘餘，作頑強而堅決的鬥爭」。但是它必須要克服的。要克服它，只有俄羅斯無產階級對聯盟的各落後民族在其經濟與文化的繁榮上須有有效而長期的幫助才行。不然的話，要希望樹立一個統一的聯盟國家範圍內各人民的正確而固牢的合作，那是沒有理由的。所以，爭取各民族事實上不平等的消滅，爭取各落後人民文化和經濟水平的提高，乃是我黨的第二个迫切的任務。

第三，這種遺產就是好多民族中間民族主義的殘餘，這些民族曾經過民族壓迫的苦重羈絆，還沒有解除舊的民族恥辱的感覺。這種殘餘的實踐的表現則爲若干的民族的分離主義與從前被壓迫的各民族缺乏對於俄羅斯人所採取的各種辦法的信心。但是在有幾個民族的一些共和國內，這種防禦的民族主義，往往變成了攻勢的民族主義，變成了比較強盛的民族用以反對這些共和國內弱小民族的難以矯正的排外愛國主義。

喬治亞人反對亞美尼亞人、奧雪廷人、亞察爾人及阿布哈柴人的排外愛國主義（在喬治亞）；阿才培疆人反對亞美尼亞人的排外愛國主義（在阿才培疆）；烏芒別克人反對土克門人及克爾吉斯人的排外愛國主義（在布哈拉和霍列姆）——所有這幾種排外愛國主義，受新經濟政策和競爭的條件所激勵，更加厲害，牠們都是最大的害處，這種害處有批若干民族共和國變為磨擦與吵嘴舞台之虞。不用說，所有這些現象都阻礙了各民族真正聯合而為一個統一的國家聯盟的事業。民族主義的殘餘，既是防禦大俄羅斯排外愛國主義的特殊方式，那末對大俄羅斯排外愛國主義的堅決鬥爭，乃是克服民族主義殘餘的最好手段。這些殘餘既變為反對各個共和國內弱小民族集團的地方排外愛國主義，那末反對它的正面鬥爭乃是每個黨員的義務。所以，反對民族主義殘餘尤其反對這些殘餘的排外愛國主義方式的鬥爭，乃是我黨的第三個迫切任務。

（八）中央和地方的許多蘇維埃官吏，把蘇聯並不是視為保證各民族共和國自由發展的數個同等的國家單位的聯盟，而視為取消這些共和國的一個步驟，視為成立所

謂『一個不可分割體』的開端，這一事實必須認爲是舊遺產的鮮明表現之一。大會指斥這種理解，認爲是反無產階級的和反動的，號召黨員們要銳敏地加以注視，爲的使各共和國的聯合與各人民委員部的合併，不要被有排外愛國主義情緒的蘇維埃官吏用作他們想輕視各民族共和國經濟文化需要的企圖的掩護物。各種人民委員部的合併是對蘇維埃機關的一個考試；假使這一試驗在實踐中獲得了大國主義的趨向，那末本黨就不得不採取最堅決的方法，以反對這種曲解，迄至提出重新審查若干人民委員部合併的問題，以後並將蘇維埃機關，根據真正無產階級和真正親睦注意弱小民族及落後民族需要的精神，加以重新訓練。

(九)各共和國聯盟(蘇聯)既是一個新的各民族共居的方式，既是各民族在一個聯盟國家內合作的方式，而在這個國家內，上邊所說的那些殘餘，在各民族共同工作過程中應加以消滅，那末聯盟最高機關的構造應是這樣的，就是他們不僅要完完全全地反映聯盟內一切民族的共同需要與要求，而且要完完全全反映各個民族的特殊需

要與要求。因此，除聯盟的現有的中央機關（這些機關是整個聯盟勞動羣衆的代議機關，與民族無關）外，還應當設立一個以平等爲原則的特殊的各民族代表機關。這個聯盟中央機關的組織，要有充分的可能，去銳敏地注意各民族的需要與要求，隨時對牠們予以必要的幫助，造成一個完全相互信任的環境，以使用最妥善的方法去消滅上述所述的那些遺產。

（十）大會根據上述各點向各黨員提出下列實踐的方法：

1. 在聯盟（蘇聯）最高機關體系內，設立一個由一切民族共和國和民族自治區基於平等原則而組成的特殊的代表機關；
2. 聯盟的各人民委員部，應是根據保證滿足聯盟各民族需要與要求的原則來建立的。
3. 各民族共和國和各民族區的機關，主要應是由熟悉該民族語言、生活、道德、習慣的當地人來組成的。

(一)在好多民族共和國內，我黨組織的發展，是在並非完全利於牠們生長和鞏固的條件下進行的。這些共和國的經濟上的落後性，民族無產階級的爲數微少，當地人中間老的黨的工作人員幹部的不夠或甚至缺乏，用本族語言刊行的鄭重的馬克思主義讀物的缺乏，黨的教育工作的薄弱，與夫急進民族主義傳統（還來不及消滅）的殘餘的存在，都在當地共產黨員中間產生了偏於過度重視民族特點、輕視無產階級的階級利益方面的一定傾向，偏於民族主義的傾向。這種現象，在有幾個民族的共和國內，成了特別危險的現象，在這些共和國內，這種現象往往採取了趨向於強大民族的共產黨員的排外愛國主義之傾向方式，這一傾向的鋒芒是朝向反對弱小民族（喬治亞、阿才倍疆、布哈拉、霍列姆）的共產黨員。民族主義的傾向，阻止着民族無產階級從民族資產階級的思想影響之下解放出來的過程，使團結各民族無產者而爲一個統一的

國際主義組織的工作，極感困難，這是民族主義傾向的害處。

(二) 別一方面，在黨的中央機關中以及在各民族共和国的共產黨的組織中，俄羅斯出身的老的黨的工作人員幹部，爲數極多，他們不熟悉這些共和國勞動羣衆的道德、習慣、及語言，因而並非常常會看到他們的需要，這種現象，在我黨裏邊，產生了一種在黨的工作中輕視民族特點和民族語言的傾向，極度鄙視這種特點的態度，趨向於大俄羅斯排外愛國主義的傾向。這一傾向也是有害的，這不僅因爲它阻止了從知道民族語言的當地人中間訓練共產主義幹部的工作，造成了使黨與各民族共和国無產階級羣衆脫離的危險，而且首先是因爲它滋生和培養着上邊所說的民族主義的傾向，使反對它的鬥爭，感受困難。

(三) 大會指斥這兩種傾向，認爲它們是對共產主義的事業有害的和危險的，請求每個黨員注意大俄羅斯排外愛國主義傾向的特別的害處與特別的危險；同時，大會號召全黨要從速消滅我黨的建設中的這些舊的殘餘。

大會委託中央委員會進行下列各項，作為實踐的方法：

1. 成立高級的馬克思主義研究班，以訓練各民族共和國當地的黨的工作人員；
2. 發展用本族語言刊行的原則的馬克思主義讀物；
3. 擴充東方人民大學及其在各地的分校；
4. 在各民族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之下設立由當地工作人員組成的指導員組；
5. 發展用本族語言刊行的黨的羣衆讀物；
6. 加強各共和國內黨的教育工作；
7. 加強各共和國青年中的工作。

一九二三年三月二十四日真理報第六十五期

黨的建設和國家建設中的民族因素

一九二三年四月二十三日在俄國共產黨(布)第十二屆大會上的報告——

同志們！自十月革命以來，我們算是第三次討論殖民地問題了：第一次是在第八次大會上；第二次是在第十次大會上；第三次便是在這次第十二次大會上。這是不是我們對於民族問題的觀點在原則上有所改變的徵候呢？不是的，對於民族問題的原則觀點，仍與十月革命以前及其以後的一樣。不過自第十次大會以來，就今日東方各國——嚴重的革命後備軍的比重之加強一點說來，國際局勢是變更了。這是第一。第二，自第十次大會以來，因實施新經濟政策的關係，本黨在國內形勢上也有若干的變更。所有這些新的因素，都須考慮到，而作一總結。在這一意義上，民族問題在第十二次大會上可說是個新的提法。

先來談民族問題的國際意義。同志們，大家都知道我們所代表的是什麼，我們是

個蘇維埃聯邦，今承歷史命運的意志，使我們做了世界革命的先鋒隊伍。大家都知道，我們首先突破了整個資本主義的陣線，命運的意志，使我們走在一切人的前面。大家知道，我們在自己的前進運動中，曾到華沙，後來又退却，固守那我們認為最牢固的陣地。從這個時候起，我們改行新經濟政策；從這個時候起，我們考慮到了國際革命運動速度的緩慢；從這個時候起，我們的政策已不是進攻的，而是防禦的了。我們在華沙一役遭受失敗（不必隱蔽真理）後，我們再不能向前進了，因為我們有跟後方脫離的危險，而我們的這種後方則是農民的，最後我們有跑的太遠，把西方與東方的革命後備軍丟掉的危險。所以，我們對內轉向新經濟政策方面，對外轉向緩步前進方面，決意休息一下，來醫治自己的創傷——先進隊伍，無產階級的創傷，調整與農民後方的關係，在落在我們後邊的後備軍，在西方後備軍與構成世界資本主義主要後方的痛苦的東方後備軍當中進行進一步的工作。所以，在討論民族問題時所說的，就是關於這些後備軍——痛苦的、同時構成世界帝國主義後方的東方後備軍。

兩者必居其一：或是我們鼓勵帝國主義的深遠後方——東方殖民地與半殖民地國家，使牠們革命化，這樣一來，加速帝國主義的沒落；或是我們在這裏錯過機會，這不啻鞏固了帝國主義，削弱了我們運動的力量。問題就是這樣。

問題就在於，整個東方把我們各共和國聯盟（蘇聯）看做經驗的場所。或是我們在這個聯盟範圍以內，於它的實踐應用上正確地解決了民族問題，或是我們在這裏，在這個聯盟的範圍以內，確立各民族相互間的真正親睦的關係，有效的合作，——這時整個東方便看到，他們以我們聯邦作榜樣，有了解放的旗幟，有了先進的隊伍，他們可以步其後塵前進，這便是世界帝國主義破產的開端。或是我們在這裏，在自己的聯邦內，犯了錯誤，摧毀了早先被壓迫的各人民對於俄羅斯無產階級的信心，使東方人眼中失掉對蘇聯所有的吸引力，那時，帝國主義要操勝算，我們就要失敗了。

民族問題的國際意義，就在這裏。

民族問題，從內部形勢說來，對我們所以有意義，不僅因為在數量上從前的強盛

民族約有七千五百萬，而其餘民族約有六千五百萬（這爲數仍不爲少），不僅因爲早先被壓迫的各民族佔據着經濟發展所最需要的區域和從軍事戰略觀點說來最重要的據點，不僅因爲如此，而且首先因爲在這兩年來我們實行所謂新經濟政策，因此之故，俄羅斯的民族主義便日益增長，加強起來，產生了路標更換派的觀念，力謀用和平方法建立那鄒尼金未曾建立成功的東西，換一句話說，力謀建立所謂「統一而不可分割」的民族。

這樣，因實行新經濟政策的關係，在我們的內部生活上，便產生了一種新的力量——大俄羅斯排外愛國主義，這種排外愛國主義巢居於我們的機關中；不僅侵入蘇維埃機關，而且侵入黨的機關，它在我們聯邦的各角落發酵着，其結果是，要是我們對於這個新的力量不加以堅決的抵抗，要是我們不連根剷除它，那末我們就要冒從前強盛民族的無產階級與早先被壓迫民族的農民分裂的危險，這等於摧毀無產階級專政。

不過新經濟政策不僅生長了俄羅斯排外愛國主義，而且生長了地方排外愛國主義

，尤其在那有幾個民族的共和國裏邊。我是指喬治亞、阿才倍疆、布哈拉而言，土耳其斯坦部分地亦可說如此，在那裏有幾個民族，其先進份子之間，也許要很快地開始互爭雄長。這種地方的排外愛國主義，自然，就其力量說，沒有像大俄羅斯排外愛國主義那樣危險。不過它們仍是一種危險，有使我們把若干共和國變爲民族吵嘴舞台，摧毀那裏的國際主義聯繫之虞。

說到民族問題一般，尤其在目前有重大的頭等意義的國際與國內性質的理由，便是如此。

民族問題的階級本質是在什麼地方呢？何謂民族問題呢？民族問題的階級本質，就在於相互關係——我是就我們蘇維埃的環境而言——的確定，就在於前強盛民族的無產階級與前被壓迫民族的農民之間正確的相互關係的確定。搗手的問題，這裏本來已經討論的很充分了，不過在根據卡明涅夫、卡里齊、索柯爾尼柯夫，甚至根據雷柯夫及托洛茨基等同志的報告來討論搗手問題的時候，主要是就俄羅斯無產階級對俄羅

斯農民的關係而言。在這裏，在民族區域內，有着更複雜的機構。在這裏，我們要應付的，是關於在前強盛民族的無產階級（爲我們聯邦無產階級最有教養的階層）與農民——主要是前被壓迫民族的農民之間建立正確相互關係的問題。民族問題的階級本質，就在這兒。要是無產階級能與異族的農民建立足以摧毀對全部俄羅斯人不信任（這種不信任是數十年來沙皇主義的政策所培養成的）的一切殘餘的關係，不僅此也，要是俄國無產階級不僅在俄羅斯無產階級與農民之間，而且在俄羅斯無產階級與其他民族的農民之間，做到完全的相互諒解與信任，建立有效的聯合，那末任務便是已經解決了。爲了這一點，需要使無產階級的政權，爲異族的農民所親近，好像爲俄羅斯人那樣的所親近。爲了使蘇維埃政權爲異族農民所親近，需要使它爲異族農民所了解，需要使它用本族語言執行職務，需要使學校和政權機關用熟悉語言、道德、習慣及生活的當地人所組成。只有在這個時候，只有在這些共和國內的機關和政權機關用本族語言作事的時候，蘇維埃政權（直至最近它是俄羅斯的政權）才會成爲不但是俄

羅斯的政權，而且成爲各民族的政權，爲早先被壓迫民族的農民所最近的政權。這是一般民族問題，尤其蘇維埃環境下的民族問題的基礎之一。

在目前，在一九二三年，民族問題解決的特徵是在什麼地方呢？在一九二三年民族方面需要加以解決的問題採取了什麼方式呢？採取了建立我們聯邦各民族在經濟方面、在軍事方面、及在政治方面合作的方式。我就是就各民族間的關係而言。民族問題是以確立前強盛民族無產階級與異族農民間的正確關係的任務爲基礎，它在目前採取了一種建立從前分設現在聯合而成爲一個統一國家的各民族合作與親睦共居的特殊方式。民族問題在一九二三年所採取的方式，便是如此。這種國家聯合的具體方式，則爲共和國聯盟（蘇聯），關於該聯盟，我們在去年底蘇維埃代表大會上就已經說過了，這個聯盟是在那時成立的。

這個聯盟的基礎是盟員的自願與法律上的平等。所以是自願和平等者，因爲我們民族綱領的出發點，則是各民族有獨立國家存在權一點，即從前我們叫做民族自決權

的一點。以此爲出發，我們應當肯定地說，民族的任何聯盟，民族的任何聯合而爲一個統一國家，要是不以充分的自願精神爲基礎，要是該民族自身不願聯合起來，那末這種聯盟，這種聯合是不會牢固的。第二個基礎是加入蘇聯的各民族的法律上的平等。這是很明白的。關於事實上的平等，我現在不說，這一點我以後再說，因爲建立先進民族與落後民族間的事實上的平等，那是很複雜很艱苦的一回事，需要歷時好多年。我在這裏所說的是法律上的平等。這一平等表現在加入聯盟的四個共和國——外高加索、白俄羅斯、烏克蘭、及俄羅斯，同等享用聯盟的幸福；同時，爲了聯盟的利益，也同等放棄自己的若干獨立的權利。例如俄羅斯、烏克蘭、白俄羅斯、外高加索諸共和國，就都沒有設立外交人民委員部，顯然的，廢除各共和國的外交人民委員部，而在聯盟內設立一個共同的外交人民委員部，定要使這些共和國的獨立受到若干的限制，不過各共和國的獨立所受的限制都是同等的。又如從前各共和國都沒有自己的對外貿易人民委員部，而現在爲了在聯盟之下設立一個共同的對外貿易人民委員部，不

論在俄羅斯或在其他共和國，這種對外貿易人民委員會都廢止了，顯然的，這樣一來，那從前完全享有而現在爲了共同聯盟的利益而縮小的獨立，已經受到了若干的限制。依此類推。有些人提出了純粹煩瑣哲學式的問題：聯合以後各共和國是否還是獨立的？這是個煩瑣哲學式的問題。各共和國的獨立是受限制了，因爲任何的聯合，乃是聯合者已有權利的某種限制。不過這裏毫無條件的，每個共和國都保留有獨立的成份，因爲每個共和國都有單方面退出聯盟之權，所以，獨立的成份，加入聯盟對每個共和國的最高限度的獨立仍是存在的，它是永遠可以實現的。

總之，在現時，在我們的環境之下，民族問題的具體方式，可歸納爲確立各民族經濟、外交、及軍事合作的問題。我們在這些方面，應當把這些共和國聯合起來而成爲一個統一的聯盟，這個聯盟就叫做蘇聯。現時民族問題的具體方式，便歸納爲這一點。

不過說話容易，做起來却很困難。

原因是在我們的環境之下，我們不僅有好多促進各民族聯合而爲一個國家的因素，而且有好多阻止這種聯合的因素。

促進的因素，據我們所知道的如下：第一是在蘇維埃政權以前即已建立而爲蘇維埃政權所鞏固的各民族的經濟上的接近，各民族間的若干分工，這一分工乃是促進各共和國聯合而爲聯盟的基本因素。第二個促進聯合的因素，要算蘇維埃政權的性質。這是很明白的。蘇維埃政權，乃是工人的政權，乃是無產階級專政，這一專政，就其性質說，是傾向於使加入聯盟的各共和國和各民族的勞動份子相互親密的調和起來。這是很明白的。第三個促進聯合的因素，乃是蘇聯活動的環境，是處在帝國主義的四面包圍之中。

不過也有阻礙這種團結，阻止這種聯合的因素。阻止各共和國聯合而爲一個統一聯盟的基本力量，我剛說過，便是新經濟政策條件下面所生長起來的力量，這就是大俄羅斯排外愛國主義。同志們，路標更換派在蘇維埃官吏中間獲得了大批同道者，那

絕不是一種偶然。這絕不是一種偶然。路標更換派的先生們，稱頌布爾塞維克共產黨員，似乎說：你們暢談布爾塞維克主義吧，你們關談你們的國際主義的趨勢吧，不過我們曉得，那鄧尼金未處理成功的東西，你們正在處理着，你們布爾塞維克已經恢復了大俄羅斯的偉大觀念，或不論如何，你們正在恢復着它。這一切並不是一種偶然。甚至有些我們的黨部也浸入了這一觀念。這也不是一種偶然。我親自看到，在二月的全體會議上，那裏初次提出關於第二院的問題，中央委員中就有人發表與共產主義不相適合的演說，與國際主義沒有絲毫共同點的演說。所有這些都是一種時代的徵兆，都是一種流行病。由此而發生了一種基本的危險，原因是我們因實行新經濟政策的關係，大國的排外愛國主義，極冷酷的民族主義，不但天天、而且時時在生長着，這種民族主義竭力排斥非俄羅斯人，使一切行政的線索以俄羅斯人爲原則，而力謀壓榨非俄羅斯人。基本的危險，就在於在這一政策之下，我們有失掉前被壓迫民族方面對俄羅斯無產者信任的危險，這種信任是在十月革命時期獲得的，在十月革命時期，俄羅

斯無產者推翻了地主、俄國資本家，當時俄羅斯無產者，粉碎了民族的壓迫，撤退波斯及蒙古的駐軍，而宣佈了芬蘭、亞美尼亞的獨立，並且一般說來，把民族問題置在完全嶄新的基礎上面。要是我們不武裝起來反對這種新的大俄羅斯排外愛國主義，那末我們在十月革命時所獲得的信任，就可以喪失的一乾二淨，因為大俄羅斯排外愛國主義，會無蹤無影地一點一滴地浸入我們工作人員的耳目，會一點一滴地改變我們工作人員的精神，全部靈魂，有使他們一無所知的危險。同志們，我們不論如何應當與這一危險作鬥爭，否則，前被壓迫人民工農的信任便有失掉之虞，這些人民與俄羅斯無產階級間的聯繫便有破裂之虞，因而我們專政體系中便有裂成一個空際的危險。同志們，不要忘記，我們所以高舉大旗，反對克倫斯基而推翻臨時政府者，又是因為我們背後有着那期待俄羅斯無產者來解放的被壓迫民族的信任。不要忘記被壓迫人民這種後備軍，他們雖然在沉默着，但是他們却拿自己的沉默壓迫着好多，决定着好多。人們往往感覺不到這一點，可是這些人民，他們是在生活着，他們是在生存着，萬不

可忘記他們的。同志們，忘記他們是很危險的。不要忘記，要是我們在柯恰克、鄧尼金、烏蘭格、及尤金尼赤的後方沒有所謂『異族』，沒有從前被壓迫的人民（因他們對俄羅斯無產者暗表同情，以致這些叛軍首領的後方，爲之摧毀，同志們，暗表同情，這是我們發展中的一個特殊的要素，任何人都沒有看見它，也沒有聽見它，但是它却決定着一切），要是我們沒有這種同情，那我們也許連這些叛將中的一個都推不倒。當我們走向他們的時候，他們的後方便開始瓦解了。爲什麼呢？因爲這些叛將們是依賴哥薩克人中的移民份子，他們在被壓迫人民面前畫了一幅進一步壓迫他們的景色，而被壓迫的人民不得不投入我們的懷抱，因爲我們展開了解放這些被壓迫人民的旗幟，這就是曾經決定這些叛將命運的東西，這就是曾經爲我軍勝利所掩蔽但終於決定一切的一些因素。這是萬不可忘記的。所以，就反對新的排外愛國主義的情緒說來，我們務須加以急劇的轉變，把那些忘記我們在十月革命中獲得即忘記前被壓迫民族信任（我們應當敬重這一點）的我們機關中的官吏和黨的同志，視爲奇恥大辱，而宣佈

其劣跡。

阻止各民族和共和國聯合而爲一個統一聯盟的頭一個最危險的因素，就是如此。要知道，要是大俄羅斯排外愛國主義這種力量，開起燦爛的花來，盛極一時，那以前被壓迫民族方面的信任是不會有的，我們在一個統一的聯盟內不會建設起任何的合作，而我們的任何共和國聯盟也是不會有的。

同志們，第二個阻止以前被壓迫民族團結在俄羅斯無產階級周圍的因素，便是我們從制度沙皇時期承繼下來的事實上的不平等。

我們雖已宣佈了法律上的平等，並且正在實施着，但法律上的平等，本身雖在蘇維埃共和國發展史上有極大的意義，但從它到事實上的平等，仍相距很遠。形式上我們聯邦內一切其他身進的民族所有的一切權利，一切落後的民族與部落都應有盡有。缺點是在於有些民族沒有自己的無產者，沒有經過甚至還沒有開始資本主義的發展，在文化上可怕地落後，完全沒有力量去享受那革命給予他們的權利。同志們，這是比

學校問題還重要的一個問題。這裏我們的同志當中，有些以爲把學校和語言的問題，放在前邊，就可以解決糾紛。同志們，這是不對的，這裏的問題並不在於學校，學校本身是在發展着，語言也是在發展着，可是不平等在事實上仍是有的，這是一切不滿意和一切摩擦的基礎。這裏你不要假託於學校和語言，這裏需要我們方面對文化經濟上落後的各民族的勞動大眾給以有效的、有系統的、誠摯的、真正無產階級的幫助。除學校與語言外，俄羅斯無產階級須要採取一切方法，使邊疆各地，使文化上落後（牠們落後，並不是他們自己的罪過，而且因爲從前把他們視爲原料來源地的原故）的各共和國內能建立起工業中心。在這一方面，已經有了若干的嘗試。喬治亞已從莫斯科得了一所工廠，該廠很快就會開工的。布哈拉也得了一所工廠，尙可得到四所工廠。土耳其斯坦也得了一所大工廠，因此可說，這些在經濟上落後而沒有無產階級的共和國，應在俄羅斯無產階級幫助之下去建立自己的工業中心——譯即使是很小的中心也吧——爲的在這些小小的中心能有一羣當地無產者，可作爲從俄羅斯無產者和農民

達到這些共和國勞動羣衆的傳遞橋樑。我們在這一方面，應當認真工作，不要假託於學校與語言。

不過還有第三個阻止各共和國聯合而爲一個聯盟的因素，那就是各共和國的民族主義。新經濟政策，不僅影響於俄羅斯的居民，而且影響於非俄羅斯的居民。新經濟政策，不僅發展了俄羅斯中央的私營工商業，而且發展了各共和國的私營工商業。所以，這個新經濟政策本身和與它有聯繫的私人資本，便在滋生着喬治亞的、阿才培疆的及烏茲別克的民族主義。自然，大俄羅斯的排外愛國主義乃是攻勢的，因爲它強大的，因爲它在以前就是強大的，它壓迫人和輕視人的習慣還是存在的，要是沒有大俄羅斯排外愛國主義的話，那末當地的排外愛國主義——對大俄羅斯排外愛國主義的答覆——也許僅有少許而已，因爲歸根結底，反俄羅斯的民族主義只是一種防禦的方式，反對俄羅斯民族主義，反對俄羅斯排外愛國主義的一種若干畸形的自衛方式。要是這種民族主義只是防禦的，那末也就用不着爲它來喧吵了。最好集中自己行動的全部力量

和自己鬥爭的全部力量來反對大俄羅斯排外愛國主義，希望把這個強敵很快地推翻，只要這個強敵一推翻，那末反俄羅斯的民族主義也就推翻了，因為這種民族主義，再重複說一句，歸根結柢，乃是對大俄羅斯民族主義的反響，乃是對它的答覆，乃是一種自衛。是的，要是地方上的反俄羅斯的民族主義不出於對俄羅斯民族主義的反響，那確是如此。可是不幸是在於：在有些共和國內，這種防禦的民族主義竟變為進攻的了。

以喬治亞為例吧，這裏非喬治亞的人口有百分之三十以上。其中有亞美尼亞人，有阿布哈查人，有亞察爾人，有奧雪廷人，有韃靼人。不過爲首的則爲喬治亞人吧了。在一部分喬治亞的共產黨員中間，產生了一種觀念——不大注意這些小民族，以爲他們是沒有文化的，不發展的，因之可以不要理睬他們，這種觀念還在發展着，這是一種排外愛國主義，有害而危險的排外愛國主義，因爲它可以把小小的喬治亞共和國弄成一個吵嘴的舞台，而且已經把它變爲這種吵嘴的舞台了。

又以阿才培疆爲例。基本的民族是阿才培疆人，可是這裏也有亞美尼亞人。在一部分阿才培疆人中間，也有這種趨勢，有時這種趨勢是很公開的，他們以爲：我們是阿才培疆人，基本的當地人，而亞美尼亞人，他們是外來的，因此之故，難道不可以把他們略微放後一點，不要顧計他們的利益嗎？這也是一種排外愛國主義，這摧毀了蘇維埃政權於以建立的民族平等。

再拿布哈拉爲例。在這裏，在布哈拉，有三個民族：一是烏茲別克人，基本的民族；二是土克門人，從布哈拉排外愛國主義的觀點看來是『不大重要』的民族；三是克爾吉斯人爲數很少，更『不大重要』了。

在霍列姆，也有相同的情形：有土克門人和烏茲別克人。烏茲別克人是基本的民族，而土克門人『則是不大重要』的。

所有這些發展的結果，便是衝突，便使蘇維埃政權爲之削弱。這種地方排外愛國主義的趨勢，也應當根本加以剷除。自然，大俄羅斯排外愛國主義，在民族問題的總

體系中要佔四分之一，與它比較起來，地方的排外愛國主義，不十分重要，可是對於當地工作，對於當地人，對於各民族共和國自身的和平發展，這種排外愛國主義却有重大的意義。

這種排外愛國主義有時開始發生極有興味的演變。我是指外高加索而言。大家知道，外高加索是由三個共和國構成的，這三個共和國共有十幾種民族。外高加索，最初就是一個殺戮和爭吵的舞台，後來在孟塞維克主義和民族主義者之下，又成了一個戰爭的舞台。大家知道喬治亞與亞美尼亞的戰爭。一九〇四年和一九〇五年末的殺戮，大家也是曉得的。我可以舉出好多地方來，在這些地方佔着多數的亞美尼亞人，把其餘的一部分居民——韃靼人，殺得一精二光，例如查格蘇區。在有些整個區域內，佔多數的是亞美尼亞人，他們把一切韃靼人都殺掉了。我還可以舉出別的一個省份——拉赫溫來。在這裏，韃靼人佔着優勢，他們殺盡了一切亞美尼亞人。這正是亞美尼亞和喬治亞脫離帝國主義羈絆以前的事情。（台下呼聲：『這是他們解決民族問題

的方法』。自然，這也是解決民族問題的某種方式。不過這並不是蘇維埃的解決方式。在這種民族相互仇視的環境之下，自然，與俄羅斯人沒有關係，因為相互鬥爭的是韃靼人和亞美尼亞人，並無俄羅斯人。所以，在外高加索，需要有一個特殊的機關，來調整各民族間的相互關係。可以大胆地說，前大俄羅斯無產階級與一切共和民族勞動者間的相互關係問題，要佔整個民族問題的四分之三。從前被壓迫民族相互間的相互關係問題，僅佔民族問題的四分之一吧了。

在這種相互不信任的環境之下，要是蘇維埃政權在外高加索不會設立可以調整摩擦和糾紛的民族和平機關，那我們也許要回到人們相互殘殺的沙皇主義時代或達什拉克（四五），穆沙華特（四六）派，少數派的時代去。所以，中央一再認爲外高加索聯邦有保存的必要，把它視爲民族和平的機關。

這裏過去乃至現在還有一羣喬治亞共產黨員，他們不反對喬治亞與蘇聯聯合起來，但是他們却反對這一聯合要經過外高加索聯邦。瞧吧，他們希望要與聯盟更接近些，

似乎不需要外高加索聯邦，這毫無，把我們喬治亞跟各共和國聯盟分開，似乎不需要聯邦。這彷彿是十分革命似的。不過這裏也有別一種意思。第一，這種言論是說，在民族問題方面，在喬治亞對俄羅斯人的關係僅有次要的意義，因為這些有傾向（一般這樣稱呼他們）的同志並不反對喬治亞直接與蘇聯聯合起來，換一句話說，他們並不害怕大俄羅斯排外愛國主義，認為它橫豎已經被斫倒，而沒有主要的意義了。顯然的，他們所怕的，甯是外高加索聯邦，爲什麼？外高加索的三個民族，相互毆打，相互爭執，相互殘殺了很久，自蘇維埃政權在他們之間建立了聯邦這個親睦聯合的連結，才產生了真正相互親愛的果實，爲什末現在他們要斬斷這個聯邦的連結呢？原因是在什末地方呢，同志們？同志們，原因是在於喬治亞因牠的地理形勢優良，也許可以居在特權的地位，外高加索聯邦的連結，使喬治亞喪失了這種特權地位。請你們自己判斷吧。喬治亞有自己的商港——巴杜姆，西方來的商品都是雲集在這裏；喬治亞又有吉佛里斯這樣的鐵道中心，從巴杜姆獲得自己的商品的亞美尼亞人、阿才培疆人、都

是不能逃過它的。假使喬治亞是個單獨的共和國，假使它不加入外高加索聯邦，那末它也許可以向非經吉佛里斯不可的亞美尼亞和非經吉佛里斯不可的阿才培羅提出某種小小的良的美教書。這也許有若干的便宜。同志們，正是在喬治亞，正在製定這種荒唐的關於警戒線的命令，這並不是一種偶然。現在此事歸罪於謝烈布拉柯夫（四七）就假定是這樣吧。不過謝氏是生長於喬治亞，而不是阿才培羅，也不是亞美尼亞。願備這種命令，想拿牠來調整人口中各民族集團間的關係，以便爲了喬治亞的利益而扣留某種東西，並使喬治亞得以享用有利的地理形勢，這種有利的地理形勢，牠是無條件地有的，而且牠以有傾向者正面表示不願失掉的，這絕不是一種偶然。其次，這裏還有一種原因。吉佛里斯是喬治亞的首都，不過其中居民，喬治亞人不到百分之二五，亞美尼亞人不下百分之三五，餘爲其他民族。喬治亞的首都，就是這樣。假使喬治亞自己是個單獨的共和國，那末這裏也許要使居民遷徙若干，比如亞美尼亞人遷出吉佛里斯。曾有這樣一種命令，據馬哈拉才同志說，這命令是爲了對付亞美尼亞人的

也許還可以採取某種遷徙的方法，使吉佛里斯的亞美尼亞人，逐年比喬治亞人減少，以便把吉佛里斯變爲真正的喬治亞的首都。就假定他們取消了遷徙的命令，但是他們手中仍有許多機會，許多靈活的方式，如『減輕』方法，在這種方法幫助之下，也許可以表面上仍遵守國際主義，而事實上設法使吉佛里斯的亞美尼亞人減少。所以，有傾向者不願失掉的這些地理上的利益和喬治亞人在吉佛里斯的不利地位（即喬治亞人比亞美尼亞人爲少），迫使我們的有傾向者不得不反對聯邦。孟塞維克會簡簡單單地逐出吉佛里斯的亞美尼亞人和韃靼人。現在在蘇維埃政權之下，是不能驅逐的，所以要从聯邦中驅逐出去，爲的造成一種法律上的可能，好獨立地採取一些動作，以便完全利用喬治亞人的有利地位，去反對阿才培疆和亞美尼亞。這樣的結果，在外高加索的內部，便可造成喬治亞人的特權地位。全部危險就在這裏。我們可否抹殺外高加索民族和平的利益，而造成一種條件，在此種條件之下，喬治亞人對亞美尼亞和阿才培疆兩共和國則處於特權的地位？不，我們是不能夠允許這樣做的。

有一種舊的專門的管理體系，即資產階級政權拉攏若干民族給他們以特權，而輕視其餘民族，不願與他們來往。這樣，牠拉攏一種民族，便可經過它來壓迫其餘的；比方在奧地利，便是如此。大家還都記得奧國一位總長貝斯特的聲明，他鼓勵匈牙利的一位總長，說道：『你管理你的游牧部落，我對付我的游牧部落。』就是說你壓迫你匈牙利的各民族，我壓迫我奧國的各民族吧。你與我，乃是特權民族，應壓迫其餘民族。對奧國內部的波蘭人，也是如此。奧人拉攏波蘭人，給他們以特權，以便波蘭人幫助奧人去鞏固他們在波蘭的陣地，爲了這會給了波蘭人以壓迫加里西亞的可能。這是個獨特的純粹奧地利式的體系——分出若干民族，給他們以特權，以便對付其餘的民族。從官僚制度的眼光看來，這是一個很經濟的管理方式，因爲這只要爲一個民族費心就夠了，但從政治的觀點看來，這是一條可靠的死路，因爲這破壞了民族平等的原則，而給予一個民族以某種特權，——這就是說使自己的民族政策定歸死亡。

現在英國正是這樣管理印度的。從官僚制度的觀點上說來，爲了易於對付印度的

各民族和部落，英國把印度劃分爲英屬印度（約有兩萬萬四千萬人口）和土著印度（七千二百萬人口）。什末理由呢？理由是英國希望分出一個民族集團，給它以特權，爲的便於統治其餘的民族。在印度，不下八百多民族，於是英國便決定：與其我分別駕御八百多種民族，不如分出若干民族，給他們以若干特權，可經過他們來管理別的，因爲第一，在這種情形之下，會導引其餘民族的不滿去反對這些特權民族，而不要反對英國；第二，爲兩三個民族『勞心』，比較爲八百多民族『勞心』來得上算。

這也是一種管理體系，卽英國式的管理體系。這一體系的結果如何呢？它使機關低廉。這是對的。但是，同志們，要是丟開官僚的便利，那末這也是英國對印統治的死路，在這種體系中，正如二乘二等於四一樣，必然要使英國管理和英國統治的全部體系爲之死亡。

喬治亞的有傾向的同志們，正推動我們走上了這條危險的道路，因爲反對聯邦，違犯了黨的一切法律，因爲他們希望退出聯邦，以保持自己的有利地位。他們推動我

們走上了犧牲亞美尼亞和阿才培疆兩共和國而給他們以若干特權的道路。我們不能走這一條路；因為這定要使我們在高加索的全部政策和蘇維埃政權歸於死亡的。

我們在喬治亞的同志，曾感覺到了這一危險，這並不是一種偶然。這是喬治亞的排外愛國主義，它已轉為進攻，它的方向是反對亞美尼亞人和阿才培疆人，它已經使喬治亞的共產黨為之煩惱。喬治亞的共產黨，自它合法存在以來，開過兩次代表大會，每次都一致否決了迷路同志們的立場，因為不建立外高加索聯邦，在高加索是不能保持和平，建立平等的，這也不是一種偶然。絕不能允許一個民族可比別個民族特權些。我們的同志都感覺到了這一點。所以，在鬥爭的兩年間，穆地華尼派只是個小小的集團，被黨在喬治亞本身就擊潰了。

同樣，列甯同志那樣急迫地要馬上成立聯邦，也不是偶然的。我們的中央一再認為外高加索有成立有自己中央執行委會和執行權力（它的決定，各共和國均須履行）的聯邦的必要，這也不是偶然的。狄而任斯基同志與卡明涅夫、奎貝雪夫兩同志（四

八）所領導的兩個委員會，來到莫斯科，謂非成立聯邦不可，這也不是偶然的。

最後『社會主義論壇』的孟塞維克，稱讚我們的迷路同志反對聯邦的鬥爭，抬舉他們：『物以類聚』，這也不是偶然的。

同志們，現在我來分析我們必須用以克服大俄羅斯排外愛國主義、事實上的不平等、及當地民族主義（尤其在它轉爲排外愛國主義的情形之下）這三個阻止聯合的基本因素的手段吧。可以幫助我們妥善地消滅這些遺產，這些阻止各民族接近的舊遺產的手段當中，我僅指出三個手段：

第一個手段：採取一切方法，使各共和國的蘇維埃政權成爲容易理解和自己的政權，使我們的蘇維埃政權不僅是俄羅斯的，而且是各民族的政權。爲了作到這一點，不僅需要使學校，而且需要使一切機關，不論黨的或蘇維埃的，逐漸民族化，使牠們用羣衆所容易理解的語言來活動，使牠們在適應該民族生活的條件下執行職務。只有在這種條件之下，我們才能夠獲得把蘇維埃政權從俄羅斯的改成各民族的、爲一切共

和國勞動羣衆——尤其爲在經濟文化上落後者所接近、所理解、所愛護的政權。

第二個手段能幫助我們去妥善地消滅沙皇主義和資產階級所留下的遺產，這個手段便是使蘇聯各種人民委員部的機構成爲這樣的，即最低限度可使各基本民族有人參加幹事會，並可造成一種環境，能無條件地去滿足各共和國的需要與要求。

第三個手段是，須使我們的最高機關中有一種機關，能夠反映一切共和國和民族的需要與要求。我希望大家對後者要特別加以注意。

假使我們在聯盟中央執委會的機構內設立兩院，其中第一院由聯盟蘇維埃代表大會，不分民族選出；第二院由各共和國和特別區（各共和國人數相同，各民族特別區人數也相同）選出，而由同一聯盟蘇維埃代表大會批准，那末我想這時我們最高機關的機構不僅可以反映一切無產階級集團的階級利益，而且可以反映純種民族的要求了。換一句話說，這時我們有了可以反映蘇聯境內各民族、各人民、及各部落的特殊利益的機關了。同志們，聯盟所團結起來的人，共計不下一萬萬四千萬，其中有六千五

百萬是非俄羅斯人，在這種條件之下，如果在莫斯科這裏的最高機關中沒有這些民族的代表，他們不僅可以反映一切無產階級所共同的利益，而且可以反映獨特的特殊的民族利益，那末這種國家是不能管理的。同志們，沒有這個條件，是不能管理的。沒有這種晴雨表在手中和足以提出各民族這些特殊要求的人，那是不能管理的。

有兩個管理全國的方法：一個方法是使機關簡單化，以一羣人或一個人爲元首，他在各地設置省長，作爲耳目。這是個簡單的管理方式，在這種方式之下，元首管理全國，從各省長那裏接得報告，自期以廉潔而正確地實行管理而自慰。後來發生了摩擦，摩擦轉爲衝突，衝突轉爲暴動。後來暴動，又被壓服了。這種統治體系，不是我們的體系，它雖然簡單，但却太昂貴。我們蘇維埃國家內應採取這樣一種體系，它可以準確地測知一切變化，可以準確地測知農民中間，各民族中間，所謂異族中間，及俄羅斯人中間的一切情形，以便最高機關體系中能有好多晴雨表，測驗一切變化，估計和預防土匪運動和克隆斯達特事變，及一切可能的風暴和不幸，這是蘇維埃的統治

體系。它所以叫做蘇維埃政權——人民政權者，因為它是憑藉下層民衆，可以首先抓住一切變化，要是路線被歪曲的話，就採取適當方法去糾正它，——自己批判自己，糾正路線。這種管理體系是蘇維埃體系，它要求在我們的最高機關體系中要有全部反映民族需要和要求的機關。

有一種反對意見，以爲這使全部管理體系更加複雜，添設新機關，無異疊床架屋。這是對的。以前我們所有者爲蘇俄中執委會，後來建立了聯盟中執委會，現在聯盟中執會又要分爲兩部份。不用擔心。我已經說過，最簡單的管理方式是設置一人，給他設置好多省長，但在十月革命後從事這種試驗已經不能了。體系雖複雜化，但它易於管理，可使一切管理深刻成爲蘇維埃的。所以，我想大會應通過在聯盟中央執行委員會的機構中設立一個特別機關——第二院，這是絕對不必要的一個機關。

我不是說這是個調整聯盟各民族間合作的盡善盡美的方式，我也不是說這是個科學的最新發明，絕不是的。我們將來還要不止一次地提出民族問題，因爲民族的和國

際的條件正在變化着，而且還可以發生變化的。我不否認，假使經驗證明，若干人民委員部合併後，會發生毛病，那末也許現在合併在聯盟機構內的若干人民委員部，以後又要把它們分開的。

不過有一點很明白的，就是在現存條件和目前環境之下，更好的方法和其他更適宜的機關，我們還是沒有的。除設立第二院外，成立可以反映各共和國各部分內一切變動和一切變化的機關的更好的手段和別的方法，我們目前還是沒有的。顯然的，在第二院內，不僅這四個聯合起來的共和國，就是一切民族都應有代表參加，因為這裏所指的，不僅是就形式上聯合起來的四個共和國而言，而且是就一切人民與民族而言。所以，我們需要有一種方式，它可以反映一切民族與共和國的要求。

同志們，我把上邊所說的作一總結吧；民族問題的重要，取決於國際形勢上的新局面，取決於我們在俄羅斯這裏，在我們聯邦內，應把民族問題加以正確地模範地解決，以便給東方——我們革命的強大預備軍——一種榜樣，這樣來加強他們的信任，

加強他們對我們聯邦的傾向。從國內形勢的觀點說來，新經濟政策的條件加強了大俄羅斯排外愛國主義和地方排外愛國主義，也使我們不得不強調民族問題的特殊重要性。

其次，我曾說過，民族問題的本質，乃是在從前強盛民族無產階級與從前非強盛民族農民之間確定一種正確的關係，從這一觀點說來，在目前民族問題的具體方式，是表現於尋求調整聯盟內，在一個統一的國家內，各民族合作和共居的方法，手段。

其次，關於促進各民族這種接近的諸因素，也說過了。關於阻止這一聯合的諸因素，也說過了。大俄羅斯排外愛國主義已成了一種日益鞏固的力量，對於它也曾特別加以敘述。這個力量是個基本的危險，它足以摧毀從前各被壓迫民族對俄羅斯無產階級的信任。這是我們的最危險的一個敵人，我們應當推翻它，因為假使我們推翻了它，那各個共和國內所保存且正在發展着的民族主義有十分之九便推翻了。

再則，我們還站在一個危險的前面，就是若干同志可以把我們推到對一個民族爭

以特權以損害別民族的道路上去。我已經說過，我們不能走這一條道路，因為這是當地民族主義最畸形最排外的愛國主義式的發展，因為它可以摧毀民族和平，消滅異族羣衆對蘇維埃政權的信任。

其次，我說過，在中央執行委員會機構內設立第二院，乃是可以使我們用最妥善的方法消滅這些障礙聯合的因素的基本手段。關於第二院，我在中央二月全體會議上曾經更公開地說過，關於它在提綱中說的比較隱約，爲的使同志們得以自行去尋求別的更靈活的方式，別的更適合的機關，以反映各民族的利益。結論便是如此。

我想，只有採用這一方法，我們才能做到民族問題的正確解決，我們才能做到廣泛地展開無產階級革命的旗幟，把東方各國的同情與信任團結在這一旗幟的周圍，——東方各國乃是我們革命的強大預備軍，在無產階級與帝國主義的未來的決鬥中可以起決定的作用（鼓掌）。

結 語

同志們！在報告民族問題組的工作以前，讓我先對關於我的報告，關於基本兩條發言的人表示我的異議。這大約廿分鐘的工夫就夠了。

第一個問題，便是關於一羣同志以布哈林、拉可夫斯基爲首太吹噓民族問題意義，太誇張它，並因爲民族問題而看不見社會問題——即關於工人階級政權的問題。

然而，我們共產黨員看的很清楚，我們全部工作的基礎，乃是鞏固工人政權的工作，然後，在我們的面前才發生了另一個問題，這個問題雖是很重要的，但是却隸屬於第一個問題的，這個問題就是民族問題。人們告訴我們，謂民族是不可侮辱的。這是非常正確的，我同意這一點——不要侮辱民族。但是從此創造一個新的理論，謂須使大俄羅斯無產階級對於從前被壓迫民族處於不平等的地位，這不啻開玩笑。那在列寧同志的論文中作爲措詞方法的，布哈林同志竟變爲整個的口號（四九）。可是顯然的，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治基礎，首先而且主要的是中央工業區域，而不是本身爲農民區域的邊疆。要是我們犧牲無產階級的區域，而傾向於農民的邊疆方面，那末結果定使

無產階級專政的體系爲之破裂。同志們，這是很危險的。在政治上，不可過於誇大，但是同樣，也不可過於小視。

要知道，除過民族自決的權利外，還有工人階級鞏固自己政權的權利，民族自決權是隸屬於後邊這一權利的。也有民族自決權與別的最高權利——當政的工人階級鞏固自己政權的權利發生抵觸的情形。在這種情形之下，——這需要直爽地說——民族自決權不能夠也不應成爲工人階級實現自己專政權利的障礙。前者應次於後者。比如一九二〇年時，我們爲了保衛工人階級的政權，不得不進兵華沙，即係此故。

因此，不要忘記，在給民族以任何諾言的時候，在各民族代表面前隱瞞的時候，如有些同志在這次大會上所作者，應當記牢，民族問題的活動範圍及其權限的限度，在我們的內部和外部條件之下，要受『工人問題』（一切問題中的基本問題）活動和權限的範圍來限制的。

這裏有好多人都援引列寧筆記和論文中的話作爲例證。我不願引證我的導師——

列寧同志，因為他不在這裏，我怕引證的不正確，可是我不得不引證一個不會引起絲毫誤會的幾句定理，爲的使同志們關於民族問題的比重不要有所懷疑。列寧同志在論民族自決權一文中分析馬克思關於民族問題的一封信的時候，曾作了這樣一種結論：

【同「工人問題」比較起來，民族問題的隸屬意義，對馬克思是毫無疑義的。(五〇)】

此地一共只有兩句話，但是它們却決定一切。這對於有些缺乏理智的熱心同志們，應當銘諸肺腑的。

第二個問題，便是關於大俄羅斯排外愛國主義和當地排外愛國主義的問題。拉可夫斯基同志，尤其布哈林同志，曾對於此問題發言，他提議刪除講述當地排外愛國主義害處的一條。似乎用不着跟當地排外愛國主義這種蛆虫去較量，我們應當去注意大俄羅斯排外愛國主義這種「巨人」。一般說來，布哈林同志有一種懊悔的情緒。這是很明白的，他否認民族自決權，犯反對民族的錯誤已有好幾年，現在是懊悔的時候了。不過他懊悔以後，又走了另一個極端。最有趣味的，就是布哈林同志號召本黨效法

他的榜樣，也要懊悔，雖然全世界都知道，本黨在這裏並無絲毫關係，因為它從自己成立之日（一八九八年）起，就承認民族自決權，因而用不着來懊悔。問題是在於布哈林同志不明白民族問題的本質。當有人說須從民族問題的見地上來進行反對大俄羅斯排外愛國主義的鬥爭的時候，其意是想藉此指明俄國共產黨員的義務，想藉此說明俄國共產黨員有自己進行反對俄國排外愛國主義鬥爭的義務。假使不是俄羅斯人，而是土耳其斯坦或喬治亞共產黨員從事反對俄羅斯排外愛國主義的鬥爭，那末也許把這種鬥爭評為反俄羅斯的排外愛國主義。這也許把問題要弄得更加糟糕，反而鞏固了大俄羅斯排外愛國主義。唯有俄羅斯共產黨員才可以担負起反對大俄羅斯排外愛國主義的鬥爭，把它進行到底。

人們提議要與當地反俄羅斯的排外愛國主義作鬥爭，其意何在呢？意在指明當地的共產黨員的義務，非俄羅斯共產黨員與自己的排外愛國主義作鬥爭的義務。反俄羅斯的排外愛國主義的傾向是有的，難道可以否認嗎？大會親眼看到，當地的，喬治亞的

，及巴什吉爾的等排外愛國主義，都是有的，需要與它們作鬥爭。

俄國的共產黨員，是不能夠與韃靼、喬治亞、巴什吉爾的排外愛國主義作鬥爭的，因為要是俄國共產黨員担負起與韃靼或與喬治亞排外愛國主義作鬥爭的艱苦任務，那末他們的這一鬥爭將被評爲大俄羅斯排外愛國主義者反對韃靼人或喬治亞人的鬥爭。這也許要把一切問題弄的更糟了。唯有韃靼、喬治亞等的共產黨員，才可以反對韃靼、喬治亞等的排外愛國主義，唯有喬治亞的共產黨員才可以順利地與自己的喬治亞民族主義或排外愛國主義作鬥爭。非俄羅斯共產黨員的義務，就在這裏。所以，在提綱中務須指出俄羅斯（我是就與大俄羅斯排外愛國主義作鬥爭而言）和非俄羅斯共產黨員（我是指他們與反亞美尼亞、反韃靼、反俄羅斯的排外愛國主義作鬥爭而言）的這種兩面的任務。沒有這一點，提綱便要成爲片面的東西，沒有這一點，不論在國家的建設中或在黨的建設中都不能創立任何國際主義。

要是我們只是與大俄羅斯排外愛國主義作鬥爭，那末這一鬥爭將要隱蔽韃靼等排

外愛國主義者的特殊鬥爭，這一鬥爭是在地方上發展起來的，它現在在新經濟政策條件之下，尤其危險。我們不能不進行兩條戰線上的鬥爭，因為只有在兩條戰線鬥爭——一面與大俄羅斯排外愛國主義（它是我們建設工作中的基本危險）作鬥爭，一面與當地的排外愛國主義作鬥爭——的條件下面，才可以獲得勝利，因為沒有這種兩面的鬥爭，俄羅斯與他民族工農的任何團結是談不到的。在相反的情形之下，反而要弄成對當地排外愛國主義的鼓勵，弄成獎勵當地排外愛國主義的政策，這是我們不能允許的。

這裏讓我引列寧同志的幾句話作證。我本來不如此作的，但是在我們的大會上，既有好多同志引證列寧同志的話，加以歪曲，那末也讓我把我列寧同志一篇有名的論文中的幾句話讀一下吧：

「無產階級應當要求被『他』的民族所壓迫的殖民地與民族的政治分離的自由。在相

反的情形之下，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要成爲空談的東西；被壓迫與壓迫民族工人間的任

何信任，任何階級的聯帶關係，都是不可能的。」

這便是支配民族或從前被支配民族的無產者的義務。其次，列寧則是述說從前被壓迫民族無產者與共產黨員的義務：

「別一方面，被壓迫民族的社會主義者應當特別堅持與實行被壓迫民族工人與壓迫民族工人十足的和無條件的以及組織上的統一。否則在資產階級一切詭計、背叛及欺騙下，要貫徹無產階級的獨立政策及其與別國無產階級的階級的連帶關係那，是不可能的，因為被壓迫民族的資產階級經常地要把民族解放的口號變為對工人的欺騙。」（五一）

騰吧，要是跟着列寧的足跡前進，——這裏有些同志是用他的名字來賭咒——那就必須把兩個提綱——既須與大俄羅斯排外愛國主義作鬥爭，又須與當地排外愛國主義作鬥爭——都留在議決案中，作為一個現象的兩方面，作為與一般排外愛國主義作鬥爭的提綱。

我反對在這裏發言的幾位的意見，即以此為結束吧。

（俄國共產黨「布」第十二次大會會議紀錄，一九三三年出版）

在俄國共產黨(布)中央與各民族共和國和民

族區負責工作人員第四次會議上的演說(五三)

——一九三三年——

一 論各民族共和國和民族區內的右派和「左派」

——一九三三年六月十日關於議事日程第一項所謂「蘇丹·加里夫事件」的演說——

關於在這裏發言的幾位同志的演說，我略說幾句。至於因蘇丹·加里夫事件而牽涉到的問題之原則方面，我想在我關於第二項的報告中來闡述它。

首先來說關於會議本身的問題。這裏有一位會說（姓名我已經忘記了），這次會議是一種非常的現象。這是不對的。這種會議，並不是本黨的一種新的東西。這次會議，自蘇維埃政權存在以來，已是第四次。在一九一九年初以前，曾有過三次這種會

議。那時的環境會允許我們召集這種會議。在一九一九年以後，在一九二〇至一九二一年，那時我們埋頭應付內戰，沒有工夫舉行這種會議。只有現在在我們已經結束了內戰以後，這時我們在經濟建設方面的工作，業已深入，只有在黨的工作本身日益具體，尤其在各民族區和民族共和國內的工作日益具體以後，我們才重新有了召集這種會議的可能。我想，中央爲了造成在地方上實施政策者與制定政策者之間的充分的相互理解，將不止一次採用這一手段。我想，不僅要召集一切共和國和特別區都參加的這種會議（這種會議在某種程度上是籠統的，因爲在此種會議上只能解決多少一般性質的問題），而且應當召集各特別區和共和國的個別會議來制定更具體的決定。只有這種提出問題的方法，既可以滿足中央，又可以滿足地方上的工作人員。

我聽了幾個同志的發言，他們敘述我怎樣警告蘇丹·加里夫，我怎樣獲得了考察他致阿吉加莫夫的第一封密信的可能，阿氏爲什末緘默不言，雖然他應當首先而且應當多多表示意見的。我受了這些同志方面的指責，說我極端替蘇丹·加里夫辯護。是

的，事實上，我確是盡可能的替他辯護，我認爲並且仍繼續認爲這是自己的義務。不過我替他辯護，有一定界限。當蘇丹·加里夫越過這一界線的時候，我就擯斥他了。他的第一封密信說，他（蘇丹·加里夫）已經與黨脫離關係，因爲他的那封信的調兒差不多是白黨式的，因爲他罵中央委員的話，只有罵敵人才能說出的。我是在政治局偶然地遇到他，在政治局他曾擁護蘇維埃共和國關於農業人民委員部方面的要求。當時我警告他，給了他一張條子，在該條子上我把他的那封密信叫做反黨的信，並責備他成立華里多夫（註）式的組織的企圖，告訴他要是不停止非法的反黨的工作，那末結果很不好，我對於他的任何支持都要一筆鈎消的。他很狼狽地答覆我，說：我走了迷路，給阿吉加莫夫的確寫了一封信，但信中所說的並非那些事情，而是別的事情，他過去是個黨員，現在仍舊是黨員，說一句老實話，將來仍要作個黨員云云。可是此後過了一個禮拜，他又寫了第二封密信，叫阿吉加莫夫務須與土耳其斯坦土匪及其頭目華里多夫建立關係，而將信閱後『付之丙丁』。這樣，結果，太卑劣，受其欺騙，

遂使我與蘇丹·加里夫斷絕任何關係。從這個時候起，在我看來，蘇丹·加里夫已成了一個立在黨外，立在蘇維埃以外的人，我認爲與他沒有談話的可能，雖然他有好幾次想找我『談話』。事實便是如此。『左』的同志尙在一九一九年初就指責我，說我支持蘇丹·加里夫，爲黨愛惜他，希望他終止其爲民族主義者，而做個馬克思主義者。事實上，我認爲在適當時期支持他是我的義務。知識份子，有思想者，甚至一般識字者，在東方各共和國和特別區，極其罕少，屈指可數，是故怎樣不要重視他們呢？要是不採取一切方法，去防止東方的人們的腐化，爲黨保持他們，那是犯罪的。不過這有個限度。在蘇丹·加里夫由共產主義者營壘跑到土耳其斯坦土匪營壘裏去的時候，這個限度便到了。從這個時候起，他對於黨已經不存在了。所以，土耳其的大使，對於他比我黨中央更要合意些。

我也聽到了夏米古洛夫同志方面的這種指責，說我不顧他的一下子結束華里多夫的主張，而替華里多夫辯護，力謀爲黨保持他。事實上，我確曾替華里多夫辯護，希

望他能夠改過。我們從政黨歷史上知道，就是不是這樣的人也可以改過的。我以為夏米古洛夫解決問題太簡單了。我沒有聽從他的忠告。是的，夏米古洛夫的預言，經過一年便都證實了，華里多夫並未改過，而加入土耳其斯坦的土匪。但是黨仍獲得了勝利，因為我們把華里多夫的退黨遲延了一年，假使我們於一九一八年就制裁了華里多夫，那末我相信穆達新、阿吉加莫夫、哈里柯夫等這些同志，那時便不會留在我們的隊伍裏面的。（台下的呼聲「哈里柯夫也許可以留下的。」）也許哈里柯夫不會退出的，但是在我們隊伍中工作的一整羣同志也許要同華里多夫一塊兒退出的。這就是我們的忍耐和謹慎所獲得的結果。

我聽了雷斯古洛夫同志的話，可以說他的演說不是十分誠懇的，而是半外交的（台下的呼聲：「說的對」），一般說來，他的演說給了我以不良的印象。我原來期望他的言論要明瞭，態度要誠懇。不論雷斯古洛夫同志說的是什末，但是很明顯的，他的家中曾放着蘇丹·加里夫的兩封密信，他向任何人都沒有說過此事，顯然的，他在

觀念上是與蘇丹·加里夫有聯繫的。雷斯古洛夫以在刑事部分上與蘇丹·加里夫事件沒有關係，來斷定他在土匪活動上，與蘇丹·加里夫沒有聯繫，這是笑話。會議上所討論的，並不是關於這一點，而是關於與蘇丹·加里夫主義的觀念上與思想上的聯繫。很明顯的，同志們，雷斯古洛夫與蘇丹·加里夫的這種聯繫是有的，就是雷斯古洛夫本人也不能否認這一點。在這裏，在講台上，應當堅決而無保留地聲明與蘇丹·加里夫主義斷絕關係，難道時候還沒有到嗎？在這點意義上說來，雷斯古洛夫同志的演說乃是半外交式的，令人不能滿意的。

安巴葉夫同志的演說也是外交式的，不誠懇的。安巴葉夫同志及韃靼一羣工作者（雖然他們的思想是不堅定的，但是我認爲他們都是極漂亮的實踐家），在蘇丹·加里夫被捕以後，曾向中央要求立即釋放，並願完全担保蘇丹·加里夫，而暗示從蘇丹加里夫家中找出的文件是不真實的，難道這不是事實嗎？然而在調查時發現了什麼呢？發現一切文件都是真實的。就是蘇丹·加里夫本人也承認這些文件是真實的，他

說他的罪過比在文件中所說的還要多，他完全全地，澈底承認自己的罪過，他承認以後，他懺悔了。是故安巴葉夫同志應當堅決而毫無遲疑地承認自己的錯誤，跟蘇丹加里夫絕緣，難道這不明瞭嗎？但是安巴葉夫同志，並未如此作。他乘機嘲笑『左派』，但是他却不願堅決地，共產主義式的與蘇丹·加里夫主義脫離關係，與蘇丹·加里夫所陷入的鴻溝斷絕關係，也許他以為運用外交手腕就可以挽救他的。

菲德斯同志的演說，更是澈頭澈尾的十足的外交手腕。在思想上究竟誰指揮誰呢？是蘇丹·加里夫指導菲德斯呢？還是菲德斯指導蘇丹·加里夫呢？這個問題，請大家討論。不過，我想，在思想上寧是菲德斯指導蘇丹·加里夫，而不是蘇丹·加里夫指導菲德斯。我在蘇丹·加里夫的理論使用中，並未看到任何特別不允許的東西。要是蘇丹·加里夫的問題只限於汎土耳其主義和汎回教主義的意識形態，那末這也許是一種不幸，我可以說，這一意識形態，在黨的第十屆大會關於民族問題議決案中雖被禁止，但仍可加以寬容，僅在黨的队伍中對它加以批判就可以了。但是如果意識形

想使用的結果，乃是跟土耳其斯坦匪賊的頭兒——華里多夫等去確立聯繫，那末這要用無辜的意識形態去替土耳其斯坦匪賊的實踐辯護，如菲德斯同志所想幹的，那是絕對不可以的。沒有一個人願意替蘇丹·加里夫的活動作這一辯護。這對於帝國主義和沙皇制度可以找到辯護，因為他們也有他們的意識形態，有時這種意識形態在外觀上也是毫無過失的。這樣的推論是不可以的。諸位在這裏不是立在法庭的前面，而是立在負責工作人員會議的前面，這些負責工作人員向你們所要求的是直爽、誠懇，而不是外交。

據我的意見，霍占諾夫同志說的很好，伊克拉莫夫同志說的也不錯。不過在這些同志的發言中應當特別指出一個地方——值得考慮的地方。兩位曾說，今日的土耳其斯坦與沙皇的土耳其斯坦之間沒有任何的差別，只是換了一個招牌，而土耳其斯坦仍是從前的土耳其斯坦，與沙皇統治下的土耳其斯坦一樣。同志們，要是這不是失言的話，要是這是深思熟慮的言論，要是這是完全自覺地說的，那末可以說，在這種情形

之下，土耳其斯坦匪賊是對的，我們是錯的。要是土耳其斯坦在事實上是個殖民地，如在沙皇制度之下一樣；那末這時匪賊是對的，我們不應指責蘇丹·加里夫，而他應當來指責我們這些容忍在蘇維埃政權範圍內有殖民地的人。要是這是真確的話，那末我不明白，爲什末諸位自己不去加入土耳其斯坦匪賊呢？顯然的，霍占諾夫和伊克拉莫夫兩位同志沒有考慮過他們演說中的這一段，因爲他們不能不知道今日的蘇維埃的土耳其斯坦根本上是跟沙皇的土耳其斯坦不同的。我願意特別指出這兩位同志演說中的這個含糊的地方，爲的使這兩位同志把這一點去好好地想一下，改正自己的錯誤。

伊克拉莫夫同志說到中央的活動，謂我們並不是常常都是很細心的，我們並不是常常都成功隨時提出了東方各共和國和特別區環境所指示的一些實踐問題。我自己接受這些非難的一部份。當然，中央工作太忙，沒有辦法處處予以留意。不過以爲中央可以隨時辦到一切，那是很滑稽的。當然，在土耳其斯坦，學校很少。當地語言，還沒有被國家機關日常應用，機關還沒有民族化，一般文化很低，這一切都是對的。但

是難道可以認真地希望中央或整個黨能於兩三年內提高土耳其斯坦的文化嗎？俄羅斯人民，要比共和國聯盟（蘇聯——譯者）的其他人民更開化些，但是我們仍在呼喊和埋怨俄羅斯文化，俄羅斯人民文化的低下。關於這一點，伊理奇是常常高聲呼喊的，——他常說我們是沒有敬養的，我們沒有可能在兩三年之內，甚至十年之內大大提高俄羅斯的文化。要是在兩三年之內甚至十年之內連俄羅斯的文化都不能提高，那末怎可以要求加速提高非俄羅斯的落後的識字很少的區域內的文化呢？這十分之九要歸「罪」於環境，要歸「罪」於落後，那正是所謂一籌莫展，這難道不明白嗎？

現在來談「左」派和右派吧。

在各特別區和共和國的共產黨組織中有沒有「左」派與右派呢？自然，是有的，這是不可否認的。

右派的罪惡是在什末地方呢？是在於右派交不出也不能交出反對民族主義觀念的消毒藥——可靠的堡壘，這種民族主義的觀念，因新經濟政策的關係，日益發展而加

強。蘇丹·加里夫主義發生這回事，它在東方各共和國，尤其在巴什吉爾和韃靼兩地造成了自己的若干同道者這回事，毫不置疑地告訴說，右派份子（在這些共和國內他們佔着優勝的多數）不是反對民族主義的有力的堡壘。要知道，我們在各邊疆，在各共和國以及在各特別區的共產主義組織，只有在它們克服民族主義情形之下，才能發展起來，站住脚跟，而成爲真正的國際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者幹部。民族主義乃是培養各邊疆和共和國馬克思主義者幹部——馬克思主義先鋒隊道路上的一個基本的思想上的障礙物。我黨的歷史告訴說，俄羅斯布爾塞維克黨是在反對孟塞維克主義的鬥爭中生長和鞏固起來的，因爲孟塞維克主義乃是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孟塞維克主義乃是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輸入到我黨裏面來的嚮導人，不克服孟塞維克主義，它便不能站住脚跟。伊理奇關於這一點，說過好幾次。只有隨着布爾塞維克主義對於孟塞維克主義在其組織和意識形態方面的克服，它才生長強固，而成爲一個真正的領導的黨。關於民族主義對各邊疆和各共和國共產主義組織的關係，亦可說是如此。民族主義對於

這些組織所演的作用，正如孟塞維克主義於過去對布爾塞維克黨所演的一樣。一切資產階級的影響，連孟塞維克的在內，只有經過民族主義的掩護才能浸入我們在邊疆的組織。我們在各共和國的組織，只有在它們會抵抗得住民族主義的觀念時，才能夠成爲馬克思主義者幹部，這種民族主義觀念竟然混入邊疆的本黨，所以混入者，因爲資產階級正在復活着，新經濟政策正在生長着，民族主義正在發展着，還有着大俄羅斯排外愛國主義的殘餘，這種殘餘，也向前推進了當地的民族主義，國外各方支持民族主義的國家的影響也存在着。在各共和國和特別區裏面與這種敵人作鬥爭，乃是各民族共和國共產主義組織必經的階段，假使它們願意鞏固起來而成爲真正馬克思主義者組織的話。別的道路是沒有的。在這一鬥爭中右派是很薄弱的，所以薄弱者，因爲他們對於黨傳染了懷疑主義，而容易受民族主義的影響。這就是各共和國和特別區共產主義右翼的罪惡所在的地方。

但是邊疆「左派」的罪惡，既不大於前者，亦不小於前者。假使邊疆的共產黨組

織，不克服民族主義，便不能鞏固和發展而成爲真正馬克思主義者幹部，那末這些幹部自身能夠成爲羣衆的組織，要能夠團結大多數的勞動羣衆於自己的周圍，只有在學習成爲充分靈活足以吸引一切略微忠實的民族份子到我們的國家機關裏面來，給他們以讓步，只有在他們於黨內反對民族主義的堅決鬥爭與從當地人、知識份子等當中吸引一切多少忠實的份子來參加蘇維埃工作的同樣堅決的鬥爭之間學習運用手腕才行。邊疆的『左派』多少解除了對黨的懷疑態度，多少解除了對民族主義影響的溫順態度。不過『左派』的罪惡，就在於他們對於居民當中的資產階級民主和簡單地忠實份子不會採取靈活的態度，他們不會也不願運用手腕去吸引這些份子，他們歪曲了黨把握全國大多數勞動人口的路線。可是這種靈活性和這種在反對民族主義的鬥爭與吸引略微忠實的份子加入我們國家機關隊伍的鬥爭之間運用手腕的能力，却是必須要造成的，不論如何要鍛練出來的。要造成和鍛練出這種靈活性和能力，只有我們對於我們在各特別區和共和國所遇見的複雜和特殊情形加以注意；只有我們不是從事簡簡單單

地撥移那在中央區域所造成而不能機械地搬到邊疆去的標本；只有我們不把居民當中
有民族主義情緒的份子，有民族主義情緒的小資產者揮之而去；只有我們學習吸引這
些份子來參加一般的國家工作才行。『左派』謬誤的地方，就在於他們不明白黨的這
些複雜任務的第一等重要性。

右派對於黨的威脅是，他們因對民族主義溫順服從，可使我們在邊疆的共產主義
幹部難以增長，而『左派』對於黨的威脅，則是他們因惑於他們單純而輕率的『共產
主義』，可使我黨脫離農民和當地居民中的廣大層級。

這些危險當中那一種最危險呢？要是『左』傾的同志想在地方實行用人爲方法把
居民分層的政策，——其實這一政策不僅在赤城和雅庫特區，不僅在土耳其斯坦已經
實行了。……（台下伊布拉吉莫夫說：『這是分化的策略』。）現在伊布拉吉莫夫同
志想以分化的策略來代替分層的策略，不過這一無所改變，——我說，要是他們想實
行從上分層的政策，要是他們以爲俄羅斯的模型可以搬到特殊的民族環境裏而去，不

須顧計到生活與具體條件；要是他們想與民族主義作鬥爭的時候，同時要丟掉一切民族的東西；一句話，要是他們邊疆的『左』派共產主義者想不改過，那末我可以說，兩個危險當中，『左』的危險可以成爲最危險的危險。

我關於『左』右派問題要說的，統通說過了。我略微跑在前面了一點，這是因爲會議預先討論第二項，所以跑在前面去了。

應當鞭策右派，迫使他們，教他們去學習與民族主義作鬥爭，以便從當地人當中鍛鍊真正共產主義幹部。同樣，應當鞭策『左派』，教他們去學習靈活性，善於運用手腕，以便把握廣大的民衆。需要如此幹者，因爲正如霍占諾夫同志所正確指出的一樣，真理是『中庸』，是在右與『左』之間。

二 論各民族共和國和特別區馬克思主義者幹部的培植與鞏固

題議決案實施方案」的報告——

……現在我來講關於從當地人當中培植和鞏固馬克思主義者幹部的方法的問題，這種幹部可用作各邊疆和各共和國蘇維埃政權的最重大最主要的堡壘。要是觀察我黨（我是指它的俄羅斯部份而言，這是個基本的部份）的發展，並追蹤它的發展中的幾個主要階段；然後按照這來建造一幅各特別區和共和國內我們共產黨組織發展的切近圖畫，那末，我想我們便找到了一把理解從邊疆我黨發展觀點看來這些區域所有的特質的鑰匙。在我黨（其俄羅斯部份）發展第一時期的基本任務，則是創立幹部——馬克思主義者幹部。這些馬克思主義者幹部，他們是在我們反對孟塞維克主義的鬥爭中造成的，鍛鍊出來的。在那個時期——我是指從布爾塞維克黨成立到從黨內逐出孟塞維克主義最完備的表現者——取消派為止的一個時期而言——這些幹部的基本任務是在爭取工人階級最有生氣、最忠實、最卓越的份子到布爾塞維克方面來，是在於創造

幹部，鍛鍊先鋒隊。這裏首先是跟資產階級性的派別，尤其是孟塞維克主義作鬥爭，此等派別妨礙了幹部的團結而爲一個統一的整體——黨的基本核心。那時與千千萬萬工人階級和勞動農民羣衆開闢廣泛聯繫的任務，把握這些羣衆的任務，爭取全國大多數的任務，還沒有當作一個迫切而緊急的要求，擺在黨的面前。在此以前黨還沒有長成的。

只有在我黨發展的下一階段上，只有在它的第二階段上，當時這種幹部已經長成了，當時他們已經傾注而成爲我黨的基本核心，當時工人階級優秀份子的同情已經取得或者差不多已經取得——只有在這以後，才以迫切而刻不容緩的要求，在黨的面前提出了把握千百萬羣衆的任務，才提出了把黨的幹部變爲真正羣衆的工人政黨的任務。在這一時期，我黨的核心已不是與孟塞維克主義進行鬥爭，而是與我黨前所謂「左傾」份子——各種「召回主義者」進行鬥爭，此種份子企圖以革命辭句來代替對一九〇五年後當時新條件的特質的認真研究，他們以他們單純「革命」的策略來阻止把我

黨的幹部變爲真正羣衆政黨的事業，他們並想以他們的工作造成黨脫離廣大工人羣衆的威脅。不與這一「左傾」的危險作堅決的鬥爭，不克服他，黨便不能把握千百萬勞動羣衆，這是無須證明的了。

——兩條戰線上鬥爭的大概情形，與右派和「左派」鬥爭的大概情形，我黨基本部份——俄國部份發展的情形，便是如此。

列甯同志，在他的『共產主義中「左派」幼稚病』一書中，關於共產黨這種必然的不可避免的發展情形，曾有十分明確的描述。列甯同志在該書中證明，西方各國共產黨大概都要經過或已經正在經過這種發展階段。我補充一句，我們邊疆共產主義組織和共產黨的發展，也是如此。

不過要特別指明的，就是我黨在過去所經歷者與今日邊疆我黨的組織所經歷者之間，雖有類似之處，但是我黨在各民族共和國和特別區仍有若干重大的發展特性，我們務須要考慮到這些特性，若對這些特性沒有細密的考慮，我們在確定從邊疆當地人

當中培養馬克思主義者幹部的任務時，有犯許多極大錯誤的危險。

現在就來考察這些特性吧。

與我們邊疆組織中的右派與「左派」份子作鬥爭，那是很需要而必須的，不然我們便不會培植出與羣衆密切聯繫的馬克思主義者幹部。這是很明白的。不過邊疆形勢的特徵及跟我黨過去發展的不同，是在於幹部的鍛鍊及把他們變爲羣衆的政黨，在邊疆不是在資產階級制度之下，如像我黨歷史上所有者，而是在蘇維埃制度之下，是無產階級專政之下。在資產階級制度下的時候，就時間的條件說，可以而且需要首先打擊孟塞維克（爲了訓練馬克思主義者幹部），然後來打擊召回派（爲了把這些幹部變爲羣衆的政黨），在我黨歷史上的兩個整個時期充滿了對這些傾向的鬥爭。現在就時間的條件說，我們絕不能如此作，因爲現在我黨已經當政，而當政的政黨需要在邊疆有從當地人當中訓練出來而同時與居民中的廣大羣衆聯繫的馬克思主義的可靠的幹部。現在我們不能首先利用「左派」的幫助來擊潰右派，如像我黨歷史上所有者，然後

利用右派的幫助來擊潰『左派』——現在我們應當同時在兩條戰線上進行鬥爭，力謀一下子擊潰這兩個危險，以便結果在邊疆從當地人當中訓練出與羣衆聯繫的對馬克思主義有修養的幹部。那時可以講還與廣大的羣衆沒有聯繫而僅在發展的下一個時期才與廣大羣衆聯繫起來的幹部，現在甚至這樣講是很滑稽的，因爲在蘇維埃政權之下，與廣大羣衆沒有聯繫的馬克思主義幹部，這無異於蘇維埃政權的崩潰。這樣的幹部，不論與馬克思主義，或與羣衆政黨都沒有絲毫共同的地方。所有這些，大大地使問題複雜化，使我們邊疆的黨的組織有同時與右派和『左派』作鬥爭的必要。所以，我黨的立場，是在兩條戰線上同時反對兩種傾向的鬥爭。

其次要指出的，就是我們邊疆共產主義組織的發展，並不是孤立的，如像我黨（俄國部份）歷史上所有者，而是在我黨基本核心直接推動之下，這個核心，不僅在訓練馬克思主義者幹部一事上是有經驗的，而且在聯繫這些幹部與居民中廣大羣衆，在爭取蘇維埃政權鬥爭中運用革命手腕一事上都是有經驗的。在這一點上，邊疆形勢的

特質，就在於我們在這些地方的黨的組織，就那裏的蘇維埃政權發展的條件來看，利用上一時期我黨的豐富經驗，可以而且應當運用自己的力量以鞏固與居民中廣大羣衆的聯繫。直到最近，俄羅斯共產黨中央普通總是跳過各邊疆共產主義組織，有時甚至迂迴過這些組織，直接在邊疆運用策略，吸引一切多少忠實可靠的民族份子來參加蘇維埃建設的一般工作。現在邊疆的組織應當自行來幹這一工作。牠們可以作這一工作，而且應當作這一工作，要記着這一方法乃是把當地人當中的馬克思主義者幹部變爲足以領導國內大多數居民的真正羣衆政黨的最良好的手段。

在決定我黨在邊疆培植馬克思主義者幹部和這些幹部把握居民中廣大羣衆一事上的路線時，應當加以嚴格考慮的兩種特性，便是如此。

（「俄羅斯共產黨中央與各民族共和國和特別區負責工作人員第四次會議」一九二三年六月九——十二日在莫斯科舉行）紀錄，一九二三年出版）

十月革命和中等階層問題

——一九三三年——

不容置疑的，中等階層問題，是工人革命的基本問題之一。所謂中等階層，就是農民和小規模的城市勞動者。被壓迫民族，也可以算在以內，因為被壓迫民族十分之九是由中等階層構成的。瞧吧，就其經濟地位說，這是站在無產階級和資本家階級中間的一些階層。這些階層的比重，取決於兩種情形：第一，這些階層是現存國家人口中的大多數，或者無論如何，是個很大的少數；第二，他們是一種重要的預備軍，資本家階級可從他們中間募集自己的反對無產階級的軍隊。無產階級，要是沒有中等階層，尤其農民的同情和援助，是不能保持政權的。特別是在我們共和國聯盟這樣的國家裏面，倘若這些階層至少不保持中立，倘若這些階層還不與資本家階級脫離，倘若他們全體還是資本家的軍隊，那末無產階級甚至連奪取政權的夢都不能作的。所以，

爭取中等階層的鬥爭，爭取農民的鬥爭，貫通了我們從一九〇五年到一九一七年的全部革命，這一鬥爭還沒有停止，它在將來還需要進行的。

法國一八四八年革命的遭受失敗，其原因就是因為它在法國農民當中沒有得到同情的反響。巴黎公社的失敗，其原因就是因為它遇到了中等階層，尤其農民的反對。

一九〇五年的俄國革命，也可說是如此。有些庸俗的馬克思主義者，以考茨基爲首，根據歐洲各國革命的經驗，得了個結論說，中等階層，尤其農民，差不多就是工人革命的天生的敵人，因此之故，必須採取一個比較長期發展的政策，以便無產階級變爲某一民族的大多數，而造成工人革命勝利的實際條件。他們這些庸俗的馬克思主義者，根據這個結論，警告無產階級不要進行『過早』的革命。他們根據這個結論，依照『原則的理由』，使中等階層完全聽命於資本。他們根據這個結論，給我們預言俄國十月革命必將失敗，他們的論據，就是無產階級在俄國是佔人口小數，俄國是個農民國家，因此之故，勝利的工人革命在俄國是不可能的。

值得注意的，就是馬克思主義對於中等階層，尤其對於農民，完全是另一種評價。當庸俗的馬克思主義者，丟掉農民，使他們完全受資本的政治支配的時候，當他們大聲疾呼他們的『原則堅定』的時候，馬克思，這位一切馬克思主義者中最原則的馬克思主義者，却堅決勸告共產黨，不要忽視農民，要爭取他們到無產階級方面來，要保證在未來的無產階級革命中得到他們的支持。大家知道，在法國和德國二月革命失敗之後，在五十年代，馬克思寫信給恩格斯，並經過恩格斯轉交德國共產黨，說道：

『德國事件的全部行程，將使所謂農民戰爭的再版給予無產階級革命的支持的『可能』

性爲轉移的。』(五三)

這是關於五十年代的德國，關於一個農民國家所說的話，那時德國無產階級爲數頗少，那時德國無產階級比之一九一七年的俄國，更缺少組織，那時德國農民，就其地位說，比之一九一七年的俄國，更少幫助無產階級革命的傾向。

不容置疑的，十月革命乃是馬克思違反一切『原則』的饒舌家所說的那『農民戰

爭』和『無產階級革命』的可喜的聯合。十月革命證明了這種聯合是可能的，而且是
可以實現的。十月革命證明了無產階級倘若能將中等階層，首先是農民，擺脫資本家
階級，倘若能將這些階層由資本的後備軍變爲無產階級的後備軍，無產階級要奪取政
權並保持政權，是可能的。

簡單地說：十月革命，世界一切革命中的第一次革命，把中等階層的問題，尤其
農民的問題，列在前面，並且違犯第二國際英雄們的一切『理論』和嘆息，而順利解
決了這個問題。

要是一般說來，關於這個問題論功行賞的話，那末，這就是十月革命的第一個功
績。

可是事情並不以此爲限。十月革命更進了一步，企圖將被壓迫民族，團結在無產
階級的周圍。上面已經說過，被壓迫民族十分之九，是由農民和城市小規模勞動者構
成的。可是這還不能說明『被壓迫民族』一概念。被壓迫民族，通常不僅是當作農民

和城市小規模勞動者而受壓迫，而且是當作民族，就是說當作有一定國家、語言、文化、生活樣式、道德習慣的勞動者而受壓迫的。兩重壓迫的壓力，不能不使被壓迫民族的勞動羣衆革命化，不能不推動他們去跟壓迫的基本力量作鬥爭——去跟資本作鬥爭。這種情形便作了一種基礎，使無產階級得以實現『無產階級革命』，不僅跟『農民戰爭』，而且跟『民族戰爭』的匯合。所有這一切情形，不能不使無產階級革命活動的場所，擴大到俄國境界以外，不能不使最深厚的資本預備軍，受到打擊。要是爭取某一支配民族的中等階層的鬥爭，是爭取資本的最接近的預備軍的鬥爭，那末爭取被壓迫民族解放的鬥爭，不能不變爲獲得資本的個別的最深遠的預備軍的鬥爭，不能不變爲爭取殖民地和平等人民脫離資本壓迫的鬥爭。後面的這一鬥爭，還遠未結束，而且它還沒有得到甚至第一步的堅決的勝利。不過這個爭取深遠的預備軍的鬥爭，已由於十月革命而開始了，它無疑地將隨着帝國主義的發展，隨着我們共和國聯盟的力量的增長，隨着西方無產階級革命的發展，而一步一步地展開。

簡單地說：十月革命在事實上開始了無產階級從被壓迫和不平等國家的人民羣衆中爭取資本的深遠的預備軍的鬥爭，它第一次舉起了爭取這些預備軍鬥爭的旗幟——這就是它的第二個功績。

在我國，取得農民是在社會主義旗幟之下進行的。農民從無產階級的手裏得到了土地，依靠無產階級的幫助戰勝了地主，並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高昇至政權，他們不能不感覺，不能不明白：他們解放的過程會在而且將來還要在無產階級的旗幟下面，曾在無產階級的紅旗下面進行的，這種情形，不能不把過去曾爲農民所懼怕的社會主義的旗幟，變爲吸引他們注意，促進他們從壓抑、貧窮、和壓迫下解放出來的旗幟了。對於被壓迫民族，可說也是如此，而且還要切近些。爭取民族解放的呼聲，解放芬蘭，撤退波斯與中國駐軍，成立共和國聯盟，對土耳其、中國、印度斯坦、埃及等民族予以公開的精神上的幫助，這些事實所聲援的呼聲，乃是第一次從十月革命中得到勝利的人們的口中所發出的。俄羅斯從前在被壓迫民族的眼中被看做壓迫的旗幟，現

在成立社會主義國家之後，它變成了解放的旗幟，這一事實萬不可叫做偶然。十月革命領袖的名字，列寧同志的名字，在今日成爲殖民地和不等國家被蹂躪被壓抑的農民和革命知識份子口中最愛護的名字。這也不是偶然的。如果從前基督教在廣大的羅馬帝國之被壓迫與被蹂躪的奴隸中間被認爲是救星的話，那末現在的事情則是社會主義可以作爲（而且已經開始作爲這東西了！）帝國主義的廣大殖民國家的千千萬萬羣衆的解放旗幟了。這種情形，大大地促進了與反對社會主義偏見鬥爭的事業，而開闢了社會主義觀念深入到被壓迫民族國家窮鄉僻壤去的大道，這是不庸懷疑的了。要是從前社會主義者很難在被壓迫國家或壓迫國家的非無產階級的中等階層中以公開的面孔出現的話，那末現在他們在這些階層中可以公開宣傳社會主義的觀念，希望人們傾聽它，而且或許正在傾聽它，因爲它已經有了像十月命革這樣的有力論據了。這也是十月革命的結果。

簡單地說：十月革命掃蕩了一條道路，使社會主義的觀念得以深入各民族和各部

落的中等的非無產階級的農民階層裏面去，它使社會主義的旗幟，變成了這些階層的通俗的旗幟——這就是十月革命的第三個功績。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七日「真理報」第二五三期)

民族問題

——節錄自一九二四年四月初在斯威特洛格夫大學

所講授的講義『論列寧主義的基礎』——

在這個題目內，我提出兩個主要的問題來講：（一）是問題底提法；（二）是被壓迫民族解放運動與無產階級革命。

（一）問題底提法。最近二十年來，民族問題遭受了許多極大的變化。第二國際時期的民族問題和列寧主義時期的民族問題，是大不相同的。不僅就牠們的容量來說，而且就牠們的內部性質來說，牠們都是彼此大不相同的。

從前，民族問題通常總是限制在一些大半祇是關係於『文明』民族的問題底狹隘範圍以內。愛爾蘭人、匈牙利人、波蘭人、芬蘭人、塞爾維亞人、及歐洲其他的某些民族——這便是第二國際英雄們所關心的幾個不平等的民族。遭受最粗暴和最殘酷的民

族壓迫的成千成萬的亞洲人民和非洲人民，通常都不在他們的視線以內。白種人和黑種人，「文明人」和「不文明人」，他們是不肯拿來相提並論的。第二國際底要人所能用以誇耀的，不過是兩三個空洞的和敷衍了事的，竭力迴避殖民地解放問題的決議案而已。現在，這種對民族問題的兩面性和不徹底性，可以說已經被消滅了。列寧主義揭露了這種極端不符合的情形，毀壞了白種人和黑種人、歐洲人和亞洲人、帝國主義底「文明」奴隸和「不文明」奴隸中間的牆壁，這樣便把民族問題和殖民地問題連結起來。這樣一來，民族問題就由局部的和國內的問題變成了一般的和國際的問題，變成了世界問題，附庸國家和殖民地被壓迫民族解脫帝國主義羈絆的世界問題了。

從前，民族自決的原則，通常總是解釋得不正確，往往縮小為民族有自治之權（第二國際底某些首領，甚至弄到這樣的地步，就是他們把民族自決權變成了文化自治權，即被壓迫民族有設立自己的文化機關的權利，而將全部政權仍留在統治民族手中。這種情況，遂使民族自決的觀念，有從反對吞併政策的武器一變而成爲辯護吞併

種策的武器的危險。現在，這種淆亂黑白的思想，可以說是已經被克服了。列寧主義擴大了民族自決底概念，把他解釋爲附庸國家和殖民地被壓迫民族完全分立的權利；解釋爲各民族有獨立的國家存在的權利。這樣，就使人完全沒有可能把民族自決權解釋爲民族自治權來替併政策辯護了。從前，在帝國主義大戰時，民族自決底原則，無疑義地是社會愛國主義派欺騙羣衆的工具，現在，他却變成揭破一切帝國主義貪慾和揭破一切排外愛國主義陰謀的工具，變成用國際主義精神來作羣衆政治教育的工具了。

從前，關於被壓迫民族的問題，通常總是被看作純粹法權的問題。第二國際底政黨曾拿來誇耀的，就是冠冕堂皇地宣布「民族平權」，發表無數的「民族平等」的宣言，他們抹煞了一件事實，就是在某一羣民族（少數的）靠剝削別一羣民族而生活的帝國主義時代，所謂「民族平等」，乃是對於被壓迫民族的一種嘲弄。現在，這種對民族問題的資產階級法權的觀點，應當認爲是已經被揭破的了。列寧主義把民族問題從冠冕堂皇的宣言底天空中落下放在地上，而指出，如果無產階級政黨對被壓迫民族底

解放鬥爭不予以直接的援助，那末『民族平等』的宣言，不過是個空洞而虛偽的宣言而已。這樣一來，關於被壓迫民族的問題，就變成了關於支持，關於幫助，有效而經常地幫助被壓迫民族去反對帝國主義，以爭取真正的民族平等，爭取牠們的獨立的國家存在的問題了。

從前，民族問題總是改良主義式地被看作個別的獨立的問題，與關於資本政權，關於推翻帝國主義，關於無產階級革命的總問題沒有關係的問題。一般默認歐洲無產階級，不與殖民地的解放運動直接聯合起來，也可以得到勝利，民族殖民地問題，離開無產階級革命底大路，不進行反帝國主義的革命鬥爭，也可以從容地『自流地』得到解決。現在，這種反革命的觀點，應當認爲是已經被揭破的了。列寧主義證明了，而帝國主義大戰和俄國革命更證實了，民族問題，祇有與無產階級革命聯繫起來且在無產階級革命底基礎上才能得到解決，而西方革命勝利底道路，須經過與殖民地和附庸國家反帝國主義的解放運動的革命聯盟。民族問題乃是關於無產階級革命的總問題底一

部份，乃是關於無產階級專政問題底一部份。

問題是這樣的：被壓迫國家革命解放運動內部所含蓄着的革命可能性，是否已經竭盡了？如果沒有竭盡，那麼，是否有希望和根據爲着無產階級革命去利用這些可能性，把殖民地和附庸國家，由帝國主義資產階級底預備軍變爲革命的無產階級底預備軍，變爲無產階級底同盟者呢？

列寧主義對這個問題的答案是肯定的，就是說，承認被壓迫國家底民族解放運動內部有革命能力，認爲可以利用這些能力來推翻共同的敵人，來推翻帝國主義。帝國主義發展底機構，帝國主義大戰和俄國革命完全證實了列寧主義對於這一點的結論。

由此可見，無產階級方面有對被壓迫和附庸民族底民族解放運動予以支持，予以堅決而積極的支持的必要。

當然，這並不是說，無產階級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時候，在一切個別具體情形之下對於任何的民族運動都要加以幫助。這裏是指幫助力謀削弱並推翻帝國主義而不是力

謀鞏固並保持帝國主義的民族運動而言。也有這樣的情形，就是個別被壓迫的國家底民族運動會和無產階級運動發展底利益發生衝突。很明顯的，在這種情形之下，談不到什麼幫助。關於民族權利的問題，並不是一個孤立的和自願自的問題，而是無產階級革命這個總問題底一部份，牠服從整個的問題，並且要求要從整個問題底觀點上去觀察。馬克思在十九世紀四十年代即贊成波蘭人的和匈牙利人的民族運動，而反對捷克人底和南斯拉夫人底民族運動。爲什麼呢？因爲當時捷克人和南斯拉夫人是「反動的民族」，是「俄國在西歐的前哨」。是君主專制制度底前哨，而波蘭人和匈牙利人當時都是反對君主專制制度的「革命的民族」。因爲在當時，幫助捷克人底和南斯拉夫人底民族運動，就是表示間接幫助沙皇制度，幫助歐洲革命運動最危險的敵人。

列寧說：

「民主底個別要求，民族自決也在內，不是一個絕對的東西，而是總的民主主義的（現在是總的社會主義的）世界運動底一部分。也許在個別的具體的情形之

下，局部和總體會發生矛盾，那時就應該拋棄局部的。」（請參看『列寧全集』第十九卷，第二五七到二五八頁。）

如果不是從形式的觀點上，不是從抽象的法權的觀點上，而是具體地從革命運動利益的觀點上來估量個別民族運動的話，那末關於個別民族運動的問題，關於這些運動底可能的反動性質的問題，就是這樣的。

關於一般民族運動底革命性質，也可說是如此。極大多數民族運動之毫無疑義的革命性，也正與某些個別民族運動之可能的反動性一樣，都是相對的和特殊的。在帝國主義壓迫的環境中間，民族運動底革命性質，並不以這個運動須有着無產階級份子底參加，並不以這個運動須有着革命的或共和的政綱，並不一定以這個運動須有着民主的基礎為前提。阿富汗國王爭取阿富汗獨立的鬥爭，客觀上是個革命的鬥爭，不管這個國王及其戰友是抱着君主制的觀點，因為這一鬥爭是在削弱着，破壞着和消滅着帝國主義；反之像克倫斯基和蔡雷特利，倫諾德爾和謝德曼，齊爾諾夫和唐恩，漢德

遜和克萊因斯，這些『激烈的』民主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革命家』和共和派，他們在帝國主義大戰時的鬥爭，却是反動的鬥爭，因為這一鬥爭底結果是粉飾和鞏固帝國主義，使帝國主義取得勝利。埃及商人和資產階級智識份子爭取埃及獨立的鬥爭，因為同樣的原因，客觀上也是革命的鬥爭，不管埃及民族運動底首領們都是由資產階級的出身，和資產階級的身份，不管他們是反對社會主義的；反之，英國工黨政府主張保持埃及附庸地位的鬥爭，因為同樣的原因，却是反動的鬥爭，不管該政府底閣員都是無產階級的出身，無產階級的身份，不管他們『贊成』社會主義的。關於其他較大的殖民地和附庸國家，如印度和中國底民族運動，我就不說了，這些國家踏上解放道路的每一步驟，即使是違反着形式的民主底要求，也還是對帝國主義的一個嚴重的打擊，即無疑地它是個革命的步驟。

列寧說得很對：對於被壓迫國家底民族運動，不應該從形式的民主底觀點上去估量，而應該從反帝國主義鬥爭底總結算中的實際結果去估量，就是說，『不應該孤立

地去估量，而應該在世界範圍內去估量。」（請參看『列寧全集』，第十九卷，第二五七頁）

（一）被壓迫民族底解放運動與無產階級革命。列寧主義在解決民族問題時，是從下面的原理出發的：

（1）世界分成了兩個營壘：一個就是區區少數文明民族的營壘，這些民族擁有財政資本，而剝削地球上絕大多數的人口；另一個是殖民地和附庸國家被壓迫和被剝削的人民的營壘，這些人民佔着地球上人口的絕大多數。

（2）被財政資本所壓迫和所剝削的殖民地和附庸國家，乃是帝國主義底最偉大的後備軍和最重要的力量來源。

（3）殖民地和附庸國家被壓迫人民反對帝國主義的革命鬥爭，乃是他們擺脫壓迫及剝削的唯一道路。

（4）最重要的殖民地和附庸國家已經走上了民族解放運動底道路，這一運動不能

不引起全世界資本主義底危機。

(5) 先進國家內的無產階級運動和殖民地民族解放運動底利益，要求這兩種革命運動須聯合而爲一條共同的戰線，來反對共同的敵人，反對帝國主義。

(6) 如不建立和鞏固共同的革命戰線，那先進國家內工人階級底勝利和被壓迫人民之擺脫帝國主義的羈絆，是不可能的。

(7) 如壓迫民族無產階級方面對於被壓迫民族底解放運動不加以直接的和堅決的援助，以反對『祖國的』帝國主義，那麼共同革命戰線底成立是不可能的，因爲『壓迫其他民族的民族，是不能夠自由的。』（馬克思底話）

(8) 這一援助，就是表示對民族有分立權，有獨立的國家的存在權一口號的主張擁護和實行。

(9) 假如不實行這一個口號，便不可能去調整各民族在統一的世界經濟中的聯合和合作，這個統一的世界經濟就是社會主義勝利的物質基礎。

(10)這一聯合祇能是自願的，基於各民族的相互信任和相互友愛關係而發生的。因此，民族問題上有兩個方面，兩個趨勢：一種趨勢是傾向於政治上擺脫帝國主義的羈絆，而成立獨立的民族國家，這一趨勢是基於帝國主義的壓迫和殖民地的剝削而發生的；另一種趨勢是傾向於各民族的經濟的接近，這一趨勢是因世界市場和世界經濟底形成而發生的。

列寧說：

「日益發展的資本主義，在民族問題上有兩個歷史的趨勢。第一趨勢是：民族生活和民族運動底醒覺，反對一切民族壓迫的鬥爭，民族國家底創立。第二個趨勢是：各民族間各種聯繫底發展和頻繁，民族界線底破壞，資本、一般經濟生活、政治、科學等等底國際統一之創立。這兩個趨勢都是資本主義底世界規律。第一個趨勢盛行於資本主義發展底初期；第二個趨勢則是已經成熟並走向轉變為社會主義社會的資本主義之特點。」（請參看『列寧全集』第十七卷，第一三九

到一四〇頁。）

這兩個趨勢對於帝國主義，是不可調和的矛盾，因為帝國主義非剝削殖民地，非用暴力將殖民地強制在『統一的整體』底範圍內，是不能夠生存的，因為帝國主義祇有靠吞併手段和奪取殖民地才能使各民族相接近，不然，一般說來，牠就不能成爲帝國主義了。

這兩個趨勢對於共產主義，恰恰相反，不過是一件事情底兩面，就是說，是使被壓迫民族擺脫帝國主義羈絆的一事底兩面，因爲共產主義知道，各民族在統一的世界經濟中的聯合，祇有根據相互信任和自願協定的原則才有可能；成立各民族自願聯合的道路，就只有使殖民地與『統一的』帝國主義的『整體』分立，把牠們變爲獨立的國家。

因此，必須與統治民族（英、法、美、意、日等）『社會主義者』底大國的排外愛國主義作頑強的、不間斷的、堅決的鬥爭，這些『社會主義者』，不願意與本國的帝國主義政府做鬥爭，不願意幫助『他們的』殖民地底被壓迫民族擺脫壓迫，謀得國家

分立的鬥爭。

沒有這一鬥爭，就不可能以真正國際主義底精神，以與附庸國家和殖民地勞動羣衆接近的精神，以真正準備無產階級革命的精神，來教育統治民族的工人階級。如果俄羅斯無產階級沒有舊俄帝國內各被壓迫民族方面底同情和援助，那末，俄羅斯革命也許不會勝利，而柯恰克和鄒尼金也許不會被擊潰。但是爲了獲得這些民族底同情和援助，俄羅斯無產階級就先應該打破俄國帝國主義底鏈子，使這些民族擺脫民族的壓迫。不做這個工作，也許不可能去鞏固蘇維埃政權，樹立真正的國際主義，創造那叫做『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而爲將來各民族在統一的世界經濟中聯合起來的蘇維埃總各民族合作底絕好的組織。

第三、要促進鬥爭，以反對被壓迫國家社會主義者底民族的閉關主義、狹隘觀念、經濟排他性，這些社會主義者不願意高出於自己的民族的鐘塔以上，不了解自己國家的國際性運動及蘇維埃國家底無產階級運動的聯繫。

沒有這樣的鬥爭，便不能保持被壓迫民族無產階級底獨立的政策，便不能保持她和統治國家無產階級的階級的聯合，以推翻共同的敵人，推翻帝國主義。沒有這樣的鬥爭，國際主義是不可能的。

以革命的國際主義的精神來教育統治民族和被壓迫民族的勞動羣衆的道路，便是如此。

請看列寧關於共產主義這個以國際主義精神來教育工人的兩面工作所說的話罷：

「這種教育……，在強大的，壓迫的民族中間和在弱小的，被壓迫的民族中間，在侵略的民族和被侵略的民族中間，能夠具體地相同嗎？」

顯然的是不能的。要達到同一的目的：即達到一切民族的完全平等，密切接近及進一步的合併，這兒顯然的要走各種不同的具體道路，這正好像從一張紙底左邊和右邊同可走向這張紙的中心點一樣。如果強大的，壓迫的、侵略的民族底社會主義者，一般地宣傳民族的合併，而有一分鐘忘記，「他的」尼古拉第二，他的

威廉第二，喬治，彭加勒等也在主張與小民族「合併」（用侵略手段）——尼古拉第二主張與加里西亞「合併」，威廉第二主張與比利時「合併」等，——那麼，那麼這樣的社會主義者，在理論上就是書獃子，在實踐上就是帝國主義底幫手。

在壓迫的國家中，工人的國際主義教育底重心，勢必在於鼓吹和堅持被壓迫國家有分立的自由。不然，便不會有國際主義了。壓迫民族的社會主義者，如果不做這種宣傳，那末我們就有理由而且應該鄙視他，稱他爲帝國主義者，稱他爲惡棍。這是一個無條件的要求，雖然在社會主義未成功以前，分立底機會有可能和「可以實現的」祇有千分之一……

反之，弱小民族的社會主義者，應當把自己鼓動底重心放在我們的總公式的第二句話上，即各民族底「自願聯合」。他既可以贊成本民族底政治獨立，也可以贊成本民族包括在鄰近的X、Y、Z國家以內，而並不違反自己的國際主義者底義務。但無論如何，他必須要反對弱小民族的狹隘觀點，閉關主義、孤獨思想，必須

要顧到全體和總體，必須主張部分的利益要服從全體的利益。

沒有思索過問題的人，會以爲壓迫民族的社會主義者主張「分立的自由」而被壓迫民族的社會主義者，却主張「聯合的自由」，是相矛盾的。但是祇要稍微思索一下，就可知道，要從現狀達到國際主義和民族合併的道路，達到這個目的、「別的道路是沒有的，而且是不能有的。」（請參看『列寧全集』第十九卷

第二六一到二六二頁）

論南斯拉夫的民族問題

——一九二五年三月三十日在共產國際執委南斯拉夫委員會上的講演——

同志們！我認爲舍米契同志並沒有充分認清楚布爾塞維克對於民族問題提法的主要本質。布爾塞維克，無論在十月革命前或在十月革命後，都從來沒有把民族問題與革命的總問題分開過。布爾塞維克對於民族問題的態度本質，就在於布爾塞維克歷來考察民族問題總是跟革命的前途密切的聯繫在一起的。

舍米契同志引證列寧的話，說列寧曾經主張在憲法中民族問題規定的某種解決。顯然的，舍米契同志的這種說法，意思是說，彷彿列寧曾認爲民族問題即是憲法的問題，也就是說，不是革命的問題，而是改良的問題。這是完全不對的。列寧從來沒有作過而且也決不會作這種憲法的幻夢。只要把他的著作看一下，就可以相信這點。即使列寧曾經說過憲法，他的意思也不是指解決民族問題的憲法手段而言，而是指革命的

手段而言，就是說，他把憲法只是看作革命勝利的一種結果。我們蘇聯也有憲法，而且這個憲法確實也反映着民族問題的某種解決。可是，這個憲法的問世，並不是與資產階級妥協之結果，而是勝利的革命之結果。

其次，舍米契同志又引證我在一九一二年所著的關於民族問題的一本小冊子，竭力想在那裏找出間接的論據以證明他自己的正確。不過這一引證，却是沒有結果的，因為他不僅沒有找到而且也不能找到一個引證，而且也沒有找到並且也不能找到半點含糊的暗示來證明他的民族問題的『憲法觀點』。爲了證實這一句話起見，我可以從那本書上引一段話給舍米契同志看，在那一段話中我曾把奧地利式的解決民族問題的方法（憲法的）與俄國馬克斯主義者的解決方法（革命的）對立了起來。

那一段話如下：

「奧地利人想用微小的改良，緩慢的步驟，來實現「民族的自由」。當他們提出民族自治當作實踐的辦法時，他們並沒有預料到根本的改變，民主解放運動這

一運動在他們的前途上是沒有的。但是俄國馬克思主義者却把「民族自由」的問
題跟或然的根本改變，跟民族解放運動聯繫起來，並沒有理由去作改良的打算。

這從俄國各民族的或然的命運說來，在本質上根本改變了問題。」

我想，這裏說得很明白了吧。

這并不是斯大林個人的觀點，而是俄國馬克思主義者的共同觀點，俄國馬克思主
義者過去和現在總是跟革命的總問題密切聯繫在一起來考察民族問題的。

可以毫不猶豫地說，在俄國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上，民族問題的提法，曾經有兩個
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十月革命以前的時期；第二個階段是十月革命的時期。在第一個
階段上，民族問題被視作了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總問題的一部分，也就是說，被視
作工農革命專政的問題的一部分。在第二個階段上，民族問題已經擴大，而變成了關
於殖民地的問題，民族問題已經由國家內部的問題變成了世界的問題——這時候民族
問題已經是被看作無產階級革命的總問題的一部分，即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問題的一

部分。瞧吧，無論在這兩個階段的任何一個階段上，對於這個問題的態度，都是嚴格地革命的。

我想，舍米契同志並沒有完全弄明白這一切。因此，他企圖把民族問題降低到憲法的立場上，就是說，把民族問題當作改良的問題。

從這錯誤中又產生出了他的別一個錯誤，這第二個錯誤就在於他不願意把民族問題在實質上看作農民問題。這並不是土地問題，而是農民問題，因為這是兩件不同的東西。至於說民族問題不能與農民問題視作一個東西，因為除了農民問題之外，民族問題還包括民族文化、民族國家等等問題，那是完全正確的。不過，民族問題的基礎，它的內在的本質，仍是農民問題，這也是毫無疑義的。所謂農民是民族運動的基本軍隊，沒有農民這支軍隊，就沒有而且也不會有強大的民族運動，即可以此來說明的。所謂民族問題，在實質上就是農民問題，正是指這點而說的。我想，舍米契同志之所以不願意接受這個公式，也就是因為他輕視了民族運動的內部力量，而不了解民族

運動之深刻地民衆的，深刻地革命的性質。這一不了解和輕視，是一種莫大的危險，因為牠們在實踐上就是表示對運動（例如霍爾瓦特的民族解放運動）中所藏着的內在的潛力的輕視，這一輕視對於整個南斯拉夫的共產黨是一種嚴重的複雜問題。

這就是舍米契同志的第二個錯誤。

舍米契同志企圖把南斯拉夫的民族問題，與國際的環境及歐洲的或然的前途不聯繫起來研究，毫無疑義的，也是錯誤的。舍米契同志根據現時在霍爾瓦特民族和斯拉夫民族中沒有什麼重大的民衆運動，便得了一個結論說，民族分立權的問題，是學院式的問題，至少也不是一個迫切的問題。這種說法，當然是不對的。即使同意於這個問題在現時不是一個迫切的問題，然而如果戰爭一開始或在戰爭開始的時候，如果歐洲革命一爆發或者在革命爆發的時候，這個問題仍可成爲一個十分迫切的問題。但戰爭是必然要開始的，他們必然是要打起架來的，如果把帝國主義的本質和發展觀察一下，那末這是毫不容懷疑的。

在一九一二年，當我們俄國馬克思主義者草就民族綱領第一個草案的時候，在俄羅斯帝國的無論那一個邊疆，都還沒有什麼重大的民族獨立運動。可是，那時我們就認為在我們的綱領裏面必須包括民族自決權，即每個民族有分立之權和獨立的國家權存在之這一項。爲什麼呢？因爲我們不僅以當時現有的事實爲出發，而且以國際關係的總系統中所發展和到來的東西爲出發，換一句話說，那時我們不僅要顧到現在，同時也要顧到將來。而且我們知道，如果某一民族要求自立，那末俄國馬克思主義者定要力謀使每個這種民族都能獲得分立權。舍米契同志在他的演講中屢次引證斯大林論民族問題的小冊子。茲引斯大林在這本小冊子中關於民族自決和獨立所說的一段話：

『歐洲帝國主義的發展，並不是偶然的。在歐洲資本已經感覺到狹隘了，因此他就力謀侵入他國去找尋新的市場，找尋廉價的工人，找尋新的投資場所。但是這要引起外部的紛亂和戰爭。在某種內外局勢配合之下，俄羅斯的某一民族乘機提出和解決自己獨立的問題，即是完全可能的。當然，在這種情形之下，馬克

思主義者用不着去阻礙牠。」

這還是在一九二二年說的。大家知道，這幾句話，後來在大戰時和戰後，尤其在俄國無產階級專政勝利以後，就完全證實了。

我們更有理由可以說，在歐洲各地，尤其是在南斯拉夫，特別是在被壓迫國家民族革命運動日益深入和俄國革命勝利後的現在，更要考慮到這種可能性。南斯拉夫並不是一個完全獨立的國家，他與某種帝國主義集團聯繫在一起，因之，他不能逃出南斯拉夫境外所作的那大規模的力量競技，這一點也須加以注意。如果你要替南斯拉夫共產黨起草一個民族的綱領——現在所說的正就是這一點——那末，你就必須牢記着，這種綱領不僅要根據現時所有的事實，同時也要根據現在正發展着的及將來由於國際關係勢必發生的現象。所以，我認爲關於民族自決權的問題，必須當作一個非常切於實際的迫切的問題。

現在來講民族綱領罷。民族綱領的出發點應是南斯拉夫蘇維埃革命的論題，即

不推翻資產階級，不獲得革命勝利，則民族問題就不能有完滿的解決這個論題。當然，也有例外。例如在大戰前，挪威脫離瑞典而獨立就是一個例外。關於這點，列寧曾經做過一篇文章很詳細的講到過。不過這是在大戰以前，且在各種順利的環境特別適合之下發生的。在大戰以後，尤其在俄國蘇維埃革命勝利以後，這種機遇就很難得到了。不論如何，現在有利於這種可能性的機會已經少到幾等於零了。但是要是果真這樣，那麼，很明白的我們就不能制定『幾等於零』的綱領了。所以，革命的論題，應當作爲民族綱領的出發點。

其次，在民族綱領中務須加入關於民族自決權乃至國家分立的特別一項。在現時內部的和國際的形勢之下，何以非加上這一項不可的理由，我在前面已經說過了。

最後，南斯拉夫有些民族，還得有需要與南斯拉夫分離，關於這些民族的民族疆土的自治，在民族綱領中也應當有一專條，明文規定。有人認爲這一項可以去掉，這是不對的。這完全是錯誤的。在某種條件之下，在南斯拉夫蘇維埃革命勝利的結果，有

些民族不願脫離南斯拉夫，這是很可能的。例如在我們俄國就是如此。顯然的，在這種情形之下，在綱領中必須要有自治的一條，這意思就是說，將南斯拉夫國家基於蘇維埃制度加以改造而為一個各自治民族國家的聯邦。

總之，那些願意分離的民族，必須予以分立權，那些甘願留在南斯拉夫國家範圍內的民族，就必須予以自治權。

爲了免除誤會起見，我必須聲明一下，就是切不可把分立權理解爲分離的義務或責任。各民族在分立一義上可以享受這一權利，但是如果他不願意的時候，也可以不享受這種權利——享受與否，這是他自己的自由，這一點不能不加以注意。有些同志把分立權變爲一種應盡的義務，比方他們要求霍爾瓦特人無論如何要實行分立。這種立場是不正確的，是應當去掉的。決不可將權利與義務混爲一談。

（一九三五年四月十五日「布爾塞維克」第七期）

東方大學(註)的政治任務

——一九二五年五月十八日在東方大學學生會議上的演說——

同志們！在東方勞動大學成立的四週年紀念日，首先讓我向諸位致敬禮。我希望你們的大學在培養東方共產主義幹部的艱難道路上的種種成功，那就不待言了。

其次，讓我道歉的，就是我雖然應該常常來，但是我却很少到你們大學裏來。忙些甚麼呢？——因為事務繁忙，沒有常來與你們見面的可能。

現在我們來談談關於東方勞動大學政治任務的問題罷。

要是把東方勞動大學的成分，分析一下，那便不能不指出這成分的若干兩重性。

這個大學團結了不下五十種東方民族和入種集團的代表者。東方大學的學生，他們都

(註)按東方大學原名全譯出來應是「斯大林東方勞動共產主義大學」，一般簡稱

東方大學，故譯者為便利起見，仍用簡稱。——譯者。

是東方的兒女。但是這個定義還不算怎樣明顯與完善。原因是在東方大學的學生中間，有兩個主要的部份，這兩個部份代表着兩種完全不同的發展條件。第一部份大多是從蘇維埃的東方來到此地的人，即是從資產階級政權已經滅絕、帝國主義壓迫已經推翻、而工人已經當政的地方來的。

第二部份學生，這是從殖民地 and 附庸國家來到此地的人，即是從資本主義仍統治一切、帝國主義壓迫尚保留其全力，而還需爭取獨立，驅逐帝國主義的這些地方來的。因此，我們看到，有兩個東方，他們過着不同的生活，發展在不同的條件之下。

這種學生成份的兩重性，在東方勞動大學的工作上，不能不印下自己的印跡，這是不用說的了。這正說明了這個大學，一隻脚是立在蘇維埃的地上，一隻脚是立在殖民地和附庸國家的地上。

因此，東方大學的活動，有兩條路線：一條路線是造就可以應付東方各蘇維埃共和國需要的幹部；而另一條路線是造就可以應付東方各殖民地和附庸國家勞動羣衆革

命要求的幹部。

因此，在東方勞動大學之前，產生了兩種任務。

現在就分別來考究東方大學的這兩種任務罷。

一 東方大學對於東方各蘇維埃共和國的任務

這些地方，這些共和國的生存和發展跟殖民地和附庸國家不同的特質是在什麼地方呢？

第一，是在於這些共和國已經解除了帝國主義的壓迫。

第二，是在於他們不是在資產階級秩序庇護之下，而是在蘇維埃政權庇護之下，作爲一個民族，正在發展着和團結着。這是歷史上無與倫比的事實，但是這究竟是事實。

第三，是在於牠們在工業上雖不大發達，但是他們在自己的發展中可完全依靠蘇聯工業無產階級的幫助。

第四，是在於這些共和國，已經解除了殖民地的壓迫，處於無產階級專政保護之下，并且是蘇聯的一分子，所以他們可以而且應該加入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

主要的任務就在於助進這些共和國工人農民加入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按照這些共和國的獨特的存在條件，創造並發展可以推進和加速這個聯合的前提。

因此在東方蘇維埃積極工作份子的前面，產生了許多迫切的任務。

一、在東方各蘇維埃共和國建立工業中心，作爲團結農民於工人階級週圍的基礎。你們知道，這個事業已經開始，並且將依蘇聯經濟增長的程度而前進。這些共和國有各種原料，這便是這個事業與時俱進到底的保證。

二、振興農村經濟，尤其灌溉事業；你們知道，這個事業也有進展，至少在高加索，和土耳其斯坦。

三、提倡並推進農民和手工業者廣大羣衆的合作事業，這是把東方各蘇維埃共和國包括在蘇維埃經濟建設總體系內的最可靠的方法。

四、使蘇維埃接近羣衆，使蘇維埃的成分成爲民族的，以便樹立勞動羣衆所接近所理解的民族蘇維埃國家。

五、發展民族文化，廣設用本族語言講授的普通教育與職業技術性質的學校及訓練班網，以便從本地人當中養成蘇維埃的、黨的、及職業經濟的幹部。

完成這些任務也就是說促進了東方各蘇維埃共和國社會主義的建設事業。

有人說建立蘇維埃東方的模範共和國。然則什麼是模範共和國呢？所謂模範共和國者，即是能忠實而自願地執行所有這些任務、因而可創造一個吸引鄰近各殖民地和平庸國家工農趨向解放運動的一種共和國。

關於蘇維埃的接近各民族的勞動羣衆，關於蘇維埃的民族化，我在上邊已經說過了。然而這是什麼意思呢？他在實踐上的表現是怎樣的呢？我想，不久以前在土耳其斯坦剛完結的民族的劃界，可算作這樣接近羣衆的模範，資產階級的報紙，把這種劃界認爲是『布爾塞維克的詭計』。然而，很明顯的，這裏所表現的不是『詭計』，而

是土克門和烏芝別克民衆願有爲他們所接近所理解的自己的權力機關的深遠意志。在革命以前的時代，這兩個地方都被分裂成好多塊可汗和國家，以供一般「富有權力」的剝削者陰謀之漁利場。現在時候到了，這些被分裂的小塊，得以重新聯合而爲獨立的國家，以便烏芝別克和土克門的勞動羣衆與權力機關接近而打成一片。土耳其斯坦的劃界，首先就是爲了使這些地方被分裂的各部份，重新聯合而爲獨立的國家。要是後來這些國家願意加入蘇聯作爲平等的一員，這不過是說找到了理解東方民衆深遠意志的鎖鑰，而蘇聯則是在世界上唯一的各民族勞動羣衆自願的聯合。資產階級爲了使波蘭重新統一起來，需用許多次戰爭。而共產黨人爲了使土克門和烏芝別克重新統一起來，僅需要幾個月工夫的說明宣傳就可以了。

由此可知，使行政機關（蘇維埃）與各民族的廣大的勞動羣衆接近，是如何的必
要了。

布爾塞維克的民族政策乃是唯一正確的政策，其證據就在這裏。

其次我曾講過提高東方各蘇維埃共和國的民族文化。但是什麼是民族文化呢？如何把牠與無產階級的文化聯合起來呢？列寧不是在大戰以前就說：我們有兩種文化——資產階級的和社會主義的，而民族文化的口號則是資產階級底反動的口號，資產階級極力想用民族主義的毒劑來毒害一般勞動者的意識。如何把建設民族文化、以本地言語發展學校和訓練班、培養地方幹部，跟建設社會主義建設無產階級文化相配合起來呢？這裏有沒有不可越過的矛盾？當然是沒有的！我們是在建設無產階級的文化。這完全是對的。但是無產階級的文化，其內容是社會主義的，它在被播入社會主義建設的各人民當中，依語言、風俗等等的不同，而採取了各種不同的表現形式和方法，這同樣也是對的。內容，是無產階級的；形式，是民族的——這就是社會主義所走向的全人類的文化。無產階級的文化，並不取消民族的文化，而是給牠以內容。反之，民族的文化，也不取消無產階級的文化，而是給牠以形式。當資產階級當政，而民族的團結是發生在資產階級秩序保護之下的時候，民族文化的口號，乃是資產階級

的口號。當無產階級當政，民族的團結是發生在蘇維埃政權保護之下的時候，民族文
化的口號，乃是無產階級的口號。誰不明瞭不同的環境的這兩個原則上的區別，便永
遠不會了解列寧主義，更不會從列寧主義觀點了解民族問題的本質。

有人解釋謂（如考茨基），在社會主義時代，其他一切語言將滅亡，而創造一個
統一的全人類的語言。我不相信這個統一的包括一切的語言之理論。無論如何，經驗
不是在擁護，而是在反對這個理論。直到現在，事實是這樣的，即社會主義革命並不
是減少，而是增加了語言的數目，因為牠激動最下層的人類，並推動他們走上政治舞
台，而喚醒了許多新的民族，從前不出名或不大出名的，來過新的生活。誰會想到舊
的俄羅斯帝國有着不下五十種民族和人種的集團。然而十月革命，突破舊的鎖鏈，而
推動許多被忘却的人民和民族走上舞台，給了他們以新的生活和新的發展。現在人們
都說印度是一個整個的。然而不容置疑的，要是在印度革命激動起來的時候，將有數
十種從前不大出名而有自己獨特語言，獨特文化的民族，出現於舞台。若說到各種民

族與無產階級文化的聯合，那毫無疑義的，這個聯合將是以適應這些民族的言語和風俗的方式來進行的。

不久以前，我曾接到一些布雅特同志的來信，請求我對全人類文化與民族文化的相互關係的重要而困難的問題，加以說明。該信說道：

『務懇將下面的幾個對我們非常重要而困難的問題加以解釋；共產黨的終極目的，是統一的全人類文化。怎樣經過我們各個自治共和國境內所發展的民族文化而轉到統一的全人類文化呢？各個民族文化的特性（語言等等）怎樣能同化起來呢？』

我想，上面說的，就可以答覆布雅特同志們所望心的問題了。

布雅特的同志們，提出了在建設全人類的無產階級文化的行程中各個民族同化的問題。無疑的，有些民族會遭受，也許一定要遭受同化的過程。這種過程，從前也是有的。但問題是在於一種民族的同化過程，並不排斥，而且以好多強大民族的強盛和

發展的相反的過程爲前提，因爲局部的同化過程，乃是各民族發展總過程的結果。唯其如此，有些個別民族的可能的同化，不但不削弱，反而證實了這個完全正確的論題，即無產階級的全人類的文化，不但不排斥，反而以民族的文化爲前提，反而要滋生民族文化，正如民族文化不但不排斥，反而補充無產階級的全人類的文化，使它更加豐富。

大體說來，擺在東方各蘇維埃共和國積極工作人員前面的迫切任務，便是如此。這些任務的內容和性質，便是如此。

必需利用已經到來的緊張的經濟建設和對農民新讓步的時期，提前完成這些任務，以便促進東方各蘇維埃共和國（這些共和國主要都是農民的國家）與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配合。

有人說，黨對於農民的新政策，給了好多新的讓與（短期出租、允許雇用勞動）、含有若干讓步的成分。這對不對呢？是對的，但是這是這樣一種讓步的成分，就是

我們是在黨和蘇維埃政權方面仍保持巨大的優越勢力之下方允許牠們的。貨幣的穩定、工業的發展、運輸的發達、信用體系的鞏固——依靠信用體系，經過優惠放款，可以使任何人口階層破產或提至最高階段，而不發生絲毫的風波——這都是無產階級專政手中的後備力量，基於這些後備力量，戰線上某一部份的若干讓步成分可以促進全部戰線上進攻的準備。唯其如此，黨對農民的若干新的讓步，將來不會阻礙，而在現時定可促進農民與社會主義建設的配合。

這種情形對於東方各蘇維埃共和國有什麼意義呢？它也許僅有這樣的意義，即在這些共和國積極工作分子手中給以新的武器，這一武器可以促進和加速這些國家與蘇維埃經濟發展總體系的聯合。

黨對農村的政策，與擺在蘇維埃東方積極工作份子面前的迫切任務之間的聯繫，便是如此。

因此之故，東方大學對於東方各蘇維埃共和國的任務，就在於為這些共和國培養

幹部，以保證上面所說的迫切任務的完成。

東方大學是不能脫離實際生活的。牠不是而且也不能是一個超於實際生活的機關。牠應以自身生存的一切根莖，與實際生活聯繫起來。因此之故，牠不能撇開擺在東方各蘇維埃共和國面前的迫切任務。所以，東方大學的任務，就在於注意這些共和國的迫切任務，爲牠們培養適當的幹部。

說到這裏，蘇維埃東方積極工作份子實踐中的兩種傾向，也須要加以指出，爲了給蘇維埃東方培養真實的幹部，和真實的革命者，在該大學內與這兩種傾向作鬥爭是很必要的。

第一種傾向，就在於把我在上面所說的那些責任，看的太簡單，企圖很機械地把經濟建設的模範搬過去，這些模範，僅在蘇聯中心是完全明瞭和適用，而對於所謂邊疆地方發展的條件，並不適合。同志們，犯這種傾向的人，不明白兩件事情：他們不懂得中心與『邊疆』的條件，並不是相同的，並不是一樣的。此外，他們不明白東

方各蘇維埃共和國本身，也不是清一色的，其中有的，例如喬治亞和阿美尼亞，民族的構成，已達到最高階段；而別的，例如柴赤尼和卡巴達，民族的構成，却很低下；第三種，例如吉爾吉斯斯坦又處於這兩端的中間地位。這些同志不明白，若是不適應各地方的情形，不嚴密考慮每個地方的所有一切特性，那是談不到什末重大的建設的。這一傾向的結果，便是與羣衆脫離，而蜕化成一種唱左的高調的人了。

第二種傾向，也爲相反，就在於誇大了各地方的特質，就在於忘記了那聯繫東方各蘇維埃共和國與蘇聯各工業區的一切共同者和主要者，就在於漠視社會主義的任務，去適應狹隘有限的民族主義的任務。犯這種傾向的同志們，很少注意本國內部的建設，他們情願聽其自然發展，在他們看來，主要的不是內部的建設，而是「對外」政策，自己共和國疆界的擴充與周圍各共和國打官司，希圖奪得鄰國一小塊多餘的土地，因此以取悅於本國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者。這一傾向的結果，便是與社會主義脫離，而蜕化爲普通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者。東方大學的任務，就在於以不妥協的與這些隱匿未發

的民族主義作鬥爭的精神中來培養幹部。

東方大學對於東方各蘇維埃共和國的任務就是如此。

二 東方大學對於東方殖民地及附庸國家的任務

現在來講第二個問題，即關於東方大學對東方殖民地及附庸國家的任務的問題。

這些國家生存和發展跟東方各蘇維埃共和國不同特質是在什麼地方呢？

第一，是在於這些國家都是生活和發展在帝國主義壓迫之下。

第二，是在於兩重壓迫——內部壓迫（本國的資產階級）與外部壓迫（外國帝國主義的資產階級）的存在，加劇和加深了這些國家裏面的革命危機。

第三，是在於這些國家中，有些國家如印度，其資本主義以加强的速度正在生長着，而產生並形成了相當眾多的本地無產階級。

第四，是在於隨着革命運動的增長，這些國家的民族資產階級，遂分化成爲兩個

部份——即革命的（小資產階級）與妥協的（大資產階級）。其中前者仍在繼續着革命的爭鬥，而後者則與帝國主義攜手了。

第五，是在於在這些國家裏面，除帝國主義的聯盟以外，還形成了另一種聯盟，即工人與革命的小資產階級的聯盟，反帝國主義的聯盟，其目的是在從帝國主義之下完全解放出來。

第六，是在於在這些國家內，關於無產階級領導權和從妥協成性的本國資產階級的影響之下，把民衆解放出來的問題，一天天採取了潑辣的性質。

第七，是在於這種情況大大的促進這些國家民族解放運動，與西方先進國家無產階級運動的聯合。

由此，至少可以得出下列三個結論：

一，要使殖民地與附庸國家從帝國主義之下解放出來，非有勝利的革命不可，無代價的獨立你是得不到的。

二，要推進革命和取得資本主義已發展的殖民地與附庸國家完全的獨立，非使妥協的民族資產階級孤立起來，非把革命的小資產階級從妥協的民族資產階級的影響之下解放出來，非實行無產階級的領導權，非把工人階級中先進的份子組織在獨立的共產黨以內不可。

三，要在殖民地與附庸國家內達到堅固的勝利，非把這些國家的解放運動與西方先進國家的無產階級運動切實聯合起來不可。

殖民地和附庸國家共產黨人的基本責任，就在於在自己的革命工作中以這些結論爲出發點。

跟這些情況相聯繫起來，殖民地和附庸國家革命運動的迫切責任是在什麼地方呢？

現時殖民地和附庸國家的特質，就在於統一而包括一切的殖民地的東方，在世上還是沒有的，從前殖民地的東方是個統一而清一色的東西，現在這種想像已經跟現實

不符合了。現在殖民地附庸國家至少有三種：第一種爲摩洛哥一類的國家，牠們沒有或者差不多沒有自己的無產階級，工業極不發展；第二種是中國和埃及一類的國家，工業很少發展，僅有比較微少的無產階級；第三種是印度一類的國家，資本主義相當發展，而有相當衆多的民族無產階級。

很明顯的，把這三種國家相提并論是不可以的。

在摩洛哥這類的國家內，還沒有理由把民族資產階級分爲革命的與妥協的兩派，對於此等國家，共產主義份子的任務，就在於採用一切手段，造成反對帝國主義的民族統一戰線。在這些國家裏面，要把共產主義份子劃分成一個單獨的政黨，只有在反帝國主義的鬥爭進程中，特別是在反對帝國主義的勝利的革命戰爭以後才行。

在埃及或中國這類國家內，民族資產階級已經分化成革命的和妥協的兩派，但是妥協的一部份資產階級，還不能與帝國主義聯成一氣，因此，共產黨人已經不能以成立反帝國主義的民族統一戰線爲自己的目的。因此，在這些國家裏面，共產黨人應該從民

族統一戰線的政策，進到工人與小資產階級革命聯盟的政策。這一聯盟，在這些國家內，可以採取統一的政黨，工農政黨的方式，如「國民黨」（五四）之類。但在事實上須使這種特殊的政黨，成爲兩種力量的聯盟，即共產黨與革命的小資產階級政黨的聯盟。揭破民族資產階級的動搖性和不徹底性，並與帝國主義作堅決的奮鬥，這就是這聯盟的任務。這種兩重成份的政黨，如果牠不牽掣共產黨的手足，如果牠不妨礙共產黨鼓動和宣傳工作的自由，如果牠不阻撓無產階級團結在共產黨的周圍，如果牠可以促進共產黨方面對於革命運動事實上的領導，那末這種政黨是需要的，而且是便宜的。假如牠不能滿足所有這些條件，那末這種兩重成份的政黨就用不着，就不大合宜，因爲牠只有使共產主義份子溶化在資產階級的隊伍中，使共產黨失去無產階級軍隊吧了。

至於印度這一類國家的情形，稍有不同。印度這種殖民地生存條件中的根本和新的東西，不僅在於民族資產階級已經分裂爲革命的與妥協的兩系，而且首先是在於資產階級的妥協派在大體上已與帝國主義妥協成功了。這一部分資產階級，他們對革命

的害怕比對帝國主義的害怕還利害，他們對於自己私人利益的關心，比對於自己祖國利益的關心更利害，這一部份資產階級最有錢，最有勢力，他們雙足都是站在革命死敵的營壘以內，而與帝國主義聯成一氣，來反對自己祖國的工農。不打破這一聯盟，休想得到革命的勝利。但是要打破這一聯盟，就須要集中火力，來反對妥協的民族資產階級，揭破他們的賣國行爲，把勞動羣衆從他們的影響之下解放出來，而有系統地準備無產階級領導權所必要的條件。換句話說，問題就在於印度這樣的殖民地內，訓練無產階級去擔負解放運動領袖的作用，一步一步把資產階級及其搖旗吶喊者從這個榮譽權地位推下來。成立革命的反帝國主義的聯盟，爭取得無產階級在這一聯盟當中的領導權，這就是責任。然這一聯盟可以採取——但並非永遠務須採取——統一的工農政黨的形式，在形式上用統一的綱領聯繫起來。在這種國家裏面，共產黨的獨立性，應該是共產主義先進分子的基本口號，因為無產階級的領導權，只有共產黨才能夠準備和實行。不過共產黨，爲了在反帝國主義的鬥爭中，使妥協的民族資產階級孤立起來，

自己來領導城市和鄉村千百萬小資產階級羣衆，他儘可以而且應該與資產階級的革命一翼成立公開的聯盟。

因此，資本主義發展的殖民地和附庸國家的革命運動的迫切任務應該是：

一、奪取工人階級的優秀份子到共產主義方面來，而成立獨立的共產黨。
二、成立工人農人和革命的智識份子的民族革命聯盟，以反對妥協的民族資產階級與帝國主義的聯盟。

三、保證無產階級在這聯盟當中的領導權。

四、力謀使城市和鄉村的小資產階級，從妥協的民族資產階級的影響之下解放出來。

五、保證解放運動與先進國無產階級運動的聯合。

擺在東方殖民地和附庸國家積極工作者面前的三類迫切責任，就是這樣的。

假如我們就今日國際的形勢來考察這些任務，那末他們都獲得了特別嚴重的性質

，和特別重大的意義。現時國際形勢的特徵，乃是業已到來的革命運動暫時沉寂的時期。然而究竟什麼是沉寂，在現時這種沉寂可以表示出什麼意義呢？牠只是表示對西方工人、對東方殖民地、尤其對蘇聯——各國革命運動的旗手——壓迫的加強。不庸置疑的，這種壓迫蘇聯的準備在帝國主義的隊伍中已經開始了。因愛莎尼亞暴動而對蘇聯的毀謗運動，因索菲亞炸案而對蘇聯的詭計陷害，資產階級報紙一般對蘇聯的抨擊，所有這些都是向我們進攻的準備階段。這是對輿論的砲兵的預備，爲的藉此訓練居民來猛烈攻擊蘇聯，並造成精神上的干涉前提。這些造謠誣蔑運動的結果如何，帝國主義者採取嚴重的進攻是否冒險，我拭目以俟之。不過這一抨擊，對於殖民地不會生效，這是不庸置疑的。所以，關於革命勢力聯合起來，準備迎擊帝國主義方面可能的侵犯的問題，乃是日程上不可避免的問題。

所以，對殖民地和附庸國家革命運動迫切任務的堅決執行，在現時獲得了特別重大的意義。

跟所有這些情況聯繫起來，東方大學關於殖民地 and 附庸國家的使命是在什麼地方呢？這一使命，就在於考慮這些國家革命發展的特點來培養從這些地方來的幹部，以保證以上所解釋的各個不同的迫切任務的完成。

東方大學聽講者約有十種不同的民族班，他們都是從殖民地和附庸國家來到我們這裏的。大家都知道，這些同志都在渴望得着光明和知識。東方大學的任務，就在於從他們當中訓練出真正的革命家，以列寧主義的理論來武裝他們，以列寧主義的實際經驗來供給他們，使他們能夠心甘意悅的毫無畏懼的去完成殖民地和附庸國家解放運動的迫切任務。

說到這裏，殖民地的東方的積極工作者的實踐中，有兩種傾向，尚須說幾句，要爲了培養真正的革命幹部，便必須與這種傾向作鬥爭。

第一種傾向，就在於把殖民地和附庸國家的解放運動的革新的可能性估計的不足，而將包攬一切的民族統一戰線的觀念估計的太高，不顧這些國家的發展的狀況和程

度。這是個向右的傾向，它含有降低革命運動和將共產主義份子溶化於資產階級民族主義者的一般聲調中的危險。同這一傾向鬥爭，乃是東方大學的直接的義務。

第二種傾向，就在於把解放運動的革新的可能性估量的太過，而把工人階級與革命的資產階級聯合起來以反對帝國主義一事估計的太低。爪哇的共產黨人，恰好就犯了這種傾向，不久以前，他們對於本國曾經很錯誤地提出了蘇維埃政權的口號。這是向左的傾向，它含有與廣大羣衆脫離和把共產黨變成宗派的危險。與這一種傾向作堅決的鬥爭，乃是爲東方殖民地和附庸國家培養真正革命的幹部之必要條件。

大體說來，東方大學對於蘇維埃的東方與殖民地的東方各民族的政治任務，就是如此。

我們希望，東方大學會忠實地能夠去完成這些任務。

(一九二五年五月二十二日「真理報」第一一五期)

再論民族問題

——關於舍米契的文章——

舍米契同志經過南斯拉夫委員會討論之後，現在在他的論文中完完全全同意共產國際俄國共產黨代表團的立場了；這是可以歡迎的事，但如果根據這一點，以為俄國共產黨代表團與舍米契同志之間，在南斯拉夫委員會討論前或討論時沒有過爭論，那是不對的。就外表看來，舍米契同志對於民族問題的爭論，似乎正是這樣想法的；他極力想把這種爭論歸咎於誤解。但可惜他完全錯了。他在他的文章中肯定地說，對他的爭論，完全出於『好多誤會』，這種『誤會』是由於他在南斯拉夫委員會上的一篇演講『沒有翻譯得充分』而引起的。換一句話說，就是他把一切爭論完全歸咎於翻譯者，為什麼他沒有把他的話完全翻譯出來。爲了真理起見，我不得不申明，舍米契同志的這種說法，是完全不合事實的。如果舍米契同志把他在委員會上所講的話（現在保存在共產黨

際的文庫裏）引證一段來證明他的這個申明，那當然要好些。但是不知道什麼緣故他沒有這樣做。因此之故，我不得不替舍米契同志來作這個不大愉快但卻必要的手續。

甚至在現在，舍米契同志跟俄國共產黨代表團的意見完全一致，而他的今日立場中依舊還有許多不清楚的地方，因此，此舉更爲必要了。

我在南斯拉夫委員會上的講演中（見布爾塞維克第七期）曾經說過，我們爭論的問題有三個：（一）是關於解決民族問題的方法的問題；（二）是關於特定的歷史階段上民族運動之內部的社會內容的問題；（三）是關於國際因素民族問題上的作用問題。關於第一個問題，我曾經說過，舍米契同志，並沒有完全弄明白布爾塞維克的民族問題提法的基本本質，他把民族問題跟關於革命的總的問題分離開來，這樣他便走到把民族問題完全歸結爲憲法問題的道路上去。

這種主張究竟對不對呢？

請你們把舍米契同志在南斯拉夫委員會上（一九二五年三月三十日）所說的下面

一段話讀一下後，自己去判斷罷。他說：

『可否把民族問題歸結爲憲法問題呢？首先，這是一個理論的提法。比方，在X國家中共有A，B，C三個民族。這三個民族，都申明他們願意相處在一個國家內。在這種情形之下，問題是在什麼地方呢？當然，是在於調整這個國家內的內部關係。就是說，這是個憲法秩序的問題。在這個理論的場合之下，民族問題便可歸結爲憲法問題了。……如果我們在這種理論的場合之下，把民族問題歸結爲憲法問題，那末我們可以說——我一向是側重這一點的——民族自決，直至民族分立，那是解決憲法問題的條件。只有在這一種立場上我才提出了憲法問題。』

我想，今天我們再讀這一段話，不該再做一些解釋了。很明顯的，凡是把民族問題看做屬於法學範圍的，而把這種問題的一個構成部分的人，就不會把民族問題歸結爲憲法問題。又轉來說，(一)有這三種理論主張屬於無產階級革命的總問題分開的人，才

會把民族問題歸結爲憲法問題。

舍米契同志的演說中，有一段話曾經說，不經革命的鬥爭，那民族自決權便不能獲得的。舍米契同志說：『很明白的，祇有用革命的鬥爭纔能獲得這種權利。這些權利決不是用議會的方法可以獲得的，祇有羣衆的革命的行動才能獲得。』但是何謂『革命的鬥爭』和『革命的行動』呢？可否把『革命的鬥爭』和『革命的行動』跟推翻統治階級、跟奪取政權、跟革命的勝利——解決民族問題的條件——混爲一談呢？當然是不可以的。把革命的勝利當作解決民族問題的基本條件，這是一回事；把『革命的行動』、『革命的鬥爭』當作解決民族問題的條件，那又是一回事。必須指出的，就是改良的道路，憲法的道路，並不排斥『革命的行動』和『革命的鬥爭』。在確定某一政黨是改良的政黨抑是革命的政黨時，主要的標準不是他的『革命行動』的本身，而是該黨所採取和所利用的政治目標和政治任務。大家都知道，俄國的孟塞維克，在第一次國會解散之後，在一九〇六年，主張舉行『總同盟罷工』，甚至『武裝暴動』。但

這並沒有絲毫妨礙他們仍是孟塞維克。因為要知道，他們那時候主張這樣幹究竟是爲什麼呢？當然並不是爲了破壞沙皇制度，也不是爲了造成革命的完全勝利，而只是爲了『加壓力』於沙皇政府，以期獲得改良、以期擴大憲法、以期召集『改善過』的國會。把政權仍保存在統治階級手中而主張改良舊制度的『革命的行動』，這是一回事，這是憲法的道路。主張破壞舊制度，推翻統治階級的『革命的行動』，這又是另一回事，這是革命的道路，這是革命完全勝利的道路。這裏有着根本的差別。

所以我認爲，舍米契同志，援引『革命的鬥爭』而把民族問題歸結爲憲法問題，並沒有推翻，只是證實了我所說的『舍米契同志並沒有完全弄明白布爾塞維克的民族問題提法的基本本質』這句話，因爲他不明瞭，民族問題不應當孤立地去研究，而應當與革命勝利的問題密切聯繫起來去研究，應當視作革命的總問題的一部分。

我只是堅持這一點，我並沒有想說，我關於舍米契同志對這一個問題的錯誤，又有什麼新的意見，絲毫沒有的。關於舍米契同志的錯誤，曼奴依爾斯基同志尙在共產

國際第五次大會上就已經說過，曼奴依爾斯基同志說：

「舍米契同志在其『馬克思主義中之民族問題』一小冊子以及其在南斯拉夫共產黨機關報『拉德尼克』上所發表的許多文章中，提出修改憲法的鬥爭，當作共產黨的實踐口號，換一句話說，他事實上把民族自決的全部問題僅僅歸結爲憲法的問題了。」（參看第五次大會記錄，五九六頁）

季諾維埃夫同志在南斯拉夫委員會上也說到這個錯誤，他說：

「在舍米契同志的前途中所缺少的只是革命這件東西，要知道，民族問題是革命的問題，而不是憲法的問題。」（見『真理報』第八三期）

共產國際俄國共產黨代表們關於舍米契同志錯誤的這些意見，當然決不會是偶然的，毫無根據的。無火是不會生煙的。

舍米契同志的第一個錯誤，基本的錯誤便是如此。

他的其餘錯誤，都是直接從這個基本的錯誤中產生出來的。

關於第二個問題，我在我的講演中（見『布爾塞維克』雜誌第七期）已經說過，舍米契同志『不願意把民族問題看作在本質上是農民的問題』。

這對不對呢？

請諸位把舍米契同志在南斯拉夫委員會上所說的下面一段話讀一下，自己去判斷罷。

「南斯拉夫民族運動——舍米契同志問道——之社會意義在什麼地方呢？」他自己回答道：「這個社會的內容就在於塞爾維亞資本與克羅阿脫及斯拉夫資本之間的競爭。」（參看舍米契同志在南斯拉夫委員會上的演說）

斯拉夫族和克羅阿脫族資產階級與塞爾維亞資產階級間的競爭，在這裏不能不起相當的作用——當然這是毫無疑義的。但是把民族運動之社會意義看作各民族資產階級競爭的人，就不會把民族問題看作在本質上是農民的問題——這也是同樣毫無疑義的。現在民族問題已由地方的和國家內部的問題變為世界的問題，變為關於殖民地與

附庸民族反抗帝國主義鬥爭的問題，這時候民族問題的本質是在什麼地方呢？現在民族問題的本質是在於殖民地與附庸民族反抗統治民族的帝國主義資產階級方面對於他們的財政的剝削、政治的奴役、以及文化的暴行。在民族問題的這一提法之下，各民族資產階級相互間的競爭，會有什麼意義呢？很明顯的，它沒有主要的意義，在若干情形之下甚至沒有重要的意義。很明白的，這裏主要的并不是指某一民族的資產階級在競爭中打倒或者可以打倒另一個民族的資產階級而言，而是指統治民族的帝國主義集團剝削和壓迫殖民地及附庸民族的基本羣衆，尤其農民羣衆而言，這一集團在剝削和壓迫他們時，便吸引他們來與帝國主義作鬥爭，使他們成了無產階級革命的同盟者。如果把民族運動的社會意義歸納爲各民族資產階級間的競爭，那末就不能把民族問題看作在本質上是農民的問題了。反過來說，如果你把民族問題看作在本質上是農民的問題，那麼，你就不能把民族資產階級間的競爭當作民族運動的社會意義。要在這兩個公式之間劃一個等號，那無論如何是不可能的。

舍米契同志曾引證斯大林在一九二二年底所著『馬克思主義與民族問題』那本書中的一段話。那句話是這樣說的：『民族的鬥爭乃是資產階級間相互的鬥爭』。他引證這句話，意在想藉此來暗示他所下的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民族運動社會意義界說公式之正確。不過斯大林那本小冊子是在帝國主義大戰前著的，那時候民族問題，在馬克思主義者看來，還不是一個全世界的問題，那時候馬克思主義者關於民族自決權的基本要求，還沒有當作無產階級革命的一部分，而是當作資產階級民權革命的一部分。自那時候起，國際的形勢已經根本改變了，歐戰和俄國十月革命已把民族問題從資產階級民權革命的一部分變為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一部分，要是看不清這一點，那就未免太可笑了。列甯尙在一九一六年十月間他就在『關於民族自決問題討論的總結』一文中說過：民族問題中關於民族自決權的這個基本點，已不成其為一般民主運動的一部分了，它已經變為全部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一個構成部分了。列甯以及俄國共產主義的其他代表者關於民族問題的許多深遠著作，那更不用提了。因此之

故，在我們已由於新的歷史環境的原故而進入於一個新的時代——世界無產階級革命時代的現在，舍米契同志却引證斯大林在俄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時期所著的那本書中的一句話，會有什麼意義呢？它僅有這樣一個意義，就是舍米契同志的引證是完全離開了時間與空間，不顧到活的歷史環境，因而違犯了辯證法的基本要求，沒有考慮到在某一個歷史環境下正確的話，在另一個歷史環境下會變成不正確的。我在南斯拉夫委員會上的講演中已經說過，俄國布爾塞維克的民族問題的提法，應分成兩個階段：第一個是十月革命前的階段，那時候還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時期，民族問題還是當作整個民主運動的一部分；第二個是十月革命的階段，這時候已經是無產階級革命的時期，民族問題已變成無產階級革命的一個構成部分了。這個區別有非常重大的意義，這是用不着再加以證明的。我怕舍米契同志還弄不明白民族問題提法中兩個階段之間這一區別的意義。

所以，我認爲舍米契同志企圖把民族運動不是視作在本質上是農民的問題，而看

作各民族資產階級間競爭的問題，是由於「忽視民族運動底力量和不了解民族運動底深刻地民衆的，深刻地革命的性質」（見「布爾塞維克」第七期）所致。

舍米契同志的第二個錯誤，就是如此。

值得注意的，就是季諾維埃夫同志在南斯拉夫委員會上的演說中也同樣說到了舍米契同志的這個錯誤。季諾維埃夫同志說道：

「舍米契同志說，在南斯拉夫，農民運動是被資產階級所領導的，因此它不是革命的，這是不對的。」

這種異口同聲的說法，是不是偶然的呢？當然不是的。

再說一句：無火不會生煙的。

最後，關於第三個問題，我會說，舍米契同志企圖「離開國際環境和歐洲的或然的前途來處理南斯拉夫的民族問題」。

這種說法對不對呢？

是對的。因爲舍米契同志在他的演說中，並沒有絲毫的暗示說，國際環境在現時的條件之下，尤其是對於南斯拉夫，乃是解決民族問題上的一個最重要的因素。南斯拉夫國家本身是在兩大帝國主義集團間決鬥的結果而形成的，南斯拉夫決不能逃出今日周圍的帝國主義國家所進行的那種力量的大競技——這一事實，都是在舍米契同志的視線以外的。舍米契同志旁徵博引，說他完全承認在國際環境中的若干變動，由於這一變動，民族自決問題可以變成一個迫切實踐的問題，但這種說法，在現時的國際環境之下，已經是不夠了。現在的問題，並不在於承認在可能的和遙遠的將來國際環境若干變動之下，民族自決問題之迫切性，——這一點，在現在，就是那些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者，在必要的時候，也會遼遠地承認的。現在的問題並不在於這一點，而在於不要把戰爭和暴力所造成的今日的南斯拉夫國家的疆界變爲解決民族問題的出發點和法律根據。兩者之間必取其一：或是民族自決的問題，即根本改變南斯拉夫疆界的問題，是暗淡地描寫遙遠的未來的民族綱領的裝飾品，或者它是民族綱領的基礎。很明顯

的，不論如何，民族自決權這一條，不能夠同時既作爲南斯拉夫共產黨民族綱領的裝飾品，又作爲南斯拉夫共產黨民族綱領的基礎。我怕舍米契同志還要繼續把民族自決權看作民族綱領的一種未來的裝飾品。

所以，我認爲舍米契同志把民族問題與整個國際環境問題分裂開來了，因此之故他的所謂民族自決的問題，即改變南斯拉夫疆界的問題，在本質上不是一個迫切的問題，而是一個學院式的問題。

舍米契同志的第三個錯誤，就是如此。

值得注意的就是曼奴依爾斯基同志在共產國際第五次大會上的報告中，也同樣講到了舍米契同志的這個錯誤。他說：

「舍米契同志對民族問題全部主張的基本前提，就是下面的這一個思想：無產階級要在經許多戰爭和暴力所造成的那種疆界以內（註）去奪取資產階級的國家。」（見共產國際第五次大會記錄）

可否說這種異口同聲的說法是偶然的？當然不是的。

再說一遍：無火是不會生煙的。

(註)着重點是我加的——斯大林。

(一九二五年六月三十日，布爾塞維克雜誌第一一二期)

給卡加諾維赤同志及烏克蘭共產黨（布）其他

中央委員的信

——一九二六年——

蘇木斯基同志的聲明書中有若干正確的思想。他說，爭取烏克蘭文化和烏克蘭輿論的廣大運動，在烏克蘭已經開始，而且正在增長着，這是對的。他說，不論如何，萬不可把這一運動交給仇視我們的份子的手中，這也是對的。他說烏克蘭好多共產黨不明白這一運動的旨趣與意義，因而不採取方法去抓緊這一運動，這也是對的。他說，我們黨的和蘇維埃的工作幹部，對於烏克蘭文化和烏克蘭輿論的問題還充滿着諷刺和懷疑主義的精神，這些幹部需要來一個轉變，這也是對的。他說，應當嚴密地選拔和造就足以抓緊烏克蘭新運動的幹部，這也是對的。這些都是對的。不過蘇木斯基同志

在這種情形之下至少犯了三個嚴重的錯誤。

第一，他把我們黨的和蘇維埃的機關之烏克蘭化與無產階級之烏克蘭化，混爲一談。可以而且需要遵守某種速度，使我們黨的、國家的、及其他服務人民的機關烏克蘭化。但是萬不可從上而下使無產階級烏克蘭化。萬不可迫使俄羅斯工人羣衆放棄俄羅斯語言和俄羅斯文化，而去承認烏克蘭文化爲自己的文化，烏克蘭語言爲自己的語言。這是跟各民族自由發展的原則相抵觸的。這也許不是民族的自由，而是民族壓迫的特殊方式。無疑的，烏克蘭無產階級的成份，將隨着烏克蘭的工業的發展，將隨着烏克蘭工人從鄰近農村的流入工業，而在改變。無疑的，烏克蘭無產階級的成份，將烏克蘭化，正如拉脫維亞和匈牙利的無產階級成份，有一時候曾具有日耳曼的性質，後來也拉脫維亞化和馬扎亞爾化一樣。不過這是個長期的，自發的，自然的過程。企圖以強制的從上而下的無產階級的烏克蘭化，來代替這一自發的過程，那無異於推行烏拉邦的有害的政策，這一政策在烏克蘭無產階級的非烏克蘭層級中定要引起反烏克蘭

蘭的排外愛國主義。我以為蘇木斯基同志對烏克蘭化理解不正確，也未顧計到上述的這個危險。

第二，蘇木斯基同志對於烏克蘭爭取烏克蘭文化和輿論的新運動的積極性質，側重指出，頗為正確，但是他卻沒有看到這一運動的黑暗面。蘇木斯基同志沒有看到，因烏克蘭當地共產主義幹部的薄弱，這種往往為非共產主義知識份子所領導的運動，在各地方上可以採取使烏克蘭文化和烏克蘭輿論跟整個蘇維埃文化和輿論分離的性質，可以採取反對「莫斯科」一般，反對俄羅斯人一般，反對俄羅斯文化及其最高成就——反對列寧主義的性質。這種危險在烏克蘭日益切實起來，那不用我來證明了。我只是要說的，就是甚至有些烏克蘭的共產黨員也沒有解除這些毛病。我是指衆所週知的一件事，即有名的共產黨員赫威列委在烏克蘭刊物上所發表的一篇論文而言。赫威列委要求烏克蘭的「無產階級要馬上非俄羅斯化」；他認為烏克蘭的詩應當「從速避開俄羅斯文學及其作風」；他宣稱「無產階級的觀念，即無莫斯科的藝術，我們也

是曉得的；」他致力於烏克蘭『青年』知識份子的什麼救世主的作用；他還有一種可笑的和非馬克思主義的企圖，想把文化與政治分開，——所有這些及類似的好多東西，現在在烏克蘭共產主義者的口中喊得（也不能不喊叫）特別驚人。當西歐無產者及其共產黨對『莫斯科』這個國際革命運動和列寧主義榮譽表示十分同情的當兒，當西歐無產者對飄揚在莫斯科的旗幟欣羨的當兒，烏克蘭的共產主義者赫威列委，除號召烏克蘭要人『從速』避開『莫斯科』外，並未說到一句別的擁護『莫斯科』的話。這就叫做國際主義呵！如果共產黨員開始說赫威列委的話，不但說，而且在我們蘇維埃的刊物上寫起來，那末叫非共產主義營壘內的其他烏克蘭知識份子怎樣辦呢？蘇木斯基同志不明白要抓緊烏克蘭爭取烏克蘭文化的新運動，只有反對共產主義者隊伍中的赫威列委同志的極端主義才有可能。蘇木斯基不明白，在反對這種極端主義的鬥爭中，才可以把日益向上的烏克蘭文化和烏克蘭輿論變為蘇維埃的文化和輿論。

（一九二六年四月二十六日，首次發表）

論中國

——摘自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聯共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聯席會議上

的演說：『國際現狀與蘇聯的國防』——

現在來講中國的問題吧。關於反對派對中國革命性質與前途問題的錯誤，我不想提及了。我所以不想提及，是因為關於這個問題，已經說得很多，很確實，這裏不值得再去重覆了。有人說，現階段的中國革命，彷彿是爭取關稅自主的革命。（託洛茨基）關於這一點，我也不想提及了。有人說，似乎中國已沒有封建殘餘，即使是有的話，也沒有甚麼嚴重的意義，因之土地革命在中國，是完全不可理解的（託洛茨基和拉狄克）。關於這一點，也不值得再提及了。關於反對派對中國問題的這些和諸如此類的錯誤，大家從我們的黨的刊物上一定知道的很多了。

現在我們來談列寧主義在解決殖民地和附庸國家革命問題時的基本出發點吧。

共產國際和一般共產黨在處理殖民地和附庸國家革命運動問題時的出發點是在什麼地方呢？

是在於把帝國主義國家（即壓迫別國人民的國家）的革命和殖民地及附庸國家（即受別國帝國主義壓迫的國家）的革命，加以嚴格的區別。帝國主義國家的革命是一回事，那裏的資產階級是別國人民的壓迫者，那裏的資產階級在革命的一切階段上都是反革命的，那裏沒有解放鬥爭的要素——民族的要素。殖民地和附庸國家的革命，又是一回事，在那裏，別國的帝國主義的壓迫，乃是革命的因素之一，在那裏，這種壓迫不能不撞着民族資產階級，在那裏，民族資產階級，在某一階段上和某一時期內可以支持本國反帝國主義的革命運動，在那裏，解放鬥爭的要素——民族的要素，乃是一個革命的因素。倘若不作這一區別，不了解這個差別，把帝國主義國家的革命和殖民地國家的革命，混爲一談——那是說離開了馬克思主義的道路，離開了列寧主義的道路，而走上第二國際同道者的道路上去。

列寧在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上關於民族和殖民地問題的報告中，關於這一點曾說道：

『甚麼是我們提綱中最重要最基本的觀念呢？是被壓迫民族和壓迫民族之間的區別。我們特別着重於這一區別，這是我們和第二國際及資產階級民主派相反的地方。』（列寧全集二十五卷，三五一頁，着重點是我加的——斯）

反對派的基本錯誤，就在於他們不了解和不承認兩種革命之間的這一區別。

反對派的基本錯誤，就在於他們把俄國這個壓迫其他民族的帝國主義國家的一九〇五年革命，和中國這個半殖民地被迫不得不來反對別國帝國主義壓迫的被壓迫國家的革命等量齊觀了。

在我們俄國，在一九〇五年，革命是在反對資產階級，是在反對自由主義資產階級，雖然革命曾是資產階級民主的革命。爲什麼呢？因爲帝國主義國家的自由主義資產階級，不能不是反革命的。正因爲如此，當時布爾塞維克不會而且也不能跟自由主

義的資產階級作臨時的同盟和妥協。反對派以此爲出處，斷定謂在中國，在革命運動的各個階段上，也應當如此，跟民族資產階級暫時的妥協和同盟，不論任何時候和在任何條件之下，在中國都是不能允許的。可是反對派却忘記了，祇有不了解和不承認被壓迫國家的革命和壓迫國家的革命之間的區別的人，才會這樣說的，祇有放棄列寧主義而投向第二國際擁護者方面去的人，才會這樣說的。

列寧關於跟殖民地國家資產階級解放運動可以成立暫時妥協和同盟一點，說道：

『共產國際應當跟殖民地和落後的資產階級民主派訂立暫時的同盟，但不要跟他們融合起來，而要絕對保持無產階級運動的獨立性，甚至在它的初步的形式上。（二十五卷二九〇頁）……我們共產主義者，祇有在這種條件下，就是當這些運動是真正革命的，當運動的代表者不阻礙我們以革命的精神來教育和組織農民和廣大被剝削羣衆的時候，才應當而且將要支持殖民地國家中的資產階級的解放運動。』（列寧全集，二十五卷三五三頁，着重點是我加的——斯）

列寧在俄國會雷電交作似的反對跟資產階級妥協，却又承認在中國可以容許這種妥協和同盟，這是怎麼的呢？也許列寧錯了吧？也許列寧由革命的策略又回到機會主義的策略吧？自然不是的！這所以「發生」的原因，是因為列寧懂得被壓迫國家的革命和壓迫國家的革命間的區別。這所以「發生」的原因是因為列寧懂得殖民地國家的民族資產階級，在其發展的某一階段上，可以支持本國反對外國帝國主義的革命運動。反對派不願意懂得這一點，他們不願意懂得這一點，是因為他們離開了列寧的革命的策略，離開了列寧主義的革命的策略。

反對派的領袖們，在自己的演說中竭力避免列寧的這些指示，害怕撞着了它們，雖然布哈林同志在其報告中還直率地向他們提出了列寧這些指示的問題，你們有沒有注意到這種情形呢？為什麼他們要避開列寧對於殖民地和附庸國家的這些人所週知的策略上的指示呢？為什麼他們害怕這些指示呢？是因為他們害怕真理。是因為列寧的策略上的指示類擬了託洛茨基主義對中國革命問題的一切觀念和政治上的立場。

現在來談談中國革命的各階段吧。反對派混淆黑白，竟否認現在中國革命發展中有任何階段。難道有無若干發展階段的革命嗎？難道我們的革命沒有自己發展的幾個階段嗎？即以列寧的四月提綱來說，你也可以看到，列寧曾承認我國革命有兩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是資產階級民主的革命，其主要軸心爲土地運動；第二個階段是十月革命，其主要軸心爲無產階級奪得政權。中國革命有幾個階段呢？據我看來，它應該有三個：第一個階段是全民族聯合戰線的革命；就是廣州時代，那時革命目標主要是打擊外國帝國主義，而民族資產階級則是支持革命運動的；第二個階段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即國民革命軍達到長江之後，民族資產階級即退出革命，而土地運動則發展成爲千百萬農民的強大的革命（今日的中國革命是處在其發展的第二階段上）；第三個階段是蘇維埃革命，這個革命還沒有到來，但是它正在到來着。誰要是不懂得沒有若干發展階段的革命是不會有的，誰要是不懂得中國革命在其發展中的三個階段，那他就一點也不懂馬克思主義，一點也不懂中國問題。

中國革命第一個階段的特徵是甚麼呢？

中國革命等一個階段的特徵，就是第一，它會是全民族聯合戰線的革命；第二，它的目標主要是在反對外國帝國主義的壓迫（省港罷工等等）。當時廣州是不是中國革命運動的中心，策源地呢？絕對是的。現在祇有瞎子才會否認這的。

殖民地革命的第一個階段應具有這樣的性質，對不對呢？我想是對的。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關於中國和印度革命的補充提綱中，曾直爽的說，在這些國家內，『外國的壓迫，仍時時在阻礙着社會生活的發展，』『因此殖民地革命的第一步應該是推翻外國資本主義。』（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報告紀錄第六〇五頁，着重點是我加的——斯）

中國革命的特徵，就在於它已經經過了自己發展的這個『第一步』，第一個階段，經過了全民族聯合戰線革命的時期，而進入第二個發展階段，土地革命的時期。

例如，土耳其（凱末爾主義者）革命的特徵，恰恰相反，它是擱淺在發展的『第

一步』上，擱淺在第一階段上，擱淺在資產階級解放運動的階段上，甚至不想轉到發展的第二個階段上去，土地革命的階段上去。

國民黨和它的政府本身在革命第一階段上，在廣州時期，曾代表着甚麼呢？當時它是個工人、農民、資產階級的知識份子、和民族資產階級的聯盟。當時廣州不是革命運動的中心、革命的策源地呢？當時支持廣州國民黨的政策，即支持跟帝國主義進行解放鬥爭的政府的政策，是不是正確的呢？當廣州和安哥拉進行反對帝國主義鬥爭的時候，我們對中國的廣州和土耳其的安哥拉予以幫助對不對呢？我們是對的。我們是對的，我們當時是依着列寧的足跡前進，因為廣州和安哥拉的鬥爭，分散了帝國主義的力量，削弱了和降低了帝國主義，因此便利了世界革命根據地發展的事業，因而便利了蘇聯發展的事業。今日的反對派的領袖們，當時跟我們在一起支持廣州和安哥拉，給牠們予以相當的援助，對不對呢？是對的，讓人們去懷疑這吧。

但是怎樣來了解在殖民地革命的第一個階段中跟民族資產階級的聯合戰線呢？這

是不是說，共產黨員不應該增強農工反對地主和民族資產階級的鬥爭，無產階級應該犧牲自己的獨立性呢，即使是最小限度的即使是一分鐘的？不，決不是這樣的意見。聯合戰線，祇有在這種情形之下和只有在這種條件之下，就是它不妨礙共產黨去進行自己獨立的政治的和組織的工作，把無產階級組織爲一個獨立的政治力量，喚起農民反對地主，公開地組織農工的革命，以準備無產階級領導權的條件時，才有革命的意義。我想認爲布哈林同志在其報告中根據大家所知道的文獻，業已完全完全的證明了共產國際正是以這種聯合戰線的概念，來啓示中國共產黨的。

加明涅夫和季諾維也夫同志這裏引證了一件唯一的一九二六年十月拍往上海的電報，該電說，在上海沒有佔領之前，暫勿增強土地運動。我決不承認這個電報是正確的。我從來不認爲，現在也不認爲我們的中央是會毫無過錯的。個別的錯誤是常有的，這個電報，無可爭辯地，是錯誤的。可是，第一，這個電報過了幾個星期之後（一九二六年十一月）未經反對派方面的任何指示，即被我們取消了。第二，反對派爲

什麼直到現在對這件事沉默不言，爲什麼他們經過九個月之後方記起這個電報，爲什麼他們要將這個電報在九個月前就被我們取消的事實來隱瞞黨呢？因此，有人以爲這個電報曾決定了我們領導的路線。這是惡意的造謠中傷。實際上，這是一件個別的枝節的電報，絕對不是共產國際路線和我們領導的路線所特有的。我重覆一遍，這從這件電報經過幾星期之後即被許多文件所取消一事上，就可以看出來，這些文件會規定路線，且爲我們領導所絕對特有的。

讓我來把這些文獻引證幾處吧。

例如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即上述電報拍出後一個月，共產國際第七次全會議決案中有一段說道：

「現時形勢的過渡性質乃是它的基本特質，這時無產階級應該在跟資產階級廣大層級同盟的前途和進一步鞏固自己與農民同盟的前途之間，選擇一個前途。倘若無產階級不提出急進的土地綱領來，那末它就不能吸收農民加入革命鬥爭，

而要失去民族解放運動中的領導權。」（着重點是我加的——斯）

又說：

「如果民族解放事業不和土地革命等量齊觀；那末廣東國民政府在革命中就不能保持政權，就不能獲得戰勝外國帝國主義和本國反動勢力的完全勝利。」

（着重點是我加的——斯，參看共產國際第七次全會議決案）。

這就是真正決定共產黨國際領導路線的文獻。

非常奇怪的，就是反對派領袖們對於這些衆所週知的共產國際的文獻，一字不提。

我把我於同年（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在共產國際中國委員會上的演說，擴引一節，不會算是不客氣吧，該委員會，自然，我也是參加的，它曾起草了七次全會關於中國問題的議決案。這篇演說後來印成單行本題爲『論中國革命的前途』。茲引那次演說中的幾段於下：

『我知道：在國民黨員中，甚至在中國共產黨員中，還有人不認爲發動農村中的革命是可能的。他們害怕農民捲入革命，會破壞反帝統一戰線。同志們，這·是·個·極·重·大·的·錯·誤·。中·國·農·民·加·入·革·命·越·迅·速·而·激·烈·，中·國·反·帝·統·一·戰·線·將·越·有·力·而·強·大·。』

又說：

『我知道，中國共產黨員中，還有些同志認爲工人改善他們物質和法律地位的罷工是非所願意的，因此他們勸告工人不要罷工。（台·下·有·人·高·呼：「廣州和上海曾有這種情形」）。同志們，這是個很大的錯誤。這是對於中國無產階級作用和比重的一個極重的忽視。這是個絕對否定的現象。在提綱中務須指出。假使中國共產黨員不利用現時有利的環境，去幫助工人改善自己物質和法律的地位，即使是用罷工的方法那就犯了極大的錯誤。不然中國革命究竟是爲了什麼呢？』

（參看斯大林『論中國革命的前途』）

第三件文獻是一九二六年十二月發表的，那時共產國際正受到中國各城市的攻擊，相信發動工人的鬥爭，定要引起恐慌、失業、工廠和作坊的關門。該文件中說：

「城市中退却和制止工人改善自己生活鬥爭的一般政策是不正確的。在農村裏面必需展開鬥爭，同時並要利用適當的時機，改善工人的物質和法律地位，竭力使工人的鬥爭具有組織性，防止過火和過度突進的行爲。特別要努力的，就是城市中鬥爭的目標是朝向反對大資產階級，尤其是反對帝國主義者，以便中國小資產階級和中等階級都儘可能地留在反對共同敵人的統一戰線的範圍以內，我們認爲調解法庭仲裁裁判等體係是適宜的，因爲在這些機關中，工人階級正確的政策，能得到保障。同時我們認爲有警告必要的，就是反對罷工和工人集會等自由的命令是絕對要不得的。因爲鑒於這個問題的重要性，須有經常的報告。」

第四個文獻是在X×X政變前一個半月發表的，其中說：

「必需要加強軍隊中國民黨和共產黨支部的工作，凡沒有支部或有成立可能

的地方，都須成立支部；凡成立共產黨支部不可能的地方，須要靠隱密的共產黨員的幫助，進行強烈的的工作。

須要堅持武裝工農的方針，要將各地的農民委員會變爲武裝自衛的眞正權力機關等等。

須要使共產黨到處要以共產黨出現；絕不容許自願的半秘密性的政策；共產黨萬不可作阻礙羣衆運動的活動；共產黨不應該隱蔽國民黨右派賣國和反動的政策；爲要揭破他們，必須動員羣衆圍繞在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的周圍。

須要使一切忠於革命的工作者，必須注意：現時中國革命由階級力量的變動和帝國主義軍隊的集中，正處在危急關頭，革命的更進一步的勝利；祇有在發展羣衆運動的堅決方針之下，才有可能。不然，革命就要受到鉅大的危險。所以，指令的執行比任何時期都必要。』

尙在一九二六年四月，即國民黨××和××政變前一年，共產國際就警告中國共

產黨，向它指示『須使右派退出國民黨或將右派開除』。

共產國際對於殖民地革命第一階段上反帝統一戰線的策略就是這麼理解的，並且還在繼續這樣理解着。

反對派是不是知道這些指導的文獻呢？當然是知道的。爲什麼他們要對這些指導文獻保守緘默呢？因爲他們是爲了吵嘴，而不是爲了求真理。

曾經有過一個時期，現在的反對派領袖們，特別是季諾維也夫和加明涅夫兩位同志，還懂得一點列甯主義，基本上還對中國的革命運動所堅持的政策，與共產國際所施行及列甯同志在提綱中所指示者相同。我是指一九二六年二、三月間共產國際六次全會而言，那時季諾維也夫同志是共產國際的主席，那時他還是個列甯主義者，還沒有投到託洛茨基的營壘中去。我所以提及共產國際六次全會者，是因爲這次全會曾有一個關於中國革命的議決案，這個議決案是在一九二六年二、三月間一致通過的。其中對中國革命第一階段，廣州國民黨和廣州國民政府的估計，大體上和共產國際與蘇共所

作的一樣，可是反對派現在却否認這個估計了。我所以要提及這個決議案者，是因為季諾維也夫同志當時曾經投票贊成它，中央委員中，包括託洛茨基，加明涅夫等同志以及現時反對派的別的領袖們，沒有一人曾提出過異議反對它。

讓我從這個議案中引證幾段吧。

這個決議案中關於國民黨說道：

『上海和香港兩地中國工人的政治罷工（一九二五年六月至九月）使中國人民反對外國帝國主義的解放鬥爭，急轉直下，……無產階級的政治鬥爭，對於國內一切革命民主組織，尤其國民黨和廣州國民政府的更進一步的發展和鞏固，給了一個强有力的推動。其基本核心和中國共產黨聯盟的國民黨，它本身乃是個工人、農民、知識份子、和城市民主派在反對外國帝國主義和反對一切軍事封建的生活方式，爭取國家獨立，和爭取統一的革命民主政權的鬥爭中而以這些階層的共同階級利益為基礎的革命聯盟。』（參看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六次全會議

決案，着重點是我加的——斯）

總之，廣州時期的國民黨，乃是四個階級的聯盟。你們瞧吧！這差不多就是當時共產國際的主席季諾維也夫同志所崇拜的『馬爾丁諾主義』。（五五）

該議決案關於廣州國民黨政府說道：

『國民黨在廣州所創造的革命政府，已與最廣大的工農及城市民主派羣眾聯系起來，它依靠它們，粉碎了帝國主義者所支持的反革命匪徒（並在廣東省內，實行急進的全部政治生活民主化的工作）。因此，廣州政府，乃是中國人民爭取獨立鬥爭中的先鋒隊，它可作爲該國未來的革命民主建設的模範。』（參看同上議決案，着重點是我加的——斯）

可知廣州國民黨的政府，乃是四個階級的聯盟，它是個革命的政府，不但是革命的，甚至是中國未來的革命民主政府的模範。

該議決案關於工人、農民、與資產階級的統一戰線說道：

「爲了對付新的危險，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應發展最廣泛的政治工作，組織羣衆的行動來援助國民革命軍的鬥爭，利用帝國主義者陣營內的內部矛盾，以革命民主組織領導下的最廣大的人民階層（工人、農民、和資產階級）的民族革命統一戰線對抗帝國主義者。」（參看同上議決案，着重點是我加的——斯）

這樣看來，在殖民地國家內，在殖民地革命的某一階段上跟資產階級的暫時聯盟和妥協，不但可以容許，而且簡直是必要的。

這跟列甯在他關於共產主義者在殖民地和附庸國家內策略的有名的指示中所告訴我們的話，如出一轍，難道這不是事實嗎？所可惜的，只是季諾維也夫同志竟然把這忘記了。

該議決案關於退出國民黨的問題說道：

「曾經暫時結合在國民黨周圍的中國大資產階級的個別層級，最近一年來，已經退出該黨，以致形成國民黨右翼的小集團，這個小集團公開反對國民黨與勞

動羣衆的密切聯盟，主張把共產黨員從國民黨中開除出去，並反對廣州政府的革命政策。國民黨第二次代表大會（一九二六年一月）對右派的譴責，和對國民黨和共產黨人戰鬥聯盟必要的確認，已經加強了國民黨和廣州政府活動之革命傾向，保證了無產階級對國民黨的革命的支·持·。』（參看同上議決案，着重點是我加的——斯）

可知共產黨人退出國民黨，在中國革命第一階段上，會成爲嚴重的錯誤。所可惜的，只是曾經舉手贊成這個議決案的季諾維也夫同志，過了個把月便把它忘記得一乾二淨了。因爲正在一九二六年四月間（經過一個月），季諾維也夫會要求共產黨人立刻退出國民黨的。

該議決案關於中國共產黨中的各種傾向和對跳過革命之國民黨階段的不許可說道：

『中國共產黨人的政治自決，將在反對兩種同樣有害的傾向的鬥爭中發展起

來：一是反對右傾的取消主義，此種傾向忽視中國無產階級的獨立的階級的任務，主張跟一般的民主的民族運動無形的融合起來；一是反對極端左傾的情緒，此種情緒，力謀跳過革命民主的運動階段，而直接從事無產階級專政和蘇維埃政權的任務，忘掉農民，這個中國民族解放運動的基本而主要的要素。」（參看同上議決案）

你們瞧吧，所有這一切，都是現在反對派想跳出中國國民黨發展階段，輕視農民運動而立刻跳到蘇維埃方面去的確證。這是很中肯的。

這個議決案季諾維也夫，加明涅夫，託洛茨基等同志是不是知道呢？

應該說是知道的。無論如何，季諾維也夫同志是不能不知道這個議決案的，因為這個議決案，是在他主席之下，在共產國際第六次全會上通過了的，而且他本人選舉手續成的。爲什麼現在反對派領袖們要迴避世界共產主義運動最高機關的這一個議決案呢？爲什麼他們要對這個議決案保守緘默呢？因爲在中國革命的一切問題上，這個

決議案會掉轉來反對他們的。因爲這個決議案會顛覆今日的反對派的全部託洛茨基派的立場的。因爲他們已經脫離了共產國際，已經脫離了列寧主義，現在因爲害怕自己的過去，害怕自己的後影，而不得不怯懦地來迴避共產國際六次全會的議決案的。

中國革命第一階段的情形，就是如此。

現在我們來談中國革命的第二階段吧。

假使第一階段的特點是，革命的鋒芒主要是反對外國帝國主義，那末第二階段的特點，則是革命的鋒芒主要是反對內部敵人，尤其是封建主，封建制度。第一階段不是解決了它的推翻外國帝國主義的任務呢？沒有，沒有解決。它把這一任務，是留給中國革命的第二階段去進行的。它只是對革命的羣衆第一步的反帝國主義的擺動以便結束自己的路程，將這個事業交給未來。可以說，革命的第二階段也不會完全解決驅逐帝國主義、反帝國主義的任務。它對於中國廣大的工農羣衆定要造成進一步的擺動，不過它的所以這麼做，是爲了將這個事業交給中國革命的下一階段，蘇維埃階段

去完成的。這是毫不足爲奇的。在我國革命的歷史上，也有類似的情形，雖然是在另一種環境之下，是在另一個情形之下，這難道不是人所週知的事嗎？我國革命的第一階段，並沒有完完全全解決它的完成土地革命的任務，而是把這個任務交給革命的下一階段，交給十月革命，十月革命才算完完全全解決了根除封建殘餘的任務，這難道不是衆所週知的事嗎？所以，要是在中國革命的第二階段上，不能全部完成土地革命，要是革命的第二階段在推動千百萬農民羣衆，使他們起來反對封建殘餘之後，而把這一事業交給革命的下一階段，蘇維埃階段去完成，這一點都不足奇怪的。這祇是中國未來的蘇維埃革命的好處。

在中國革命的第二階段上，革命運動的中心顯然的已由廣州移到武漢，與武漢的革命中心並行的，在××反革命的中心又造成了，這時共產黨人的任務是在什末地方呢？是在於盡量利用黨、無產階級（工會）、農民（農會），和一般革命的公開組織。是在於推動武漢的國民黨人向左走，向土地革命的方面走。是在於把武漢的國民黨

變爲反對革命鬥爭的中心，變爲工農的未來的革命民主專政的核心。

這個政策是不是正確的呢？事實證明，這個政策是唯一正確的政策，它以革命進一步發展的精神來教育廣大的工農羣衆。

當時反對派要求立刻成立工農代表蘇維埃。可是這是個冒險主義，是冒險主義的突進，因爲立刻成立蘇維埃，在當時是表示跳過左派國民黨的發展階段。爲什麼？因爲武漢的國民黨，曾支持和共產黨人的聯盟，還沒有在廣大的工農羣衆的眼中失掉信用，還沒有揭破自己的真面目，還沒有失掉其資產階級革命組織的作用。因爲在羣衆還沒有根據他們自己的經驗相信這個政府的無用，相信有推翻這個政府的必要的當兒，提出蘇維埃和推翻武漢政府的口號，那是說向前直衝，脫離羣衆，失去羣衆對自己的支持，因而毀壞業已着手的事業。反對派以爲，要是他們懂得了武漢國民黨的不可靠，不堅固和不夠革命（一切在政治上^後有經驗的工作者都不難懂得這一點），那末這足夠使羣衆也懂得這一切，足夠以蘇維埃來代替國民黨，而領導羣衆了。不過這是

反對派的一個慣常的極左的錯誤，他們往往把自己的意識和理解，當作千百萬工農羣衆的意識和理解。反對派要是說黨應該向前邁進，那是不錯的。這是一個普通的馬克思主義者的論則，不遵守這個論則，就沒有也不能有真正的共產黨。不過這只是真理的一部份。全部的真理，就在於黨不僅要向前邁進，而且要領導千百萬羣衆。向前邁進，而不領導千百萬羣衆，那是說在事實上是落後於運動，留在運動的尾巴上。向前邁進，脫離後衛，不善於領導後衛，那就是說造成突奔，足以在某一時期毀壞羣衆的前進。老實地說，列寧的領導，就在於先鋒善於領導後衛，先鋒前進時，不與羣衆脫離。然而要使先鋒不與羣衆脫離，要使先鋒能夠真正領導千百萬羣衆，就需要有一個決定的條件，即使羣衆本身根據他們自己的經驗，相信先鋒指示命令，和口號的正確。反對派的不幸，正在於他們不承認這個簡單的列寧的領導千百萬羣衆的規則，不懂得如果沒有千百萬羣衆的支持，單是一個黨，單是一個先進的集團，是不能夠進行革命的，不懂得革命歸根結蒂，乃是千百萬勞動羣衆所『幹』的。

我們布爾塞維克，在一九一七年四月間，雖然曾經相信，在不久的將來，我們即有推翻臨時政府和建立蘇維埃政權的必要，但是爲甚麼我們不提出推翻臨時政府和建立蘇維埃政權的實踐的口號呢？因爲後方和前線的廣大勞動羣衆，以及蘇維埃本身，還沒有準備把握這個口號，他們還相信臨時政府的革命性。因爲臨時政府對後方和前線的反革命的支持還沒有將自己凌辱，而失去自己的信用。一九一七年四月間，波格達契也夫派在列寧格勒會提出立刻推翻臨時政府，和建立蘇維埃政權的口號，列寧爲什末要譏笑他呢？因爲，波格達契也夫的企圖是個危險的向前奔馳！這一奔馳有造成布爾塞維克脫離千百萬工農羣衆之虞。

政治上的冒險主義，對中國革命問題的波格達契也夫主義，這就是現在戕害我們的託洛茨基反對派的東西。

季諾維也夫會謂我提到波格達契也夫主義，是把今日的中國革命，和十月革命等量齊觀了，當然，這是胡說八道。第一，我在「時事雜談」一文中，曾有保留的說：

『這裏的相似是有條件的』、『我祇是在所有必要的一切保留之下，即如果注意到今日中國的局面與一九一七年俄國的局面不同時，我才說這種相似的。』第二，如果有人說，在詳述某國革命中的某些傾向和某些錯誤時，萬不可一般地取其別國革命中相似的地方，那是很愚蠢的。難道一國的革命，不能學習別國的革命嗎，即使這些革命不是同一形式的？不然，革命的科學應歸到甚麼地方去呢？季諾維也夫則承認革命科學之可能。列寧於十月革命前一時期，曾經譴責契海才，蔡列吉利，斯却克洛夫等爲一八四八年法國革命中的『路易·勃朗主義』，難道這不是事實嗎？請你把列寧的『路易·勃朗主義』一文讀一下，就會明白，列寧在評述十月革命前某些要人的錯誤時，曾經廣泛地利用一八四八年法國革命的相似之點，雖然列寧很明白，法國革命和十月革命不是同一形式的革命。如果可以說，在十月革命前的一時期，契海才和蔡列吉利是『路易·勃朗主義』，那麼爲什麼不能說，在中國土地革命時期，季諾維也夫和

託洛茨基是『波格達契也夫主義』呢？

反對派肯定地說，武漢不是革命運動的中心。但是爲什麼當時季諾維也夫同志却要說對武漢的國民黨，『務須予以各方面的幫助』，以便使它成爲反對中國卡溫涅克鬥爭的中心呢？爲什麼不是別的地方，正是武漢的轄境，成了土地運動高度發展的中心呢？正是武漢的轄境（湖南，湖北）在本年初曾成爲土地運動高度發展的中心，難道不是事實嗎？爲什麼沒有羣衆土地運動的廣州，可以叫做『革命的策源地』（託洛茨基語），而轄境內開始了和發展了土地革命的武漢却不能叫做革命運動的中心，『策源地』呢？在這種情形之下，反對派要求共產黨放棄參加武漢國民黨和武漢政府，理由何在呢？難道反對派沒有在一九二七年四月間主張和『反革命的』武漢國民黨成立聯盟嗎？反對派爲什麼這樣『健忘』和糊塗呢？

反對派幸災樂禍，以爲限武漢國民黨的聯盟，結果短命，他們並且確定說，共產國際不曾警告中國共產黨員，謂武漢國民黨有崩潰之可能。反對派的幸災樂禍，祇是證明了他們政治的破產，這是不用證明的了。就外表看來，反對派以爲在殖民地國家

內，跟民族資產階級的聯盟一定是永久的。不過祇有把列寧主義喪失盡淨的人，才會這樣想的。倘若在中國封建主和帝國主義的勢力，在某一階段上，要比革命強大些，倘若這些敵對勢力的壓迫，要引起武漢國民黨的向右轉變和中國革命的暫時失敗，那末祇有患失敗主義病的人，才會對這幸災樂禍的。至於反對派謂共產國際不會警告中國共產黨，說武漢國民黨有崩潰的可能，那末這更是充滿現在反對派武器庫的很平常的誹謗之一了。

讓我引幾個文獻來駁斥反對派的誹謗罷。

第一個文獻是一九二七年五月發表的，其中說：

「現在國民黨對內政策中最主要的是在『一切政權歸農民協會和農村委員會』一口號之下，有系統地開展各省，特別是廣東的土地革命。革命和國民黨成功的基礎，就在這裏。在中國建立廣大而強盛的反對帝國主義及其代理人的政治軍事軍隊的基礎，就在這裏。在實踐上，沒收土地的口號，在那些有強大土地運動

的省份，如湖南，廣東等等，是完全合時的。否則，開展土地革命是不可能的……（着重點是我加的——斯）

現在應該從革命的工農當中開始組織八個或十個師團，以絕對可靠的份子任官長。這將是在前線和後方保衛武漢，解除不可靠部隊的警衛軍。這是刻不容緩的工作。

應該加強後方和部隊中的分化工作，並對廣東的農民游擊隊予以幫助，在該地地主的政權是特別不能夠忍受的。」

第二個文獻是一九二七年五月發表的：

「沒有土地革命，勝利是不可能的。沒有土地革命，國民黨的中央委員會，就要變成不可靠的軍閥們的可憐的玩具。反對過火是應當的，但不要派軍隊去，而應經過農會去執行。我們堅決地主張由下而上的實際上的奪取土地。譚平山（五六）出巡的恐懼是有某些根據的。不要脫離農民運動，而應用各種方法去促進

它。不然，事情就要弄糟了。

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的幾位老領袖，害怕事變，表示動搖，妥協。應當儘可能的從下而上吸收新的工農領袖加入國民黨中央委員會。他們的勇敢的呼聲，可使老的領袖變成堅決的或者會將他們拋擲出去。目前國民黨的機構應當改變。國民黨的上層務須加以刷新，而補充以土地革命中提拔出來的新的領袖，並應利用工會和農會中的千百萬會員擴大範圍。不然，國民黨就有脫離實際生活，喪失一切信心的危險。

應當消滅對不可靠的軍閥的依賴。應動員兩萬年青共產黨員，加上五萬湖南湖北的革命的工農，組織幾個新的軍團，利用軍官學校的學生做官長，及時組織自己的可靠的軍隊。不然，就不能担保不失敗。這是一件困難的事情，但是別的道路是沒有的。

應組織革命軍事法庭，以非共產黨員的有聲望的國民黨人爲領袖。處罰與×

××保持聯系或挑唆軍民、工農互相殘殺的軍官。光是勸告是不夠的。應立即開始行動了。應該懲罰惡漢。假使國民黨人不學做革命的雅谷賓黨人，那他們對於人民，對於革命都要滅亡的。」（着重點是我加的，——斯）

瞧吧，共產國際曾預先看到了事變，它時時放出危險的警號，警告中國共產黨員：倘若國民黨人不能做革命的雅谷賓黨人，武漢國民黨就會滅亡的。

加明涅夫同志說，中國革命的失敗，是由共產國際的政策應該負責的，並謂我們「培植了的中國卡溫涅克派」。同志們，祇有甘心叛黨的人，才會這樣說我們的黨的。在一九一七年七月失敗時期，即俄國卡溫涅克派登台的時候，孟塞維克就是這麼來說布爾塞維克的。列甯在其「關於口號」一文中寫道，七月的失敗是「卡溫涅克派的勝利」。當時孟塞維克幸災樂禍說，俄國卡溫涅克派的出現，是由列甯的政策應該負責的。加明涅夫同志是否想過在俄國卡溫涅克派一九一七年七月失敗時期的出現，是列甯的政策，我黨的政策應該負責的，而不在于別人？加明涅夫同志在這個場合之

下，配不配模仿孟塞維克紳士們呢？（哄笑）。我未曾想過，反對派中的同志們竟會弄得這麼卑劣……大家知道，一九〇五年革命遭受失敗了，而且這次失敗，比現時中國革命的失敗，更為深刻。孟塞維克當時會說，一九〇五年革命的失敗，是由布爾塞維克極端革命的策略應負責任的。加明涅夫同志是不是在這裏想模仿孟塞維克解釋我國革命史的榜樣來打擊布爾塞維克呢？巴伐利亞蘇維埃共和國和國的失敗是用什麼來解釋呢？原因也許用列寧的政策，而不用階級力量的對比來解釋罷？匈牙利蘇維埃共和國的失敗是用什麼來解釋呢？也許用共產國際的政策，而不是用階級力量的對比來解釋罷？怎麼能夠說：一個黨的策略可以改變或顛倒階級力量的對比呢？我們在一九〇五年的政策是否正確呢？當時為什麼我們會失敗呢？難道事實沒有告訴我們說：在反對派的政策之下，中國革命比實際上更要失敗得快嗎？凡忘掉革命期間階級力量的對比而企圖僅用某黨的策略來解釋一切的人，怎樣稱呼他呢？關於此種人，只能說一句話，就是他們脫離了馬克思主義。

作幾句結論吧。反對派的主要的錯誤如下：

第一，反對派不懂得中國革命的性質和前途。

第二，反對派沒有看見中國革命和俄國革命，殖民地國家的革命和帝國主義國家的革命之間的區別。

第三，反對派完全放棄了列寧在革命第一階段上對殖民地國家民族資產階級一問題的策略。

第四，反對派不懂得共產黨參加國民黨的問題。

第五，反對派違犯了列寧對於先鋒（黨）和後衛（幾百萬的勞動羣衆）之間相互關係一問題的策略的基礎。

第六，反對派完全放棄共產國際六次和七次全會的議決案了。

反對派竭力頌揚他們對中國問題的政策，說，這個政策倘被採用，中國現時的情形也許要好些了。在反對派所犯的這些重大的錯誤之下，倘若中國共產黨採取了反對

派的反列寧主義的冒險主義的政策，那它也許完全走入絕路了，這是不用證明的。中國共產黨在一個很短的期間，既由二千人的一个小小集團，增長而為一個有六萬黨員的羣衆政黨；中國共產黨在這個期間既成功將三百萬無產者組織到工會中來，中國共產黨既能成功喚醒了千百萬昏睡中的農民，吸收了成千成萬的農民加入革命的農民協會；中國共產黨既成功在這個期間募集國民革命軍中的十幾團和幾師到自己方面來；中國共產黨既成功在這個期間將無產階級領導權的觀念由願望變成事實，總之，中國共產黨既成功在一個很短的期間獲得了這一切勝利，那末這原因正是因為它依了列寧所指示的道路，依了共產國際所指示的道路前進的原故。

不用說，在反對派的政策之下，在他們的錯誤之下，在他們的對殖民地革命問題的反列寧主義的方針之下，中國革命的這些勝利，不是一無所得，便是得到的很少。
祇有超左的變節者和冒險主義者，才會對這一點懷疑的。

(論反對派，一九二八年出版)

論無產階級解決民族問題方法的問題

——摘自「十月革命的國際性質」一文，一九二七年——

十月革命不僅在帝國主義底統治中心，不僅在『宗主國』內動搖了帝國主義。十月革命還打擊了帝國主義底後方，帝國主義底外圍，而摧毀了帝國主義在各殖民地 and 附庸國家中的統治。

十月革命推翻了地主和資本家以後，便打破了民族壓迫和殖民地壓迫的鎖鏈，使一個龐大國家中的各被壓迫民族一概擺脫了這種壓迫。無產階級如果不解放被壓迫民族，便不能解放自己。十月革命在蘇聯不是在民族仇視和民族間衝突底旗幟之下，而是在蘇聯各民族工農互相信任和親睦接近底旗幟之下，不是在民族主義名義之下，而是在國際主義名義之下進行這種殖民地民族的革命，——這件事實，就是十月革命底一個特點。

正因為在我們蘇聯和殖民地民族的革命是在無產階級領導和在國際主義旗幟之下進行的，所以被賤視的民族，被看作奴隸的民族，在人類歷史上第一次才高昇至真正自由和真正平等的民族地位，而以自己的榜樣感染了全世界底被壓迫民族。

這就是說，十月革命展開了一個新時代，殖民地革命底時代，而這種殖民地革命，在世界各被壓迫國家內，是在與無產階級聯盟中，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進行的。

從前『照例』認為：世界自古以來，就分成了下等的和高等的種族，分成了黑色人種和白色人種，這兩種人種中，第一種人種是沒有達到文明的能力，而注定淪為剝削對象；而第二種人種，却是文明的唯一的代表者，公認可以剝削第一種人種。現在可以說這種奇談已被打碎，已被丟掉了。十月革命給了這種奇談以致命的打擊，在事實上證明了已被解放的，已被吸引到蘇維埃發展軌道上來的非歐洲的民族，能夠推進真正先進的文化和真正先進的文明，絲毫不比歐洲民族差些，——這件事實，是十月革命底極重要的成果之一。

從前『照例』認為：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的·方·法，各民族間彼此一個消滅一個的方·法，各民族分離的方法，加強各民族勞動羣衆間民族仇視的方法，乃是解放被壓迫民族的唯一方法。現在可以說這種奇談已被推翻了。十月革命給了這種奇談以致命的打擊，牠在事實上表明了無·產·階·級·的·和·國·際·主·義·的·解·放·被·壓·迫·民·族·的·方·法，是唯一正確的方法；在事實上證明了這個方法的可能性和適合性；在事實上表明了各民族工農以自·願·和·國·際·主·義·爲·基·礎，建立親睦聯盟的可能性和適合性——這種事實，是十月革命底極重要成果之一。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蘇聯），是世界各國勞動者將來在統一的世界經濟中聯合起來的實際榜樣，它的存在，不能不成爲上述這一點底直接證明。

不用說，十月革命底這些結果和與此類似的結果，曾經而且現在不能不對於殖民地 and 附庸國裏的革命運動，有極大的影響。中國、南洋羣島、印度等地被壓迫民族革命運動的發展和這些民族對蘇聯的同情的日益增長——這些事實無疑地證明上述這

一點。

平安無事地剝削和壓迫殖民地及附庸國的時代，已經過去了。

殖民地和附庸國家解放革命底時代，這些國家無產階級覺醒的時代，無產階級領導革命的時代，已經到來了。

論民族問題方面的各種傾向

——摘自一九三〇年六月二十七日在聯共（布）第十六次大會上的報告——

在講到反對黨內各種傾向的時候，如果不說一說黨內在民族問題方面所有的各種傾向，那麼這幅圖畫是不完滿的。我所指的，第一、就是大俄羅斯排外愛國主義的傾向，第二、就是地方民族主義的傾向。這些傾向是沒有『左』傾和右傾那麼顯著和厲害的。把牠們也許可叫作跛腳的傾向。但是，這還不是說，這些傾向是不存在的。不，這些傾向是存在着，而且主要的是，這些傾向正在增長着。這是毫無疑義的。也是不能懷疑的，因為階級鬥爭一般尖稅的勞圍，不能不使民族的磨擦也相當的尖銳起來，而這種民族的磨擦便反映到我們黨裏面來。所以把這些傾向的面目應當加以揭穿，公佈於世。

在我們現在的條件之下，大俄羅斯排外愛國主義傾向的實質是在什麼地方呢？大俄

羅斯排外愛國主義傾向的實質，就在於企圖迴避語言、文化、風俗的民族區別；就在於企圖準備取消各民族共和國和區域；就在於企圖破壞民族平等的原則，並輕視黨對機關、出版物、學校、以及其他國家和社會組織的民族化的政策。

犯這一傾向的人，在這個問題上的出發點是：因為在社會主義勝利之下，各民族先要合併而爲一，而他們的民族語言，定要變爲一個統一共同語言，所以消滅民族差別，放棄幫助從前各被壓迫民族發展本民族文化政策時候已經到了。他們這樣主張，援引列甯所說的話，但是他們把列甯的話引得不正確，有時簡直是曲解列甯和侮辱列甯。列甯會說，在社會主義之下，各民族的利益匯合而成爲一個整體——是不是可以由此一點就得出結論說，爲了國際主義的利益，取消各民族共和國和區域的時候到了呢？列甯在一九一三年同猶太工會派辯論的時候，曾經說民族文化的口號，是一個資產階級的口號，——是不是可由這一點就得出結論說，爲了國際主義的利益，消滅蘇聯各民族文化的時候到了呢？列甯曾經說過，民族的壓迫和民族的界限，在

社會主義之下是要消滅的，——是不是可以由這一點就得出結論說，爲了國際主義的利益，放棄顧計蘇聯各民族特質政策，而採取民族同化政策的時候到了呢？餘此類推。

毫無疑義的，對民族問題的這一傾向，帶着國際主義和列甯名字的假面具，它是大俄羅斯民族主義最精巧因而也是最危險的一種形式。

第一、列甯從來沒有說過，在一個國家境界之內，在社會主義還沒有在全世界勝利以前，各民族間的差別就應當消滅，而各民族的語言就應該合併而爲一個統一的共同語言。恰恰相反，列甯曾經說：『各民族和各國家間民族和國家的差別，就是在無產階級專政在全世界範圍內實現以後，還要存在很久很久』（『列甯全集』第十七卷，第一七八頁）。怎能引證列甯的話，而可以忘記他這個根本的指示呢？

不錯，過去是個馬克思主義者，而現在是個叛徒和改良派的考茨基先生，他有一種說法，是和列甯告訴我們的完全相反。考茨基與列甯相反肯定地說，如果上世紀中

葉在奧德聯合的國家內無產階級革命勝利，那麼，結果就要形成一個共同的德國話，並使捷克人日耳曼化，因為「僅僅從束縛下解放出來的交換的力量，僅僅德國人所帶來的現代文化的力量，不用任何強制的日耳曼化的方法，就可使落後的捷克人的小資產者、農民和無產者變成德國人，因為這些小資產者、農民和無產者，他們的瘦弱的民族，對他們是沒有絲毫益處的（見『革命與反革命』一書德文版的序言）。很明顯的，這種『概念』，是與考茨基的社會愛國主義完全配合的。我於一九二五年在東方民族大學的講演中，就曾反對考茨基的這種觀點。難道這位走到了極端的德國社會愛國派的這種反馬克思主義的謬論，對於願意始終為國際主義者的我們馬克思主義者還有什麼積極的意義嗎？誰是對的，是考茨基，還是列寧？如果考茨基對的，那麼像白俄羅斯人和烏克蘭人這樣比較落後的民族，他們對大俄羅斯人比捷克人對德國人還要接近些，但是他們並未因蘇聯無產階級革命勝利的結果而俄國化，反之，他們却復興起來發展而成了獨立的民族這種事實怎麼解釋呢？又像土克門、吉爾吉斯、烏茲別克、

塔齊克等等民族（且不說喬治亞人、阿美尼亞人、阿才培疆人了）他們雖然是落後的，但是他們不僅沒有因蘇聯社會主義的勝利而俄國化，反而因復興發展而成了獨立的民族，——這件事實，又怎樣解釋呢？我們的可敬的傾向主義者，爲了追求外觀的國際主義，却跌在考茨基式的社會愛國主義的窠臼裏面去，難道這不明白嗎？這些傾向主義者，歡喜在一個國家的範圍內，在蘇聯的範圍內，有一個共同的語言，但是他們實際上却是力謀恢復以前佔過統治地位的語言的特權，就是大俄羅斯語言的特權，這還不明白嗎？這裏國際主義是在什末地方呢？

第二、列寧從來沒有說過，民族壓迫的消滅和各民族利益的合而爲一，就等於民族差別的消滅。我們已經消滅了民族的壓迫，我們已經消滅了民族的特權，而建立了民族的平等。我們已經消滅了蘇聯內部各民族間舊時所謂的國界、界標和關稅障礙物。我們已經建立了蘇聯各民族政治和經濟利益的一致。但這是不是說，我們因此就消滅了民族的差別，民族的語言、文化、風俗等等呢？很明顯的，不是這種意思。但是民

族的差別、語言、文化、風俗等等，既還存在，那麼在現在的歷史時期，消滅民族共和國和區域的要求，就是一種反動的要求，反對無產階級專政利益的要求，——這難道還不明白嗎？我們的傾向主義者，明白不明白，現在消滅民族共和國和區域，那就等於剝奪了蘇聯各民族千百萬羣衆用本族語言受教育的可能，剝奪了他們有用本族語言設立學校、法庭、行政機關、社會的及其他的組織和機關的可能，剝奪了他們跟社會主義建設配合起來的可能？我們的傾向主義者，爲了要追求外觀的國際主義，却跌在反動的大俄羅斯排外愛國主義者的窠臼裏面去，而忘記了，完全忘記了無產階級專政時期中文化革命的口號，即對於蘇聯所有民族，無論對於大俄羅斯人，或非大俄羅斯人，具有同樣效力的口號，——這還不明白嗎？

第三、列甯從來沒有說過，在無產階級專政的條件之下發展民族文化的口號是反動的口號。恰恰相反，列甯始終主張，要幫助蘇聯各民族發展他們自己的文化。正是在列甯指導之下，而不是在別人領導之下，在黨的第十次大會上，曾經草就並通過了

關於民族問題的一個決議案，這個決議案中曾直捷了當地說：

「黨的任務，是在於幫助非大俄羅斯民族的勞動羣衆，趕上走在前面的中央的俄羅斯，幫助他們：（一）發展並鞏固他們的蘇維埃國家，他的形式要跟這些人民的民族風俗的條件相適應；（二）發展並鞏固他們的用本族語言活動的法庭、行政機關、經濟機關、政權機關，這些機關應由熟悉當地居民心理和風俗的當地人組成之；（三）發展他們的用本族語言創辦的刊物、學校、戲院、娛樂事業，以及其他一切文化教育機關；（四）用他們的語言開辦並發展廣大的普通教育及職業技術教育性的訓練班和學校網。」

這樣，列寧是完全主張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發展民族文化這個口號的，——這難道不明顯嗎？

否認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之下發展民族文化的口號，就是否認有提高蘇聯各非大俄羅斯民族文化程度的必要，就是否認對於這些民族有實施一般強迫教育的必要，就是

把這些民族交給反動的地方民族主義者在精神上去奴役他們了，——這難道不明瞭嗎？

列甯確實曾經把資產階級統治下的民族文化的口號，看作是反動的口號。這難道不是正確的吗？何謂民族資產階級統治之下的民族文化呢？這是一種內容爲資產階級而形式爲民族的文化，他的目的是在拿民族主義的毒藥去蒙蔽羣衆，去鞏固資產階級的統治。何謂無產階級專政之下的民族文化呢？這是一種內容爲社會主義而形式爲民族的文化，他的目的是在以國際主義的精神來教育羣衆並鞏固無產階級專政。假使不與馬克思主義分裂，怎能把這兩種原則上不同的現象混爲一談呢？列甯反對資產階級制度下民族文化一口號，是在打擊民族文化的資產階級內容，而不是打擊它的形式，——這難道不明瞭嗎？假使以爲列甯曾經把社會主義的文化，看作一種沒有民族的，沒有任何民族形式的文化，那是很蠢的。猶太工人同盟確實曾經有個時候給列甯戴上了這麼一頂大帽子。但是從列甯的『全集』中，可以看出，列甯曾經堅決地反對這一謬說，痛斥這種說法的不正確性。難道我們的可敬的傾向主義者，非學一學猶太工

人同盟派的樣子不成嗎？

除了上面所說的以外，我們的傾向主義者，還有什麼理由可說呢？

除了在國際主義旗幟下施行欺騙和污蔑列寧以外，沒有別的。

傾向於大俄羅斯排外愛國主義的人以爲蘇聯建設社會主義的時期，即是民族文化崩潰和消滅的時期，那是很錯誤的。事實却是相反。事實上，蘇聯無產階級專政和社會主義建設時期，正是內容爲社會主義形式爲民族的民族文化發揚的時期，顯然的，他們不懂得民族文化的發展，隨着用本族語言的初等普遍強迫教育的施行與推廣，而會更有力量的展開。他們不明白，只有在民族文化發展的條件之下，纔能真正使落後的民族一同參加建設社會主義的事業。他們不明白，列寧幫助并支持蘇聯各民族文化發展的政策的基本，正是在這裏。

或許有人以爲很奇怪，我們是主張將來把各種民族文化匯合而成爲一個共同文化（不論形式或內容）并用一種共同語言的人，而同時却主張，在現在，在無產階級專

政時期，發揚各種民族的文化。但是這是沒有什麼可奇怪的。應當讓各民族文化發展和展開起來，顯出它們的一切潛力，以便造成它們匯合而成爲一個共同語言的一個共同文化的條件。在無產階級專政的條件下，在一個國家內，發揚那形式是民族內容是社會主義的各種文化，以便在無產階級在全世界勝利而社會主義成爲風俗習慣的時候，使牠們匯合而成爲一個用一個共同語言的，共同的社會主義的（不論形式或是內容）文化——這正是列寧民族文化問題提法的辯證方法的所在。

也許有人以爲這種提問題的方法是『自相矛盾』的。難道我們關於國家問題的提法沒有同樣的『矛盾』嗎？我們是主張國家的死亡的。但是我們同時又主張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這一專政是以前所有的一切國家政權當中最強有力的一個政權。使國家政權達到高度發展，以期造成國家政權死亡的條件——這就是馬克思主義的公式。這是『自相矛盾』嗎？是的，這是『自相矛盾』的。但這一矛盾，是活生生的，它正完全反映着馬克思的辯證法。

或以列甯關於民族自決權（一直到分立權）一問題的提法爲例。列甯有時候把民族自決的論題，用一個簡單的公式：「爲了聯合而分開」表達出來。你們試想一想「爲了聯合而分開」這句話罷。這簡直是一句似是而非的話。但是這個「矛盾」的公式，却反映着馬克思辯證法的活生生的真理，這一真理使布爾塞維克竟然攻破了民族問題方面的最堅固的堡壘。

關於民族文化問題的公式，也是這樣：在一國無產階級專政的時期，發揚民族文化以期造成社會主義在全世界勝利的時期使它們死亡，並使它們匯合而成爲一個共同的社會主義文化和一個共同的語言條件。

誰不瞭解我們過渡時代的這個特性和「矛盾性」，誰不瞭解歷史過程的這一辯證法，那在馬克思主義看來，他就是一個不可救藥之人了。

我們的傾向主義者的不幸，就在於他們不瞭解，而且不願瞭解馬克思的辯證法。

關於大俄羅斯排外愛國主義的傾向便是如此。

不難明白，這種傾向，是反映着從前大俄羅斯支配民族的垂死階級恢復自己已經失掉的特權之志向。

大俄羅斯排外愛國主義是黨內民族問題方面的一個主要危險，原故就在這裏。

地方民族主義傾向的實質是在什麼地方呢？

地方民族主義傾向的實質，就在於力謀孤立起來而閉關在自己民族的外殼以內，就在於力謀抹殺本民族內部所有的階級矛盾，就在於力謀用離開社會主義建設總流的方法保護自己，以反對大俄羅斯的排外愛國主義，就在於力謀不看見那使蘇聯各民族勞動羣衆接近并聯合起來的東西，而只看見那可以使各民族彼此隔離的東西。

地方民族主義的傾向，反映着從前被壓迫民族中正在死亡的各階級對於無產階級專政制度的不滿意，反映着這些階級要分立而成立自己的民族國家，在這裏確立自己階級統治的企圖。

這一傾向的危險，就在於培植了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削弱了蘇聯各民族勞動羣

衆的一致，而作了國外武裝干涉者的玩具。

地方民族主義傾向的實質，就是如此。

黨的任務，就在於對這一傾向作堅決的鬥爭，以保證對蘇聯各民族勞動羣衆實行國際教育所必須的條件。

摘自結論

第二類條子是關於民族問題的。其中有一張條子，我認爲是最有趣味的，它把我第十六次大會上的報告中關於民族語言問題的言論，跟我於一九二五年在東方大學的講演中的言論作一比較，認爲這裏有些不清楚的地方，須要加以解釋。紙條說道：

『你當時反對在社會主義時代（在一國內）消滅各民族語言而創造一個共同語言理論（考茨基的理論），但現在，你在第十六次大會上的報告中却說，共產主義者贊成把各民族文化和各民族語言匯合而成一個共同的文化 and 一個共同的語言（在社會主義在

全世界勝利的時代，——這裏不是有些不清楚的地方嗎？」

我想這裏並沒有任何不清楚的地方，也沒有任何的矛盾。我在一九二五年的演講中，曾反對考茨基的民族排外愛國主義的理論，根據這一理論，上世紀中葉與德聯邦內無產階級革命的勝利，定要使各民族合併而為一個共同的德意志民族，使用一個共同的德意志語言，而使捷克民族德意志化。我援引蘇聯社會主義勝利後我國生活中的事實——推翻了這一理論的事實，來反對這一反馬克思主義反列寧主義的理論。現在我仍在反對這一理論，這從我在這次第十六次大會上的報告中，便可以看出來。所以我反對這一理論者，因為例如蘇聯各民族合併起來，而成為一個共同的大俄羅斯民族，使用一個共同的大俄羅斯語言的理論，乃是民族排外愛國主義的理論，是反列寧主義，是和列寧主義基本原則相抵觸的理論，列寧主義的基本原則，認為民族的區別，在最近時期內是不能消滅的，它們甚至在全世界無產階級革命成功以後，還要存在很久。至於講到各民族文化和各民族語言的更遼遠的前途，我總是堅持而且現在仍在

繼續堅持着列寧的意見，即在社會主義在全世界範圍內勝利的時期，那時社會主義已經穩固起來並深入於生活，各民族的話言不可避免地要合併而成爲一個共同的話言，這一語言當然不會是大俄羅斯的，也不會是德意志的，而是某一種新的語言。關於這點，我在第十六次大會上的報告中，也很確定地講過了。

這裏有什麼不清楚的地方，而需要加以解釋呢？

很明顯地，寫這個紙條子的人們，至少自己并未十分弄明白兩件事情。

首先，他們自己沒弄清楚一件事實，就是我們在蘇聯已經進入社會主義時期，不過，我們雖已進入這一時期，但各民族却不但不衰亡，反而發展和繁榮起來了。實際上，我們是否已經進入了社會主義時期呢？我們的這個時期，通常都叫做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它在一九一八年被叫做過渡時期的，當時列寧在他的有名的『左派幼稚病』一文中，首次分析這一時期及其經濟生活底五種結構。現在一九三〇年，它仍被叫做過渡時期，這時這些經濟結構中有幾個已經衰老而沒落了，而其中有

一種，即工業和農村經濟方面的新結構，正以空前未有的速度增長着，發展着。能不能說，這兩個過渡時期是一樣的，根本上彼此沒有差別呢？很明顯地，是不可以的。

在一九一八年，我們國民經濟方面的狀況怎樣呢？當時所有的是破壞不堪的工業，殘垣破瓦，大量的集體農場與國營農場一概缺乏，城市「新興」資產階級和鄉村富農日益生長起來。但現在的情形怎樣呢？現在，我們的社會主義工業已經恢復而且已加以改造，集體農場和國營農場體系，已大加發展（只春耕面積它們已佔全蘇聯播種面積百分之四十）。城市裏的「新興」資產階級正在死亡着，鄉間的富農也正在蕭條着。從前是過渡時期，現在也是過渡時期。可是它們中間有天淵之別。誰也不能否認，我們正在開始消滅最後一個厲害的資產階級，即富農階級。很明顯地，我們已經走出了從前所說的那種過渡時期，而進入了全社會主義建設線上直接展開的時期。很明顯地，雖然我們距完成社會主義社會建設和消滅階級區別的時期還遠，但因為現在社會主義部份已經握住了整個國民經濟的一切經濟命脈，所以我們是已經進入社會主義的時期。

了。雖是這樣，但各民族的語言不但沒有衰亡，不但沒有合併而成爲一個共同的語言，而且恰恰相反，各民族的文化和各民族的語言却發展和興盛起來。因此，在社會主義建設展開的時期，在一國建設社會主義的時期，在一個國家的範圍以內，消滅各民族語言將它們合併而爲一個共同的語言，這個理論乃是不正確的，是反馬克思主義、反列寧主義的理論，難道這還不明白嗎？

第二，寫這些條子的人們不了解，消滅各民族語言將它們合併而爲一個共同的語言問題，並不是一國內部問題，也不是社會主義在一國之內勝利的問題，而是個國際的問題，是個社會主義在國際範圍內勝利的問題。寫這些條子的人們不了解，不能把社會主義在一國的勝利和社會主義在國際範圍內的勝利混爲一談。所以，列寧說過，民族的區別，甚至在無產階級專政在國際的範圍以內得着勝利以後，還要存在很久，這話是很有意思的。此外，還要注意與蘇聯許多民族有關係的一種情形。在蘇聯的機構中有個烏克蘭，但在別國的機構中也有一個烏克蘭。在蘇聯的機構中有個白俄

羅斯，但在別國的機構中也有個白俄羅斯。你們是否想到，不估計到這些特殊條件，便能解決關於烏克蘭和白俄羅斯語言的問題呢？再拿蘇聯南方的各民族，從阿才倍羅到哥薩克斯坦和布雅特蒙古來看，它們都跟烏克蘭和白俄羅斯的情形一樣。很明顯地，這裏對於這些民族發展條件的特質，不能不加以注意。所有這些及與民族文化和民族語言的問題有關係的類似問題，在一個國家的範圍以內，在蘇聯的範圍以內，是不能加以解決的，難道這還不明白嗎？

同志們，一般民族問題，特別是上面所講的紙條所問的民族問題，就是如此。

（聯共第十六次大會紀錄，一九三〇年出版）

論民族主義的各種傾向

——摘自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二日在聯共(布)第十七次大會上關於聯

共中央工作的報告——

或者比方拿民族問題來說吧。在這裏，在民族問題方面，跟在其他問題方面一樣，一部份黨員也有糊塗觀念，這種糊塗觀念造成了一種危險。關於資本主義殘餘的有生氣，我已經說過了。其次應當指出的，就是資本主義在人們意識中的殘餘，在民族問題方面，比在其他任何問題方面，更有生氣得多。它們所以更有生氣者，因為它們穿上民族的服裝，易於掩飾的原故。有許多人認為：斯克里普尼克的犯罪是個唯一例外的事情，這是不正確的。斯克里普尼克及其集團在烏克蘭的犯罪並不是一個例外。其他各民族共和國的個別同志也有同樣的脫節毛病。所謂民族主義的傾向——無論是大俄羅斯民族主義的傾向也好，或是地方民族主義的傾向也好——，究竟是什麼意思

呢？所謂民族主義的傾向云者，即想使工人階級國際主義政策適應於資產階級民族主義政策之謂。民族主義的傾向，反映着『自己』『民族』資產階級想破壞蘇維埃制度而恢復資本主義的企圖，你們瞧罷，這兩種傾向的來源是有共同的，即對列寧主義的國際主義的放棄。如果你們想向這兩種傾向開火，那末，你們就應當首先來打擊這種根源，打擊那些放棄國際主義的人——無論是地方民族主義的傾向也好，或是大俄羅斯民族主義的傾向也好，都是一樣的（大鼓聲）。

有人在爭論着，那一傾向是主要的危險，是大俄羅斯民族主義的傾向呢，還是地方民族主義傾向？在現時條件之下，這是個形式上的爭論，因而也是個空洞的爭論。如果關於主要危險與非主要危險想開出一個適用於一切時候和一切條件的現成的藥方，那是很愚蠢的。這樣的藥方在世界上是根本沒有的。如果中止反對某一傾向，因而該傾向滋長起來到了危害國家的地步，這一傾向便是主要的危險（長時間的鼓聲）。在烏克蘭，還在不久以前，烏克蘭民族主義的傾向還不是主要的危險，但是當時

即中止反對它的鬥爭而讓它日益滋長，竟與武裝干涉者勾結起來，以致這一傾向就成
了主要的危險。關於民族問題方面主要危險的問題，決不能由空洞的形式上的爭論，
就可以解決，而需要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去分析當時的實際情形，研究在這一方面所
犯的錯誤，才能解決的。

(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八日真理報第二十三期)

附
錄

一 聯共(布)民族問題決議摘要

民族問題決議案

——一九一七年四月(公曆五月)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七次全國臨時代表

大會(四月大會)通過——

民族壓迫的政策乃是專制政體和君主政體的遺產，地主、資本家及小資產階級爲了保持他們的階級的特權和離間各民族的工作，都是支持這一政策的。現代帝國主義更加强了征服弱小民族的志向，它是加劇民族壓迫的一個新的因素。

假使在資本主義社會裏面，剷除民族壓迫可以做到的話，那末這只有在徹底民主共和國的國家制度和管理之下才有可能，因爲只有這種國家制度和管理才可以保證各民族和語言的完全平等。

應承認構成俄羅斯的一切民族，都有自由分立和成立獨立國家的權利。否認這一權利和不採取保障實行這一權利的方法，便等於支持侵略或兼併政策。只有無產階級的承認各民族有分立之權，才可以保證各民族工人的充分的團結，確實促進各民族的民主的接近。

現在芬蘭和俄國臨時政府之間所發生的糾紛，特別明瞭地表明，對民族自由分立的否認，便要走向對沙皇主義政策的直接繼續。

絕不允許把民族自由分立權的問題跟某一民族在某一時期適合於分立的問題，混爲一談。無產階級政黨對後這個問題，應在每一場合之下，完全獨立地，從全社會發展的利益和無產階級爭取社會主義的階級鬥爭的利益見地，加以解決。

黨要求要實行廣泛的區域自治，取消從上而下的監督，取消義務的國語，並要求以當地居民自身考慮經濟和風俗條件，居民族成份等爲基礎確定自我管理和自治區域的邊界。

無產階級政黨堅決地排斥所謂『民族文化自治』，即將教育事業從國家管理權中取出而交給民族國會去處理的制度。民族文化自治，用人工方法，把住在同一個地方甚至在同一個企業內作工的工人，照屬於某一『民族文化』的情形，拆散開來，即加強了工人與個別民族資產階級文化的聯繫，而社會民主黨的任务就在於加強全世界無產階級的國際文化。

黨要求要把宣佈一個民族享有任何特權及任何違犯少數民族權利的無效的基本法，包括在憲法以內。

工人階級的利益，要求俄國各民族的工人融合在統一的無產階級的政治的、職業的、合作社的及教育的等組織以內。只有各民族工人這種融合在統一的組織內的情形，才使無產階級有跟國際資本和資產階級民族主義進行勝利的鬥爭的可能。

關於黨在民族問題方面的迫切任務

——一九二一年三月間俄國共產黨(布)第十屆代表大會所通過的決議案——

一 資本主義制度與民族壓迫

(一) 現代的民族，本身是一定的時代——上升的資本主義時代的產物。封建主義消滅與資本主義發展的過程，同時也就是人們結合而為民族的過程。英吉利人、法蘭西人、日耳曼人、意大利人的結合而為民族，正是戰勝封建割據性的資本主義勝利發展的時代。

(二) 凡民族的形成，在時間上跟中央集權的國家的形成完全相符合的地方，民族自然披著國家的外衣，發展而為獨立的資產階級的民族國家。在英國(除愛爾蘭)，在法國，在意大利，都是如此。在東歐，適為相反，中央集權國家的形成，由於自衛

(防禦突厥人、蒙古人等的侵犯)的需要所加速，比封建主義的消滅爲早，所以民族的形成爲早。因此之故，民族在這兒未曾發展、也不能發展而爲民族的國家，而成立了幾個混合的、多民族的、資產階級的國家，這種多民族的國家是由一個強盛的支配民族和幾個弱小的被隸屬的民族組成的。奧國、匈牙利、俄羅斯，便是如此。

(三)民族國家，如法國和意國之類，起初主要地是憑藉於本民族的力量，一般說來，不知有民族的壓迫。與此相反，多民族的國家，是基於一個民族，更確切些說，是基於該民族的支配階級對其餘民族的支配而建立起來的，它們本身就是民族壓迫和民族運動的基本產地和基本舞台。支配民族利益與被支配爲民族利益的矛盾，是必須加以解決的矛盾，這些矛盾不解決，則多民族的國家，要想牢固存在，那是不能的。多民族的資產階級國家的悲劇，就在於它無力去解決這些矛盾，它在保存私有財產和階級矛盾之下『弄平』各民族和『保障』少數民族的每一企圖，通常結果都重新歸於失敗，使民族的衝突重新尖銳化。

(四)資本主義在歐洲的進一步的發展，新的銷貨市場的需要，原料和燃料的尋求，以及帝國主義的發展，資本的出口和保證水陸交通幹線安全的必要，一面使舊的民族國家去佔新的領土，把它們變為多民族（殖民的）的國家，因而帶來了民族的壓迫和民族的衝突（如英、法、德、意）；別方面在舊的多民族國家的支配民族中間，不僅加強了保持舊有國界的意向，而且加強了擴充國界、犧牲鄰國，而為自己征服新的（弱小的）民族的意向。因此之故，民族問題，更加擴大，歸根結底，自然而然的與關於殖民地的總的問題匯合而為一，而民族的壓迫遂由國內的問題變為國與國間的問題，變為『大』的帝國主義強國征服弱小的不平等的民族而鬥爭（和進行戰爭）的問題了。

(五)帝國主義大戰，連根帶底地暴露了不可調和的民族的和資產階級多民族國家的內部的破產情形，它使戰勝的殖民國家（英、法、意）內部的民族衝突極端尖銳化，使戰敗的舊的多民族國家（奧、匈、一九一七年的俄國）完全崩潰，最後

——這是資產階級對民族問題的最『急進』的解決——並成立了許多新的民族國家（波蘭、捷克斯拉夫、南斯拉夫、芬蘭、喬治亞、亞美尼亞等）。不過新的獨立的民族國家的成立並未確立也不能確立各民族的和平共居，並未消除也不能消除民族的不平等，更不能消除民族的壓迫，因為新的民族國家，係基於私有財產和階級的不平等，牠們（一）非壓迫自己的少數民族（波蘭壓迫牠境內的白俄羅斯人、猶太人、立陶宛人、烏克蘭人；喬治亞壓迫牠境內的奧雪廷人、亞布哈斯人、亞美尼亞人；南斯拉夫壓迫牠境內的霍華特人、波斯尼克人，餘此類推）；（二）非侵犯鄰國擴張自己領土以致引起衝突與戰爭（如波蘭的侵犯立陶宛、烏克蘭、俄羅斯；南斯拉夫的侵犯保加利亞；喬治亞的侵犯亞美尼亞、土耳其等）；（三）非在財政上、經濟上、軍事上壓迫帝國主義『大國』，就不能存在。

（六）這樣戰後時期便揭開了一幅無可慰藉的民族仇視、不平等、壓迫、衝突、戰爭、文明民族方面彼此之間以及對不平等的人民的帝國主義獸行的圖畫：一方面

是，幾個『大』國，壓迫和剝削附庸的和『獨立』（事實上完全是附庸的）的民族國家的全體羣衆，以及牠們相互之間爲爭取剝削民族國家的獨占權而鬥爭；別一方面，是附庸的與『獨立』的民族國家反對『大國』的苦重壓迫；民族國家相互之間又爲擴充自己的民族領土而鬥爭；每個民族國家都力謀抑制自己的被壓迫的少數民族；最後，殖民地反對『大國』的解放運動，日益加強；這些大國內部以及民族國家（照例這些民族國家都包含着好多少數民族）內部的民族衝突，日益尖銳。帝國主義大戰所遺留下的一幅『和平圖畫』，就是這樣的。

資產階級社會，在解決民族問題一事上，遂完全破產了。

二 蘇維埃制度與民族自由

（一）要是私有財產和資本不可避免地要拆散人們、燃起民族的岐視、加強民族的壓迫；那末集體的財產和勞動却不可免地要使人們接近、消滅民族的岐視，摧毀民族

的壓迫。資本主義的存在，非有民族的壓迫是不可能的；正如，社會主義的存在，非解放被壓迫民族，非實行民族的自由是不可能的。當充滿着民族偏見的農民（以及一般小資產階級）跟着資產階級走的時候，排外愛國主義和民族鬥爭是不可避免的，是無可如何的；反之，當農民跟着無產階級走的時候：換一句話說，要是無產階級專政有保證的話，則民族的和平和民族的自由可算有了保證了。所以蘇維埃的勝利與無產階級專政的確立，乃是消滅民族壓迫、確立民族平等、保證少數民族權利的基本條件。

（二）蘇維埃革命的經驗，完全證實了這一論點。蘇維埃制度在俄羅斯的確立和各民族的國家分離權的宣佈，掉換了俄羅斯各民族勞動羣衆間的關係，摧毀了舊有的民族仇視，剝奪了民族壓迫的基礎，不僅取得了俄羅斯、而且取得歐亞二洲異族兄弟對俄羅斯工人的信任，使這一信任達到熱心甘願爲共同事業而奮鬥的地步。阿才培疆、亞美尼亞蘇維埃共和國的成立，也得了同樣的結果：消滅了民族的衝突，解決了

土耳其勞動羣衆與亞美尼亞勞動羣衆，亞美尼亞勞動羣衆與阿才培疆勞動羣衆間的「永世」仇恨。關於蘇維埃在匈牙利、在巴威利亞、在芬蘭、在拉脫維亞的臨時勝利，也可說是如此。另一方面，可以確信地說，要是不消滅自己家中的民族仇視和民族壓迫，要是沒有西方和東方各民族勞動大衆方面對他們的信任與熱忱，那末俄羅斯工人也許不能夠戰勝柯爾恰克和鄧尼金阿才培疆和亞美尼亞共和國也許不能站住脚跟。蘇維埃共和國的鞏固和民族壓迫的消滅，乃是勞動者解除帝國主義奴役的同一過程的兩方面。

(三)不過蘇維埃共和國的存在，即使是規模是最不大的吧，仍是對帝國主義的一個致命威脅。這一威脅不僅在於蘇維埃共和國自與帝國主義決裂以後，曾從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變爲真正獨立的國家，因而剝奪了帝國主義者的多餘的一塊領土和多餘的一筆收入，尤其在於蘇維埃共和國存在的本身，這些共和國歷服資產階級和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的每一步驟，都是反對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的巨大鼓動，都是爭取附庸國

家解除帝國主義奴役的巨大鼓動，都是瓦解和破壞各種資本主義的不可克服的因素。所以，帝國主義『大國』反對蘇維埃共和國的鬥爭，『大國』力謀消滅這種共和國的志向是不可避免的。『大』列強反對蘇維埃俄羅斯的歷史——嗚使一個一個遼闊資產階級政府，嗚使一羣一羣反革命的軍人起來反對牠，勞心焦慮地設法封鎖牠，及一般力謀在經濟上孤立牠，——所有這一切都 very 明白地證明，在現存國際關係之下，在資本主義包圍的環境之下，不論那一個蘇維埃共和國，如個別而論，牠都不能認為自己已有保證，可以對付世界帝國主義方面的經濟消耗和軍事毀滅了。

(四) 所以，各蘇維埃共和國的孤立生存，由於資本主義國家方面對牠們生存物威脅，是不安定的，是不牢固的。一則各蘇維埃共和國國防的共同利益；二則被戰事所破壞的生產力的恢復；三則產糧食的蘇維埃共和國方面對非產糧食的蘇維埃共和國的必要的食物的幫助，都在在有力地指使各個蘇維埃共和國須實行國家的聯盟，這是從帝國主義奴役下和民族壓迫下拯救出來的唯一道路。從『自己』的和『異族』的資

產階級之下解放出來的各民族蘇維埃共和國，要能保持自己的生存和戰勝帝國主義的聯合力量，只有聯合而爲一個密切的國家聯盟才行，否則它們是不會獲勝的。

(五) 基於軍事和經濟事業的共同性而成立的蘇維埃共和國聯邦，乃是國家聯盟的一個總的方式，這一總的方式：(一) 可以保證各個共和國以及整個聯邦的完整與經濟的發展；(二) 可以包括發展階段各不相同的民族和人民的各色各樣的生活、文化及經濟狀態，並可以根據此點應用某一聯邦方式；(三) 可以調整各民族和各人民的和平共居和親密合作，使他們把自己的命運跟聯邦的命運設法聯繫起來。俄羅斯應用各種聯邦的經驗，以蘇維埃自治(吉爾斯基、巴什吉爾、韃靼、山人、達格斯坦) 爲基礎的聯邦，進而到以與各獨立蘇維埃共和國(烏克蘭、阿才培疆) 訂立條約關係爲基礎的聯邦，並允許在他們之間設立中間階段(土耳其斯坦、白俄羅斯)，完全證實了聯邦的適合時宜與靈活性，證實了聯邦是各蘇維埃共和國的國家聯盟的總的方式。

(六) 不過要使聯邦能夠牢固，要使聯邦的結果能夠切實，只有它依靠於加入它

的各國相互信任和自願同意時才行。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是世界上唯一的國家，這裏好多民族和人民和平共居和親密合作的試驗已經完全成功，其原因就在於在這裏不論支配者、被支配者、宗主國、殖民地、帝國主義、民族壓迫等都沒有了，——在這裏聯邦是以各民族勞苦大眾相互信任和自願聯盟爲基礎的。聯邦的這種自願性質，務須設法保存起來，因爲只有這一聯邦才能成爲走向各國勞動者在統一的世界經濟內達到最高統一的過渡方式，這種最高的統一的必要一天天感覺着迫切了。

三 俄羅斯共產黨的迫切任務

(一) 因爲無產階級革命顛覆帝國主義的多民族的國家，而代以自由的各民族蘇維埃共和國聯邦，所以，蘇維埃制度保證從前被壓迫民族的勞動者得逐漸而妥善的向共產主義發展，可使牠們在其反對民族壓迫和不等殘餘及反對本國剝削者上層份子的鬥爭中憑藉於先進國家無產階級的革命經驗與組織力量。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

義共和國及與它有聯繫的獨立的各蘇維埃共和國，約有一萬萬四千萬人口。其中非大俄羅斯人，約有六千五百萬（即烏克蘭人、白俄羅斯人、吉爾吉斯人、烏茲別克人、土克門人、達韃克人、阿才培韃人、伏爾加韃靼人、克里姆韃靼人、布哈里亞人、赫瓦人、巴什吉爾人、亞美尼亞人、赤城人、卡巴丁諾人、奧雪廷人、切爾基斯人、茵古什人、卡拉查也夫人、巴爾卡人（註一）、卡勒米克人、卡列勒人、阿瓦里亞人、達爾根人、卡西庫穆人、庫林人、庫姆克人（註二）、瑪里人、秋瓦什人、伏恰克人、伏爾加日耳曼人、布雅特人、雅庫特人等）。沙皇主義的政策，地主和資產階級對這些人民的政策，就在於殺死他們中間一切國家的萌芽，蹂躪他們的文化，抑制他們的語言，使他們永處於愚頑無知之中，並盡可能地使他們俄羅斯化。這一政策的結果，便是這些民族的不發展與政治的落後。

（註一）後邊七個民族統稱為「山人」。

（註二）後邊五個民族統稱為「達格斯坦人」。

在地主和資產階級被推翻和這些區域內勞苦大眾宣佈成立蘇維埃政權的現在，黨的任務就在於幫助非俄羅斯民族的勞苦大眾趕上走在前邊的中央俄羅斯，幫助他們：

(一)發展並鞏固自己的蘇維埃國家，其方式須與這些人民的民族風俗條件相適應；
(二)發展並鞏固自己的用本族語言活動的法庭、用熟悉當地居民風俗和心理的當地人組成的行政機關、經濟機關、權力機關；
(三)發展自己的用本族語言的報紙、學校、戲院、俱樂部及一般文化教育機關。
(四)開辦發展廣大的用本族語言授課的一般教育性質及職業技術性質的訓練班和學校網（尤其對於吉爾吉斯人、巴什吉爾人、土克門人、烏茲別克人、達輯克人、阿才倍疆人、韃靼人、達格斯坦人）、以便加速造就土著的熟練工人及一切行政方面尤其教育方面蘇維埃及黨的工作人員幹部。

(二)六千五百萬非大俄羅斯人口中間，除過已經多少經過工業資本主義時期的烏克蘭、白俄羅斯及阿才倍疆的一部分、亞美尼亞以外，剩下的三千萬左右的人，主要為土耳其居民（土耳其斯坦、阿才倍疆的大部分、達格斯坦、山人、韃靼人、巴什

吉爾、吉爾吉斯等），他們還未來得及踏入資本主義的發展，還沒有或者差不多還沒有自己的工業無產階級，大抵還保存着牧畜經濟和家長氏族生活狀態（如吉爾吉斯、巴什吉爾、北高加索），或者還沒有完全脫離半家長半封建的生活狀態（如阿才倍疆、克里姆等），可是牠們都已經捲入在蘇維埃發展的總的軌道以內了。

這裏的事實上的民族不平等的消滅，乃是一個長期過程，這個過程需要跟民族壓迫和殖民地奴隸制的一切殘餘作頑強而堅定的鬥爭。這裏民族的不平等，直至現在是置基於歷史上形成的經濟的不平等之上。這一不平等，首先表現於：俄羅斯的這些邊疆（特別是土耳其斯坦），曾處於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地位，被強制去作一切原料的供給者，這些原料運到中央去加工製作。這便是牠們經常落後的原因，而阻止了這些被壓迫人民當中工業無產階級的發生，尤其發展。無產階級革命在東方各邊疆不可避免地要與這一切發生衝突，其頭一個任務，便是澈底消滅社會和經濟生活各部門內民族不平等的一切殘餘，尤其有計劃的在邊疆各地樹立工業，把工廠遷到原料產地去（如在土

耳基斯坦、巴什吉爾、吉爾吉斯、高加索等地開辦紡織、毛織物、及皮革工業等）。

黨要用堅決而澈底之力謀消滅各種民族不平等的方法，取得東方各邊疆勞動羣衆的信任，同時，黨要把他們團結和聯合起來，在澈底消滅從前被壓迫民族本身當中的家長封建關係，使他們加入共產主義的建設。東方各邊疆階級分化政策的第一個步驟，應是設法解除土著剝削份子對羣衆的影響，在一切蘇維埃自治機關內反對他們，用土著羣衆自我組織勞動者蘇維埃的方法剝奪他們的階級的特權。在這種情形之下，首先要組織並用最關心的方法吸收在各門事業內，在煤礦中，在鐵道上，在鹽場上，在富農家中作工時比較爲數不多的土著無產階級份子，參加共產黨的隊伍及蘇維埃工作。

第二個步驟，應是成立混合的職業合作社型的土著貧民經濟組織，這種混合的職業合作社型是土著勞動羣衆從落後的經濟方式到更高形式——從遊牧生活方式到農業，從爲自由市場而工作的行會手工業到爲蘇維埃國家而工作的勞動組合（吸收手工業半無產份子加入工會），從手工業勞動組合生產到工廠生產，從小規模農業到有計劃的

共同耕地的過渡情形所使然的。蘇維埃政府首先應當經過統一的消費合作社機關來幫助土著的半無產階級羣衆，此種羣衆已被災荒置在死亡的威脅。根據蘇維埃經濟建設的這些特殊條件，將各經濟機關的工作，應加以改組，如將重心移至土著環境，將手工業等包括在計劃經濟組織以內，與居民中的基本生產羣衆確立牢固聯繫，依照當地條件製定在邊疆樹立工業的具體計劃。對於盲目的模仿中央蘇維埃俄羅斯榜樣的方，須同樣堅決地加以反對，尤其在邊疆實行糧食專賣之下，不要在口頭上而要在事實上把實行食物政策跟在落後的土著居民當中實行階級分化政策聯繫起來。中央俄羅斯的各種經濟措施，只適於比較高度的經濟發展，任何把這些措施很機械的移置於東方各邊疆的方法，都須加以排斥。勞動者蘇維埃只有基於廣大的土著貧民羣衆生存所關的經濟利益把他們組織起來，才可以扶助東方各民族去跟先進各國無產階級肩並肩的進行共同的鬥爭。

(三) 要是從三千萬主要爲土耳其人的口中，除去阿才倍疆人、土耳其斯坦的

大部分、韃靼（伏爾加的和克里姆的）、布哈拉、赫瓦、達格斯坦、一部分山人（卡巴丁諾、切爾基斯、巴爾卡拉），及其他若干業已定居下來而牢牢繫在一定領土的人民外，那剩下的約有一千萬樣子的人口，則爲吉爾吉斯人、巴什吉爾人、赤城人、土耳其斯坦的南方，奧雪廷人、齒古什人，他們的土地直到最近曾作了俄羅斯僑民方面的殖民地化的對象，這種俄羅斯僑民攫去了他們的良好耕地，有系統地把他們排擠到貧瘠的荒原裏面去。沙皇主義的政策，地主和資產階級的政策，就在於在這些區域內盡量移植俄國農民和哥薩克當中的富農份子，把這種富農份子變爲大國的意向的可靠支柱。這一政策的結果，便是被排擠到荒野去的土人的逐漸滅亡（如吉爾吉斯人、巴什吉爾人）。

黨對於這些人民的勞苦大眾的任務（除過第一第二兩節所說的任務以外），就在於把他們的力量跟當地俄國居民當中勞苦大眾的力量聯合起來，力謀從一般富農——尤其強盜般的大俄羅斯富農之下解放出來，用一切力量和手段幫助他們丟掉肩上所負

的富農殖民者，以便給他們保證以良好的、爲人類生存所必須的土地。

(四、除過上述所說的有着一定的階級構成並在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境內佔據着一定的領土的民族和人民外，還有着各個流動的民族集團，少數民族，這種少數民族點綴在稠密的佔據多數的異民族中間，大抵沒有一定的領土，(如拉脫維亞人、愛沙尼亞人、波蘭人、猶太人等)。沙皇主義的政策，就在於用一切手段，直到屠殺(如屠殺猶太人)，來使這種少數民族逐漸滅亡。

在今日民族特權業已消滅、民族平等業已實行，而少數民族自由發展的權利又有蘇維埃制度的性質本身爲之保證，這時黨對於這些民族集團勞苦大眾的任務，就在於幫助他們完全享用這種他們所有的自由發展的權利。

(五)共產主義組織在邊疆的發展，是在幾個特殊的條件下面進行的，這些條件阻止了黨在這些區域內的正常的生長。一方面，在邊疆工作的大俄羅斯共產主義者，他們是在『強國』民族的生存條件之下長大的，不知有民族的壓迫，因之他們往往縮

小了民族特質在黨的和蘇維埃的工作中的意義，或是完全沒有顧計到這些特質，在自已的工作中未考慮到某一民族的階級構成、文化、生活、過去歷史的特質，使黨對於民族問題的政策庸俗化，因而加以曲解。這種情形，其結果便弄成放棄共產主義，而傾向於大國精神、殖民主義、大俄羅斯排外愛國主義方面去了。別方面，當地共產主義者，他們曾經過民族壓迫的時期，還沒有完全解脫民族壓迫的夢幻，因之他們往往誇大了民族特質在黨的和蘇維埃的工作中的意義，而放棄了勞動者的階級利益，或是簡簡單單地把該民族勞動者的利益跟該民族的所謂『全民』利益，混為一談，不會把前者從後者之中分別出來，而根據勞動者的利益去建立黨的工作。這種情形，又弄成放棄共產主義，而傾向於資產階級民主的民族主義的方面，這種民族主義有時採取了大同敘主義，大土耳其主義（在東方）的方式。

這兩種有害的離開共產主義的國際主義原則的傾向，起源於邊疆共產主義組織初期不可避免的污點。一方面，富有的移民份子混入黨內，別一方面，土著剝削者集團

的代表者也侵入黨內。

大會堅決地指斥這兩種傾向，認爲它們對共產主義事業是有害的和危險的，並認爲須要指出趨向於大國精神、殖民主義方面去的第一種傾向，有着特別的危險和特別的危害。大會認爲，如不克服黨的隊伍中的殖民主義和民族主義的殘餘，便沒有可能在邊疆成立牢固的及與羣衆聯繫的真正共產主義的組織，此種組織基於國際主義可把土著居民和俄羅斯居民中的普羅和半普羅份子團結在自己的隊伍中。因此大會認爲消滅共產主義中的民族主義的——尤其殖民者的動搖，乃是黨在邊疆的重大任務之一。

大會號召要與一切混入無產階級政黨的僞共產主義份子作堅決的鬥爭，並使黨要特別提防用吸收市儈民族主義和富有的份子來『擴充』的辦法。同時大會側重指出在東方各邊疆的蘇維埃工作中，務須巧妙而有組織的利用從前被壓迫人民當中的一切誠實而忠於蘇維埃政權的民族知識份子。

黨的建設和國家建設中的民族因素

——一九二三年四月俄國共產黨(布)第十二屆大會所通過的決議案——

一

(一)資本主義的發展尙在前一世紀，就暴露了生產方法和交換的國際主義化、民族閉關主義的消滅、各民族經濟的接近及廣大領土的逐漸聯合而爲一個聯繫的整體之趨勢。資本主義的進一步的發展，世界市場的發展，主要海上航路和鐵道的設置，資本的輸出等，更加强了這一趨勢，把各色各樣的人民，用國際分工和各方相互依賴的繩索聯繫起來。因爲這一過程反映了生產力的巨大發展，因爲它促進了民族孤立性與各民族利益對立性的消滅，所以，它仍是一個進步的過程，因爲它準備了未來的世界社會主義經濟的物質前提。

(二)不過這一趨勢是在一種特殊的方式之下發展起來的，這種方式是跟它的內在的歷史意義不相適應的。各民族的相互依賴和地域的經濟聯合，在資本主義發展行程中，並不是經過各民族平等合作，而是由於一個民族支配別個民族，比較發展的民族壓迫和剝削不大發展的民族而建立起來的。對殖民地的掠奪和侵略，民族的壓迫和不平等，帝國主義的橫行與殘暴，殖民地的奴隸制和民族的毫無權利，與夫『文明』民族相互之間奪取對『非文明』民族統治權的鬥爭，——這就是各人民經濟接近過程所經過的方式。因此，與聯合趨勢並行的，還生長了一個用暴力方式消滅這個聯合的趨勢，被壓迫殖民地和附庸民族謀解除帝國主義壓迫的鬥爭。因為這第二個趨勢是表示被壓迫羣衆反對帝國主義聯合方式的憤激行動，因為它要求各人民根據合作和自願聯合的原則而聯合起來，所以，它仍是一個進步的趨勢，因為它造就了未來的世界社會主義經濟的精神前提。

(三)這兩個爲資本主義所特有的形式上所表現出來的基本趨勢的鬥爭，充滿着

近五十年來多民族的資產階級國家的歷史。在資本主義發展的範圍以內，這兩個趨勢間的不可調和的矛盾，曾作了資產階級的殖民國家內部破產和有機的不安定的基礎。這些國家內部的不可避免的衝突和這些國家相互間的不可避免的戰爭；老舊的殖民國家的崩潰和新興的殖民國家的成立；奪取殖民地的新的角逐和多民族國家的新的崩潰（這一崩潰，使世界政治地圖重新劃過），——這便是這一基本矛盾的結果。一方面舊俄羅斯、奧匈帝國、及土耳其的瓦解；別一方面，大不列顛及舊德意志這些殖民國家的歷史；與夫偉大的「帝國主義戰爭和殖民地及不平等民族革命運動的生長，——所有這些及類似的事實，都很明顯地說明了多民族的資產階級國家的不安定與不牢固。這樣，各人民經濟聯合過程與這種聯合的帝國主義方法間的不可調和的矛盾，便決定了資產階級尋求解決民族問題的正確方法的毫無能力，一籌莫展，及脆弱無力。

（四）本黨以民族有自決權、各人民有獨立國家生存權爲自己關於民族問題政策的基礎，考慮到了這些情形。尙在自己生存的最初幾天內，在自己的第一次代表大會

上（一八九八年），那時資本主義在民族問題方面的矛盾，還沒有十分明白地顯示出來，本黨就承認各民族有這個不能剝奪的權利。後來直到十月革命爲止，牠在自己代表大會和代表會議上，以特殊的決議和決定毫不改變地確認了自己的民族綱領。帝國主義大戰和與這一大戰有關係的殖民地的強大的革命運動，不過對於本黨對民族問題的決定給一個新的確認罷了。這些決定的意義就在於：（一）堅決否認對各民族的一切任何強制方式；（二）承認各民族平等並對自己命運的處理有自主權；（三）承認各民族的牢固聯合，只有基於合作和自願的原則才能做到；（四）宣佈了這種聯合的實現只有在推翻資本權力的結果而才能夠做到的真理。

本黨在自己的工作中，不倦地拿這種民族解放的綱領，跟沙皇制度的公開壓迫的政策以及少數派和社會革命黨的不澈底的半帝國主義的政策對立起來。要是沙皇制度的俄羅斯化的政策造成了沙皇制度與舊俄各民族間的鴻溝，而少數派與社會革命黨的半帝國主義政策，曾使這些民族的優秀份子脫離了克倫斯基主義，那末本黨的解放政

策，曾獲得了這些民族的廣大羣衆在他們反對沙皇制度和帝國主義俄羅斯資產階級鬥爭中的同情與支持。毫不容疑的，這種同情與這種支持，乃是確定我黨在十月革命時期內勝利的因素之一。

（五）十月革命把本黨關於民族問題的決定，作了個實踐的總結。十月革命推翻地主與資本家——民族壓迫的基本執行者——的政權，而使無產階級得了政權以後，一下子便擊破了民族壓迫的鎖鏈，把舊的各民族間的關係顛倒過來，而摧毀了舊有的民族仇視，掃清了各民族合作的地盤，不僅取得了俄羅斯異族兄弟，而且取得了歐亞二洲異族兄弟對俄羅斯無產階級的信任。不用說，沒有這種信任，俄羅斯無產階級也許不能夠戰勝柯恰克和鄧尼金，右金尼赤與烏蘭格爾。別一方面，無疑的，在俄羅斯的中央不建立無產階級專政，被壓迫民族也許不能獲得自己的解放。當資本掌握政權的時候，當充滿着民族主義偏見的以前「強國」民族的小資產階級，尤其農民，眼在資本家屁股後面走的時候，民族的仇視和民族的衝突總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反

之，要是農民與其他小資產階層跟着無產階級走的話，要是無產階級專政有保證的話，那末民族的和平和民族的自由也就有了保證。所以，蘇維埃的勝利和無產階級專政的確立，乃是在一個統一的國家聯盟之內各民族親睦合作所由建立的基礎。

（六）不過十月革命的成績，並不限於民族壓迫的消滅和各人民聯合基礎的創立。在自己發展的行程中，十月革命還制定了這一聯合的方式，而指出了各民族藉以聯合而爲一個聯盟國家的基本路線。在革命的初期，那時各民族の勞動羣衆初次感覺自己成了一種獨立的民族，同時外國干涉的威脅還沒有呈現爲一種實在的危險，因之各民族的合作還沒有完全肯定的、嚴格確定的方式。在內戰和國外干涉時期，那時各民族共和國軍事自衛的利益佔着首要的地位，同時經濟合作的問題還不甚迫切，因之合作採取了軍事聯盟的方式。最後，在戰後時期，那時恢復被戰爭所破壞不堪的生產力的問題，佔了首位，於是軍事聯盟乃補充以經濟聯盟。各民族共和國的聯合而爲蘇維埃共和國聯盟（蘇聯），乃是合作方式發展的末了一個階段，這一階段在這次採取

了各民族在軍事、經濟、政治上聯合而爲一個統一的多民族的蘇維埃國家的性質。

這樣，無產階級便在蘇維埃制度中找到了正確地解決民族問題的鑰匙，它在蘇維埃制度中發見了依據民族平等和自願的原則而組織堅固的多民族國家的道路。

(七)不過找到正確地解決民族問題的鑰匙，還不是說已經完全而澈底地解決了它，還不是說這一解決的具體而實踐的實現，已經完善無遺。爲了把十月革命所提出的民族綱領正確實施到生活中去，還需要克服那過去民族壓迫時期所遺留給我們的障礙，這些障礙是不能一下子在最短期間就能克服的。

第一，這種遺產，便是大國的排外愛國主義的殘餘，這種排外愛國主義乃是從前大俄羅斯人的特權地位的反映。這種殘餘，還在我們中央與地方蘇維埃工作人員的頭腦中活着，它們巢居在我們中央與地方的國家機關裏面；它們以「新的」路標更換派的大俄羅斯愛國主義的觀念（這種觀念，因實行新經濟政策的關係，而日益加強）的方式而取得援助。在實踐上，它們表現爲俄羅斯蘇維埃官吏對各民族共和國困苦與要求的

輕視與官僚的冷淡態度。多民族的蘇維埃國家，要能真正牢固，其中各民族的合作，要能真正親睦，只有這些殘餘在我們國家機關的實踐中堅決而澈底地剷除時才行。在好多民族共和國（烏克蘭、白俄羅斯、阿才倍疆、土耳其斯坦）內，因蘇維埃政權底基本支柱——工人階級，大半屬於大俄羅斯民族，因之，形勢更加複雜。在這些區域內，城市與鄉村，工人階級與農民間的聯合，碰到了黨的機關以及蘇維埃機關中大俄羅斯排外愛國主義殘餘的猛烈障礙。在這種條件之下，俄羅斯文化優越的議論和較高的俄羅斯文化必需征服比較落後的各民族（烏克蘭、阿才倍疆、烏芷別克、克耳基斯等民族）文化的理論之提出，無非是想鞏固大俄羅斯民族統治的企圖。所以，反對大俄羅斯排外愛國主義殘餘的鬥爭，乃是本黨的頭一個迫切的任務。

第二，這種遺產便是各共和國聯盟（蘇聯）內各民族事實上的、即經濟與文化上的不平等。十月革命所獲得的法律上的民族平等，乃是各民族的偉大獲得，但是它本身並未解決整個民族問題。好多共和國和人民，還沒有經過或者差不多還沒有經過資本

主義，還沒有或者差不多還沒有自己的無產階級，因此之故，在經濟上和文化上都落在後邊，所以這些共和國和人民，都不能完全地享用民族平權所給予的權利和可能，要是沒有外來的有效而長期的幫助，牠們都不能高升至最高的發展階段，因而，都不能趕上走在前面的各民族。這種事實上的不平等的原由，不僅藏在這些民族的歷史裏面，而且藏在沙皇制度和俄羅斯資產階級的政策裏面，因為沙皇制度和俄羅斯資產階級力謀把邊疆變爲純產原料的區域，而受工業發展的中央區域所剝削。要在最短期間克服這一不平等，要在一兩年內消滅這一遺產，那是不可能的。本黨第十次大會，就指出謂：『事實上的民族不平等的消滅，乃是一個長期的過程，這一過程需要與民族壓迫和殖民地奴隸制的一切殘餘，作頑強而堅決的鬥爭』。但是它必須要克服的。要克服它，只有俄羅斯無產階級對聯盟的各落後民族在其經濟與文化的繁榮上須有有效而長期的幫助才行。這一援助首先應表現於採取各種實踐的方法，去在從前被壓迫的各民族共和國內，建立工業中心，最高度的吸收當地居民來參加。其次，這一援助

，依照黨的第十次大會的決議案，應與勞動羣衆反對因新經濟政策關係而日益加強的當地和外來的剝削上層份子，以鞏固自己社會立場的鬥爭，同時並進。因爲這些共和國主要都是農業區域，所以，內部的社會設施首先應從將空閑的公地分配給勞動羣衆辦法着手。不然的話，要希望樹立一個統一的聯盟國家範圍內各人民的正確而固牢的合作，那是沒有理由的。所以，爭取各民族事實上不平等的消滅，爭取各落後人民文化 and 經濟水平的提高，乃是我黨的第二個迫切的任務。

第三，這種遺產就是好多民族中間民族主義的殘餘，這些民族曾經過民族壓迫的苦重羈絆，還沒有解除舊的民族恥辱的感覺。這種殘餘的實踐的表現，則爲若干民族的分離主義與從前被壓迫的各民族缺乏對於俄羅斯人所採取的各種辦法的信心。但是在有幾個民族的一些共和國內，這種防禦的民族主義，往往變成了攻勢的民族主義，變成了比較強盛的民族用以反對這些共和國內弱小民族的難以矯正的排外愛國主義。喬治亞人反對亞美尼亞人、奧雲廷人、亞黎爾人及阿布拉柴人的排外愛國主義（在喬

治亞)；阿才培爾人反對亞美尼亞人的排外愛國主義(在阿才培爾)；烏茲別克人反對土克門人及吉爾吉斯人的排外愛國主義(在布哈拉和霍列姆)；亞美尼亞的排外愛國主義等，——所有這幾種排外愛國主義受新經濟政策和競爭的條件所激勵，更加厲害，牠們都是最大的害處，這種害處有使若干民族共和國變為磨擦與吵鬧舞台之虞。不用說，所有這些現象都阻礙了各民族真正聯合而為一個統一的國家聯盟的事業。民族主義的殘餘，既是防禦大俄羅斯排外愛國主義的特殊方式，那末對大俄羅斯排外愛國主義的堅決鬥爭，乃是克服民族主義殘餘的最好手段。這些殘餘既變為反對各個共和國內弱小民族集團的地方排外愛國主義，那末反對它的正面鬥爭乃是每個黨員的義務。所以，反對民族主義殘餘，尤其反對這些殘餘的排外愛國主義方式的鬥爭，乃是我們黨的第三個迫切任務。

(八)中央和地方的大部分蘇維埃官吏，把蘇聯並不是視為保護各民族共和國自由發展的數個同等的國家單位的聯盟，而視為取消這些共和國的一個步驟，視為成立

所謂「一個不可分割體」的開端，這一事實必須認爲是舊遺產的鮮明表現之一。

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有些官廳，力謀使各自治共和國的獨立人民委員會服從自己和開闢取消各自治共和國道路的趨向，可說就是這種舊遺產的結果。

大會指斥這種理解認爲是反無產階級的和反動的，並宣佈各民族共和國有生存和進一步發展的絕對必要，因之，大會號召黨員們要銳敏地注視，爲的使各共和國的聯合與各人民委員會的合併，不要被有排外愛國主義情緒的蘇維埃官吏用作他們想輕視各民族共和國經濟文化需要的企圖的掩護物。各種人民委員會的合併是對蘇維埃機關的一個考試；假使這一經驗在實踐中獲得了大國主義的趨向，那末本黨就不得不採取最堅決的方法，以反對這種曲解，迄至提出重新審查若干人民委員會合併的問題，以後並將蘇維埃機關，根據真正無產階級和真正親睦注意弱小民族及落後民族需要的精神，加以重新訓練。

(九)乃是根據各共和國工人和農民平等和自願原則而成立的，它是無產階級調

劃各獨立國家國際相互關係的頭一個經驗，同時又是成立未來的『全世界勞動蘇維埃共和國』的頭一個步驟。各共和國聯盟（蘇聯）既是各民族共居的一個新方式，既是各民族在一個聯盟國家內合作的方式，而在這個國家內，上邊所說的那些殘餘，應在各民族共同工作過程中加以消滅，那末聯盟最高機關的構造應是這樣的，就是牠們不僅要完完全全地反映聯盟內一切民族的共同需要與要求，而且要完完全全反映各個民族的特殊需要與要求。因此，除聯盟的現有的中央機關（這些機關是整個聯盟勞動羣衆的代表機關，與民族無關）外，還應當設立一個以平等爲原則的特殊的各民族代表機關。這個聯盟中央機關的組織，要有充分的可能，去銳敏地注意各民族的需要與要求，隨時對牠們予以必要的幫助，創造完全相互信任的環境，以使用最妥善的方法去消滅上邊所述的那些遺產。

（十）大會根據上述各點向各黨員推薦下列實踐的方法：

1. 在建立聯盟各中央機關時，須要保證各共和國在其相互關係上以及在對聯盟中

央政權關係上權利與義務的平等；

2. 在聯盟（蘇聯）最高機關體系內，設立一個基於平等原則的一切民族共和國和民族自治區的特殊代表機關，務使包括在這些共和國內的一切民族，都有代表參加；

3. 聯盟的各執行機關，應是根據可以保證各共和國代表真正參加它們並滿足聯盟各民族需要與要求的原則而組成的；

4. 對各共和國須予以充分廣大的財政上的，尤其預算上的權利，以保證它們自己國家行政機關的，文化的及經濟的自動精神之表現的可能；

5. 各民族共和國和各民族區的機關，主要應是由熟悉各該民族的語言、生活、道德、習慣的當地人來組成的；

6. 頒佈特殊法律，以保證一切國家機關及一切給當地異民族居民和少數民族服務機關使用本民族語言，凡違犯民族權利——尤其少數民族權利者，須以革命的

嚴峻方法，加以懲辦；

7. 加強紅軍中的教育工作，貫輸以聯盟各民族親睦和休戚相共的觀念，並採取實際的方策，來組織民族的軍隊，並遵守保證各共和國充分自衛力所必要的一切方法。

二

(一) 在多數民族共和國內，我黨組織的發展，是在並非完全利於牠們生長和鞏固的條件之下進行的。這些共和國的經濟上的落後性，民族無產階級的爲數稀少，當地人中間老的黨的工作人員幹部的不夠或甚至缺乏，用本族語言刊行的鄭重的馬克思主義讀物的缺乏，黨的教育工作的薄弱，與夫急進民族主義傳統（還來不及消滅）的殘餘的存在，左右都在當地共產黨員中間產生了偏於過度重視民族特點、輕視無產階級的階級利益方面的一定傾向，偏於民族主義的傾向。這種現象，在有幾個民族的共

和國內，便成了特別危險的現象，在這些共和國內，這種現象往往採取了趨向於強大民族的共產黨員的排外愛國主義之傾向方式，這一傾向的鋒芒，是朝向反對弱小民族（喬治亞、阿才倍疆、布哈拉、霍列姆）的共產黨員。民族主義的傾向，阻止了民族無產階級從民族資產階級的思想影響之下解放出來的過程，使團結各民族無產者而為一個統一的國際主義組織的工作，極感困難。這是民族主義傾向的害處。

（二）別一方面，在黨的中央機關中以及在各民族共和國的共產黨的組織中，俄羅斯出身的老的黨的工作人員幹部，為數極多，他們不熟悉這些共和國勞動羣眾的道德、習慣、及語言，因而並非常常會看到他們的需要，這種現象，在我黨裏邊，產生了一種在黨的工作中輕視民族特點和民族語言的傾向，極度鄙視這種特點的態度，趨向於大俄羅斯排外愛國主義的傾向。這一傾向也是有害的，這不僅因為它阻止了從知道民族語言的當地人中間訓練共產主義幹部的工作，造成了使黨與各民族共和國無產階級羣衆脫離的危險，而且首先是因為它滋生和培養着上述所說的民族主義的傾向，

使反對它的鬥爭，感受困難。

(三)大會指斥這兩種傾向，認爲它們是對共產主義的事業有害的和危險的，請求每個黨員注意大俄羅斯排外愛國主義傾向的特別的害處與特別的危險；同時，大會號召全黨要從速消滅我黨的建設中的這些舊的殘餘。

大會委託中央委員會進行下列各項，作爲實踐的方法：

1. 成立高級的馬克思主義研究班，以訓練各民族共和國當地的黨的工作人員；
2. 發展用本族語言刊行的原則的馬克思主義讀物；
3. 擴充東方人民大學及其在各地的分校；
4. 在各民族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之下設立由當地工作人員組成的指導員組；
5. 發展用本族語言刊行的黨的羣衆讀物；
6. 加強各共和國內黨的教育工作；
7. 加強各共和國青年中的工作。

(四)大會鑒於各自治共和國和獨立共和國以及一般邊區內的負責工作人員活動(實現該共和國勞動者與聯盟其餘共和國勞動者的聯繫)的極端重要，特委託中央對於這些工作人員的揀選，務須慎重，以便他們的成份能完完全全地保證黨的關於民族問題的各項決定之切實施行。

摘自關於中央報告的議決案

——一九三〇年七月間聯共(布)第十六次大會通過——

大會指出，隨着國內階級鬥爭的尖銳化，黨的隊伍中偏於大國排外愛國主義和地方排外愛國主義方面的民族傾向，日益積極化。

在現階段上，大國的傾向乃是主要的危險，這一傾向企圖修改列寧的民族政策的基礎，並在國際主義旗幟之下掩護着從前立於支配地位的大國民族之死亡階級挽回他們業已喪失的特權的志向。與此並行的，地方民族主義的傾向也積極起來了，這一傾向削弱了蘇聯各民族的統一，而作了干涉者手中的玩具。

黨應當加強反對民族問題上的兩種傾向及對兩種傾向的調和主義的鬥爭，同時，對於列寧民族政策的實施，民族不平等成份的消滅以及蘇聯各民族文化的廣泛發展，予以更大的注意。

摘自黨綱

——一九一九年三月間俄國共產黨（布）第八次大會通過——

在民族關係方面

在民族問題上，俄國共產黨以下列幾點爲方針：

（一）把各民族無產階級及半無產階級接近的政策，放在首位，以便進行共同推翻地主和資產階級的革命鬥爭。

（二）爲了克服被壓迫國家的勞動羣衆方面對壓迫他們的國家之無產階級之信任，務須消滅任何民族集團的一切特權，實行各民族完全平等，承認各殖民地和平等民族有國家分立之權。

（三）爲了同一目的，黨主張按蘇維埃方式組織的各國家，實行聯邦式的聯合，這是達到完全統一的過渡方式之一。

(四)誰是各民族分立意志的代表者，俄國共產黨在這一問題上是抱着歷史的和階級的觀點，而考慮到某一民族是處在其歷史發展的那一階段上：是處在從中世紀制度到資產階級民主制度之途上，還是處在從資產階級民主到蘇維埃或無產階級民主之途上。

不論如何，壓迫民族的無產階級方面，對於被壓迫民族或平等民族勞動羣衆的民族感覺的殘餘，務須特別慎重，並須加以特殊的注意。只有在這種政策之下，才可以建立國際無產階級的各種民族份子真正牢固的自願統一之條件，好多民族的蘇維埃共和國團結在蘇維埃俄羅斯周圍的經驗，便表明了這一點。

二 註解

(一)『馬克思主義與民族問題』一文，寫於一九一二年末和一九一三年初，第一次署名K. 斯大林，登載於一九一三年出版之布爾塞維克雜誌『啓蒙』第三——五期，題爲『民族問題與社會民主黨』。一九一四年該文出版爲單行本，取名『民族問題與馬克思主義』，由彼得堡普里波伊出版社發行。一九二〇年，民族問題人民委員會將該文再版，編入斯大林『民族問題論文集』內（杜拉國家出版局發行）。這本論文集前面有一篇序言『作者的幾句話』，其中關於本文有下列一段話：

『本文係反映帝國主義大戰開始前一年半地主沙皇反動時代，即俄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生長時代俄國社會民主黨隊伍中關於民族問題原則論戰的時期。當時有兩種民族理論在相互鬥爭着，因之也就有兩種民族綱領：一種是奧地利的，爲

猶太工人同盟和孟塞維克所支持；一種是俄羅·斯·的，布爾塞維克的。讀者在本文中即可找到關於兩派的評述。後來的事件，尤其帝國主義大戰和奧匈的瓦解而爲各個民族國家，十二分明顯地表明了真理是在那一方面。現在希普林格和巴威爾二氏坐在他們的民族綱領的破槽旁邊，不庸置疑的，歷史是在譴責「奧地利學派」的。甚至猶太工人同盟也不得不承認，「在資本主義制度範圍以內所提出的民族文化自治（即奧國民族綱領——斯）的要求，在社會主義革命條件之下喪失了自己的意義」。〔見一九二〇年出版之「猶太工人同盟第十二次會議」〕猶太工人同盟也不懷疑，這樣一來，牠就等於承認（出其不意地承認）奧國民族綱領理論基礎的原則上的破產，就等於承認奧國民族理論的原則上的破產。〔（第一頁）〕

（二）西翁主義是一個反動的民族主義的政治派別，擁護者多爲猶太商業和手工業中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商店店員，手工業者及猶太工人最落後的一層，其目的是在巴勒士坦組織自己的猶太資產階級的國家，力謀使猶太工人羣衆孤立起來，脫離

無產階級的一般鬥爭。(第二頁)

(三)大同教主義係土耳其人、韃靼人等上層份子(可汗、主教、地主、商人等等)的政治意識形態，力謀把一切信仰伊斯蘭教(回教)的人民聯合而為一個整體。大土耳其主義與大同教主義相近，力謀把信仰回教的土耳其民族在土耳其人權力之下聯合起來。(第二頁)

(四)猶太工人同盟係立陶宛、波蘭、俄羅斯等地猶太工人總會，於一八九七年九月間在維爾諾代表大會上成立，主要在猶太手工業者羣衆中曾發展了廣泛的工作。猶太工人同盟在一八九八年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一次代表大會上加入該黨，作爲一個自治的組織，僅在專門關於猶太無產階級的問題上是獨立的。一九〇一年前，在政治要求中，猶太工人同盟曾特別提出，猶太人公民平等的要求。在一九〇三年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二次大會上，猶太工人同盟曾要求承認他是猶太無產階級的唯一代表者，並基於聯盟原則從事建黨，因大會否決這一要求，該同盟乃退出黨。猶太工人同

盟在其一九〇五年第六次大會上，提出『民族文化自治』的要求，主張『將一切與文化問題有聯繫的機能（國民教育等）從國家和地方及區域自治機關的權限內劃出，交給各民族自己特設的地方與中央機關，這些機關係根據普遍的、平等的、直接的及秘密的投票方法所選出的』。猶太工人同盟跟俄國社會民主黨在一九〇六年第四次（斯托霍姆）大會後，再度聯合。這次大會將猶太工人同盟民族綱領的問題，暫時擱置下來，並未討論。在黨內鬥爭中，猶太工人同盟大多抱着右傾立場，而爲少數派所支持，從一九一二年起，該同盟且與取消派發生密切的組織關係。在世界大戰期間，猶太工人同盟（除少數國際主義的份子以外）曾持着防守立場，而在俄國二月革命後，曾支持聯合政府，而反對多數派。一九一八年末，猶太工人同盟內開始組織了左派，一九一九年五月間烏克蘭退出的『猶太工人共產主義同盟』在基也輔舉行第一次會議，在該會上它與『猶太人合衆共產黨』合併，而爲一個『猶太共產主義同盟』，此同盟於一九一九年八月間通過加入俄國共產黨（布）。在白俄羅斯，猶太工人同盟左翼，曾組

織爲「猶太共產黨」，於一九一九年三月間也併入俄國共產黨（布）。最後，於一九二一年三月間，在明斯克會議上，猶太工人同盟殘餘，乃通過一決定，正式加入俄國共產黨（布），僅將以亞布拉維赤爲首的一小部分留在黨外了。尙在事前，即一九二〇年，猶太工人同盟在其第十二次會議（此次會議承認對蘇維埃政權有放棄反對策略的必要），正式承認他的主要的民族主義的要求——「民族文化自治」爲無用，而宣佈謂「置在資本主義制度範圍以內的民族文化自治要求，在社會主義革命的條件下面已經喪失了它的意義」。（第三頁）

（五）猶太工人同盟第九次會議，係於一九二二年六月間在維也納舉行，曾討論與第四屆國會選舉和召集八月會議（取消派的，大家都知道，猶太工人同盟派會參加該會議，參看註解第六）有關的各項問題。猶太工人同盟第九次會議的決定，帶着極端機會主義和取消主義的性質（取消共和國的口號，放棄非合法的工作，忘記無產階級的革命任務）。此次會議批准了猶太工人同盟與少數派，取消派及波蘭社會黨「左

派」的公開聯合。(第三頁)

(六) 係指一九二二年八月間在維也納舉行的所謂取消派八月會議而言，該會議的目的是在組織反多數派聯盟。取消派，猶太工人同盟，拉特維亞人及高加索社會民主主義者的一部份，都參加該會議，會議的主要組織者和鼓勵者則為托洛茨基。關於該會議對於民族問題的決定及對這一決定的批評，請看本書八七——九五頁。(第四頁)

(七) 猶太工人同盟第四次大會係於一九〇一年四月底在白洛斯托克舉行。大會曾宣佈「民族」一概念適用於猶太人民，俄羅斯應改組為各民族聯邦，其中每一民族實行完全的自治，不拘他們所居住的地域；並提出民族平等的口號來代替從前它的公民平等的要求；且提出俄國社會民主黨依據聯盟原則加以改組的要求。大家都知道，所有這些要求以及在這次大會上所提出而後來在猶太工人同盟刊物上加以支持的「民族文化自治」的要求，曾引起了舊「火星」派方向，尤其列甯（參看他的全集第五、第六兩卷各文）方面反對猶太工人同盟的猛烈論戰。(第三四頁)

(八) 奧國社會民主黨的布隆大會，係於一九九九年九月二四——二九日舉行。大會上辯論的中心問題則爲民族問題。大會否決了南斯拉夫社會民主黨堅持治外法權的民族文化自治觀念的議決案，而通過了聯合執行委員會（中央委員會）所提議的議決案，這個議決案要求隔離的各民族區域聯合起來，因之，它可說是擁護中央集權國家觀念的德奧社會民主黨與站在民族主義立場上的南斯拉夫、捷克等社會民主黨間的妥協。在組織問題上，布隆大會比文伯克大會（參看註解十一）跑的更遠，它使各民族社會民主集團孤立起來，把黨的中央管理機關改組爲聯盟機關，由各民族社會民主組織（德國的，捷克的，波蘭的，烏克蘭的，意大利的，南斯拉夫的）執行委員會來組成的。（第三四頁）

(九) 『多謝上帝，我們沒有議會』，這是沙皇財相（後任總理）柯可錯夫於一九〇八年四月二十四日在國會上所說的。（第三九頁）

(一〇) 這幾句話係引自馬、恩『共產黨宣言』第二章『無產者與共產黨員』。

（第五四頁）

（一一）奧國社會民主黨維也納大會（又借用了開會邸宅的名稱，叫做文伯克大會），係於一八九七年六月六日——十二日舉行。在這次大會上，從前統一的黨會分裂爲六個獨立的民族社會民主集團（即德國的，捷克的，波蘭的，烏克蘭的，意大利的，南斯拉夫的），這六個集團僅由總的代表大會和總的中央委員會聯絡起來。

（第五六頁）

（一二）係指於一八四四年登載在「德法年書」內的馬克思的「論猶太問題」一文而言，馬克思在該文中係駁斥德國自由思想急進派領袖——布魯諾巴威爾。該文有幾個俄語譯本。現收集在莫斯科馬恩學院所編的「馬恩全集」（一九二八年出版）第一卷內。（第五八頁）

（一三）猶太工人同盟第六次大會於一九〇五年十月間在朱利里（瑞士）舉行。在這次大會上，猶太工人同盟最後規定了它的民族綱領，提出「成立公法機關」的要

求，這種公法機關『只可以民族文化自治的方式，鑄成治外法權的自治』，而民族文化自治『需要以下列兩點爲前提：第一，將與文化問題有聯繫的一切職能，從國家和地方及區域自治機關的權限內劃出；第二，將這些職能交給各民族自設的地方的與中央的特殊機關，這些機關係根據普遍、平等、直接及祕密的投票方法由全體人員選舉出來的』。（第六〇頁）

（一四）猶太工人同盟第八次會議係於一九一〇年九月間在里窩夫（加里西亞）舉行。會議的主要注意力是集中於猶太公社和星期六休息的問題，關於此問題的議決案證明，以後猶太工人同盟的民族主義，更其加強。（第六六頁）

（一五）猶太工人同盟派和高加索社會民主黨『使社會主義適應於民族主義』一句話，普列漢諾夫在其『又是一個分裂的會議』一文中，即已使用過，普氏此文登載在一九一二年十月十五日『黨報』（一九二一—二四年普列漢諾夫派）『少數派黨員』與『多數派黨員』——調和派的機關報，第三期上面。普氏在此文裏曾嚴厲地

指責取消派八月會議的召集及決定。(第七一頁)

(一六) 指柯索夫斯基致取消派雜誌『我們的曙光』(一九二一年第九——十期)編輯部的一封信而言，此信標題爲『不可寬恕的蠱惑宣傳』，柯索夫斯基在此信中係駁斥上面的註解中所說的普列漢諾夫在『護黨』第三期所發表的『又是一個分裂的會議』一文。(第七一頁)

(一七) 猶太工人同盟第七次大會係於一九〇六年年底在里窩夫(加里西亞)舉行。大會贊成猶太工人同盟根據俄國社會民主黨第四次大會(斯托霍姆)所通過的章程，加入該黨，但保留『猶太工人同盟加入俄國社會民主黨和接受它的綱領時，則保持自己的對於民族問題的綱領』。第七次大會以後猶太工人同盟便完完全全激頭激尾地轉到少數派的路上去。(第七二頁)

(一八) 『我們的話』，係猶太工人同盟的合法的週刊，於一九〇六年在維爾諾出版。共只出版了九期。(第七三頁)

(一九)係指波蘭社會黨「左派」耶格羅當選爲第四屆國會華沙代表而言，此事爲猶太工人同盟和波蘭社會黨跟猶太資產階級民族主義者爲了對付波蘭社會民主黨復選人（在工人複選人委員會中佔着多數）的票數而勾結在一起所幹的。第四屆國會內社會民主黨黨團，鑒於當時取消派在該黨團內佔着多數，乃通過非社會民主黨員耶格羅加入自己的團體，這遂支持了猶太工人同盟的分裂舉動，加深了波蘭工人當中的分裂。關於這一點，請參看斯大林於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一日在真理報第一八二期上所發表的「社會民主黨黨團的一位無全權的委員——耶格羅」一文。（第七四頁）

(二〇)舊「火星報」，即一九〇〇——一九〇三年一時期的「火星報」（到五一期爲止），其時列甯曾積極參與該報的編輯工作，所以如此稱呼者，是爲了跟新「火星報」有所區別，因爲新「火星報」已改取少數派的立場了。舊「火星報」會跟猶太工人同盟的民族主義作過極頑強的鬥爭。「火星報」連列甯在內曾發表了好多文章，批評猶太工人同盟及其關於民族問題和黨的組織建設問題的立場。（第七四頁）

(二二) 加爾溫尼克係奧國議會和布隆省議會的捷克社會民主黨代表，布隆病院院長，捷克分離主義者領袖之一。一九一〇年溫尼克曾在『平等』雜誌上面，連續發表了好幾篇文章，題爲『我們願受人監護呢還是願成爲自由人？』擁護分離主義的觀念，而充滿着民族的排外愛國主義。這些文章（並出版有單行本）和其他文件均收在奧國五金工人工會所出版的『分離主義文獻』一書裏面，奧國五金工人工會想用出版本書的方法去阻止溫尼克、布里安、杜沙爾等捷克分離主義者領袖所領導的捷克工人運動的分裂的發展。

斯大林在這裏所述溫尼克小冊子中的一段話如下：

『要是捷克人民的消費力量認爲不須依賴於自己手工業者、商人、及工業家的服務，那末捷克工人尙在社會實行復活前怎樣能夠拯救自己兒女的滅亡或保證他們在將來有比他們以往遭遇的更好的生存呢？』

如果捷克工人羣衆把自己的經濟基礎交給他人，把生產的可能性，把置在金

錢中的可用的力量，交給別一民族的同志們，他們怎樣能夠期待在未來的國家內他們可以得到他們在權利上所應得的東西，在政治關係上，在社會關係上，在民族關係上他們可以平等呢？」（第七六頁）

（二二）X氏是喬治亞少數派領袖，——約旦尼的筆名，約氏曾爲喬治亞少數派政府的首領，現爲僑居國外的白俄僑民，積極主張干涉蘇聯。（第七八頁）

（二三）『我們的生活』係喬治亞少數派的日報，於一九一二年在庫泰斯出版。共出了十九期。這裏斯大林所引的一段話，係摘自約旦尼的一篇論文，該論文題目爲『奮的與新的』，登載在該報第十一——十四期上面。（第七九頁）

（二四）俄國社會民主黨（在一九〇三年第二次大會上所通過）黨綱關於自決的一條，原文如下：『凡加入國家機構的一切民族，都有自決之權』（第八八頁）

（二五）係指第一次巴爾幹戰爭而言，此次戰爭開始於一九一二年十月，參戰國一方面爲保加利亞、塞爾維亞、希臘、及黑山；一方面爲土耳其。此次戰爭乃協約國

列強（法、英、俄）利益與三角同盟列強（德、奧、匈、意）利益在巴爾幹半島上衝突的結果。不論這次戰爭或第二次巴爾幹戰爭（一九一三年，是因昨日的同盟國之間分贓不均而爆發的，結果保加利亞毀滅），僅使帝國主義者在巴爾幹的矛盾絲結更形加緊，而作帝國主義世界大戰的序幕。（第九六頁）

（二六）這裏係就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四（所謂『第三次全俄會議』，舉行於一九〇七年十一月十八日至二十五日）第五（所謂『十二月會議』，舉行於一九〇九年一月三日）至九日，即俄國舊歷爲十二月二十一至二十七日）兩次會議的決定而言。兩次會議的議決案均收入在馬恩列學院所出『大會、會議、中央全會等議決案和決定中之聯共（布）』一書內。（第一〇五頁）

（二七）參看註解一九（第一〇五頁）

（二八）多數派第七次（四月）全俄會議，係於一九一七年五月七——十二日（俄國舊歷四月二十四至二十九日）在彼得堡舉行，對於民族問題的研究曾予以極大的

注意。斯大林報告民族問題，擁護列甯所起草（參看『附錄一』第一節）的議決草案，而比塔柯夫則站在反列甯的觀點上，否認『民族自決權』口號，他代表民族問題組，對斯大林的報告，提出一反報告，以示對抗。狄茲任斯基（他表現了波蘭社會民主派——盧森堡的觀點）和馬哈拉才都是擁護比氏的立場的。列甯關於此問題曾作了一篇很長的演說（參看全集二卷二七五——二七八頁）。會議否決了比塔柯夫所提議的議決草案，而以壓倒多數票通過了斯大林所擁護的議決案。關於討論記錄，詳見黨史編纂局所編『一九一七年四月間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多數派）的彼得堡全市與全俄會議』一書，一九二五年出版。（第一〇七頁）

（二九）係指中央與黨的工作人員所謂一九一三年『二月』聯席會議而言，此會議於一九一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一九一三年一月一日在克拉克夫舉行。會議關於民族文化自治通過下列決定：

「赤洪克里同志代表『國會』黨團，以『成立每一民族自由發展的必要機關』

的方式，擁護民族文化自治，乃是對黨綱的直接違犯。在本質上與此完全相同的公式，曾由確定黨綱的第二次大會，以特殊的表決方式所否決。對民族主義情緒的讓步，甚至在這種擁護方式之下，也是對無產階級政黨不許可的。」（第一一

三頁）

（三〇）『十月革命與民族問題』一文，曾收在『斯大林民族問題論文集』（一九二〇年出版，民族人民委員部編）一書內，該論文集序言：『作者的幾句話』內關於本文有下列一段話：

『……本文反映着十月革命後的一時期，那時蘇維埃政權戰勝中央俄羅斯的反革命以後，曾跟各邊疆的民族資產階級政府，曾跟反革命的策源地發生衝突，那時協約國感於蘇維埃政權對於牠們（協約國）殖民地的影響日益增長，便公開地贊助各邊疆民族資產階級政府，以期窒息蘇維埃俄羅斯，那時在反對各邊疆民族資產階級政府的勝利的鬥爭過程中，在我們的面前發生了一個關於各區蘇維埃自

治具體方式，關於在各邊疆成立自治蘇維埃共和國關於蘇維埃俄羅斯經過俄羅斯東方各邊疆普及於東方各被壓迫國家，關於成立西方和東方反對世界帝國主義統一革命戰線的實踐問題。本文指出了民族問題與政權問題的不可分離的聯繫，把民族政策是當作被壓迫人民和殖民地總問題的一部分來處理的，這正是通常『與地利學派』，少數派，改良派，第二國際所反對而爲以後事件的全部行程所證實者』。(第一一七頁)

(三一)烏克爾的中央『拉打』，係於一九一七年四月間在烏克蘭小資產階級政黨和民族主義組織的大會(在基也輔舉行)上成立的。『拉打』曾經與採取壓迫方法以壓服民族運動的俄國臨時政府常常發生尖銳的衝突。十月革命後，『拉打』即變成『在民族民主方式掩護下的資產階級反革命』(斯大林)的支柱。斯大林在其向全俄第三次蘇維埃代表大會的報告(一九一八年一月)中，關於『拉打』所領導的小資產階級富農『社會主義者』詳述如下：

『一般說來，他們在言論上宣佈自己是主張把一切土地交給人民的人，但是隨後他們用全體人民說明方法，把這一交給加以限制，而宣佈地主土地的一部分是不可侵犯的，是不應交給人民的。』

他們在言論上宣佈他們是忠於蘇維埃的，但在事實上他們跟蘇維埃作拚命的鬥爭，解除蘇維埃軍隊的武裝，逮捕蘇維埃工作人員，斬斷蘇維埃往後生存的任何可能。

在言論上，他們說效忠於革命，但在事實上則表明了他們是革命的最惡毒的敵人。他們說他們在反對頓河的鬥爭中保持中立態度，但是在事實上他們對於卡列金將軍予以直接的和公開的協助，幫助叛軍屠殺蘇維埃軍隊，不許把食糧運到北方去。』

在一九一八年二月間，『拉打』爲起義的烏克蘭工農所推翻，但旋由進攻烏克蘭的德奧聯軍所恢復。一九一八年四月間，『拉打』代表奧斯大林所領導的人民委員會

代表團，本來就要舉行和平談判（在庫爾斯克），但到這個時候斯柯羅巴茨基指揮官的叛變却完全取消中央『拉打』了。

關於『拉打』，並可參看斯大林的下面的一些論文和演講：『人民委員會論烏克蘭』（與巴金斯基同志的談話），見一九一七年十二月七日『消息報』第二三四期；『拉打的總秘書處與立憲民主黨卡列金的反革命』，見一九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真理報』第二〇九期；『答後方和前線的烏克蘭同志』，見一九一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真理報』第二一三期；『論拉打』（一九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在全俄中央執委會會議上的演說）；『何謂拉打？』見一九一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真理報』第二一五期；『論基也輔的資產階級的拉打』見一九一八年一月二十六日『真理報』第六期。（第一一八頁）

（三二）白俄羅斯的『拉打』，係小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的組織，是於一九一七年七月間在明斯克白俄羅斯民族組織大會上成立的，爲排外愛國主義的民族主義份子

所領導，於十月革命勝利以後，便加入蘇維埃政權的敵人的隊伍，公告解散地方蘇維埃，宣佈白俄羅斯人民共和國獨立，並致書威廉二世，申謝德軍佔領白俄羅斯。一九一九年一月一日，白俄羅斯臨時工農政府公告『拉打』爲非法，白俄羅斯宣佈爲蘇維埃共和國。（第一一八頁）

（三三）『斯法士柴里』（邊區會議）係羅馬尼亞參謀部代理人在被佔領的比沙拉比亞所成立的邊區『議會』，從一九一七年十一月起到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底止，由指派的（非選舉的）莫勒達維亞『民族黨』和好多器具管理人組織的代表所組成，有好多縣份和組織抵制未參加。一九一八年三月間，『斯法士柴里』，在甚至自己的大多數議員放棄投票之下，通過了一條法案，比沙拉比亞基於自治原則併入羅馬尼亞，一九一八年十一月間羅馬尼亞侵略者迫使『斯法士柴里』表決，比沙拉比亞完全（甚至無任何自治）併入羅馬尼亞。大家都知道，比沙拉比亞的合併，不論在當時或以後，都引起了居民反對羅馬尼亞侵略者的猛烈鬥爭，這一鬥爭不止一次匯合而成爲殘酷被壓服

的暴動（如霍吉暴動，韃靼布納爾暴動等）。（第一一八頁）

（三四）克里姆的『苦爾台』係於一九一七年十二月十日在巴赫赤萊城召集（以後在新菲羅波爾開會），大半爲追隨於韃靼民族主義的『人民黨』後的粗糲小資產階級之期望與情緒之表現者。『苦爾台』曾成立了一個克里姆韃靼『國民政府』，以切列比葉夫和沙達米特爲首，該『政府』在其活動中係憑藉於前在俄國反革命軍官指揮下的武裝力量（『陸戰隊』）。一九一八年一月間，『苦爾台』企圖把自己的武力與塞瓦斯托波爾軍事革命委員會對立起來，那時牠與『國民政府』同被驅逐，僅在德國佔領克里姆期間，牠又復活了若干時期。（第一一八頁）

（三五）巴什吉爾的『苦爾台』係於一九一七年十一月間在奧倫堡城召集。在牠的裏面，以瓦立多夫爲首的民族主義份子，演有最高支配的作用，這些份子都是代表巴什吉爾居民中一部分資產階級富農的利益。『苦爾台』所成立的以瓦立多夫爲首的巴什吉爾政府，進行反蘇維埃的活動，與杜多夫和柯爾恰克將軍們勾結在一起。但

是柯爾恰克政策（他頒佈了一道命令，取消巴什吉爾的自治）的大國的本質，曾使瓦立多夫政府在羣衆壓力之下於一九一九年宣佈轉到蘇維埃政權方面來。在巴什吉爾蘇維埃共和國成立以後，以瓦立多夫爲首的民族資產階級份子，很快就掀起反對蘇維埃政權之暴動，但是這一暴動並未得到巴什吉爾勞動羣衆的支持。（第一一八頁）

（三六）土耳其斯坦的自治政府，以唐什巴葉也、沙格亞赫米托夫、及喬卡也夫爲首，係於一九一七年十一月間在柯坎德（故亦稱『柯坎德自治』）所舉行的所謂全體回人的民族資產階級組織大會上成立的，以與當時在塔什干已有的人民委員會對抗。這一政府受白衛軍的支持，遂開始了土耳其斯坦的內戰，但它於一九一八年二月間即被塔什干和沙馬坎德紅軍支隊所消滅。（第一一八頁）

（三七）『蘇維埃政權對於俄國民族問題的政策』，曾收集在一九二四年民族人民委員部所出的『斯大林民族問題論文集』一書內，論文集序言：『作者的幾句話』內關於本文有下列一段話：

「本文係屬於今日俄羅斯基於區域自治而實行的尚未完畢的行政重新劃分的時期，係屬於在邊疆各地組織行政公社和自治蘇維埃共和國而作為蘇維埃俄羅斯構成部份的時期。本文的重心，就是關於認真實施蘇維埃自治的問題，即關於保證中央與邊疆間革命聯合的問題，這一聯合乃是反對帝國主義干涉方案的保障。本文堅決駁斥邊疆各地與俄羅斯分離的要求，認為這是反革命的把戲，也許有人以為奇怪。我們談印度、阿拉伯、埃及、摩洛哥及其他殖民地與協約國分離，因為這種情形之下的分離是表示這些被壓迫國家從帝國主義之下解放出來，是表示帝國主義陣地的削弱，是表示革命陣地的加強。我們反對邊疆各地與俄羅斯分離，因為這種情形之下的分離是表示邊疆各地的受帝國主義奴役，是表示俄國革命力量的削弱，是表示帝國主義陣地的加強。惟其如此，所以協約國反對印度、埃及、阿拉伯及其他殖民地的分離，而同時却力謀邊疆各地的與俄羅斯分離。惟其如此，共產主義者在力謀殖民地與協約國分離的時候，他們同時不能不反對邊

疆各地與俄羅斯的分離。顯然的，分離問題的解決是依具體的國際條件爲轉移的，是依革命的利益爲轉移的。」（第一三二頁）

（三八）係指新切林於外交人民委員長任內在『真理報』第五〇，五一，五二諸期（一九二一年三月六，七，及九日）上面所發表的幾篇論文而言，該論文題爲『反對斯大林同志的提綱』。（第一七四頁）

（三九）第二半國際所謂各國社會黨的國際聯合，於一九二一年二月間由革命高潮時期暫時退出第二國際的好多政黨（俄國少數派也在內）在維也納成立，領導者爲F·阿德勒、O·巴惠爾及L·馬爾托夫等。第二半國際的目的是在對抗共產國際在丟掉了失却信用的第二國際的工人羣衆當中的日益增長的影響。一九二三年第二半國際重新又與第二國際合併了。（第一八三頁）

（四〇）『東方人民宣傳與行動委員會』於一九二〇年九月間在巴庫東方人民代表大會上成立，其任務是在宣傳，幫助，並聯合東方解放運動，爲的在世界無產階級

革命一口號之下來反對帝國主義。存在了約有一年的工夫。該委員會並用俄語、土耳其語、波斯語，及阿拉伯語出版了自己的機關雜誌——「東方人民」。(第一八七頁)

(四一) 熱那亞、海牙會議係於一九二二年在熱那亞(意大利)和海牙(荷蘭)所舉行的國際經濟會議，參加者一面為資本主義國家(英、法、意、日及其他好多國家)，則一面為蘇維埃俄羅斯，目的在研討「恢復中歐和東歐經濟」的方法，但其本質是在解決「俄國」問題，換一句話說，是在確定蘇維埃俄羅斯與資本主義世界間的關係。蘇維埃俄羅斯「抱着實踐的目的——擴充貿易與創造它最廣泛最順利發展的條件」(列寧語)到熱那亞去，以便在這個會議上給外國資本以堅決的抵抗，因為外國資本力謀叫我們償付一切戰時與戰前的債務，歸還被收歸國有的一切外人的財產，在俄羅斯創立一種在本質上可把蘇維埃國家變為西歐資本殖民地法律與財政制度。(第二〇〇頁)

(四二) 烏·卡·特·係英國一實業家，於革命前在俄國握有廣大面積的土地、森林、

鐵礦、煤井等，以後充任柯爾恰克顧問，作了反對蘇維埃政權鬥爭的組織者之一。一九二二年九月間，烏卡特與蘇聯對外貿易人民委員長克拉辛訂立預備條約，根據該約，他從蘇維埃政府方面獲得了他從前在烏拉爾和卡沙克斯坦所有財產的大部分租讓權。但是這一條約的奴役條件，以及克爾遜爵士所領導的英國政府的極端仇視蘇維埃政權的政策『特別表現在力謀不許蘇維埃俄羅斯的代表參加洛桑會議（參看註解四十三）』，迫使蘇維埃政府不得不延期批准與烏卡特所訂的條約。（第二〇〇頁）

（四三）洛桑會議係於一九二二年十一月間爲希臘和土耳其之間締結和約所召集。參加者爲美、英、法、意、日、羅馬尼亞、南斯拉夫、希臘、及土耳其；蘇維埃俄羅斯，根據協約國，尤其英國的堅持，僅在討論韃靼尼爾海峽問題時，才允許參加。蘇維埃政府，對協約國的這一決定，曾提出了幾次強烈的抗議，在會議上並堅決主張除土耳其外，任何國軍艦均不許通過海峽，而猛烈反對帝國主義要求在平時和戰時軍艦均得通過海峽（其錄在反對蘇維埃俄羅斯）的主張。隨後協約國曾企圖把蘇聯代

表完全從會議上排斥出去，而一九二三年五月十日蘇聯代表伏羅斯基便在洛桑被白俄康拉狄槍刺殞命。（第二〇一頁）

（四十四）路標更換主義，係一九二一年國外俄國白黨僑民中間——主要是其知識份子中間所發生的一個派別，以N·V·烏斯拉洛夫爲首，他曾出版一冊『路標更換集』，隨後又出版了一個雜誌，也取名『路標更換』。『路標主義』，乃是正在日益生長且逐漸與富農及服務的知識份子攜手的新興資產階級的一種意識形態。新興資產階級曾提出了自己的意識形態——路標更換的意識形態，這一意識形態就在於共產黨定要蛻變，而新興資產階級應團結起來，並且不知不覺地布爾塞維克似乎要走人民主共和國的門關，以後更要越過這個門關，利用某一皇帝（他不是軍人提出的，也不是文官提出的）定要陷於普通的資產階級共和國的地位。（第二三五頁）

（四十五）漆什納基·係亞美尼亞小資產階級民族主義政黨，發生於九〇年代初，就其綱領講，頗近於俄國社會革命黨。在反動和世界大戰諸年，它執行了亞美尼亞資

產階級戰鬥先鋒和擁護沙皇主義利益者作用。一九一八年——一九二〇年，達什納基開始領導土耳其軍隊所造成的資產階級的亞美尼亞共和國，把它變爲英法干涉者及俄國白衛軍反對蘇維埃政權和共產黨的據點。在亞美尼亞蘇維埃化以後，它的首領，僑居國外，進行瘋狂的反對蘇維埃亞美尼亞鬥爭。（第二六三頁）

（四六）穆沙華派——「穆沙華」黨——係土耳其資產階級「民主」政黨，於一九一二年發生在巴庫，充滿着大回教主義與大土耳其主義。在一九一八年，曾作了阿才培疆的主要的反革命力量，舉行暴動反對巴庫公社，請求土耳其人以後乃至英國人幫助，跟工農運動作過殘酷的鬥爭。自一九二〇年阿才培疆蘇維埃化以後，它即失掉影響，現在僅在爲利於干涉蘇聯而活動的國外僑民中間存其同道者。（第二六三頁）

（四七）係指奧爾卓尼基才同志在第十二次黨的大會上所論的一件事實而言，奧爾卓尼基才謂喬治亞的「傾向主義者」，頒布命令，封閉喬治亞邊境，不許北高加索和伏爾加河流域飢民入境，並命令在邊境設置障礙物，遮斷交通，傾向主義者曾企圖

把此事緣罪於謝烈布亞柯夫（曾爲聯共中央派往喬治亞的一個委員會的主席），但未成功。（第二六五頁）

（四八）係指由狄慈任斯基、米茨凱維赤、及曼奴意斯基所組成的委員會及由奎貝雪夫（時爲聯共中央祕書）及加明涅夫所組成的委員會而言，兩委員會於一九三三年派往喬治亞，調查與喬治亞共產黨員中一小部分上層份子——即往往破壞黨的中央委員會決定的所謂『傾向主義者』（穆吉文尼，馬哈拉才，清查才）有關的一些問題。（第二六九—二七〇頁）

（四九）布哈林在黨的第十二次大會上的演說中，曾提出了下邊的一個論調，即斯大林在這兒所說者：

「……我們以從前大國民族的資格，應當橫斷民族主義的情緒，對民族派別予以更大的讓步，應使自己處於不平等的地位。只有在這種政策之下橫斷前進，只有在這種政策之下，我們用人爲方法使自己處於同他人比較更低的位置，只有

用這一代價，我們才能購得從前被壓迫民族對自己的真正信任」。(見聯共第十二次大會報告記錄，五六二——五六三頁)(第二七七頁)

(五〇) 這一段引證，係引自列寧的「論民族自決權」一文(見全集第十七卷，四六〇頁)(第二七九頁)

(五一) 這兩段引證，係引自列寧的「社會主義革命與民族自決權」提綱(見全集第十九卷，四一頁)(第二八三頁)

(五二) 中央與各民族共和國和民族區負責工作人員第四次聯席會議，係根據斯大林同志的動議所召集，一九二三年六月九——十二日在莫斯科舉行。會議日程的基本問題為斯大林同志關於實施第十二次大會對民族問題議決案實踐辦法的報告。有各民族共和國和民族區二十個黨的組織的代表，報告當地的情形。會議並討論蘇丹·加里也夫的問題，蘇丹·加里也夫的問題，蘇丹·加里也夫的問題，民族問題人民委員會幹事會幹事，會利用自己的負責職務成立非法的組織，為的反抗黨關於民族問題的措施，並與編

著反革命的力量——尤其與布哈拉、土耳其斯坦土匪發生聯繫。參加會議者除過中央委員及候補委員外，尚有各民族共和國和民族區的五十八個代表。關於會議的議決案，可看『大會，會議及中央全會議決案和決定中的聯共（布）』一書。（第二八四頁）

（五三）此段引證係引自一八五六年四月十六日馬克思致恩格斯的信（見亞多拉茨基所編馬恩書信集，一九三一年出版）（第三〇七頁）

（五四）關於中國國民黨，詳見本書所摘斯大林於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在聯共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全體聯席會議上的演說中的一段——『論中國』。（第三五五頁）

（五五）『馬丁諾夫主義』由馬丁諾夫從前有名的少數派，經聯共（布）第十二次大會通過，加入聯共（布）的隊伍名字得來的。馬丁諾夫在其關於中國革命問題的一篇論文中，曾提出了一個『不經與現存政權的堅決衝突和尖銳鬥爭，不經第二次革命』，而和平的轉向無產階級專政的論題。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反黨聯盟，企圖把

馬丁諾夫的這一條論題的責任，轉嫁於共產國際和聯共（布）的領導。（第三九五頁）

（五六）譚平山（前中共中央委員，有一個時期曾爲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於一九二七年在武漢政府農長任內，力謀阻止土地革命的發展。以後被開除黨籍。（第四〇七頁）

鄧力平

戰時社會科學叢書

柳湜
主編

本叢書第一輯係專為提供今日全國各大中學，各種軍事、政治、民運訓練班之基本課本。共十二冊。包括中國政治經濟社會民運歷史以及今日全國國民必修的「民族統一戰線」「抗戰形勢發展」等問題。態度客觀，取材實際，文字通俗，既合於教材，尤適於自修之用。

◀ 冊 各 出 已 ▶

宣傳技術讀本

曹伯韓著 實價三角

組織工作讀本

廖廬謙著 實價三角

國際現勢讀本

張仲實著 實價六角

三民主義讀本

許崇新著 實價三角

抗戰建國綱領問答

史枚等著 不日出版

各地生活書店發行

AL-SP. 2

AL-SP. 2

AL-SP. 2

AL-SP. 2